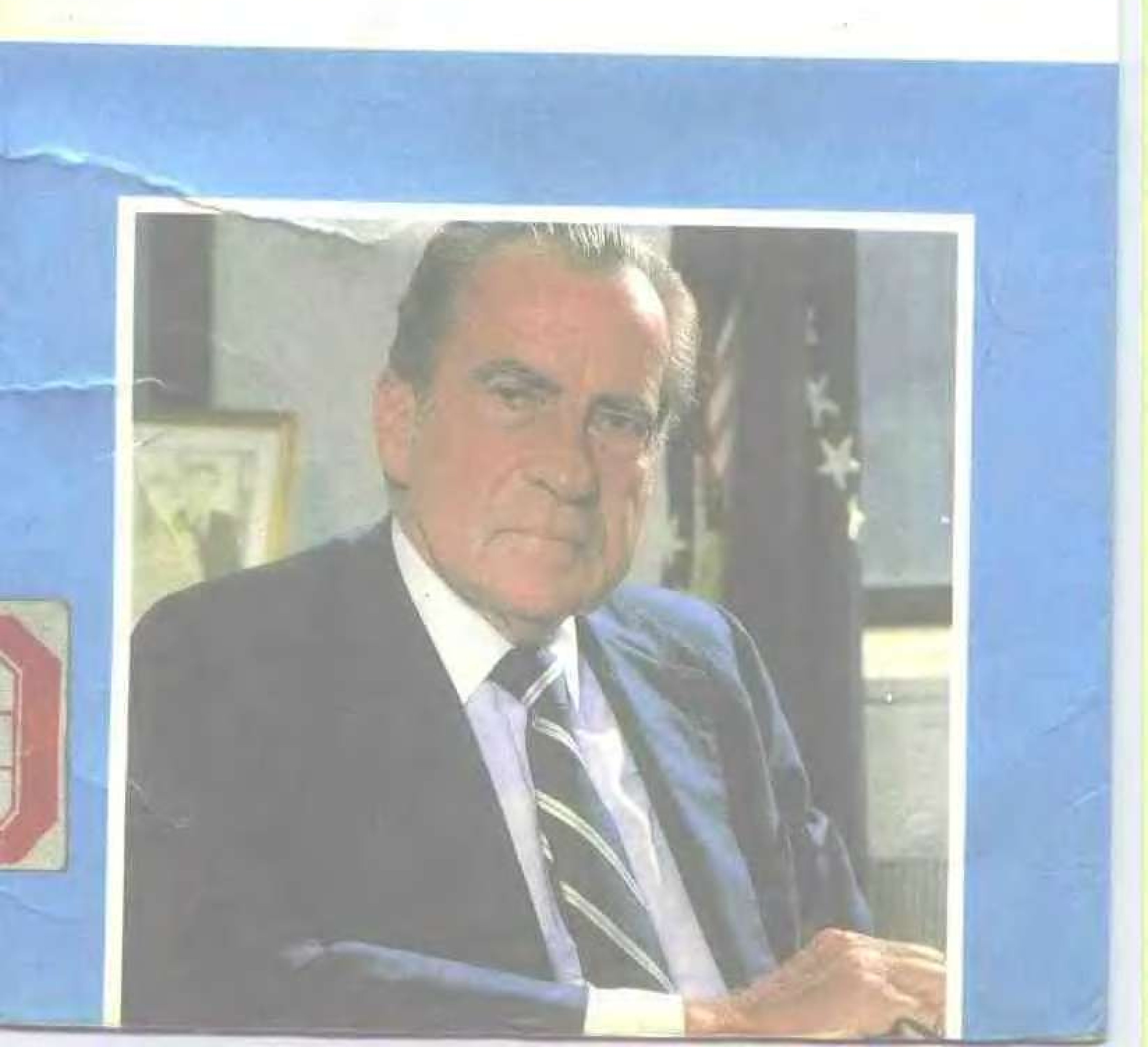
1999年：

不战而胜

〔美〕 尼克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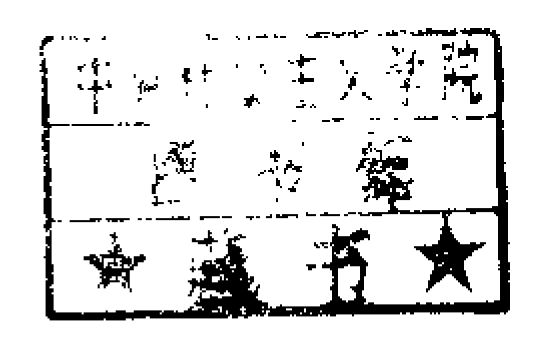




1999年：不战而胜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王观声　郭健哉　李建英
徐亚男　冯小兰　吴方方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VICTORY WITHOUT WAR

by

Richard Nixon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1988
根据美国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1988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今　晨
封面设计：施本铭

1999年：不战而胜

〔美〕理查德·尼克松 著
王观声　郭健哉　李建英　徐亚男　冯小兰　吴方方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11　字数：228000
1989年6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7次印刷

ISBN7 5012-0212 5 D·19　定价：4.40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88年出版的新作。尼克松写作本书时，正值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联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改革和新思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缓和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关系．苏美达成了中导协议，许多热点地区的冲突正在降温，国际关系中出现了对话和缓和的明显趋势。与此同时，多极世界的特征日益突出，美国的地位相对衰落，国际关系格局经历着剧烈的变动。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舆论界出现了一场声势不小的讨论。各种不同倾向的学者、政治家们殚思竭虑，估计当前形势，分析世界走向，设计美国的对策。尼克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撰写本书，根据他一生政治、外交生涯的经验，为美国和西方描绘出一幅中长期的战略蓝图。

尼克松代表的是对形势的发展和苏联的新思维持较为谨慎和保留态度的一派。他认为，苏联人对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追求目标是不战而胜，美国则不能谋求不战而和，它也必须谋求不战而胜。美国和苏联从未在战争中互为敌国，但两国正在进行着的"和平的战争"却是一场殊死的较量。尽管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新步骤，个人风格也与前任截然不同，但苏联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国际战略目标。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开始只是意味着美苏争斗进入了一个危险和

具有挑战性的新阶段。戈尔巴乔夫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美国遇到的最敏锐、最能干的对手，如果他的国内改革取得成功，美国在21世纪将面对一个更可怕而不是更容易应付的超级大国。在尼克松看来，美苏之间不可能达成彻底裁军的协议，美国也不可能建成万无一失的对付核武器的防御系统。因此，在美苏关系方面，美国需要的是一项将威慑、竞争与谈判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政策。就是说，美国仍然应该遏制苏联，同时利用美国的经济技术优势同苏联进行无限制的竞争，并且利用苏联的困难和急于同美国缓和的时机，同苏联谈判，压苏联作出让步。

尼克松在这部著作中将西欧称为"分裂的巨人"，主张赋予北约新的活力。他高度评价日本防务预算突破国民生产总值1%限制的深远意义，认为日本必须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当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有远见的政治家，尼克松肯定了中国十年来的改革，分析了中美苏相互关系的状况和趋势。他预言："如果中国继续走邓小平的道路，我们孙辈的世界将有三个超级大国，而不是两个。"他认为，美中关系的发展有着良好的土壤和气候，必须保证同中国的关系存在和发展下去。他声明，"我们的行动主要是为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中国。"

在本书中，作者毫不隐讳自己的反共立场。他对各种问题的分析，都是从东西方长期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的。他对一些具体问题所提的策略、对策和建议，如美苏谈判中美国必须采取的六条关键策略、美国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共革命运动"的三个条件、与非共产党独裁政权发展关系的四条指导方针、为了与莫斯科进行有效的竞争必须加

以提高的六项关键性能力，等等，也无一不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这些都是毋庸赘言的。

尼克松这本书是有代表性的，对于了解尼克松本人的政见，以及当前美国政界、学术界的主张和美国今后可能的政策趋向都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为此，我们特将全书翻译出版，以供国际问题研究者和对国际事务感兴趣的各界读者研究、参考。

本书的译者为以下同志：第1、2、8、9、10各章为王观声、郭健哉所译，李建英、徐亚男译第4、5章。冯小兰译第6、7章，吴方方译第3章，由王观声、郭健哉校订。

目　录

第 一 章

最血腥和最美好的世纪

12年后我们将庆祝一个千年一遇的日子：一个新年、一个新世纪和一个新的千年期的开始。在这历史性的一天，人类将首次面临这样的抉择：不仅是我们能否使未来变得比过去更美好，而且是我们能否活下去过未来的好日子。

一千年前这个文明世界怀着一种几乎是惶惶不可终日的不祥之感跨入了这个千年期。宗教领袖们根据圣经的预言，宣称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他们担心在1000年，上帝的力量将摧毁这个世界。而2000年面临的危险是，人的力量将摧毁这个世界——除非我们采取决定性行动予以防止。

当我们在1999年回忆20世纪时，将认为它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和最美好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的130场战争中，1.2亿人丧生——这个数字超过了1900年前历次战争中死亡者的总数。然而同时，这100年中取得的技术与物质上的进步又超过了过去任何时代。20世纪将作为战争和奇迹的世纪为人们所铭记。我们应使21世纪成为和平的世纪。

尽管就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而言，20世纪是有史以来最糟的，但就和平期间所取得的进步而言它却是最美好的。两次

大战席卷了各个大陆，然而医学科学却在地球上清除了多种疾病。尽管20世纪中死于战祸的人数超过了历史上战争中死亡者的总数，但农业进步却防止了饥荒，所拯救的生命超过了有史以来饿死者的总数。

在19世纪后期，有些人认为进步已经到顶了，人类应节衣缩食，学会在一个无增长的世界中生存。

- 1876年，一家波士顿报纸的社论谈到电话时说，“有识之士都知道，通过电线传导声音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这一做法也没有实际价值。”
- 1878年，一位英国教授在世界科学博览会上参观了电灯之后说，“巴黎博览会闭幕时，电灯也将关闭，并从此绝迹。”
- 1897年，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宣称，“无线电没有前途。”
- 20世纪前夕，美国专利局专员查尔斯·迪尤尔要求麦金莱总统撤销该局，理由是：“能发明的东西都发明了。”

这话说于1899年，其后仅美国一国便批准了400多万项专利。

关于达到了极限时代的一切说法都是目光短浅和愚蠢的。世界不会陷于停滞，而是在每个领域中都处于取得空前进展的边缘。人类革新的大爆发正是20世纪的主要特点。在上一世纪末还难以想象的数以百计的发明对于本世纪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尽管战争和自然灾害使人类遭受巨大伤亡，但1999年世界人口将从1900年的12亿增至62亿。仅三个世纪前，世界人口在100年里曾有所下降。医学和农业两大战线的空前发展使20世纪发生了人口爆炸。

保健事业的发展超过了过去所有时期的总和。诸如结核、天花等曾使一些国家万户萧疏的疾病已基本消灭。1900年，在美国每生下的1000个婴儿中，死亡者为162个。据估计，1999年将为14个。英国女王安妮共生育了13个孩子，但都在10岁前夭折，因而继位无人——这只是250年前的事。

在20世纪，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增长将超过粮食增长的不祥预言已被否定。本世纪初，美国40%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现在则是低于2%，他们的产量足以供养二亿三千万美国人，另有数百万吨输往国外。几百年来饥荒不断，仅二、三十年前专家们还认为不可救药的印度和中国，以现在的产量养活这两国的近20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绰绰有余。

医学和农业方面的革命使人的平均寿命大大地延长了。1900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是47岁。1984年则为72岁。1999年将是75岁。如按目前的速度增加，下一世纪末出生的人平均寿命将为101岁。

人们还将记得，在20世纪，汽车取代了马和马车，飞机开始从火车的上空掠过，电话代替了电报，收音机、电影和电视使信息交流发生了革命。人们将记得，就在这个世纪，人类开创了电脑时代并在月球上行走。

在1900年，乘坐汽船和火车作环球旅行需要两个多月。1950年，螺旋桨飞机可以用四天的时间完成这一旅程。1980

年，超音速喷气式飞机只需24小时。到了1999年，很可能已使用能够飞出并重返大气层的飞机，环绕地球一周所需的时间将以分钟为单位。

在这个世纪，主要的新闻媒介已从印刷文字变为语言广播，又变为电视图象。过去，独裁者能使一个国家孤立于世界之外并控制该国人民获得的一切信息。那样的时代过去了。今天，国外的无线电广播已经越过了边界，而到了1999年，直接的卫星电视广播也将做到这一点。

就物质方面的进步而言，20世纪在历史上是无出其右的；然而，就政治方面的进展而言，情况却令人失望。

技术革命的最大启示很简单：只有人才能解决人所造成的问题。技术能解决物质方面的问题，但不能解决政治问题。下个世纪最重大的挑战之一是不要再赞叹和陶醉于我们的技术力量，而要用它来处理信奉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的各国人民之间依然存在——并将永远存在——的深刻分歧。

有史以来，尤其在20世纪，人类对于战争为何发生和取得了什么成果一直有所误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H·G·韦尔斯写道，“人类历史越来越成为教育和灾难之间的一场赛跑。”韦尔斯期望仅靠知识创造一个更加和平的世界。他把知识误认为智慧。德国人在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者之前，曾是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而日本人则是文化素养最好的。

伍德罗·威尔逊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目标是驱除专制独裁的政府，使民主在这个世界上有安身之地。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的专制政权都是那场战争的遗产。在德国、

意大利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民主取代了专制。然而它却极大地加强了第四个专制国家——苏联。作为一个核超级大国，莫斯科现在的军力已超过了柏林、罗马和东京的前独裁者们的军力总和，对自由与和平已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专制君主制度和殖民主义，但并没有在全世界普遍推行代议制民主。20世纪初期，世界人口的11％生活在民主国家，20％处于君主制之下，69％在没有自治权的殖民地中。今天，全世界人民只有16％生活在稳定的民主国家之中。极权共产主义在本世纪初还只是一个策划于密室之中的阴谋，现在已统治着世界人口的35％。其余的49％生活在非共产主义的专制政权下或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中。虽然有些国家取得了进步，更多的国家实际上倒退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欧洲殖民主义开始崩溃，原英、法、荷、比、美等国的殖民地获得了独立。西方开明的知识界对于这一事态发展拍手称快。然而，严酷的事实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现在的境遇比欧洲人统治时期糟得多，甚至比不上殖民者到来之前。一种更坏得多的新殖民主义在许多国家取代了老殖民主义。在东欧、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有19个已正式独立的国家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完全为苏联所控制。纵观政治上的得失，情况是不佳的。20世纪最重大的事态发展不是殖民主义宣告结束或民主大踏步前进，而是极权共产主义的崛起。

在得的方面，建立得到受治理者同意的政府虽然还没有在五洲四海普遍实现，但这一思想已在20世纪取得了胜利。它已几乎是人人所共有的愿望。在那些从未有过民主传统的国家里，人们也要求举行自由选举。这种民主的躁动已深刻

地影响了专制政权的性质。过去独裁者们声称他们有权进行统治。今天，绝大多数独裁者则声称以人民的名义进行治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绝大多数共产主义专制政权都自称民主共和国。

当我们在1999年回顾20世纪时，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人类在军事力量和物质进步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使他们在为维护和平和利用技术进步而发展政治才能和体制方向所取得的进展相形见绌。弥合我们在技术才能与落后得可怜的政治才能之间的差距，正是我们在21世纪的任务。

开发原子能是20世纪最令人望而生畏的遗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只有三枚原子弹，其它国家都没有。今天，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中国共有五万多件原子武器，其中绝大多数的威力都超过了炸毁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城市的原子弹。

尽管人类在本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对其前途作消极的展望已成为一种时髦——据某些专家认为，这是由于核战争恐怖的阴影扭曲了我们孩子们的心灵、歪曲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把现代人在情感和心理上变成一种怪人。他们断言由于末日即将来临，人人都成了偏执狂。

然而制造了核武器的人类天才也生产了青霉素和宇航飞机。某些人玄谈技术成就的“好处”，而对其“罪恶”则感叹不已。但事实上这种比附是臆想的。我们念念不忘核武器的罪恶，这实属一种无理的自我鞭笞。真正的罪恶是战争。核武器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是防止发生以常规武器作战、使千百万人死亡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力量。我们必

须接受这些严酷的现实：不会消灭核武器、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对核武器无法进行绝对有效的防御、我们必须学会同原子弹安然相处，否则我们会死于原子弹。

核武器不可能置我们于死地，而对核武器的存在坐卧不安——如果这阻止了我们去处理那些不管原子弹是否存在都可能导致战争的东西方之间的政治分歧的话——却肯定会。

在20世纪发生了几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也取得了最伟大的进步。在这100年里人类实现了自己的最大破坏力和最大创造力。42年前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演讲时谈到了这一矛盾的现象。他说："科学的闪光翅膀可能载回石器时代，现在给人类在物质上带来无穷福祉的可能使他彻底毁灭。"在这些遗产中，哪一种遗产在下一个世纪将左右人类的命运？由于美国是自由世界中最强大的国家，决定哪一种遗产将持久存在下去的主要责任落到了它的身上。

遗憾的是，许多美国人不愿肩负起这种责任。用各种客观标准衡量，当今的一般美国人已过上了空前未有的好日子。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康、吃得更好、住得更好。他们有更多闲暇的时间、赚更多的钱。然而他们的目的性却模糊了。一个世纪前开展工业革命时，美国在扩展，美国人言必称天命论[①]。那时一般美国人的潜力受到疾病和匮乏的限制，但他们却意气风发。今天，绝大多数美国人已无虞匮乏，但我们却往往把精力浪费在责难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价值取向上。

① 指美国对外扩张乃天命所定的唯心史观。——译者

倘若美国在国际上不起一种核心作用，和平与自由就无法在这个世界存在下去。这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许多美国人对此感到很不舒服。安德烈·马尔罗有一次告诉我："美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自己不加争取却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但如果我们不出面领导自由世界，将来就会没有自由世界可以领导了。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领导的责任已落到了美国的身上。我们的国家并非十全十美。有些人声称它的欠缺之处意味着它没有权利扮演一个世界性的角色。但是如果美国退缩的话，世界舞台上留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将是个心术不正、劣迹昭彰的国家。

越南的悲剧——它不在于我们介入了，而在于我们打败了——刺伤了美国。战争是在我们结束了我们的战斗作用两年之后打败的，但这并没有减轻伤痛。它有损于国外的朋友们对我们的看法，也贬低了我们在对手们心目中的形象。但它在国内造成的破坏最大。我们在越南的失败使一个不习惯于失败并总把打胜仗和真理将获胜混为一谈的国家感到慌乱。它鼓励和加强了美国人品格中固有的孤立主义倾向。它在我们自己之间造成分歧，并使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错误地认定美国政府做了一件可耻而不是高贵的事情。

今天人们常说美国人已经恢复了对祖国的自豪感。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由于若干年来经济持续增长，也由于来自国外的坏消息——至少就涉及美国人的而言——只是一些比较个别的恐怖主义事件或在波斯湾偶而发生小规模冲突，因而许多美国人感到情况比八年前好了。

然而，不是在逆境中锻炼出来的民族自豪感是没有什么

作为的。缺乏国际责任感的民族自豪感是空洞的。没有为我们深感骄傲的事物分担责任的激情——这样的民族自豪感是自私的。我们所谓的恢复了民族自豪感往往只是自在而舒服的自我陶醉。真正的自豪感并不是来自于回避矛盾，而是投身于矛盾之中，为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朋友而奋斗。

要在美国人以及我们在国外的友邦和盟国之中建立起对美国的新的持久的信心，仅靠诸如入侵格林纳达和袭击利比亚等几次成功但却规模较小的军事行动是不够的。全世界几乎没有任何地方的人民有美国人那么安定而富裕。我们的巨大实力和福分都向我们提出挑战，要求我们奉行最终目标是使世界变得更安全、更美好的国内外政策。这场为自由的和平而进行的斗争，其成败所系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武装斗争。如果美国不能承担其全球责任，西方将失败，这个世界在下个世纪将变得比这个世纪危险和残酷得多。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我们应首先抛掉对于这个世界如何运转所抱有的幻想。

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冲突是不合人情的、各国人民基本上都很相似、分歧是因误解而产生的、永久和完美的和平是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历史已逐条否定了这些看法。多少世纪以来国际冲突从未间断。各国在一些基本方面——政治传统、历史经验和意识形态动力——各不相同，这些往往孕育了冲突。利害矛盾——我们的确对对方彼此有所了解——引发了争端，最终触发了战争。只有当各国承认冲突的存在、并设法通过力量的平衡予以处理的时候，才出现了长期的全面和平。

许多高举标语牌上街游行、要求“和平”和“全球裁军”的人都认为，消除战争危险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起由某个国际组织维持的世界秩序。20世纪戳穿了许多神话，而戳穿得最彻底的便是国际组织能实现完美的和平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

本世纪曾为建立世界秩序进行过两大试验：国联和联合国。二者都一败涂地。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一次要求美国加入国联的演讲中宣称：“它肯定将保障和平。它肯定将仗义执言确保防止侵略的发生。”国联成立后不足20年，世界上便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战争。

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于联合国持同样乐观的态度。他说：“应建立一个能够维护和平并在若干年后在国与国之间实现更完美的正义的世界秩序，这一次我们对此不应失去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联合国成立以来已打过120场战争。1800万人在这些战争中丧生——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者的总数。

派驻联合国的代表是一些世界上最能干的外交家。委派给他们的工作是极其令人灰心丧气的。他们可以无所不谈，但却毫无作为。他们值得我们敬重与同情。但是美国不能把一些涉及其利益的问题提交给一个对我们抱有严重偏见的机构。

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一个只有六辆坦克的小国或六个卑鄙地身藏一颗小炸弹的恐怖分子比在东河之滨的富丽堂皇的大厅里开会的联合国大会有更大的实际力量。使这个世界采取行动的——且不论其好坏——是实力，主权国家绝不会将其一星半点的实力送交给联合国或任何其它机构——现在不

会，以后也决不会。这是国家性质中永恒不变的一个方面。我们愈早面对这一事实——大国特别是西方各国的人民愈早对自己的实力不再有内疚感——一个建立在国与国之间实力稳定平衡基础之上的真正的世界秩序就会愈早实现。

世界和平与国家实力是不可分的。不运用国家实力，任何外交政策目标——无论是战略、地缘政治或有些人权的——都无法实现。如果美国的领导阶层不把握住这一现实，美国将失去在世界上作为一股行善的力量而开展活动的机会，因为那样它就不成为力量了。

过去40年里我在90个国家会见过的所有领导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他对各种推动世界的伟大力量的了解可谓博大精深。20年前我同他初次会面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在他那个简朴的办公室中来回踱步，断断续续地讲话，不时有些生动的比喻和富有表情的手势。他把世界比作一个森林，林中有许多大树、小树和攀缘植物。他说大树是俄国、中国、西欧、美国和日本。其余都是小树和攀缘植物，有些小树会长成大树，攀缘植物则由于缺乏人力或资源没有希望长成大树。

我肯定他会同意美国和苏联是高于其它的两棵大树。在20世纪余下的几年中，我国外交政策的议程必须以美苏关系问题为重点，但又不能仅限于此。我们应在四条战线上采取主动行动。

- 我们应同苏联发展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新关系，这种关系承认尽管两国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并将继续进

行全面竞争，但两国应共同关心避免因这些分歧而打仗。

- 我们和盟国应承担更多的全球责任,西欧和日本应为保卫西方的总体利益在人力物力方面作出更合理的贡献。
- 我们应继续培育美国同中国的关系，重点首先放在经济和政治合作方面,并视可能伴之以军事和战略合作。
- 我们应有一项更富有创造性的政策，促进第三世界的和平、自由与繁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里，将发生最富有生气和戏剧性变化的是那些政治、军事实力最弱的国家。

如果我们不回避领导世界的责任，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在其广度和复杂性方面都将是惊人的。但此事关系极大。1999年时，人所拥有的破坏力将是无限的。但他取得进步的能力也将是无限的。100年前许多人以为我们在发明和进步方面已经到了头。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才刚刚开了头。

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20世纪科学的重大突破只是为21世纪的成就揭开了序幕。我们能减轻劳动的负担，为可怕的疾病找到治疗方法，并为全世界人民消除饥饿的痛苦。但是，我们只有在实现了我们的首要目标——使21世纪成为和平的世纪——的前提下才能做到这些。

1974年我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举行了最后一次私下会晤。当译员把我的话译成俄语时，我在纸上写下了这一段话：“和平有如一种娇嫩的植物，应不断进行照料和培育才能生存。如果我们对它有所疏息，它就会凋萎以

至死亡。”我们在本世纪未能接受这一挑战；但在下个世纪不能再有此失误。

在20世纪结束之前的12年里，我们将为21世纪的世界勾划出轮廓。抓紧这一时机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样，当我们从1999年这块历史的高地上回顾过去时，就会看到我们没有坐失良机使下世纪成为文明史上最美好而不是最血腥的世纪。

36年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说“胜利是无可取代的”时，听众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他指的是在常规战争中取胜。核战争中不会有战胜者，只有战败者。然而胜利仍是无可取代的。

苏联人追求的是不战而胜。我们的对策不应是不胜而和。我们也应追求不战而胜。但我们追求的是另一种胜利。我们追求的不是对其他国家或人民的胜利，而是自由的思想对于否定自由的极权专制思想的胜利。我们追求各国人民免受政治压迫的权利取胜。我们追求在世界任何地方取得对贫困、苦难和疾病的胜利。

苏联人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我们则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自由世界的目标，使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谁来治理他们以及如何进行治理。苏联人认为历史在他们一边。我们应确保在书写下一世纪的历史时，它是在我们这一边。

第 二 章

两个超级大国

大约150年前，阿雷克西斯·德·托克维尔[1]以惊人的洞察力预言，世界的未来掌握在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手中。他写道，“前者的主要手段是自由，后者是奴役，”并说这两个国家幅员辽阔，仅仅这一点就意味着它们将起决定性作用。“它们的起点各异，所走的道路也不同，然而似乎是天意要它们各左右半个地球的命运。”

托克维尔在那时不可能想象得到20世纪的各种惊天动地的事件——两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的发明以及由压制性大得多的共产主义专政取代君王专制的1917年俄国革命。但是，他在1840年预言的美国和俄国的命运现在得到了证实，并将在21世纪继续得到证实。今天，美国同苏联的专制政权之间的鸿沟比19世纪美国同专制的俄国之间的鸿沟大得多。

美国和苏联从未在战争中互为敌国。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盟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托克维尔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斯大林使苏联走上了同世界各国迎头相撞的轨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便开始了。美国军队复员，其它主要盟国也开始重建它们的国家。与

---

[1] 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政治家、作家。——译者

此同时，苏联却明目张胆地展开了帝国征服活动。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莫斯科吞并了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以及芬兰和日本的部分领土，把共产主义傀儡政府强加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北朝鲜人民，并企图攫取希腊、土耳其和伊朗的一部分，但未能得逞。在其后的30年里，克里姆林宫在东德、古巴、越南、柬埔寨、老挝、安哥拉、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也门、阿富汗和尼加拉瓜制造了卫星国。克里姆林宫虽未正式宣战，但已同自由世界交战了40余年之久。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被称为和平的战争。这是一场迄今尚未结束、可能还要继续几代人之久的冲突。苏联人不用军队和核武器打这场战争。他们在同西方的这场斗争中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宣传、外交、谈判、外援、政治手腕、破坏、秘密行动和代理人战争。这场冲突的成败所系不仅是我们自身的自由，而且还有世界各国的自由。自由的存亡取决于美国的行动。

自从三年前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上台执政以来，没有迹象表明苏联已改变了其国际目标。他的个人风格与几位前任不同，使人耳目一新，在西方博得了许多人的好感。如果我们继续把风格误认为实质从而低估了他，那么他有可能囊括整个西方。

戈尔巴乔夫执掌下的苏联对外政策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娴熟和巧妙。但其侵略性也是有增无减。如果他那大刀阔斧的国内改革也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在21世纪将面对一个更繁荣、生产能力更高的苏联。那时，同今天相比，它将是一个更可怕而不是更容易应付的对手。

有些观察家认为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对于美国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这说明他们根本不懂美苏关系的实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开始并不标志着美苏角逐的结束，而是标志着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斗争开始了一个危险和具有挑战性的新阶段。他已作为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遇到的最敏锐、最能干的对手而受到我们的敬重。和一些政治学教授、社论撰写人的一厢情愿的说法相反，戈尔巴乔夫并不以我们所使用的方式寻求和平。

在过去40年里，我曾有机会会见过若干伟大的领导人——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加斯贝利、吉田茂、毛泽东和周恩来。戈尔巴乔夫和他们不相上下。只有重量级的运动员才应上台和他较量。唯有美国这个国家才能对付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当我们跨入21世纪的时候，和平与自由是否有保障将取决于我们今天是否采取正确的战略和外交、国际政策。

核武器使大国之间的战争作为解决矛盾的手段过时了。在核时代，我们的目标应是和平。然而完美的和平——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是个幻想。它过去从未有过，今后也永远不会有。

现实的和平不是矛盾的终结，而是学会与矛盾共存的一种手段。一旦实现，它需要时刻给予关注才能久存。美国人是理想主义者，而理想主义者都盼望有一个没有矛盾的世界，一个各国之间的分歧都已得到克服、舍弃了一切野心、一切侵略和自私的冲动都能化为个人或国家乐善好施行动的世界。但矛盾是人类固有的。历史、思想和物质愿望历来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造成分歧，这些分歧时常导致矛盾和战争。

这种情况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必须承认矛盾是永恒的，并在制订政策时对这一国际生活中永恒不变的事实加以考虑。

我们不应徒劳无功地探寻完美的和平，而应转而努力缔造现实的和平。完美的和平假想矛盾业已终结。现实的和平是学会与永无终止的矛盾共存的一个手段。现实的和平是一个过程——一个处理和控制竞争中的各国、各种制度和各种国际野心之间发生的冲突的持续过程。迄今存在过的和平仅此一种，我们以现实的态度有希望实现的也仅是这一种。

美国人常把现实的和平与完美的和平混为一谈。美国在其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期没有受到外部敌人的威胁。它幅员辽阔、地处两大洋之间，这使美国可以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在150年的时间里，欧洲各国在几十次危机和战争中互相厮打，美国却超然物外，偏安一隅。美国人认为自己很安全，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时，美军总数在世界上名列第16位，甚至次于罗马尼亚。

美国的历史独特，但它却使美国人从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许多人逐渐认为，世界和平的障碍仅在于或是自私与玩世不恭的领导人不愿为了和平而放弃他们狭隘的民族利益，或是各领导人和各国之间令人遗憾地缺乏国际谅解。在他们看来，为了造就和平，所需要的只是理想主义和不懈的努力。

美国的外交也不乏上述特点。在为缔造理想主义的完美的和平所作的努力中，美国政治家们几乎总是起带头作用。它开始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运动：通过创立国联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继而美国外交家们在20年代起草了宣布战争为非法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这种做法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仍经久不衰——他相信联合

国有能力约束侵略者。甚至今天还有许多美国人坚持认为如果美苏领导人坐下来谈判，“彼此了解对方，”消除分歧，美苏矛盾就会烟消云散。

美国人如不丢掉理想主义的幻想，我们就永远不会有现实的和平。矛盾是世界上的一种自然状态。各国必定会在多种问题上、通过各种手段发生矛盾、这些矛盾会导致暴力的危险将永远存在。我们的任务不是设法消除一切矛盾——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处理矛盾使之不致爆发为战争。

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我们并非无能为力。我们有缔造现实和平的必要手段。那些可能发动侵略的人只有他们认为从中有利可图时才会进行侵略。只有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认为他们能以一种可接受的代价达到其目的时，这个国家才会发动战争。我们应确保任何潜在的侵略者都不会认为侵略有利可图，以此影响他们对得失的估算。我们的目标应是使战争无利可图。

在通向和平的大门上有两把锁。苏美各持一把钥匙。没有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至少是默契的合作，我们无法实现现实的和平。

我会见过战后苏联领导人中的三位：1959和1960年会见了尼基塔·赫鲁晓夫；1972、1973和1974年会见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86年会见了戈尔巴乔夫。三人中戈尔巴乔夫的能力是遥遥领先的。仅在两年的时间里，他成了一个国际超级明星。他年方55岁，比几个前任都年轻得多，可望统治苏联20年以上，并同五个美国总统打交道。这使他成为一个十分可怕的对手，但也为现实的和平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许多西方记者和外交官滔滔不绝地谈论戈尔巴乔夫，内容不乏自相矛盾之处。和过去那些以苏联问题专家自命的人一样，他们多被风格所一叶障目。一位美国外交官在会见了约瑟夫·斯大林之后说，“他那双褐色的眼睛极其睿智、仁慈。小孩会想坐在他的膝盖上，小狗会悄悄地挨近他。”赫鲁晓夫上台执政时，一些行家里手鄙视他为小丑，因为他的衣着不合身、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俄语讲得蹩脚、饮酒过多、举止粗鲁。勃列日涅夫得分较高——他穿丝质双层袖口衬衫——但又因他的乡土气和在公众场合举止笨拙而受到嘲笑。从《华盛顿邮报》到《华尔街日报》这些意识形态各不相同的种种报纸都刊登文章说安德罗波夫打网球、喜欢美国爵士乐、苏格兰威士忌和抽象派艺术。

戈尔巴乔夫衣着讲究、举止文雅、夫人美貌、善于同记者周旋，这些都使他在报界和外交使团成为明星。见过他的一位美国官员对于他“善于以目示意、握手时坚定有力、声音深沉悦耳”印象深刻、惊讶不已。一个英国政治家甚至说戈尔巴乔夫是他举世最景仰的人。一个裁军积极分子说得更妙：“戈尔巴乔夫就象耶稣。他不断行善，提出军备控制建议等等，对方却总是加以拒绝。”

凡此种种，都是无知妄说。斯大林“仁慈”的目光掩盖着他那暴戾的秉性。赫鲁晓夫貌似农民，但却修起了柏林墙。勃列日涅夫笨口拙舌，然而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扩充军备却是他搞的。安德罗波夫“喜爱爵士乐”的风格也掩盖不了这一事实：他是世界上最擅于弹压的警察机关的冷酷无情的首脑。爬到克里姆林宫权力顶峰的任何人，都曾在世界上最严格的学校里受过政治锤炼。如果我们接受反核左派对戈尔

巴乔夫的看法，我们就会使自己在这个控制着世界上最强大武装力量的人面前在心理上解除武装。

过去40年里我会见过共产党国家的15个领导人。他们没有一个是软弱的。尽管我们应该指出共产党政府不得人心这一弱点，我们却不能无视他们的长处。在共产党内，只有强者才能在争夺权力的残酷斗争中爬到顶峰。戈尔巴乔夫将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一样，坚定、无情而颇有手腕地不仅发挥他自己的长处，而且利用对手的短处。

我们目前同戈尔巴乔夫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今后还将永远如此。原因之一是我们相信自己的制度而苏联人拒绝这一制度。这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容易明白的。但是有些美国人对于问题的另一面难以理解，即苏联人相信他们的制度并认为它比我们的制度优越。不管我们如何抨击苏联人和他们在世界各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对他们决不可有所轻蔑。我们应把苏联作为一个强劲的对手予以尊重。朋友之间相互尊重是重要的；而在核时代，潜在敌人之间相互尊重则是必不可少的。

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有权受到平等对待特别敏感。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们作为俄国人对于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的文学、音乐、戏剧——感到自豪。托尔斯泰和柴可夫斯基的故居已成了国立纪念馆。他们为俄国人民的力量而自豪。他们常常提到俄国人在19世纪打败了拿破仑、在20世纪打败了希特勒，以及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超过了美、英、法伤亡的总和。

1959年我去莫斯科之前，哈罗德·麦克米伦对我说，苏联人有一种极为强烈的愿望，要求把他们作为“俱乐部的一

员"相待。他们在心理上可能还有自卑感，但无可非议，在其后的30年中，苏联人已赢得了被称为超级大国的权利。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同里根总统会晤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尖锐地指出："我们不是傻瓜。"我们对于这一说法无可厚非。我们的技术比他们先进，但我们做到的他们也能做。第一个进入太空的是俄国人，不是美国人。不论是原子弹、氢弹还是多弹头导弹，他们都赶上了我们，其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的特务窃取了我们的机密。

戈尔巴乔夫其人比起他的几个前任来，对我们更是一个有力的警告：如果我们低估了苏联人，必将自食其果。他和一般人心目中的满脸大胡子、想炸掉这个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形象正好相反。他是个才华横溢、老成练达、阅尽沧桑的人。他散发着魅力，他的这个特点人人都承认、但却无人能够言传。他极善于与人交流看法。他曾取得法学士学位，但他搞公共关系的天才足以取得这个学科的硕士学位。如果他出生在美国，竞选公职一定稳操胜券。

戈尔巴乔夫极其自信，有铁一般的自制力和应有的自尊。他不如赫鲁晓夫思维敏捷，但因此也不容易犯错误。他在说话之前必先进行一番思索。他是个严肃的人——在字面和更广泛的意义上都是如此。他善于聊家常，但更想处理手边的公务。他象绝大多数右翼和左翼极端分子一样，很少有幽默的言谈。他全神贯注在他已作了充分准备要进行讨论的那些严肃问题上。有人说他脾气暴躁。我不同意。他利用他的脾气，而不是发脾气。偶尔他也会失控而发脾气，但能立即煞住并用来达到步步进逼、使自己成为对话中主导一方的目的。他谈话中不时会离题，但这只是为了阐明他的观点。他的思

路从来不乱。他的思维能力是训练有素的。

1987年12月他把拉关系的手腕用于超级大国首脑会晤。把华盛顿这个城市搞得人仰马翻。保守派的参议员们对他俯首听命。他使华盛顿社交界眼花瞭乱、为之陶醉。平时总爱挑剌的美国新闻界中咄咄逼人的大记者们在他面前乖得象只小猫。商界头面人物和新闻界的大亨们私下会见他时对他的某些显然颇为离奇的说法不置一词。他完全征服了一批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据一位观察家说，这些人提了些投其所好的问题，使他在逐题回答时都能挥洒自如。民主国家的领袖们——如丘吉尔、戴高乐、阿登纳——从来没有象戈尔巴乔夫那样受到拍马和阿谀逢迎。

在华盛顿的权势集团人士中，领导人的风格比政策的实质更受重视。但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几个前任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风格。

在我见过的苏联领导人中，他是第一个亲自动手抓外交的。他了解东西方关系中复杂而微妙的细节。赫鲁晓夫气势汹汹地大谈苏联政策的正确性，但他从来超出苏联最近的宣传方针。勃列日涅夫宣读预先准备好的讲稿、然后靠他手下的人进行一切会谈。我见到戈尔巴乔夫时，只他一个人代表苏方发言，不用讲稿，看得出他对错综复杂的军备控制等问题了解得十分透彻。他懂得权力的含意，并知道怎么使用它。他坚忍但不死板。他是那种可以摆脱顾问而自作判断并能拍板成交的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是一位新型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狂妄地吹擂苏联的优越性，以此掩盖苏联的弱点。勃列日涅夫知道他的核力量和我们旗鼓相当，但他仍怯生生地不断强调苏美

是平等的世界大国。戈尔巴乔夫对他的长处十分自信，因此不怕谈论他的弱点。

他承认苏联的弱点并不意味着他已对苏联的制度丧失了信心。要使苏联人转变并接受我们的思维方式就象要我们转变并接受他们的思维方式一样，是办不到的。每当我们想和他们辩论意识形态问题时，就总是象两艘在黑夜中迎面驶过的轮船。人权问题便是如此。苏联人认为人权主要指公费医疗、免费住房、免费受教育和充分就业。我们认为人权主要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宗教自由和自由选举。

我们认为我们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他们则认为他们在正确的一方。因此，作为建立一种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新关系的开端，两个超级大国都应承认它们的差别之处和存在差别的原因，学会尊重对方的长处和能力，避免说些无理地贬低对方的话，同时也承认我们双方仍将大力鼓吹自己的信仰。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几个前任一样，试图扩大苏联的影响和实力。尽管他对莫斯科的公共关系技术作了精心改进，他却保留了为统治全球而努力这一长远目标。然而苏联有根本性的、威胁到其超级大国地位的国内问题，而戈尔巴乔夫是正视这一事实的第一个苏联领导人。他是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但当他察看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时，他不戴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

当他回顾20世纪的时候，他看到共产主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列宁在本世纪初只是一小股阴谋分子的头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只有一个占世界人口7%的国家有个共产党政府。现在，有史以来最大的国家中的两个——苏联和中国，亦即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都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

戈尔巴乔夫知道他所统治的那个国家具有极大的潜力。美国（包括夏威夷）横跨6个时区，苏联则为11个时区。它地大物博，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高。它的人民创造了伟大的文学艺术。它的科学家对人类知识作过重大贡献。今天，它的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人数已超过美国。虽然它的生活水平落后于西方，我们决不可认为它只是个拥有核火箭的第三世界国家。

他也知道在过去15年里苏联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莫斯科加强了它在常规武器方面的巨大优势。它已将在近海游弋的海上部队扩建为一支远洋海军——吨位居世界之冠。最令人不安的是，它已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这一威力强大、命中率高的核武器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它已向西南亚投放力量，而它的代理人们则在东南亚、南部非洲和中美洲连连得手。它在西欧不断开展宣传攻势，使得各大政党只能奉行实质上是中立的纲领，这些纲领如果得以施行，将导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的解散。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一生中看到了苏联从许多大国之一上升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尽管共产主义有许多缺陷，但它已被证明是一个夺取政权、维护政权的有效手段。这条经验证实了戈尔巴乔夫的意识形态信念。虽然他知道苏联有许多大问题有待处理，但他仍认为它代表了未来的潮流。

戈尔巴乔夫想保住他从几位前任手中继承的遗产。如果可能，他还想另有建树。但是，环顾国际舞台，他无法感到鼓舞。他的道路上存在着种种棘手的内外障碍。

他朝西方看去，看到的是从波兰到保加利亚的整个苏联集团中，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政治动荡的迹象。苏联身边的

这些盟国靠不大住，同时却面对着一个有史以来存在时间最长的联盟。北约由于10年来增加防务开支，已大大加强了其野战部队的力量。虽然苏联破坏了英国工党和西德社会民主党在国际问题上的雄心壮志，但这些党走向中立主义也使它们在竞选中失去民心。赫尔穆特·科尔总理再次当选，连任五年。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在竞选中击败了四分五裂的反对党。法国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和雅克·希拉克总理的领导下，加强了军事力量，发展了同北约的合作。

戈尔巴乔夫朝东方看去，看到的是中国和日本长远说来将构成的巨大挑战。中国仍是个潜在的敌人，今天对苏联不构成军事威胁。但它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将来是个心腹大患。北京的经济改革加重了这一威胁。如果苏联的增长率仍象过去五年那样落后于中国，下个世纪中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苏联。

日本没有能源，人口不及苏联的一半，领土只有苏联的六十分之一，人均收入却比苏联高一倍。日本的增长率大大超过莫斯科，下个世纪将使苏联无法望其项背。从克里姆林宫的观点看来，更加不祥的是，日本政府最近取消了防务费用不得高于国民经济总产值1%的正式限制，并实行了一项重要、虽然规模还不大的提高防务能力的计划。

戈尔巴乔夫象所有苏联领导人一样，对外交政策有长远观点。美国人想的是几十年。苏联人想的是几百年。他知道苏联人不能无视远东的这些不祥的动向。在莫斯科看来，未来的威胁就是当前的问题。

他再朝南方看，威胁已经临近：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泥足深陷，无望取胜。入侵已八年，克里姆林宫还不能撤出其

12万军队，否则喀布尔的共产党政府就会倒台。苏军已有25000余人战死。这场战争已耗资400多亿美元，当前每年的费用高达100多亿美元。苏军蹂躏了乡村，但莫斯科还只能控制阿富汗的大城市和公路干线。更不妙的是，这场战争带来一个风险：苏联的穆斯林可能作出不祥的政治反响。

毋庸置疑，莫斯科有潜在的实力压倒对方。但以目前的速度，胜利至少是20年之后的事，也可能遥遥无期。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来说，他们看不到隧道尽头的亮光。

当戈尔巴乔夫的目光越过与他本国边界接壤的地区时，他看到的是他在第三世界的所有共产党附庸国都排队乞求施舍。它们不是盟国而是附属国。如果没有经济补贴或军事援助，莫斯科在第三世界的朋友没有一家能支撑下去。列宁写道，资本主义国家为牟取利润而转化为帝国主义。果真如此，那么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肯定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因为莫斯科的帝国使克里姆林宫变穷而不是致富了。越南使苏联每年支出35亿美元以上，古巴49亿多美元，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共30亿美元以上，尼加拉瓜10余亿美元。莫斯科的帝国领土使克里姆林宫每天耗资3500万美元以上。

当戈尔巴乔夫察看思想领域的斗争时，他发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失去了吸引力。自由派记者林肯·斯蒂芬斯70年前访问苏联后写道，“我看到了未来，它真行！”现在我们都看到了那个未来，它不行。不但在人民群众已把共产主义付诸实践的东欧和苏联是这样，在世界各地也都是这样。20世纪50年代，第三世界的许多非共产党人向往苏联经济发展模式。今天，第三世界没有哪个政府愿象苏联那样成为文牍主义盛行、经济停滞不前的可怕的官僚机构。30年代曾有美

国人出于意识形态信念，为莫斯科充当特务。今天，为苏联人当特务而被定罪的美国人则是为了现钞。

莫斯科的军事实力是它的唯一资产。但是军力虽强，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实力却难以持久。莫斯科的进退维谷之处在于它的资产不适用于解决它的问题，而它的问题却正损害着它的资产。

戈尔巴乔夫没有低估苏联的困境。他东边的共产党邻国也没有。有一次一位中国领导人说明了中国如要加入先进国家的行列就非进行当前的经济改革不可，然后他对我说如果苏联不作类似的改变，莫斯科作为一个大国在下个世纪就会“消失”。情况的确如此，而戈尔巴乔夫也心中有数。

在经济上，它在发挥其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的作用方面，可说是搞得一塌糊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在国民经济总产值方面没有超过任何大国，而却被日本和意大利所超过。莫斯科的经济犹如一个竹篮子。增长率几近于零。生产率下降。旷工、腐化、装病逃差、酗酒盛行。生活水平有所降低，以致苏联人的平均寿命实际上缩短了。为了赚钱买部汽车，一个苏联工人要比一个西欧人多工作七倍的时间。苏联的工业电脑比先进的西欧国家少15倍，比美国少45倍。近年来苏联主要经济指标中增长项目寥寥无几，而这些还是由于克里姆林宫对其经济统计数字做了手脚。

西方经济学家过去惯于以玄奥的推断探测苏联经济危机的深度。今天，他们只要阅读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就可以了。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将在十年内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勃列日涅夫对经济问题文过饰非。安德罗波夫以为在工人中加强纪律就能解决问题。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领导人终于明

白，经济搞不上去苏联的国际地位就会日益削弱，军事实力就会逐渐萎缩。他正式废除了赫鲁晓夫时代共产党提出的目标：要求苏联在80年代超过美国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赫鲁晓夫关于苏联经济增长的预言和吹牛，被他称之为"毫无根据的狂想。"戈尔巴乔夫知道，要振兴苏维埃制度，只靠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动员大会是不行的。

他还知道他的主要当务之急是振兴苏联经济。经济搞不上去，他就负担不起苏联现有数额的军费开支，不能使苏联人民的生活哪怕只是略有提高，也无法把苏联制度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楷模。

戈尔巴乔夫面临着共产极权主义制度的典型矛盾。为了取得进步，他必须允许人们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允许更多的自由却威胁他的权力。过度集中是苏联经济的主要问题。但是，下放经济决策权则有引起要求政治权力下放的风险。而政治权力下放将意味着共产主义制度的解体。

当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的长处和弱点算个总帐时，结果并不美妙。莫斯科已自陷于一种绝无仅有的历史地位：它在世界大国中没有一个盟国。克里姆林宫的潜在对手有西欧、中国、日本、加拿大和美国，这些国家国民经济总产值的总和占世界经济的60%以上。此外，历史上没有一个侵略国在向其它国家扩展其统治方面这么有作为，而要取得这些国家人民的认可却这么不顺遂。在共产党统治的19个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它们通过在自由的民主选举中取胜而上台执政的，也没有一个敢举行自由的民主选举。如果苏联的实力逐渐衰落，其卫星国肯定将设法摆脱克里姆林宫的轨道。

戈尔巴乔夫感觉到了这些问题的压力，并发动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运动作为对策。当他处理面临的艰巨任务时，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他的改革会给全世界带来的后果。我们必须回答下列几个问题：他提出的是哪几种改革？从这些改革中我们能看到戈尔巴乔夫有些什么意图，这些改革成功的可能性多大？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努力预示苏联今后在世界上将有些什么举动？西方应采取什么对策？

戈尔巴乔夫推行一项三管齐下的改革方案。但是尽管他的政策同几位前任有所不同，我们应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些变革的。

公开性。这是个时髦的字眼，指的是对苏联的问题采取公开化的新态度并对不同政见更为容忍。戈尔巴乔夫允许苏联报刊发表文章论述苏联制度的失误和腐败。他让在国内流放的安德烈·萨哈罗夫回来，并释放了几个有名的不同政见分子。他准许更多的犹太人移居国外，并给那些配偶在西方的苏联公民发放了出境签证。这些措施在西方都受到了广泛的赞扬。

这些事态发展是有意义的，是一种不同于过去的令人高兴的做法。但我们应牢牢记住，公开性这个词的直译是“透明”。弹压仍是苏联制度的基石。已释放的不同政见分子不到100人，另有4万人仍在监狱中受苦。1987年8000名犹太人获准移居国外，另外40万还有待批准。虽然已准许对苏联的制度多做些批评，但仍都是官方首肯的批评。提出公开性后受到批评的人从不反驳，这绝非偶然。

戈尔巴乔夫的目的有三方面。他要在西方造成一种对苏联更有利的态度，以利于他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达成贸易

和军控协议。他想利用公开性清除政治上的反对者，他想在苏联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中树立一种新精神。公开性只是付出的一点小代价。

民主化。戈尔巴乔夫的历次演说充满了对民主的赞颂。但是他所说的民主含意和我们大不相同。他想使这个制度趋于开放；他想鼓励人民提出新思想；但他毫无意思放弃共产党的任何权力和特权。他的民主化严格限于党内。在党外没有任何真正的民主化。他想整顿苏联的制度，使它再次转动起来。但其结果将同西方的民主风马牛不相及。

改革。这个经济改革的口号字面的意思是重新构建。戈尔巴乔夫曾以横扫千军的口气谈到这个计划。他要求废除大部分的中央计划机制。他赞成和西方私营公司搞合资企业的办法。他建议扩大厂长的自主权。他要求准许很小的企业有更多的机会为私人牟取利润。但是迄今为止他的成绩不大。戈尔巴乔夫的建议没有几条得到立法，而这些同邓小平在中国采取的革命创举又都不可同日而语。在苏联，日常事务的管理仍然听命于旧政权。

戈尔巴乔夫想以一种新办法来处理苏联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摒弃了苏联制度的基本内容。他认为这个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好的，但无须提高其效能。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改革本身不能向我们展示戈尔巴乔夫的意图。这些改革的目的不是使苏联国内有更多的自由，或使其对外政策的侵略性有所收敛，而是要使共产主义制度运转得更好。他想使这个制度提高效能，而不是削弱其共产主义性质。

戈尔巴乔夫能否成功还远远没有保证。他面临极大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上的障碍。有些人甚至说他执政五年的可能性

只有50%。他们指出他在每次讲演中都提到有人反对他的改革。他们回忆起前一个伟大的苏联改革家尼基塔·赫鲁晓夫企图给这个制度重新注入活力时，他在政治局中的同僚们立刻让他下台。他们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可能落得同样的下场。

持这种看法的人指出了有人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这是对的；但却低估了他的对付能力。整顿苏联的制度总会受到通过捞取外快和贪污腐化从这个制度得到好处的那些人的反对。他想对那些按旧方式办事的受益者强制实行新的变革。他们不愿失去别墅、小卧车、芭蕾舞票、去黑海休养以及由专家保健和子女教育受照顾的权利。但是不能把他同赫鲁晓夫相提并论。戈尔巴乔夫和赫鲁晓夫相似之处是他也是个胆大如斗、难以预测的人；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不仓促鲁莽。

戈尔巴乔夫在巩固权力方面手段也十分高明。他不象斯大林那样把对手置于死地，也不象赫鲁晓夫那样让他们继续身居高位从而对他的权势构成威胁（勃列日涅夫便是一例。1959年我们进行厨房辩论时，他站在赫鲁晓夫身旁）。戈尔巴乔夫则是把他们揪出来，削去要职，并委派自已的亲信取而代之。仅在两年的时间里，他把掌管党务的关键机构——党的书记处的所有书记，除了一人之外，全部撤换。在大权独揽、掌管全国日常事务的机构政治局的13名成员中，只有三名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留任的。他还撤换了三分之二的党委书记和60%的政府部长。他铁面无情，把改革的最有力支持者之一鲍里斯·叶利钦撤职，便是对胆敢向他的权威挑战的任何人——不论是友是敌——的一个警告。戈尔巴乔夫正牢牢地掌握着权柄，今后仍将如此——只要他继续以这么高明的手腕玩弄权术。

然而，即使戈尔巴乔夫继续掌权，他的经济改革面临三大困难。第一是他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是个具有深刻信念的共产党人。共产主义是他的信仰。他在私下谈话中也偶而提到上帝，但这并不说明他在内心是个基督徒。一个共产党人不能成为基督徒，除非他不再是个共产党人。共产主义和基督教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人们称赞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本人也曾谈到应该用物质刺激引导工人和经理作出有关的决定。而这和斯大林式的指令性经济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的经济制度运转得好是因为市场指导了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如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立为法律，苏联的制度将产生一个内在的紧张关系。戈尔巴乔夫应如何确定哪项决定应由市场作出、哪项由国家作出？他毕生的信念是，国家控制比自私自利的资本家对群众的无情剥削具有优越性，要他摆脱这一信念将是困难的。随着问题的产生，苏维埃国家将在强大的促动因素的作用下出面发布命令解决这些问题。

第二个障碍是墨守成规的苏联官僚机构。戈尔巴乔夫必须通过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下级工作人员和经理推行他的改革。要老官僚走新路子，谈何容易！他们简直就不知道怎么办事才象个企业家。他们已习惯于奉命行事，而不是自出机杼。天下的官僚主义者有雷同之处，他们懂得要步步高升就要四平八稳，而不要甘冒风险。他们对于判断哪种经济风险值得一冒，是一窍不通。要克服已有70年之久的斯大林式集中计划的老习惯，简直得发动一场文化革命，抑制党的纪律，发挥个人首创精神。

第三个问题涉及俄国人民。俄国人不同于东欧各国人民，

也和许多中国人不同。不管是在19世纪的老沙皇还是20世纪的新沙皇统治下，他们都只有政府控制的企业。中国人多为天生的企业家，他们不论移民到哪个国家都能发财致富，就足以说明这点。大多数俄国人则不是。我们总认为人们都会响应机遇的挑战。事实并非如此。甚至在美国，许多已习惯于福利国家所提供的保障的人仍把这一点视为最可宝贵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虽然攻击宗教，说它是人民的鸦片，但是，世俗的宗教马列主义却已证明是一种更恶毒的麻醉品。当人们习惯了一种铁饭碗制度、一种使求稳而不是冒险成为晋升的捷径的制度之后，要改变他们是很困难的。对他们来说，变革意味着动荡不安，并成为一种威胁。即使是从这个制度得益不多的人也担心失掉能得到的那一点。

戈尔巴乔夫对这些问题心中有数。他对于他的意识形态信仰至深，但他知道他的经济不行。他想改革这个制度，但是没有组成这个制度的人民参加，他就无法进行改革。他不能只通过政府机构办事。但他手下的官僚和经理们对于没有上级指示自作决定很不习惯。他还必须取得人们的合作，使他们改变毕生养成的习惯，响应机遇的挑战，甘冒各种风险，而不苟且偷安于社会实行的全面计划之中。他的任务之难有如把雄蜂变为工蜂。

迄今为止还没有理由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会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或更安全。首先，他没有同苏联过去的恐怖时期决裂。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是一个具有反复无常、专制独裁性格的人，他的迫害狂已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并说斯大林曾亲自下令大批处决他的反对者，把一些民族全部从他们在苏联土生土长的地方大规模

驱逐出去。而戈尔巴乔夫却赞成农业集体化的残暴政策，赞扬了“约瑟夫·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中所表现出的极其坚强的政治意志、目的性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组织人民和加强他们的纪律性的能力，”而只批评了斯大林时代的“过火行为。”对于这个屠杀了千百万苏联公民的人，戈尔巴乔夫拍背赞许，然后轻轻地敲打一下他的手腕。

而且，就苏联而言，国内改革不会自动导致在国外的克制。我们不应寄望过大，认为这些改革会软化苏联的对外政策。在沙皇和共产主义俄国，改革者的传统做法是在实行新的国内政策时伴以强硬的对外政策。彼得大帝便是典型的例子。尼基塔·赫鲁晓夫也是如此。他企图改革经济，但又在古巴部署导弹，修筑柏林墙，而在他做了谴责斯大林罪行的有名的秘密报告之后仅九个月，便下令苏联坦克在布达佩斯街道上枪杀匈牙利自由战士。

戈尔巴乔夫不能有示弱的表现。他必须给人这样的印象：他是个强有力的、有成就的、不可等闲视之的领导人。如果他在国外有所退却，他在苏联权势集团内部很快就会失去支持，他在共产党内的敌人就会把他撕成碎片。他在世界各地采取新的主动行动时将小心翼翼，但也将为保住他从前任手中继承的遗产而拼搏。他认为在90年代有新的建树之前，应先巩固70年代所得。

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方面是个处在保守派对手们四面楚歌声中的“温和派”，接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虽然在内部可能有人与他为敌，但整个领导集团结成了一条统一战线一致对外。苏联常用的手法之一是给人造成克里姆林宫内有“鹰派”和“鸽派”之争的印象。罗斯福的某些顾

问曾受人愚弄，认为斯大林不得不和强硬派分子周旋。勃列日涅夫在与我和基辛格会谈时，煞有介事地装作出去同“鹰派”商量，希望我们在其后会再做些让步，帮他打发国内的反对派。故伎重演，我们不能上当。戈尔巴乔夫的对手们反对他，并非因为他是个温和派，而是因为他们觊觎他的权柄。

最后一点是，没有证据说明，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侵略政策已有收敛。为实现苏联的全球野心，戈尔巴乔夫在世界各地的所作所为，同他的几个前任相比，毫无逊色之处。虽然苏联人士散布谣言，佯称苏联的战略理论已改为纯防御态势，戈尔巴乔夫也已宣布了一项以“足够的战略力量”而不是追求优势为基础的军事新方针，但他并未削减苏联的防务预算或减少苏联的兵力部署。他赞同为苏联插手镇压东欧共产党国家和第三世界人民起义进行辩解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他增加了苏联对尼加拉瓜、阿富汗、安哥拉和波斯湾的军援和苏联在这些地区的军事存在。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反美宣传变得更恶毒了。它使里根总统关于“邪恶帝国”的讲话相形见绌。戈尔巴乔夫政府控制的苏联报刊指责美国阴谋策划暗杀了英迪拉·甘地和奥洛夫·帕尔梅。它宣称苏联向非洲人提供援助，而美国却向他们传播爱滋病。正如迪米特里·赛姆斯所说，“苏联豹身上的斑点有所改变，但还是只豹。”

一些所谓苏联问题专家总是从克里姆林宫的言论中捕风捉影，认为苏联对外政策已有软化的迹象。对于这些人的建议，我们应不予理会。当戈尔巴乔夫回忆起在赫鲁晓夫时代“一股改革之风曾吹遍祖国大地，”他们立即得出结论说，戈尔巴乔夫要搞个莫斯科之春。我们应经常提醒自己，戈尔

巴乔夫改革的目的不是使国内有更多的自由，或者使在国外实行的对外政策威胁性有所减少，而是要使共产主义制度运转得更好。如果他的改革取得成功，而他的对外政策依然如故，那时戈尔巴乔夫就会有更大的力量来加强和扩展苏联帝国。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让苏联国内政策的变化影响我们的对外政策。有人认为我们应在军控谈判中作出让步，以"帮助"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取得成功。照这些人的话办将是愚不可及。他的各项改革将因其本身的优劣而有起有伏。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影响克里姆林宫的内部政治动向。如果苏联报纸每次发表论述苏联问题的文章时我们都作出让步，那么莫斯科将得到战略好处，而我们得到的只是报上剪下的几篇文章。

与此同时，我们又要不抱成见地观察苏联制度是否有进行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的可能性。虽然目前还无法断言，但戈尔巴乔夫的多项改革有可能生气勃勃地进行下去，并使苏联制度真正地起变化。然而，我们应记住，经济改革不会必然导致政治改革。正如查尔斯·克劳思默尔所指出，"经济自由能引起政治自由的欲望，但现代的独裁者们有必要的弹压手段对付各种欲望。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可以和极度的政治弹压并存。"

长远说来，直至苏联内部起了变化，我们不能期望其对外政策会有根本的变化。这就要求我们以严格的标准衡量苏联各项改革的意义。他们是否把政治和经济权力都下放？他们是否给苏联的非俄罗斯人更大的自治权？他们是否保护思想和宗教自由？他们是否解除东欧国家的卫星国地位？如果

改革在这些领域打不开局面，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就不会有所牵动，西方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自慰之处。

一阵清新的微风正吹拂着苏联。我们还无法知晓其风力和风向。但哪怕只是青萍之末的自由微风也能使苏联高压的闷热有所缓解。因此，我们应对这一变化持欢迎态度，但对其意图继续保持警惕。

为现实的和平而努力应从承认美苏之间存在深刻的分歧这一基本事实开始。

严酷的现实是，两国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都是针锋相对的。苏美之间的斗争是一个自称和公认的侵略性国家同一个自称和公认的防御性国家之间的斗争，是极权主义文明和自由文明之间的斗争，是一个对自由这一概念惊恐万状和一个以自由这一概念立国的国家之间的斗争。

双方的抱负水火不相容。美国要和平，苏联要囊括整个世界。我国的对外政策尊重其它国家的自由，它们的对外政策企图摧毁其它国家的自由。我们追求和平，并把它本身就作为一个目的；它们只在和平有利于实现它们的目的时才予以追求。苏联人肆无忌惮地、除了全面战争以外不择手段地追求这些目标。

有些人认为从道德的观点看，美苏两国难分上下，对和平与自由构成同等的威胁。但是，美国既没有威胁和平，也没有威胁自由，面苏联则把枪口既对准和平又对准自由。我们有必要拥有威慑力量，使苏联不敢进攻或恐吓西方，但苏联很清楚它无需对我们进行威慑。我们应牢记丘吉尔在1945年对议会说过的一段肺腑之言：“除非兵戎相见，真理与谬

误之间无平等可言。”

正如阿贝·罗森塔尔所说，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在世人的心目中为美苏塑造一种不相上下的道德形象——但“又不付出下列的代价：改变共产党专政赖以存在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各个要素。”他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他在欧洲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在英国和西德的民意测验中，他得分高于里根总统。在纽约和华盛顿上层社会的鸡尾酒会上，公认的高见是俄国人和我们这号人没啥两样。这些卖弄聪明的才子们忽略了一点：“我们这号人”不动用军队占领八个卫星国家、不建立集中营监禁几万个政治犯。

戈尔巴乔夫1987年12月访问华盛顿时，有人问他苏联为何限制向外移民的权利，他的老一套的回答就是反问为什么美国在同墨西哥的边界上没有移民代理人。我们应这样回答：“我们对于迁入的移民的确只好施加限制，因为有许多人包括铁幕后面的数以千计的人都要求来美国。有多少人申请去苏联定居？此外，任何人要离开美国随时都可以走。走的人很少。你准许多少人离开苏联？如果能离开的话，有多少人会离开？”

苏联对我们的人权政策提出过荒唐的指责，不予反驳就会使人认为我们的制度并不比他们的制度强。一个民主国家和一个专制国家在道德规范上是不能等同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触动这个国家的警察权力。不管公开性会使局面有什么改观，它不会带来自由。只要在苏联帝国没有自由，苏美在道德规范上就不能等量齐观。如果我们妄自认为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没有一条道义的鸿沟，那就会损害我们的价值

观念和我们抵制苏联扩张主义的能力。

对争取现实和平的事业最不利的做法是宣传这样的神话：美苏之间的问题只是一个大误会。只要我坐下来，了解对方，我们之间的分歧就会烟消云散。主张加强超级大国间的接触以增进相互了解为宗旨的政治学派就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其实，情况恰恰相反。问题不在于我们之间缺乏相互了解，而在于我们彼此很了解，但有着难以消除的分歧。我们应认识到，通过谈判有希望做到的只是防止这些分歧升级为武装冲突。

苏联对外政策是俄罗斯传统的扩张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气魄这两者的危险混合物。它是双料的帝国主义。即使没有共产主义，俄国仍会是个扩张主义的国家。但是共产主义使它变本加厉地追求全球霸权。在苏联人看来，扩张就是现状。正如赫鲁晓夫1961年在维也纳对肯尼迪总统所说，"各国连续发生的革命进程就是现状，任何企图阻止这一进程的不但是要改变现状，而且是个侵略者。"

谁想了解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意图，就应该去阿富汗。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阻止该国人民推翻人所不齿的共产党政府时，我正在撰写《现实的和平》，我指出莫斯科的这一入侵是为实现其控制波斯湾石油资源的长期战略而采取的最新步骤。莫斯科知道入侵将付出巨大的政治和军事代价，但它仍象一个棋坛老手走出一步大胆而深思熟虑的棋那样，泰然自若地作出了进行干涉的决定。

八年来苏联对一个国家的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着最恶毒的战争。苏军的种种暴行，可谓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有一次苏军开进了一个村庄，把老百姓的手脚捆了起来，叠

成象成捆的木材，然后把他们活活烧死。这不是个偶然事件或军队的过激行动，而是一项处心积虑的政策，目的在于对人民群众进行恫吓，使农村成为无人居住的地区，阿富汗抵抗者便失去了后勤基地。战前阿富汗有1500万人,其中500万人逃入了巴基斯坦和伊朗，100万人惨遭杀戮。把莫斯科对阿富汗人民犯下的灭族罪行同希特勒灭绝犹太人的罪行相比，不是耸人听闻的冷战宣传，而是冷峻、严酷的事实。

1985年我在巴基斯坦同阿富汗接壤的地区旅行，看到了当地一贫如洗的状况，而目前几百万威武不能屈的阿富汗人就是生活在这种状况之中。阿富汗问题结局如何还有待分晓，因为阿富汗抵抗运动不会很快消亡。但是苏阿战争迄今给人们的主要启示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为了其战略利益会不惜使大批人饱尝人间苦难。世界各国对于这一启示不可视而不见。即使苏联在几年后从阿富汗撤出，我们也不应忘记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在过去八年中对阿富汗人民的所作所为。

我们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应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同时，又应时刻谨慎地把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同苏联人民加以区别。苏联人民同莫斯科征服的国家一样，都是身受克里姆林宫压迫的。一个乌克兰农民和一个波兰造船工人一样倒霉。

虽然苏联政府侵略成性、极其残酷无情，但要了解苏联人民却必须到苏联各地旅行，同他们见面、谈话。

我去过苏联六次——一次作为副总统，两次作为总统，三次作为普通公民。我的交谈对象有莫斯科、撒马尔罕、阿拉木图集市上的购物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煤矿工人和新西伯利亚工厂的工人。我在谈话中总是深深地感受到他们作为人民所具有的力量和朝气，他们爱国主义的自豪感以及他

们对和平的热爱。我还发现，虽然政府进行了宣传，但一般公民对美国仍怀有真诚的崇敬甚至羡慕的心情。依我看来，支持克里姆林宫在阿富汗打仗的只是一小部分人。

苏联的各族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可以证明他们伟大之处的是，尽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和可怕的镇压使他们蒙受了苦难，但苏联仍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其它国家的人民在这种压力下也许会一蹶不振，但苏联的各族人民经受住了，并把苏联推向前进。

1986年戈尔巴乔夫对我说，虽然美国和俄国人民有许多共同之处——大国地位、从全球而不是地区的角度看问题、对体育和娱乐兴趣相近——两国应能克服相互敌视和猜疑。我敢肯定他抱有这一信念。但是，虽然他对两国所作的类比是正确的，他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美国人民同苏联的各族人民可以成为朋友。但是由于我们之间存在无法调和的分歧，美国和苏联的政府决不可能成为朋友。但我们应永远记住，我们是和克里姆林宫而不是和克里姆林宫统治的各族人民之间存在着分歧。这一点适用于俄罗斯人民，但更适用于视莫斯科的统治为帝国统治的非俄罗斯人民。斯大林在乌克兰实行残暴的集体化运动杀害了800万人以上。俄罗斯向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移民使哈萨克人在他们的本土上成为少数民族。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以及其它几十个非俄罗斯民族继承了同样的遗产。列宁称俄罗斯为“各民族的监狱”，这一说法适用于沙皇时代，也适用于今天。非俄罗斯民族人口的迅速增长终有一天会使俄罗斯人在苏联成为越来越小的少数民族，这是埋放在克里姆林宫墙脚下的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

我们的政策应时刻考虑到苏联中央政府与其各个千差万别的民族之间的区别。我们不应该由于我们同苏联政府之间存在分歧而不对苏联人民表示友好。我们应设法增加西方同苏联人民之间的接触。采取的做法应是不给苏联的侵略野心帮忙。但同西方各自由国家人民的接触久而久之必然会加大国内对苏联政府的压力，要它给各族人民更多的生活自主权。

我们与苏联之间的政治分歧是实际存在的，而不是因误解或偏执的妄想而产生的。对这一点有怀疑的人应请教阿富汗人或那些被强行划入苏联帝国版图的各国人民。苏美友好协会或首脑会晤时以伏特加酒碰杯不会带来现实的和平。由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价值观念和目标完全不同，美苏政府之间的现实和平不能以双方的友谊为基础。它只能建立在互相尊重对方的实力和合法利益的基础上。

尽管美苏之间的分歧是深刻而无法弥合的，双方最关心的都是避免由于我们之间之分歧而发生核战争。尽管美国和苏联永远不会成为朋友，但它们也承受不了相互为敌的后果。我们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阻碍了我们缔造和平。核武器则使我们不能通过战争解决我们的分歧。尽管由于政治分歧的存在今后不可避免地仍会发生磨擦，但由于双方都关心生死存亡问题，现实的和平是可能实现的。

我们不应舍弃现实的和平这一可以实现的目标而去追求完美的和平这个无法实现的目标。美国和苏联都不会放弃自己的价值观念或牺牲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要与分歧共存而不为分歧殉葬，我们就应该想办法在不打仗的情况下解决分歧。我们应设法制订交锋的和平规则，因为我们之间的冲突会持续至1999 年以至下一个世纪内的相当一个时期。那

些上街游行要求完美的和平和立即实现博爱的西方人对于这一做法是不会满意的。这一做法不会使他们满意——但至少会使他们健康地活着，并享有再上街游行的自由。

在1999年之前的11年中，我们应采取旨在实现现实和平的三个要素的外交和防务政策。

第一，我们应避免核战争。目前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武器各有一万枚以上的核弹头，中程和战术核武器另有数千枚。核战争将导致文明的毁灭。

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灾难性事件释放出的放射能污染一千英里之外的食物。从苏联官方对释放出的放射能量所作的估计中，西方专家估算在苏联45000人将死于癌症。然而，仅引爆一枚核弹头释放的核微粒就会比切尔诺贝利高100倍。一场全面核战争除了使几亿人立即死亡之外，不但会毒化整个地球，而且会使癌症广泛流行。相形之下，16世纪的大瘟疫就会只象是一场流感。

第二，我们应避免不战而败。克里姆林宫中无人低估核战争的危险。但是，苏联领导人也不相信这个老看法：核武器的发明使军事实力失去了效用。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核武器改变的只是它实现其传统目标的手段。

因无视力量平衡的消长而终于沦亡的国家，史书上不乏其例。从一个国家的利益看来是无关大局的外围地区受些损失，似乎总不值得做出反应，也没有理由为此而同敌人对抗。但是小的损失会积少成多。扩张主义国家常从模糊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得利。如果它们的侵略活动畅通无阻，冲突将成为不可避免的。而冲突发生时，情况往往对防守的一方极其不

利。历史上最大的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是场莫须有的战争。如果英、法在1936年纳粹德国仍然弱小时阻止希特勒重新武装莱茵兰，1939年希特勒统帅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时它们就绝对不会被迫作出是否宣战的决定。

美国应认识到它对于远在天涯海角的冲突都无法坐视不理。美国1975年在越南的失败使苏联取得了金兰湾和岘港的海军基地，今天它的海军就从这些地方威胁着日本到波斯湾的石油生命线。桑地诺共产主义政权在尼加拉瓜得到巩固后，可能迫使美国动用军队保卫中美洲其它地区，从而影响美国在欧洲、朝鲜或中东发生危机时采取行动的能力。在苏联接连小有得利的时候，我们不能漠然视之。否则，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全球力量平衡已经大变，我们已危在旦夕。

这并不是说美国应随随便便地进行军事干涉，或承担义务保卫全世界每一平方英寸的土地。腓特烈大帝告诫过，"无所不保者，无所保。"但这不是说美国应对避免核战争和防止不战而败给予同等的重视。既然两个超级大国都认识到核战争的危险，不战而败已成为更大的威胁。

第三，我们应积极与苏联和平竞争。这一竞争不仅应在铁幕的我们这一边进行，也应在他们那一边进行。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同苏联是竞争对手。如果我们不积极同莫斯科竞争，克里姆林宫就会自行得利。托洛茨基有一次说过，"你也许对战略不感兴趣，但战略却对你感兴趣。"

我们应认识到，对外政策的目标不仅在于近期内有所收益。它是有关缔造我们身居其中的这个世界的未来。我们反对苏联扩张主义不是出于权欲，而是因为如果莫斯科占上风它会摧毁我们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应为同莫斯科竞争制订

一项长远战略。

我们之间的竞争将主要集中在第三世界各国。在下个世纪，进行公开侵略的代价将愈加高昂，因此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将起决定作用。我们应使自己有所准备，在这些方面进行竞争。但在角逐中把竞争局限于自由世界是没有意义的。苏联领导人的立场是，他们的东西是他们的，我们的东西则是可以谈判的。我们决不应默认这种偏颇而危险的态度。

每当苏联帝国扩展其版图时，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国家人民便被剥夺了人权。我们应象关心生活在苏联境内的人民那样关心这些人。我们在防止苏联将压迫推向国外方面可以比减轻其对内压迫更有作为。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的对外侵略只是对内压迫的延伸。虽然苏联的对外政策对于我们的生死存亡比对他们的对内政策更重要，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犯无视后者的错误。

就近期而言，我们首先关注的应是苏联的对外侵略。但我们决不应忘记，除非苏联减轻其对内压迫，否则它将继续向世界各地输出压迫。苏联这个国家的内在本性是进行侵略，因为其极权主义制度如不扩张就无法生存。苏联的对内压迫制度是其侵略性对外政策的根源。

我们应设法在苏联人的活动地区和苏联国内同他们竞争。如果我们总是居于防守地位，把主动权让给对手，我们就会失败。如果一个球队的守卫球员从不走出自己一方的球场，这个队就不会取胜。我们也应有进攻的战术。

有人问：戈尔巴乔夫是否“真诚”希望和平。这回避了问题的实质。他诚心诚意地不想打仗。但他同样诚心诚意地

希望取胜。苏联人争取不战而胜。如果我们争取不胜而和，我们就注定会失败。我们只有鼓励苏联集团内的和平演变才能真正降低美苏矛盾中的紧张关系。只有那时才有可能实现现实的和平。

戈尔巴乔夫要在苏联进行变革。然而，从他关于苏联经济情况不妙和应进行改革的讲话中，我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要推翻苏联的制度。他的意图是要提高这个制度的效能。他向西欧和中国所做的姿态表明，他想在国外问题上稍有间歇，以便有个喘息之机，处理国内问题。我们的目标是持久的和平；他们的目标是暂时的和平——休养生息、养精蓄锐、为实现不战而胜的目标发动新攻势。

鉴于戈尔巴乔夫有需要作出某种妥协，我们应采取什么对策？

底牌很简单。只有戈尔巴乔夫把我们所需要的交给我们，我们才能把他所需要的给他——消除苏联在用作第一次打击力量的陆基核导弹方面的优势，这些导弹使西方而临无法接受的战争威胁和核讹诈；按照赫尔辛基协议的要求，减轻苏联的对内压迫；停止苏联的对外侵略。

不幸的是，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在摇摆不定：时而希望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能实现现实的和平，时而又害怕这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

从冷战开始直至1969年，美国的政策是遏制。它企图以一系列的联盟组织包围苏联，从面阻止苏联扩张。这一做法的依据是，设想在一定的时候内部力量会促使莫斯科改革其政治制度，改变其侵略的行径。它纯属防御性，避免由美国采

取任何可能激怒苏联的行动。

这项政策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但长远看来却失败了。它满怀希望的预言没有实现。除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外，由美国牵头的所有大的联盟组织都早已散伙了。早在50年代，莫斯科就冲破了遏制，越过我们的联盟组织，先同埃及的加麦尔·阿卜杜勒·纳塞尔建立关系，然后又同非洲的几个民族主义领导人、最后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了关系。克里姆林宫现在在世界各地已有一连串的仆从和卫星国——从地中海的利比亚到加勒比海的古巴，南中国海的越南、阿拉伯海的南也门、红海的埃塞俄比亚。遏制使美国必须不断作出反应，对付苏联对西方薄弱环节的试探。在50年代和60年代，苏联在世界各地发动灌木林火式战争，战火一点燃，美国便急忙予以扑灭。这一政策使美国疲于奔命，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由于纵火者总是掌握着战略主动权，他对灭火者占有优势。从长远说来，遏制是个失败的对策。

从1969年开始，美国奉行讲究实际的缓和政策。缓和与协约不同，协约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间的协议，而缓和则是利益各异的国家间的协议。它并不意味着美苏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协议，而是意味着虽然我们在大多数问题上存在着歧见，我们想就一些问题达成协议，不想为任何问题而打仗。

讲求实际的缓和设法把缓和同威慑结合起来。缓和紧张关系不等于放松警惕。美国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意志力足以迎击苏联的扩张威胁和讹诈。美国准备不但以外交压力而且以军事压力制止苏联的直接和间接的侵略。美国不向威胁其利益的人保证，除非它受到攻击，否则不会使用武力；

而是宣布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卫自己和盟国的利益。

更重要的是，美国决心说到做到。1970年，苏联曾企图在古巴的西恩富戈斯建立核潜艇基地，并曾努力通过叙利亚推翻约旦国王侯赛因，但由于美国的压力而后退了。在1971年的印度—巴基斯坦战争中，当新德里企图吞并巴基斯坦时，它约束了印度。1972年，北越大规模进攻南越，美国的反应是轰炸和在海防布雷，但三个星期后莫斯科仍参加了原计划的美苏首脑会晤。1973年，在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美国宣布其全球武装力量进入戒备状态后，莫斯科便放弃了派兵进入中东的威胁。

对于苏联领导人说来，讲求实际的缓和所具有的威慑的利刃没有使超级大国谈判变得一文不值，而是使美国人成为有价值的谈判对象。

威慑还和奖善罚恶相结合，这对苏联有明确的吸引力：要维护和平而不要破坏和平。美国在广泛的各类问题上着手同苏联谈判。有些是双方共同关心的，如军备控制、清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债务以及缔结柏林协议。另一些则是苏联人特别感兴趣的，给予最惠国贸易待遇和购买美国粮食。

这些谈判使美国有了可以左右苏联的一定力量。当莫斯科威胁美国利益时，美国放慢或暂停这些谈判。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对于这种信息总能心领神会。当他们回心转意时，美国又继续谈判了。

讲求实际的缓和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决心抵制苏联扩张，同时探索可能达成协议的领域。从1969年至1974年间所实行的缓和加威慑维护了必要的平衡，使苏联领导人认识到有限的合作符合他们的利益。在大力执行缓和加威慑政

策时期，苏联没有攫取新的领土。

1975年之后，缓和失去了军事威慑的利刃。共产党的侵略使西贡陷落时，美国维护其利益的意志减弱了，缓和往往蜕化为天真地追求克里姆林宫所能接受的任何协议。促使莫斯科同美国达成真正妥协的正反两方面刺激都被消除了。这使苏联领导人认为他们可以既搞缓和又吞并其它国家。

缓和的消亡开始于国会大厅中。讲求实际的缓和要求胡萝卜和大棒两手并用。国会对这个政策的这两半都搞釜底抽薪。

1973年，国会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规定在苏联公民获准自由迁往国外之前不给苏联最惠国贸易待遇。其结果是取消了促使苏联克制的最重要的正面刺激。

1968年至1975年间，白宫提出的防务预算被国会削减了共400亿美元。此外，国会还在1974年把政府要求向南越提供的军事援助削减了一半，1975年又削减了三分之一，对柬埔寨的援助则减得更多。更有甚者，国会不顾我的否决，通过了战争权力法并通过了禁止在越南使用美国空军的决议，从而剥夺了我和福特总统的政府执行巴黎协议的权力。与此同时，苏联却增加了对越南的军援。1975年共产主义分子在印度支那取胜是因为国会不准许美国象苏联援助其盟国那样大力援助自己的盟国。1975年在安哥拉又再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国会拒绝给苏联最惠国待遇，就是把胡萝卜弃而不用。它削减防务预算、削弱总统对苏联侵略作出反应的能力，美国手中便只有一根软弱无力的棍子。

这些做法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了错误的信息，无异于向莫

斯科示意它可以奉行侵略政策，为此只需付出很小的甚至不必付出代价。苏联对此当然却之不恭。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不久就在世界各地四出开展对外冒险活动。

美国领导人没有从美国在东南亚和南部非洲的受挫中汲取应有的教训。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对苏政策从一个极端摆向另一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超级鸽派。在卡特政府初期，他们的影响占主导地位，纵然卡特的一些顾问如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肯定不属于超级鸽派。超级鸽派的中心论点是，美国应认识到，苏联进行侵略的唯一原因是他们害怕我们和自感不安全。这意味着东西方之间存在紧张关系，错在我们而不在他们。超级鸽派为苏联的每一个侵略事例开脱，办法是虚构一些威胁，而把苏联的每一次行动都说成仅仅是防御性的反应。在他们看来，美国应设法向苏联人反复保证美国要和平，并在必要时采取些单方面的步骤。超级鸽派认为，如果我们为和平做出榜样，苏联人会投桃报李。

这种看法是天真的。它对苏联人的本质缺乏认识。我们无需使苏联领导人相信我们要和平。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撤军。在战后初期我们没有利用我们的核垄断地位。除了对付共产主义扩张或颠覆外，我们从未卷入远离我们地区的事务。我们在欧洲和其它地区的军事部署和应急计划纯属防御性。

卡特总统执政后采纳了超级鸽派的政策。它导致了灾难。当他单方面削减美国的防务计划时，莫斯科加速扩充军备，从70年代中期的战略均势到70年代末期已变为它在陆基弹道导弹方面肯定占优势。当他不再把军控的进展同东西方关系

问题的进展相联系时，莫斯科对谈判拖拖沓沓——它最有兴趣的那些问题除外。当他在地区性危机中采取单方面克制的做法时，莫斯科转入进攻。它扩大了对阿拉伯半岛、西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统治。这一连串的失利以入侵阿富汗为高潮，使卡特总统不再听从超级鸽派的政策建议。他宣布了反对苏联染指波斯湾的卡特主义，并要求增加防务预算。

当超级鸽派控制着政策时，战争的可能性增加而不是减少了。美国的单方面克制降低了苏联为冒险行动而付出的代价，增加了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走上侵略道路的可能性。

里根总统就职时，美国的政策摆向了另一个极端。他的一些最有影响力的顾问是超级鹰派。他们要求彻底孤立苏联。他们强调苏联经济困难重重，克里姆林宫正不择手段要搞垮我们。他们要求美国以同样的做法回敬苏联。依他们看来，美国不但应取得军事优势，还应断绝给莫斯科的一切西方贷款、信贷和同它进行的贸易。超级鹰派的论点是，如果我们狠狠地压他们，风雨飘摇的苏联经济终将崩溃，共产主义制度也会随之灭亡。

这是一幅令人神往的情景，但却是不现实的。虽然它对苏联的本质看法正确，但它对美苏国内外政治现状的臆想却和超级鸽派对克里姆林宫的动机缺乏了解一样，是天真的。

超级鹰派看不到全面的财政和贸易封锁是行不通的。美国绝对无法劝诱西欧和日本进行合作，采取这样的行动。这个教训是在1982年苏联煤气管道危机中遭到失败后才总算有所领悟，而在这次事件中受害更大的是西方联盟而不是苏联经济。实际上，没有盟国参加，美国实行禁运没有意义，而且效果会适得其反。

超级鹰派过高估计了外部压力对苏联制度的影响力。极权主义政府在受到外国的经济压力时不会善罢甘休。当苏联受到压力时，他会压制国内消费。虽然苏联各方面的弱点和问题很大，但它不会垮台。苏联人民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表明，他们很能忍受牺牲和痛苦。戈尔巴乔夫手腕高明，他在动员人民对付任何企图制服苏联帝国的努力方面，会比斯大林干得更出色。

超级鹰派不懂得在美苏关系中如何运用经济力量。虽然经济方面的吸引力不能决定苏联的对外政策，但可以对其施加影响。美国政府企图孤立苏联的做法，削弱了自己的杠杆作用。一方面它不影响苏联取得西方物资。莫斯科只需要转而求助于其它国家的供应。另一方面，它却使东西方贸易中美国的份额下降。这说明超级鹰派的目的一个也没有达到，但却削弱了美国从运用其经济力量中所能取得的牵制能力。

超级鹰派不懂得美国及其盟国的基本政治现状。美国的政策往往只是没有战略思想的好战言论。必须说到做到，否则便是空谈。美国公众舆论希望美苏冲突能尽快解决，但并不预期真能做到。然而，美国公众却的确期望美国领导人努力减少同另一个唯一的超级核大国之间发生战争的风险。自由的人民如果对和平不存在希望，就不会为制止战争作出必要的牺牲。绝大多数美国人会断然拒绝这个理论性的命题："宁愿赤化不愿死"。但是，如果他们一旦面临即将死亡的严酷现实，这个问题就更加逼人了。我们应确保他们不必作出这种选择。基于那样一种态度的战略在实际上和政治上都是无法支撑下去的。

里根政府的一大问题是它的一些政策看来是听命于政治

而不是战略。美国农场主的压力使他取消了卡特总统的谷物禁运。当民意测验表明，卡特下台后大多数人要求实行强硬的反苏政策时，它便表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都不好，对于任何旨在达成新军控协议的认真努力，美国都应拆它的台。1984年竞选临近时，里根总统放弃了超级鹰派的做法，表示较为愿意同苏联人谈判。有些人说他采取这一态度是因为民意测验表明他的主要弱点是和平问题。他的某些政治顾问可能是如此，但我怀疑总统是否如此。他曾在雷克雅未克拒绝了一笔不利的交易，我确信他在莫斯科也会拒绝不利的交易。

然而，我们不应低估念念不忘民意测验会带来的一些后果。如果莫斯科认定，政府的政策会受民意测验的影响，它就会集中力量影响民意测验而不认真谈判。在和苏联人打交道时，一个总统所能犯的最大错误莫过于追随而不是引导民意测验。今后莫斯科肯定会利用公众舆论作为一个对付美国的杠杆。当谈判即将告成，当危机要求美国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时，莫斯科会对每一届美国政府进行考验，考验它是否愿意为保卫美国利益而顶住民意测验的结果。

自从1976年以来，我国的对苏政策存在深刻的弊端。它没有章法、犹疑不定、囿于防守、忽起忽停。不管我们对苏联的对外政策有何议论，我们应承认它是条前后一贯的强硬路线。我们可以不喜欢他们的政策，但不能声称我们不知道它的内容。

展望未来，在这个世纪余下的11年中实行过去已失败了的任何政策都是不行的。遏制已过时。缓和已失去意义。超级鹰派认为它是体制化了的投降。超级鸽派认为它是体制化

了的博爱。超级鸽派的政策不懂得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超级鹰派没有这一方面的错误，但是他们教条的政策是不现实的，政治上也是难以持久的。

我们需要的是一项认清了苏联人的真面目、但又意在同他们打好交道的新政策。在制订同苏联打交道的战略时，我们应采取必要的步骤保证美国的经济情况良好。坚挺的、高生产率的、蒸蒸日上的经济是美国所扮演的责无旁贷的世界性角色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我们就不会有强有力的对外政策。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我们就负担不起遏制苏联侵略的必要防务开支。没有强有力的经济，我们就无法以外援计划资助受到侵略威胁的友邦和盟国。而最重要的，强有力的自由经济对于正在探索既有自由又能取得发展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是个有力的榜样。实行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和在财政上不负责任的美国会削弱我们以我们思想的力量和军事力量发挥领导作用的能力。

在美苏关系方面，美国需要的是一项熔威慑、竞争和谈判于一炉的综合性政策。

首先，我们应认识到我们应为确保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而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这应包括保持我国的核威慑力量。我们不可能同莫斯科达成彻底裁军的协议。我们不可能建立万无一失的防御系统对付核武器。我们应在今天就决定将来需要哪几种最能对苏联起到威慑作用的战略力量。我们还必需保持足够的力量，以威慑苏联使其不敢进攻我们在欧洲和远东的主要盟国以及我们在波斯湾的重大利益。

我们的任务是在欧洲和其它地区不仅以核力量而且以常规力量威慑苏联。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我们能够完成。

B·H·利德尔·哈特曾这样描绘苏联人，“他们信奉武力，这就使他们容易慑服于对方的强大力量。”

除了威慑之外，美国还必需在双方不可能达成协议的问题和领域中采取为同苏联进行有效的全面竞争所需要的各种政策。在美苏角逐中终会有一方得胜、一方失败——如果我们不进行竞争我们就不能取胜。

我们的谈判战略还必需以此为依据：了解这两个超级大国在哪些方面能达成协议、在哪些方面达不成协议。

我们能就采取措施减少发生意外核战争的可能性达成协议。我们能就降低和稳定核武器的战略平衡的办法达成协议。我们能就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办法达成协议。我们能就解决世界各纷争地区的某些（但不是所有）冲突的办法达成协议。我们能就如何构造诸如贸易和文化交流等互利关系达成协议。我们应和苏联一起努力，防止第三世界的冲突引爆大规模战争，但又不能期望解决这两个超级大国在这些冲突中的所有分歧。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谈判过程中提出。

我们应明确表示，只要他们有意，我们随时准备建立真正的和平与合作关系。但我们也应明确表示，消除西方猜疑的责任在于克里姆林宫，因为这种猜疑不是来自我们的狂想，而是由他们漫长的侵略历史所造成的。对于积极的变化我们应给予回报，但回报的多寡应视他们行动的大小而定，而不是根据我们希望的大小而定。

我们迄今还没有过一项威慑莫斯科、同莫斯科竞争、同莫斯科谈判的象样的综合战略。我们今天就应制订出来，否则就难保不重蹈不久之前的覆辙。如果我们忽视三大任务——威慑、竞争和谈判——中的任何一项，我们会给在超级大国

间缔造现实和平的机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最后，在我们的竞选活动和在国会大厅里，我们应公平而自由地辩论我们在对苏政策上的不同看法。应该看到，反苏者不是好战，反战者不是亲苏。问题不在于某项政策是否反共。反共不是一项政策。它是一种信念——对自由的信念。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这种信念，但他们对于哪一种政策最能捍卫和传播这一信念看法不一。我们应就政策进行辩论，但同时不必怀疑和我们持不同看法者的信念。

如果托克维尔今天还健在，他对美苏斗争的前景会有什么预见？

他无疑会对美国的对苏政策落到这个地步摇头叹息。他会认为他的论著中的下列看法是正确的："在外交事务方面，民主政府看来肯定不如其它政府，" "民主国家要对一项大任务的各个细节进行协调、选定某项计划并不顾各种障碍毅然将其推行到底是会感到困难的。"因此，他会不得不承认，在美苏冲突中莫斯科具有一个天然的有利条件。

我们不应因托克维尔的假设性结论而感到绝望。我们应视其为建设性的批评，使它为我所用。他对民主国家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能力感到悲观，但他的看法不够全面。美国内在的经济、政治实力极其强大，足以克服我们在执行外交政策方面的弱点。莫斯科内在的经济、政治弱点极为严重，非其在执行政策方面的长处所能补偿。如果美国使其战略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技巧更臻完善，它就能克服托克维尔告诫的主要弱点。

如果采取一项威慑、竞争和谈判相结合的战略，我们就

能成功地构建现实的和平，并使之持续至1999年之后。

我们所愿看到的苏联的变化不会很快地到来，但我们应努力使之实现，决不可丧失耐心。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1959年我去莫斯科之前，哈罗德·麦克米伦向我指出，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曾把失宠的顾问送上断头台，100年后安妮女王则将失宠者流放。斯大林处决他的对手，而只有五年后赫鲁晓夫派马林科夫去西伯利亚管理一座发电厂。

戈尔巴乔夫目前的处境是令人羡慕的。他不但能成为今年的风云人物，甚至能成为本世纪的风云人物。当他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时，他决定把苏联引向何处，这不但涉及苏联人民而且涉及全世界人民的生死存亡。苏联所发生的变化可以使这个世界更安全，也可以使这个世界更濒于绝境。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这种变化会有多大、属于什么性质、来得多快——这些取决于他，也取决于我们。

第 三 章

如何威慑莫斯科

我们生活在拥有核武器的世界上。这一事实既然不会改变，我们就必须学会与核弹共存。避免核战争和避免不战而败是我们的两大首要目标。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两大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核弹的存在。如果我们没有威慑力量阻止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进行核战争或核讹诈，我们就不可能开始建立现实的和平。现实和平的大厦只能建筑在核威慑的基石上。

核武器大大改变了世界运行的方式。在均势政治的时代里，战争是一种公认的治国权术。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基本上不影响广大民众。而今天则并非如此。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几乎肯定会升级而动用核武器。仅在美国和苏联就会有4亿多人在一场全面的交锋中死亡。在核时代，一个超级大国再也不能用战争作为对付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政策工具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下一场战争将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因为它也将结束我们所享有的文明。

一些分析家认为，既然发射核武器会有遭受灾难性报复的危险，任何清醒的领导人都不会考虑使用它，因此核武器是无用的。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虽然超级大国的庞大核武库在总体战中没有军事上的用途，但在美苏争夺中仍有政治

上的用途：核武器仍可用来恐吓对方。正是人们所说的这种无用性使核武器对苏联比对西方更有用。斯大林曾经说过："核武器这东西可以用来吓唬神经脆弱的人。"

美国及其盟国在20世纪的今后几年和21世纪所面临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的核讹诈，而不是核战争。如果我们想在1999年以前在争取现实和平方面取得进展，就必须理解优势在核时代的意义并采取必要的军控和防务政策以防止莫斯科获得优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核武器巨大的毁灭性力量造成了关于如何避免战争的三种矛盾的想法。一些人认为解决核难题的唯一办法是彻底裁军。另一些人认为唯有取得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才是补救的办法。还有一些人认为万无一失的防御体系可以使核武器过时。这三种观点都是骗人的神话。直接观看核爆炸会使人致盲。想到核射线笼罩着地球或由克里姆林宫统治世界的可怕情景看来已使许多人在思想上致盲。

相信裁军可带来和平这种神话的人认为军备竞赛是世界上的万恶之源，因此超级大国的谈判中应绝对优先进行军控会谈。他们主张美国不应把军控的进展同其它问题上的进展联系起来。军控会谈应谋求从地球上消除核武器，或至少大规模削减超级大国现有的核武器。他们认为彻底裁军将会保障和平。

由于军备不是引起战争的原因，军备控制也不能实现和平。主张军备控制的人不理解这一点。战争并不是由于武器的存在而引起的，而是由于各国之间的政治分歧导致了使用武器而引起的。军备竞赛从来没有引起过战争，而有领土野

心的侵略性国家却常常引起战争。最可能发生战争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防御性国家和一个进攻性国家都在进行军备竞赛时，而是一个防御性国家在竞赛中落后并失败时。扩军是政治冲突的一种症状，而不是病因。我们固然应设法缓解症状，但不应忽视疾病本身。

大量削减核武库并不能解决核难题。自50年代以来，我们已把美国核武库的实际爆炸当量减少了20倍，但我们仍然拥有巨大的毁灭性力量。即使两个超级大国同意将其现有的核武器销毁一半，双方仍各拥有5000枚以上的战略核弹头，每一枚的爆破力都比毁灭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大许多倍。超级大国之间的战争仍会毁灭文明。正如邓小平1985年对我说的："美国和苏联现在有力量把世界毁灭10次。假如它们只能毁灭5次，难道这个世界就更安全了吗？"

主张消除核武器的人生活在梦幻之中。人们渴望有一天核战争的威胁会消除，这是可以理解的。声称我们可以用一纸消除所有核武器的军控协议来做到这一点也许作为政治策略是不错的，但作为治国的手段却并不高明。如果人人都是天使，我们就可以禁止核弹。但人不是天使。我们不应鼓吹假定人是天使的军控政策。

与苏联签订消除核武器的协定将会是个灾难。我们的防务政策是公开制定的，他们的防务政策则完全是秘密制定的。莫斯科可以肯定美国会遵守协定，而我们却无法知道克里姆林宫是否违反了协定。这就有引起灾难的风险。搞欺骗会使克里姆林宫垄断某些核武器并会危及我国的生存。即使苏联不搞欺骗，禁止核弹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莫斯科在常规部队方面占有压倒的优势。西方以核升级的威胁来对付这种优

势。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将是一个由苏联统治的世界。

即使我们成功地消除了核弹，超级大国之间的任何协议都不可能废除制造核弹的知识。核武器的基础是简单的物理定律，已有十多个国家掌握了核技术。美国和苏联都可以在几天的时间里搞出一个新的核武库。没有核弹的世界比今天的世界要危险得更多。超级大国之间的危机象两个枪手在光天化日之下摊牌：谁能象掏枪一样更快地装配起新的核武器，谁就能获得全面胜利。然而，过去在西部的一次摊牌可能打死一个人，而核时代的交战却会使1亿人丧生。

呼吁"从地球上消灭核武器"只不过是一句哗众取宠的政治口号。把它上升为总统的政策——卡特和里根政府时都曾这样——就模糊了公众的辩论，使我们转而为不现实的目标而努力。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怎样建立核时代的现实和平的严肃讨论中不允许存在"禁止核弹"综合症。

重新获得绝对军事优势是核时代的另一个和平神话。鼓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美国如果肯花钱生产足够的导弹，就可以重新获得它从1945年直至60年代后期所享有的优势。为获得进攻性核武器方面的绝对优势，美国需要建立起能够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苏联所有的报复性武器的战略武装力量。这就要求生产出1000多枚新型的高精度陆基导弹。这种主张经不起基本常识的检验。过去八年中国会把MX导弹的部署从200枚减为100枚又减为50枚，最后减至40枚，因此没有人能认真地争辩说国会会拨款生产1000枚导弹。而且，苏联绝不会默许美国取得绝对优势。不管莫斯科有多大的经济问题，它都会不惜为防止美国获得这种决定性优势而拨付必要的款项。两个超级大国都不会接受另一方的核优势。一方的安全

不能以另一方的不安全为基础。

主张建立万无一失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只是以绝对军事优势保证完美的和平这一神话的新版。只有万无一失的防御体系才能保护美国人民免受弹道导弹的核攻击。即使一个防御体系能阻挡敌方99%的弹头，在一场全面战争中，1%仍会是100枚核弹，这会给美国人民带来灾难性的伤亡。更何况我们建立一个有效率为99%的防御体系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主张建立保护全国居民的防御体系的人要求我们建立一个“太空盾”。然而目前我们现实可行的只是建立一个太空筛。对保护全民的防御体系的研究应继续进行，但我们在了解其作用之前不能把它当作解决问题的办法。

即使是万无一失的反弹道导弹之盾也不会使核武器过时。它不能抵挡远程轰炸机运载的核弹。它也不能抵挡巡航导弹运载的核弹头，而巡航导弹可以由苏联的任何飞机、舰船或潜艇发射并能作低空飞行使雷达无法发现。它肯定不能抵挡偷运进美国的小型核装置。美国的边防漏洞百出，以致成千上万的毒品走私分子和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能在边境出入而不冒多大风险。任何了解情况的人都不会确实认为美国能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部署一个万无一失的反核弹防御体系。

虽然我们不能以万无一失的防御体系使核武器过时，但是对美国战略力量作有限防御在当前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保护全民的防御体系是下个世纪的一个梦想，而保护美国战略力量则可以在本世纪实现。当我们考虑战略防御体系的威慑作用的时候，必须随时对这两者加以区别。我们应该用战略防御计划去加强、而不是代替威慑力量。

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谈中，美国错误地把彻底裁军的神话和万无一失的防御的神话捏在一起并称之为战略。里根总统同意了戈尔巴乔夫关于美苏在10年内消除所有核武器的建议。总统还坚持说，为了确保不受苏联的欺骗，必须允许两个超级大国10年后在全国范围内部署保护全国人民的防御体系。雷克雅未克出现的情况是美国政府成为自己言辞的俘虏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尽管有了雷克雅未克首脑会晤、而不是由于有了雷克雅未克首脑会晤，我们后来的军控谈判仍取得了进展。军备控制的核心问题是超级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在雷克雅未克杜撰神话的人放弃全面消除核武器和使核武器过时这两种幻想之前，这个问题不会取得真正的进展。

有人认为既然美国无力恢复50年代和60年代的核优势，核时代的优势就无关紧要。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虽然美国不再谋求优势，但我们绝不能让苏联获得优势。很明显，苏联将尽一切可能防止美国获得绝对优势。反过来是否如此尚可商榷。如果超级大国之间进行军备竞赛，美国肯定不会落后。问题是，在过去20年中，苏联一直在跑，而美国却还没有离开起跑线。

认为优势无关紧要的人忽视了美苏外交政策目标是针锋相对的。由华盛顿的领导人还是莫斯科的领导人掌握核优势对世界会有截然不同的后果。

美国是一个防御性国家。它从来不是进攻性的国家。客观情况而不是主观计划，使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如果二次大战后苏联没有威胁要使西欧臣服，美国就会退回到它在战前

的孤立地位上去。如有可能，大多数美国人仍然愿意回到美国对时局超然物外的那个较为单纯的时代去。

苏联是一个进攻性的大国。当前它公然以莫斯科统治下的共产主义世界为目标。在19个受莫斯科统治的国家里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甚至曾与莫斯科的同志们做过10年亲密盟友的北京的共产党人对此也不持异议。中苏分裂就是因为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坚持要中国人服从苏联的领导。这并不是说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的密室里藏有类似施利芬计划的全球计划。戈尔巴乔夫不想打仗。一个城毁人亡的世界并非战利品。但他的确想以除了战争之外的其它手段扩大苏联的控制权。这方面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就是含蓄地和明确地以核战争相威胁。

由防御性大国还是进攻性大国掌握核优势是大不相同的。防御性大国手中的优势是和平的保障，进攻性大国手中的优势是对和平的威胁。侵略者在认为自己握有很大的军事优势时就会发动战争。为了维护和平，防御性大国必须十分强大才能使潜在的侵略者相信他们诉诸武力是不会取胜的。

从二次大战末期直到70年代初期的25年中，美国享有核优势。西欧今天仍然是自由的，这是因为美国的核优势抵消了苏联强大的常规优势。美国的优势在50年代中期登峰造极时对苏联在其它地区的冒险和侵略是一个强大的威慑力量。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解释说，美国的大规模报复理论的意思是美国将“在自己选择的时间与地点”对共产主义扩张作出反应。对此，克里姆林宫不敢忽然置之。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知道，时间是B-52飞机飞越北冰洋所需的12小时，地点是莫斯科。

美国优势的逐步消蚀是无法防止的。然而，对核武器持修正观点的人有贬低1945年以来核外交的决定性作用的倾向，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美国核优势在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1959年的柏林危机及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都是我们取胜的关键。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不仅是为击退共产主义对朝鲜半岛的侵略而战，而且也是为了保护没有武装的日本和防止苏联和中国在亚洲其它地区的扩张。中国进行干涉之后，1953年这场战争已在三八线附近陷入了僵持的局面。在南朝鲜已经得救的情况下，美国人民很快对不断流血感到厌倦，肯定不会考虑美国常规力量的升级。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反对在亚洲打一场长期的地面战争。因此，他命令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通知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希纳·梅农——他同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都有良好的关系——总统已越来越不耐烦，正考虑在朝鲜使用核武器。结果是，在1953年7月艾森豪威尔就职半年后签署了停战协定。

在苏伊士危机中，艾森豪威尔面临着苏联在中东进行干涉的威胁。英法进行了军事干涉要从埃及总统纳赛尔手中夺回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之后，赫鲁晓夫想使艾森豪威尔相信两个超级大国应联合部署兵力迫使伦敦与巴黎撤军。由于没有成功，这位苏联领导人就以单方面派兵帮助埃及并向英国和法国发射苏制导弹作为掩护火力相威胁。艾森豪威尔命令北约的美籍司令传达我们的反应。北约司令格伦瑟将军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明了赫鲁晓夫的威胁如果变成行动会有什么后果："莫斯科将象黑夜接替白昼一样肯定遭到摧毁。"赫鲁晓夫退让了。

在1959年的柏林危机中，苏联要与东德缔结一项单独的和平条约，其作用不仅是违反同盟国的战略协议使苏联对东柏林政府的控制合法化，而且也会阻碍西柏林向西方的开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似乎有些闪烁其词。他说我们“肯定不会在欧洲打一场地面战争”，“在我看来，核战争总的来说对所有人都是于己无益的”，但他又说我们“决不会在权利和责任上让步”，他“没有谈过核战争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四天之后美国空军司令在国会的证词中使人们对艾森豪威尔讲话的含意不再有任何疑问。他明确宣布，如果我们在柏林受到挑战，就会使用核武器。所以，赫鲁晓夫虽然继续在柏林问题上进行威吓，却没有象他所威胁的那样采取单方面行动。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的核外交，尽管没有言明，却是迫使赫鲁晓夫妥协的关键。当肯尼迪发现赫鲁晓夫秘密向古巴运送了导弹时，总统要求撤走这些导弹，并接着以海军进行了封锁。赫鲁晓夫在面对美方登船搜查一艘苏联货轮的威胁时反击说，这“将使会谈成为多余的”，将使“战争力量”起作用，并会产生“无法弥补的致命后果。”肯尼迪对赫鲁晓夫的核恫吓采取了蔑视的态度。赫鲁晓夫退让了，但这是在他迫使美国允诺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和不支持古巴和美国的反卡斯特罗力量之后。虽然肯尼迪政府的一些前官员今天争辩说是美国常规力量的压倒优势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核优势。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美国核优势为后盾，我们的常规优势是否有足够的威慑力量阻止赫鲁晓夫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以上是美国得胜的四个例子。这四个事件都危及我们的

重大利益。在这些事件中，我们都有一定的核优势，美国总统都不容置疑地表明了他将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以保护美国利益的意志，而且除在古巴外，美国以常规力量进行干涉都是不可能或无法取胜的，只有核优势才解决了问题。在朝鲜，它结束了战争。在苏伊士，它把苏联人挡在中东之外。在柏林，它避免了超级大国在中欧的冲突。在古巴，它防止了莫斯科在距美国90英里的地方部署核力量。

持核时代优势无用论的人忘记了当我们具有优势时它是多么有用。而1945年在伊朗和1979年在阿富汗的两次危机则确凿地说明了优势的重要性。1945年和1979年，莫斯科在常规兵力方面不仅在西南亚而且在全世界都拥有压倒的优势。1945年，美国独家垄断核武器。到1979年，莫斯科已取得了与美国的核均势，并且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

1945年，当战时协定要求苏联、英国和美国的军队撤出伊朗的时候，斯大林企图割取两个省份并使其最终划入苏联帝国的版图。他策划了库尔德人民共和国和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的独立宣言。在欧洲问题上过分信任苏联人的杜鲁门总统早已有了教训，他给斯大林发了一封密电，威胁说苏军如不撤离伊朗会有严重后果。由于美国垄断着核武器，斯大林别无选择只得照办并在几个月内撤走了苏军。美国没有任何常规兵力迫使莫斯科撤军，因为华盛顿已经把自己的军队撤出了伊朗，并正对二次大战的大多数部队进行复员。这就是说，斯大林只能是对美国的核优势作出了反应。

1979年，阿富汗的共产党政府在反共叛乱面前濒临崩溃。苏联迅速地在苏阿边境集结了它的入侵部队。卡特政府虽然

对日益增长的危险认识迟缓，但最终还是警告莫斯科说，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将带来严重后果。然而，卡特总统既没有常规力量、也没有核力量作为这一威胁的后盾。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知道可供卡特总统马上选择的方案仅仅是要么打一场全面核战争、要么是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措施。莫斯科的结论是这种选择等于没有选择，便下令派出八万五千大军入侵阿富汗。

唯一可能的结论是：美国具有核优势的时候，它能够对苏联扩张主义进行威慑。一旦苏联消除了我们的核优势，它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它在常规力量上的强大优势。就象福尔摩斯那只不叫的狗一样，美国无法进行威胁这一点在帮助人们认识核优势在阿富汗问题上的重要性方面具有关键意义。

如果我们掌握优势有这么大的决定意义，那么莫斯科掌握优势也会如此。这是我们必须记取的一个主要教训。然而危险在于，美国过去20年中一直在滑向核劣势。

克里姆林宫内部对核武器的看法与华盛顿大不相同。美国人认为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在美国200年的历史中一共有65万人死于战争。因此，在美国人想来，任何有理智的领导人都不会考虑发动一场将使千百万人丧生的战争。

苏联仅在本世纪就有一亿多人死于内战、两次世界大战、历次清洗和饥荒，但其领导人看问题的角度却有所不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对人的生命的价值有完全不同的看法。苏联政府仅仅为了建立集体农庄就杀害了千百万的本国公民。虽然苏联在战争中是受害国，其政府却使数百万的本国人民沦为

受害者。而且，虽然经历过这种巨大的战争苦难的人不会急于使历史重演，但他们知道战争过后还会有人存活下来。他们还知道，既然已经发生过一次，就可以再发生一次。这就是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与美国人不同，他们在认真地考虑和策划这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尽管当前苏联的宣传口径是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但莫斯科打算采取一切措施以便这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一旦发生它便能取胜。

因此，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超级大国的战略完全分道扬镳了。华盛顿有意识地决定放弃自己的核优势；莫斯科有意识地决定要取得优势。

如果说古巴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核优势的重要性，那么肯尼迪政府并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国防部长罗伯特·斯·麦克纳马拉决定美国部署的陆基导弹将不超过1000枚。他以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同他一样认为核武器的研制到了一定程度就失去了意义。他还期望莫斯科在和美国持平之后会停止进一步部署。

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却另有想法。莫斯科不遗余力地争取获得核优势。赫鲁晓夫在1962年的对抗中退让之后，一个苏联官员——副外长库茨涅佐夫——对美国谈判代表约翰·J·麦克洛伊说："你们美国人再也别想这样对待我们了。"莫斯科说到做到。

1963年以来，苏联部署了11种新型远程弹道导弹，而美国只部署了3种。1975年以来，莫斯科生产并部署了840枚新型远程导弹，而我们只部署了310枚。克里姆林宫在莫斯科周围部署了全世界唯一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并在整个苏联的外围部署了保护整个大陆的空防体系。苏联在战略防御上

耗资1500多亿美元，其中用于研究和试验激光和粒子束武器的达几十亿美元。苏联还建成了一套复杂的防核掩体，以保护其175000名高级军政领导人。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对每年仅50亿美元的战略防御计划拨款却不予批准。

对超级大国核力量对比的估算数字举不胜举。唯一说明问题的数字是第一次打击的核弹头数量与其目标的比例。第一次打击弹头是命中率极高、威力极大的弹头，足以摧毁一个对核进攻已有防护的目标。第一次打击目标是战略核武器，如陆基导弹或战时通讯设备。如果一个国家的第一次打击弹头大大超过敌方第一次打击目标的数量，这个国家在理论上就有能力先发制人地进攻，使敌方除了向城市发射精确度不高的海基或空基武器之外别无其它办法进行报复。成功的第一次打击并不只是一方首先同时向城市和军事目标发动进攻，而应是使对方的战略核力量和通讯系统受到致命的破坏，因而没有能力向军事目标进行精确的反击或进行任何报复。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苏联储存的第一次打击弹头一直在迅速地增加。苏联并没有象美国那样停止在1006枚陆基导弹的水平上。它的生产线一直在全力运转。达到部署了1620枚导弹的高峰之后，莫斯科开始对老式导弹进行更新，代之以命中率更高的导弹。因此，苏联1985年拥有5240枚第一次打击弹头，而1995年至少将有8000枚。相比之下，美国的第一次打击目标只有1500处，这就使苏联的战略威胁显得突出而严峻。

莫斯科在弹头与目标之比上占有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正在悄悄地准备用导弹发动第一次打击。戈尔巴乔夫知道第一次打击将是战争史上最复杂的技术行

动。它要求从未在战争条件下试用过的复杂武器不出半点差错，否则就可能导致彻底的灾难。克劳塞维茨曾警告过："战争中一切都是简单的，而最简单的事情却是困难的。"戈尔巴乔夫懂得这一点。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熔化事件和挑战者号爆炸之后，他会格外谨慎，不会过于信赖高技术，或把自己国家的命运随便押在高技术的赌博游戏上。

然而技术在继续发展。在刚刚发明核武器的时候，有人想到可以用火箭将其射向地球另一面的目标。这种想法遭到职业军人的嘲笑。今天，双方拥有的武器甚至都能很有把握地摧毁那些为了抵御核进攻而经过特殊加固的目标。今后，导弹的命中率将越来越高，第一次打击的不肯定因素就会减少。

虽然苏联进行第一次打击的可能性仍然很小，但莫斯科大规模扩充其战略力量对美国造成了三个现实的威胁：

假如战争爆发，苏联现在有能力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美国90％的陆基战略力量，余下的弹头还足够消灭我们的城市。这时美国总统将面临严峻的选择。由于失去了90％命中率最高的导弹，他手头的导弹已不足以消灭苏联余下的陆基导弹。他的选择将是要么用命中率不高的海基或机载武器进攻苏联城市——这反过来将会导致对美国城市进行破坏性更大的报复，要么默许苏联在战争中提出的要求。说穿了，他只能在投降与自杀之间选择。

假如苏联用常规力量向美国的重大利益所在——如波斯湾——发动进攻，我们将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如果美国没有常规力量对付苏联，不掌握核优势的美国总统就无法用核威胁迫使苏联退让。另一方面，即便美国象在1962年的古

巴导弹危机时那样拥有相当的常规兵力，克里姆林宫仍可进行核讹诈。苏联可用其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威胁美国，并以此为威慑阻止美国以常规力量进行干涉。

假如我们的盟国由于这种战略失衡状态而认为我们的核保护伞已漏洞百出，西欧人和日本人很可能会决定与莫斯科单独达成妥协。如果盟国不相信我们的核安全保证，我们的联盟很快就会瓦解。虽然我们这时可能避免了核战争，但我们却已是不战而败。

要实现现实的和平，我们必须具有对莫斯科的威慑力量。但我们的威慑力量已是岌岌可危。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同归于尽的威胁是不可信的，而不可信的威胁是没有威慑力量的。

外交政策专家中最流行的一种观点是美国无需加强其威慑力量，它的战略应以确保相互摧毁的理论为基础。首先，他们提出了在核时代不可能有优势的前提。然后他们又论述了既然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数千枚核武器，双方都不可能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对方的全部战略力量。这就是说，即使在第一次打击之后，受害者仍可以报复性的反击给侵略者造成无法承受的破坏。在核战争中即使是输家也能极大地杀伤赢家。主张确保相互摧毁的人还认为战略防御体系即使是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会削弱一方对另一方进行报复的能力。

确保相互摧毁的理论是以一个错误的前提为基础的，即以为美国和苏联对和平具有同等的威胁，双方都必须受到制约使其不致发起核进攻。而且，虽然这一理论抽象地可以具

有说服力，但一个致命弱点使它大为逊色：这一战略必须双方同意才有作用。不仅美国，而且特别是苏联需要遵守它的规定。如果只有一方遵守，那么这种战略所确保的就不是相互摧毁，而是另一方的单方面优势。问题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从未作过这类承诺。如果美国的战略轰炸机部队停留在50年代的水平，莫斯科今天就会拥有第一次打击的绝对能力。如果我们的战略力量停留在目前的水平，危险的是克里姆林宫很可能在几十年内获得第一次打击的能力。

我当总统的时候并不同意确保相互摧毁的理论，而且我知道莫斯科也不同意。经过艰苦的斗争，我使国会批准建立保卫我国战略力量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我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但我并没有退回到基于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我用防御体系方面的局限性换来了对进攻性威胁的一定限制。此外，在我的政府提出的关于世界形势的年度报告中，我明确地使美国的政策摆脱确保相互摧毁，在这一转变的基础之上，后来的历届政府又进一步有所建树。

莫斯科仍然相信军事优势。其领导人接受确保相互摧毁的事实而不是接受这一理论。如果我们的战略力量能够承受住第一次打击，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就会把美国的威慑力量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予以接受。但现实情况也会起变化。莫斯科不会把美国的威慑力量看作永久的现实。它将尽一切可能改变这个现实。当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单方面地限制美国核力量的规模时，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正在扩充他们的核力量。当卡特总统取消或减缓美国战略计划的时候，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加速推行他们的核计划。莫斯科把美国的克制看成获取优势的机会。

主张确保相互摧毁的人也没有认识到，随着洲际弹道导弹精确度的提高，也许在下世纪初就会开创外科手术式的第一次打击的可能性。过去，战略武器是些粗陋、命中率不高的武器，只能击中城市那样大的目标。现在已不是这样。今天，双方都拥有命中率很高的导弹，可以将弹头击中地球另一面象扬基体育场那样大小的目标。随着技术上的进步，不久就会有可能把对方的掩体定为目标。也就是说，一方摧毁另一方的报复性力量将越来越可行。今天只能是纸上谈兵的第一次打击今后也许会有付诸实践的可能。

确保相互摧毁的战略在威慑失败的情况下会使美国没有可行的选择方案。一旦战争爆发，美国总统将会只有一种选择，即下令大量消灭敌方平民，其肯定的后果是随后美国人民也会遭到大规模屠杀。这是不能接受、也是无法使对方相信的。更严重的是，仅仅立足于威胁杀害千百万平民的任何政策都是极不道德的，在有其它有效的替代政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我们发动全面报复的能力也许就是阻止对方全面进攻的威慑力量，但威慑力量也必须针对有限的进攻，如果美国不能对有限挑战作出有限反应，那么美国也就不大可能作出反应，美国进行报复的威胁也就不大可信了。反过来，这会使苏联更有可能进行挑战。把我们的威慑力量仅仅建立在同归于尽的威胁基础之上已经站不住脚了。

主张确保相互摧毁的人没有看到，这一战略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否定美国的核威慑力量仍然是苏联的一个主要目的。莫斯科扩充战略力量已经使美国的陆基导弹和轰炸机易受第一次打击。在今后几十年中，随着技术上的进步，有可能对

我国所有核力量发动外科手术式的进攻并取得成功，而这将使美国丧失报复的能力。这一弱点不仅会促使苏联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进行更大的侵略，而且也会使美国人不愿冒必要的风险迎击苏联的挑战。

美国需要做些什么以在1999年以后保持威慑力量呢？我们必须拥有具备以下三项基本条件的战略部队：

摆脱易受第一次打击的软弱状态。美国至少必须拥有苏联无法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的战略反攻武器。没有能够经得起进攻并可用以攻击苏联军事目标的报复力量，威慑就会化为乌有。这种能力对美国加倍重要，因为苏联在常规武器上的优势迫使我们要大大地依赖以核报复作为威胁。我们不能让这种战略平衡进一步恶化，而必须采取措施使我们的陆基力量摆脱当前的易受打击的状态。

达到同等水平的能力。在处理除全面战争外的冲突中，我国战略力量的能力必须与莫斯科势均力敌。这在超级大国间发生危机时是最重要的。假如苏联了解到美国并不具备同等水平的能力，因而能够以发动一场有限的核进攻相威胁，那么克里姆林宫将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它还可通过恐吓和核讹诈利用其较大的灵活性和核优势。

扩大威慑的范围。我们的核力量必须能够扩大其威慑范围，防止苏联对我们的主要盟国和友邦进行侵略。40年来，我们扩大威慑的范围，办法是我们威胁说如果莫斯科对我们的盟国动手，我们将以核武器进攻苏联。这一办法在美国具有核优势的时候发挥了作用。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仍然面临着美国也许会升级到使用核武器来阻止苏联侵略的问题。但我

们必须认识到，由于苏联人已经获得了对美国的某种核优势，这一威胁的可信性已大大降低了。

克里姆林宫通过不断扩充战略力量威胁着我们实现上述各项目标的能力。但我们可以用三种方式对付莫斯科的努力。我们可以扩充自己的战略进攻力量，特别是陆基导弹。我们可以部署一个战略防御体系。我们可以与莫斯科谈判一项军控协定，建立一种稳定与持久的力量均势。我们的目标应是降低苏联第一次打击力量的军事价值。这三种方式中单靠任何一种都是不够的，而三管齐下就有可能形成我们所需要的威慑力量。

如果我们仅仅扩充部署在固定的导弹发射井里的进攻性力量，结果将会事与愿违，那将使我们无休止地去做那毫无希望的无益之事。进攻性的军备竞赛对进攻性的国家有利。增加弹头比增加导弹容易，因为每个导弹可以携带好几个弹头。苏联最大的陆基导弹携有10个弹头，但加以装备后可以携带30个之多。即使需要 3 个苏方弹头才能摧毁一枚美方导弹，美国至少需要部署为苏联的三倍的导弹才能缓解美国军队的易受打击状态。

一个替代办法是发展机动陆基导弹，如拟议中的侏儒式导弹。斯考克劳夫特委员会提出这个构想的时候我表示坚决支持。我现在仍然赞成这一构想，但它目前面临两大问题。首先，美国公众和国会不大可能同意核导弹在一片广阔的地区上随意迁移，而机动导弹系统为了免受袭击却正需要如此。联邦政府的保留地可能不够大，不能使这些导弹免受袭击，而在美国铁路上或各州间的公路上部署这些武器则会引起强烈的反对。第二，如果苏联继续发展战略防御能力，那么美

国就需要发展多弹头的，而不是单弹头的导弹。假如我们把战略武器资金的一大部分都用于一支单弹头的导弹部队，那么只要稍为有效的苏联战略防御体系就可以使美国报复性打击的有效性大大降低。我们威慑力量的相当一部分应是小型的机动导弹，但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些导弹就不可能发挥斯考克劳夫特委员会初次提出报告时所期望的那样大的作用。

我们能够也应该建造能击中硬目标的战略武器，这样就能威胁相当大部分的苏联武器库。我们部署了第一批MX导弹和将要部署新型三叉戟Ⅱ导弹就是为此目的。但这还不够。美国计划只制造40枚MX导弹并将其部署在易受苏联第一次打击的固定发射井里。新型三叉戟Ⅱ导弹在海上是不易受袭击的，但潜艇一旦潜入水中通讯联络起码会很困难。事实是我们仍然需要建立能够经受得起苏联第一次打击的更大规模的陆基力量。

许多主张搞战略防御计划的人所鼓吹的加紧部署战略防御体系保护美国居民的做法解决不了我们的战略问题。建立一种防御体系使核武器过时的想法是个神话。这种体系必须万无一失才有作用，而在鼓吹这一想法的人中，即使是最乐观的也认为要到进入下一世纪许多年以后这一办法在技术上才是可行的。

但是，建立一个有限的防御体系减少我国战略武器的易受打击状态并在意外地射来几枚核武器或一个非超级大国发动小规模袭击时保护我国则是可能的。这种防御体系不一定要万无一失，即使它只有50％的效用也会使苏联为执行第一次打击而进行的运算大大地复杂化，以致任何苏联领导人都

没有把握会取得成功。在最好的情况下，第一次打击也是一场危险的赌博。如果美国有了有限的战略防御体系，莫斯科的困难就更大。苏联第一次打击的威胁将失去其可信性，这样在超级大国之间发生危机时莫斯科就不能以此对美国进行讹诈了。

有限的战略防御体系是解决美国陆基力量易受苏联第一次打击这一危急问题的关键。里根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不仅有助于迫使苏联人认真地谈判，而且创造了部署有限防御体系的可能性。尽管要求建立万无一失的防御体系是不现实的，但他坚持搞战略防御计划是大大值得称赞的。我们应把战略防御计划中的大部分研究和发展资金用于设计如何对我国的战略力量进行有限的防御，而不是用于保护全国居民这一不现实的希望。企图建立全面防御体系只能给我们带来电子马其诺防线之类的虚幻的保护。我们不应放弃可以达到的目标而去追求那些无法达到的目标。

有限的防御体系将会弥补MX导弹和侏儒式导弹存在的问题。将MX导弹存放在固定放射井中并没有改善我方力量的存活力，但有了有限防御体系以后，它就会大大加强我们的安全。部署在联邦保留地上的侏儒式导弹也许经受不了饱和进攻，但有了有限防御体系以后，它们就会加强我们的安全和战略稳定。因此我们既要进行进攻性力量的现代化也要部署防御性力量。

我们不应就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进行哪一种研究、试验和部署陷入一场法律条文的争论。我签署了这项条约因为它在70年代初期的战略背景下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有好处。这一条约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而且其存在的时

间比其他任何重大军控条约都长。辩论对它应作广义还是狭义的解释既无益处也无必要。美国缔结一项条约以后，我们应遵守其规定，而不应试图通过玩弄法律文字游戏使自己不受其规定的约束。这项条约具体地规定：任何一方如发现事态已"危及自己的最高利益"，即可提出六个月后退出这一条约。我们应确定需要做些什么以保证我们的安全。如果需要的是一个有限的战略防御体系，那么我们就应了解什么样的防御体系是可行的，然后采取措施进行发展和部署。如果这要求我们重新谈判反弹道导弹条约条款，那么我们就应把我们的要求摆在超级大国的议事日程上。如果莫斯科拒绝谈判，我们应根据条约行使我方的权利，在提前六个月通知后中止条约的规定。

我们应宣布随着技术的发展一旦条件允许我们就打算部署有限的防御体系。我们应表示愿意通过一个谈判达成的时间表来这样做，但如果谈判不能及时达成协议我们将单方面行动。尽早部署的问题应该进行谈判，但谈判不应阻止我们尽早部署一个防御体系。

虽然有限战略防御体系将会解决我们的一些问题，但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我们需辅之以更多的进攻性力量。我们不应谋求获得第一次打击的能力。这在政治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人民不会支持，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会采取反措施——如建立它自己的战略防御体系——使我们的努力成为徒劳。但我们仍需部署新的战略武器，这些武器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将使美国总统除了同归于尽和投降以外还会有更多的选择。

仅有军备控制并不能解决我们的战略问题，但可在这方

面发挥重大的作用。过分宣传军备控制的人给自己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美国人有把军备控制看成本身就是一个目的的倾向，而苏联人则把它看成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莫斯科做得对。仅仅军备控制并不能带来和平或保证我们的安全。它只是我们整个国防政策的一部分。它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维护我国安全的一个手段。为了加强我国的安全和双方的稳定，防务和军控政策必须协调起来。两者可互相加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军控支持者都反对战略防御计划。因为如果里根总统没有提出战略防御计划，苏联人就不会参加军备控制谈判。

一项谈判得当的军控协议可以有三方面的建设性意义。首先，有助于造成战略稳定，减少发生可能升级为战争的危机的可能性。当一方或双方部署的武器具有第一次打击的潜力时，其结果就是出现战略不稳定。这反过来又会在危机形势中刺激这些武器的使用以获取决定性的优势。如果这些武器有可能在第一次打击中被摧毁，使用的危险性就最大。因为领导人在危机中会不自禁地趁他还没有失去这些武器之前使用这些武器。一项防止双方获得第一次打击能力的协议将会加强战略稳定并减少战争的可能性。

第二，一项限制进攻性武器的军控协议可以提高有限战略防御体系的效用。没有这样的协议，苏联人就会力图增加其进攻性力量以压倒我方的防御。由于我们的防御体系只是谋求达到保护我方战略力量的有限目标，苏联的扩充几乎肯定不会恢复其目前的优势。但是，一项限定进攻性力量的军控协议通过限制威胁增强了有效的战略防御体系的前景。这仍然是事实。

第三，认真进行军备控制谈判在政治上是当务之急。如果没有可信的军控政策，西方领导人就不能动员公众支持国防开支。我们不应争论是否要谈判。原来拒绝谈判的那些人，如里根政府中的超鹰派，早晚会迫于国会或公众舆论而进行谈判。我们的重点应是如何以有利于我方利益的方式进行谈判。

在美国和苏联着眼于将来达成一项战略军控条约的时候，我们必须确保这一条约能满足四个条件：

均等。该条约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数量上相等很重要，但数量不应是均等的唯一标准。我们应就导弹的数量和大小及弹头的数量进行谈判，使双方在军事上能力相等。这方面，一方摧毁另一方的坚固目标的能力如何是最关键的标准。因此，极其重要的是，应有分项限制——即总限制中所包括的对各类具体武器的限制——以求质量上的均等。

弹头与目标的比例。该条约应使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可信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应把苏联第一次打击弹头与美国第一次打击目标的比例降低到目前水平以下。如果一项协议允许苏联这样的进攻性大国维持或增强其目前在第一次打击武器方面的优势，实际上就会增加战争的危险和不战而败的危险。

更新换代。该条约必须有极其严格的规定，禁止把旧式导弹改装成第一次打击武器。第一次和第二次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曾试图解决更新换代的问题但都失败了。苏联不仅违反了协议的精神，利用其语言中的模棱两可之处把他们的武器更新换代，而且还违反了条约的条文，部署了超出准许范围以

外的新型武器系统。如果要签署一项持久的控制战略武器协议，我们必须把更新换代看作一个中心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

核查。该条约必须提供手段使双方得以核查对方遵守条约的情况。过去我们一直依靠卫星侦察及其它从国内进行核查的技术手段。但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现在要求我们非进行现场考察不可。苏联人过去一直反对这样的规定，但在中导条约中已同意在这一点上进行妥协，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对于削减战略武器会谈来说还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坚持，现场考察不仅是装璜门面，我们要让苏联人懂得，只有我们对双方都会执行协定有绝对的信心，参院才会以三分之二的票数批准该条约。

除了努力达到这些目标，我们的军控政策还不能无视苏联对过去军控协议的违约行为，对此我们不能因急于达成新的协议而悄悄地予以掩盖，而应作出有分寸的反应。苏联违反军控的行为不应使我们抛弃旧的协议并放弃谈判。相反，我们应把苏方守约的问题放在超级大国谈判日程的重要位置上。如果莫斯科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除我们的忧虑，我们就必须采取这样的立场：美国将对苏联违反军控的行为作出相应的反应。里根政府正是这么做的。

单方面守约无异于单方面裁军。我们签署协议是为了本国的安全，在苏联违约行为威胁我方安全的时候，我们不应恪守协议。单方面守约只会使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蔑视我们，而不是对我们产生好感。

在各项战略问题上我们需要一种全面的妥协。不仅在美

国和苏联之间，而且在政府与国会之间，都需要达成这样一种妥协。十多年来，现在第一次具备了达成这种全面妥协的各种条件。

国内的妥协比达成满意的国际妥协容易。今天国会在决定美国的国防政策上与总统有同样大的权力。政府应承认这一基本的政治现实。如不承认，众院与参院就会利用其制定预算的权力夺去总统的控制权。如承认，就有可能出现一种明确的战略政策。

这并不是说政府只要追随国会中的政治风向就可以了。总统可以单独进行领导，但无法单独采取行动。他应决定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以维护我们的安全，并应谋求国会对其计划的批准。他必须考虑尽责的国会人士的意见，否则就绝对无法驾驭国会。国会中大多数人是尽心尽责的，总统必须对他们关心的问题作出反应。

政府如此难以得到国会对其战略计划的批准，原因在于它未能从战略稳定的角度阐明问题。而战略稳定正是尽责的国会议员所时刻关心的。从这个角度看，政府决定在易受苏联第一次打击的发射井中部署MX导弹是毫无意义的。如果问题在于陆基导弹易受袭击，解决的办法就不是把导弹放入固定的地洞中去。这些发射井只会成为诱使苏联进行第一次打击的目标。

只要政府仍然抱着建立一个保护全体美国人民的全面防御体系的想法不放，国会将继续削减给战略防御计划的资金。要求拨款几十亿美元建造一个"太空盾"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国会知道，滴水不漏的防御目标虽然在政治上颇受欢迎，但在技术上和战略上都是不现实的。

更使尽责的国会议员感到气馁的是政府在战略防御问题上的谈判立场。想同对方达成交易、放弃整个战略防御计划的人颇为喧嚣，但却是少数。认为限制战略防御的谈判应与削减进攻性武器的谈判联系起来的人代表着一种协商一致意见。以这种协商一致意见为基础可以建立起一个明确的战略计划。

如果政府想要继续对进攻性武器更新换代和初步部署防御体系，就必须改变其在国会的战略。政府的计划应分两个部分。第一，请求在固定的发射井中部署更多的MX导弹，但这必须与有限的战略防御同步进行。还应请求部署一些机动的、单弹头导弹，但不必象原来设想的那么多。由于机动导弹的数量减少而且有了有限战略防御体系，这些导弹就可以在较小的地区范围内流动，不再成为问题。同时，这些导弹携带的高精度弹头的数量应控制在不对苏联构成第一次打击威胁的水平之下，而战略防御体系则应做到使苏联无法进行第一次打击。由于这个防御体系不需要十分完善，这种二结合的部署可以在90年代中期至后期完成。

第二、应宣布对莫斯科的新的谈判战略。里根政府的做法有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它顽固而不现实地追求建立保护美国全国居民的防御体系，致使国会中的多数议员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另一方面，一些政府官员表示愿与苏联人谈判限制战略防御体系的试验，但他们所同意的限制方式实际上会破坏用来保护我方战略力量的有限防御体系的部署。其结果是，支持部署战略防御体系的人越来越少，同时却助长了想要置战略防御计划于死地的反对派的气焰。如果现任总统同意扼杀战略防御计划的试验限制，今后任何总统都会无法

拒绝扩大这些限制。

继续进行全民防御的研究并保留试验和部署有限防御体系的权利以保护越来越易受袭击的美国战略力量，这样一种较为灵活的立场将会得到大多数的支持。

这将为强有力的对苏谈判地位奠定基础。总统得到国会的支持以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就会知道，他们再也不能指望参院和众院对政府搞釜底抽薪。他们还会知道，如果他们不同我们的谈判代表达成协议，美国已决定自行采取行动解决自己的战略问题。这时我们手中就有了成交所必需的左右对方的力量。

完善的战略军控协定的内容已经明确。苏联领导人担心的是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美国领导人担心的是苏联用其最大的陆基导弹摧毁我方战略力量的能力日益增强。双方做成交易将互有好处。

对于接受什么样的妥协我们必须极为谨慎。在战略防御问题上，我们的立场必须是强硬的，但又是合情合理的：我们的研究不能谈判。我们的试验不能谈判。我们对具体武器系统的研制不能谈判。我们对部署的酌定权不能谈判。唯一可以谈判的是我们部署的程度。我们应向戈尔巴乔夫表明，我们部署的程度将由能在第一次打击中使用的高精度导弹构成威胁的程度所决定。我们应坚持这一立场，决不退让。

我们手中应保留战略防御这张牌，同时大力发展有限防御体系。这不仅是为了获得讲价力量，而且也是为了一旦谈判失败进行部署。我们应冷静地向克里姆林宫讲明：进攻与防御之间的联系是达成任何交易的先决条件。我们将把我们部署的防御体系的数量与他们部署的威胁性很大的进攻体系

的数量相联系。如果他们想要限制我们的防御，减少他们的进攻性威胁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扩充其进攻性武库，我们的对策将是进行更大规模的防御部署。

在1987年12月华盛顿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中，里根政府正在谈判的削减战略武器协议的轮廓形成了。它谋求达成把战略力量削减50%的协议。双方的武库中，诸如轰炸机和导弹发射井的发射装置将削减至1600个，弹头将削减至6000枚。而且，弹道导弹的弹头数量将限制在4900枚。这样大幅度的削减在政治上也许颇有吸引力，但需要仔细加以研究。我们必须牢记，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西方的生死存亡。

我们必须了解我方在战略方面面临哪些安全问题，以及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谋求这类的协议，然后再考虑数量问题。我们的问题是苏联在所谓反击弹头方面的优势。这种武器的爆炸力和命中率之高足以摧毁已经过加固以承受核攻击的导弹发射井和通讯系统。任何军控协议如要符合我们的利益和现实和平的利益，就必须解决苏联在反击武器方面的优势。

戈尔巴乔夫的动机是传统的苏联动机。苏方军控谈判代表一贯谋求限制美国兵器技术的发展，同时维护或加强苏联在武器部署方面的优势。在这一点上，戈尔巴乔夫的建议无非是新瓶装旧酒。

我们首先必须问明白，协议的条款是否会扼杀战略防御的可能性同时却维护苏联在高精度进攻性武器方面的优势。在华盛顿首脑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的态度虽然有些暧昧，但他一直努力要使里根政府放弃战略防御计划，作为削减50%战略力量这一交易的一部分。戈尔巴乔夫最希望的是明确禁止新的防御体系。其次他希望的是暂时停止战略防御计划中

某些类型的试验，或将反弹道导弹条约延长 7 至10年。他大概颇有信心地认为，由于部署将遥遥无期，这两种办法都会使国会砍掉战略防御计划。此外，苏联可以对今后的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施加决定性的政治压力，迫使其延长暂停试验或继续接受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约束，对这一点他大概也是有信心的，尤其是因为他会认为今后的美国总统都不会象罗纳德·里根那样积极支持战略防御计划。

如果戈尔巴乔夫通过美国的直接让步或通过一项会使国会不给战略防御计划拨款的协议得以破坏这项计划，那将是美国安全的一场大灾难。只有戈尔巴乔夫同意消除他的高命中率的陆基导弹所构成的威胁，美国才有理由在战略防御上作出让步。没有莫斯科在这方面的重大让步，美国就不能退让。如果美国在研究、试验和发展上让步，或将部署战略防御体系的选择拱手让出，削减战略武器协议就会使美国的安全实际上遭到削弱。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战略防御计划上的要求有所退让，不再把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谈判相联系，并爽快地同意削减50％的战略力量，我们该怎么办？这未必值得高兴。如果戈尔巴乔夫真的放弃这种联系，我们首先必须仔细研究他为什么这样做。

我们知道戈尔巴乔夫在高命中率的反击导弹方面具有优势——即在他称之为力量对比中的优势。戈尔巴乔夫不是一般的苏联领导人。然而，任何苏联领导人如果在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的情况下放弃了力量对比中的优势都不可能生存下去。具体地说，如果达成不能阻止战略防御计划然而却放弃了莫斯科在进攻性的陆基导弹方面的现有优势的战略军控协

议，他是无法向军方领导人交代的。因此，如果苏联人接受与限制战略防御没有任何联系的大幅度削减进攻性力量的方案，那将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对这种条款感到满意，我们就应提高警惕。

为了判断削减50％的战略力量对我国安全的利弊，我们必须研究一下它对我们战略力量所面临的苏联进攻性威胁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需要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达成削减50％的协议之后，苏联向美国的战略力量发动成功的第一次打击的能力是削弱了还是加强了？到现在为止，很少有人注意过这样的削减会对战略力量对比造成什么后果，而认为核武器既然可恶、削减总是好事的智囊和政客却太多了。这里的问题在于具体的规定上，即规定在陆地、潜艇或轰炸机上所能部署的弹头数量和种类的分项限制，如果没有其它措施，弹道导弹可有4900枚弹头的分项限制会使美国战略力量更易于被摧毁，而不是相反。

根据这种协定，莫斯科保留的陆基力量就会几乎全都是可以用于第一次打击的命中率很高的导弹。这些导弹是SS-18、SS 25和SS 24。同时，为保证第一次打击胜利而必须摧毁的美国目标的数量也会由于这种削减而减少。而且，这一协定会限制我们只能部署大约10艘三叉戟Ⅱ型潜艇，而这种潜艇是我们能量最大、存活力最强的部队。结果是这些潜艇很可能也会自身难保。其中的一半将长期停泊在港口，另外一半将受到苏联270多艘攻击潜艇的跟踪。

我们如果接受这样的条件来进行50％的削减，苏联第一次打击弹头和美国第一次打击目标之间的比例就会大大恶化。因此，根本问题在于，将要达成的削减战略武器协议中

的现有规定不符合美国和现实和平的利益。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个有致命缺陷的协定，那对我们的国家安全将是有害无益的。

虽然正在谈判中的50%的削减是无法接受的，但我们也不应退出谈判。我们应就我国利益受到威胁的领域展开谈判，以达成加强双方安全与战略稳定的协定。

首先，我们必须把常规军备控制放在日程的首要和中心位置上。在常规军备谈判没有进展的情况下，我们不应推进大规模削减战略力量的谈判。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两种谈判联系起来，就等于是接受了苏联的日程，或者说上了莫斯科的当。

第二，我们必须保留尽早部署战略防御体系的选择，并要有这方面的可行的计划。只要莫斯科在反击武器方面占有优势，我们必须向戈尔巴乔夫表明我们部署战略防御体系的决心——并立即迈出象征性的步骤，开始建造1972年条约所允许的一个反弹道导弹基地。这样的基地莫斯科已经建造完毕。

第三，我们应该为削减战略武器谈判重新制定方向。对于能够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经过加固的军事目标的战略弹头，我们应提出严格限制其数量。应允许两个超级大国保留同等数量的反击弹头，但这些威胁性极大的武器的数量应大大减少。这种限制应包括对诸如SS-18、SS-24和SS-25导弹之类的苏联武器按现有数量削减75%。还将要求对计划部署的美国的相应武器如MX和三叉戟ⅡD-5型导弹进行削减。伴随着这样一项协议，美国应同意限制太空基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的部署范围。我们部署的防御性武器只应足以

对付苏联削减后的进攻力量。

根据上述内容达成的协议将使双方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两方面达成均势。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条款对双方来说都会缩小第一次打击弹头与第一次打击目标的比例，从而加强双方的安全和战略稳定。根本问题在于，根据这样的协定我们将会享有真正的战略稳定。双方都不会获得第一次打击能力，但都有向对方的战略力量进行报复性的第二次打击的能力。

最近几个月以来，一些分析家声称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经历了一场战略思想革命。他们认为，苏联战略家们已终于接受了西方的“充足战略力量”与“战略稳定”的概念。由于苏联的军事计划和军控战略没有任何变化，我们抱有怀疑是很自然的。但我们应对这种所谓的新思维进行检验。我们应提出类似上述的建议，目的在于通过把第一次打击中使用的命中率高、爆破力强的武器系统削减到同等和稳定的水平来加强相互安全。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由于超级大国的武库中总共有二万多个战略弹头，每一方所拥有核武器的相对数量不很重要，重要的是相对说来它在多大程度上易受对方的第一次打击。我们的军控谈判战略应把我们是否易受打击而不是把算术作为指导思想。无论如何，如果随意减去一些武器的数目，我们可能会使自己更加易受打击，从而危害我们的安全。假如我们想使削减战略武器谈判成为美苏竞争中的一个转折点，就必须把谈判引向新的目标，即限制对安全和稳定造成最大威胁的反击武器。

第四，对削减战略力量还必须进行极其严格的核查。有人认为中导协定已解决了最棘手的核查问题，他们错了。这

项协定在允许有限的现场视察方面打开了新局面，是一个积极的进展。但没有人会否认，由于SS -20导弹体积小、机动性高，如果苏联决意舞弊是无法发现的。而且，现场视察规定的期限只有13年。13年以后，美国就得靠自己了。尽管中导协定中的核查条款胜过以往的任何军控协议，但对于削减战略武器协议，这样的条款仍是不够的。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核查比中导协定的核查要困难得多，而且重要得多。消除一整类武器比削减各种各样的武器——以海上或海底为基地的，远程轰炸机上的，还有陆地上的固定发射井中的或机动发射装置上的——要容易核查得多。美国政府中还没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一任务的复杂性。在这些问题得到认真细致的考虑之前，我们不能匆忙达成削减战略武器协议。同时我们要记住，虽然核查是一个中心问题，但不是唯一的中心问题。可以进行核查并不能使一项糟糕的协议变成好协议。

我们必须认识到，缔结一项只有马马虎虎的核查条款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于是自取灭亡。在中导协定上舞弊会取得重要但却无关大局的优势。而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上舞弊，尤其是在大幅度削减了战略力量之后，则可能会使力量对比产生深刻的变化。这种潜在的好处对舞弊者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我们执行协定一定会循规蹈矩，可是莫斯科呢？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过去并非以能抵制这种诱惑而闻名于世，所以今后我们不能用这种会令人动心的机会挑逗他们。

如果我们要在里根政府期间在削减战略武器协议方面有所进展，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加以解决。我们必须把削减战略武器的进展与常规军控谈判的进展相联系。我们不能破坏

在近期内部署有限战略防御体系以保护我国战略力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由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而更容易受第一次打击。在核查得到保证之前，我们决不能就美苏战略平衡这一中心问题签署任何协议。如果以上任何一点没有得到满足，我们没有削减战略武器协议反而更好。

我们必须认识到，唯一能同莫斯科达成满意的交易的办法是向戈尔巴乔夫表明做不成交易苏联的日子会更不好过。我们应向他的谈判代表讲明，我们打算部署一切必要的防御体系以抵消莫斯科当前在第一次打击武器方面的优势。那时他面临的选择将是要么接受对双方都有利的全面妥协，要么不惜花一大笔钱争取恢复进攻性的优势。

那时，如果戈尔巴乔夫签署了维持稳定的力量对比的协议，军控谈判就达到了目的。如果他不签，美国也还拥有对莫斯科进行威慑所需要的战略力量。

第　四　章

如何与莫斯科竞争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遏制克里姆林宫，我们就能够避免一场核战争。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够与莫斯科进行竞争，我们就将不战而败。竞争是美苏关系的核心，并将决定谁将在超级大国的争斗中取胜。我们的政策不能建立在对苏联的进攻临时作出反应的基础之上，这是失败的政策。临时措施对付不了克里姆林宫精心策划、顽固坚持的扩张主义。我们必须发展按照苏联的条件对付其策略的能力，而且必须制定按我们的条件与莫斯科竞争的长期战略。

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已经是利用除核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进行这场战斗的老手了，而美国人还不是。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不愿承认，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行扩张主义带来了危险。在雅尔塔会议上，我们完全相信斯大林，结果失掉了东欧。我们从西欧撤出了军队，只是当莫斯科威胁控制欧洲大陆时，我们的军队才再次开往欧洲。我们的军队撤出了亚洲大陆，只是当苏联支持的北朝鲜军队入侵南朝鲜时，我们的军队才又不得不开进亚洲。外交欺骗、军事恐吓、通过代理人进行侵略，这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标准行事方法。

我们曾试图实行遏制战略，利用一群盟国来包围苏联集

团。但是，苏联打破了我们的遏制，我们的盟国各奔东西，我们的这一战略失败了。我们也试用过缓和的战略，寻求尽可能减少冲突，承认在不能达成妥协时进行积极竞争。然而，某些美国领导人认为，冷战时期公开敌对的结束就意味着超级大国之间冲突的结束。因而，这一战略也失败了。苏联利用了我们这种天真的想法，开始实行征服全球的帝国主义计划。我们不能再实行那些过去已证明是失败了的政策。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两个基本事实。第一，美苏关系气氛的改善并不意味着超级大国之间竞争的结束。友好并不等于协调一致。即使在诸如核武器控制等问题上能达成妥协，我们两国在诸如欧洲的前途和第三世界地区冲突等其它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冲突。如果看到美苏关系的气氛有所改善，我们就放松警惕，我们就会进行单方面裁军，这是最糟糕的。

第二，一个只捍卫在欧洲和亚洲已有阵地的战略将把我们引向失败。莫斯科将继续在第三世界推进，对于苏联的这种行动，美国必须进行反击，因为今天站在这一边，明天站在那边的正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同时，我们不能够一方面允许苏联在自己的势力范围里安然无恙，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将主动权拱手送给克里姆林宫。如果我们要进行竞争，就必须在铁幕两边都与苏联进行竞争。如果我们只按莫斯科的条件来进行竞争，苏联领导人不会满足于我们拱手相送的那些东西，他们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他们将会大量集结军队，力求在我们最薄弱的地方实现突破，他们耐心地以小的代价和风险，一点一点地积聚获得的利益。最后，我们将发现，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对苏联有利的变化。

苏联领导人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两个重要事实，戈尔巴乔

夫也不例外。他发表的关于和平与友谊的雄辩言论与他在非洲、东南亚、西南亚和中美洲的所作所为相互矛盾。他不想要战争，但想要胜利。他相信能够不进行战争而依靠策略来取胜。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危险，这就是我们必须战胜的挑战。

如果我们只是端坐在核威慑的马其诺防线[1]后面，我们就将在美苏争斗中失败。核武器能够阻止苏联对美国进行核袭击，也能够阻止苏联对像欧洲这样的冲突中心进行袭击。然而，只有当危及美国的利益，有理由冒核战争风险时，核威慑才能奏效。因此，在与美国利益无关紧要的边远地区，就不能只靠核武器来阻止苏联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侵略。那将意味着我们的核武库在第三世界的危机中是无用的。但问题是，1999年之前，超级大国最可能发生对抗的地区正是第三世界。

莫斯科知道如何在有核武器的情况下进行竞争。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它一直推行利用地缘政治机会的全球战略，但并没有引起核战争的危险。在美国享有核优势时，苏联十分谨慎，不轻易采取主动行动，一看到美国的决心就退让。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莫斯科赢得了对美国的核力量均势，因而它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我们利用核保护伞来保护欧洲和远东的盟国，而苏联则利用它的核保护伞来掩护它在第三世界的侵略。从1975年至1980年不到五年的时间里，一亿多人被东方征服了，或者说被西方丢失了。

核均势改变了美苏冲突的性质。我们再也不能以核战争

① 马其诺防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在法德边界上所筑的防线。——译者

的威胁来阻止苏联向越南战争中的共产党提供武器弹药了。我们也不能以基督教启示来阻止苏联在非洲、亚洲的边远地区甚至拉丁美洲采取行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必须放弃在这些地区的利益。但这确实意味着，美国除了保持足够的核威慑力量，还必须学会在不进行直接军事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竞争。

我们不应该误认为，因为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依赖于其军事力量，所以莫斯科就没有其他资本了。威廉·谢尔曾提醒我们说，"这样看问题往往导致忽视苏联使用非军事手段和影响的倾向。有些手段是苏联所独有的，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善于进行战略欺骗、歪曲宣传、颠覆及其他民主国家所不会使用的伎俩。因此，为了与莫斯科进行有效的竞争，我们必须提高六个关键性能力：

意识形态的力量。尽管我们与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政治上进行竞争，但意识形态是我们争夺的根源。苏联企图扩张共产主义，消灭自由；而美国则要阻止共产主义，扩大自由。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

与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竞争，我们手中握有王牌。我们的自由和民主价值在全世界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自由和民主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没有规定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而只规定个人和民族应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虽然并不是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具有民主地管理自己的能力，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向往民主管理。

了解苏联生活情况的人都不愿意在苏联定居，这本来是不存在争议的。但是，他们虽然搞得一团糟，但善于宣传；

而我们虽然搞得很好，但不善于宣传。莫斯科将大量的财力物力用于意识形态的竞争之中，它用几十种语言向世界各地播放莫斯科电台的节目，在国外印刷和散发成千上万种书籍和报刊，还向10万名外国学生提供在苏联大学学习的奖学金。

美国常常毫无准备地参加意识形态斗争。迄今为止，支持“自由欧洲之声”和“自由之声”是美国最有效的外交政策项目之一。这两家电台孤军奋战，防止了东欧和苏联人民被彻底洗脑子。但问题是，支持这两家电台是美国在思想战线上采取的唯一行动。

我们必须大幅度增加宣传项目，赶上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用粗制滥造的节目去充塞我们的电波。我们绝不应广播谎言，或进行歪曲宣传。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我们的节目常常不值得一听。我们必须停止播放为“美国之音”制作的华而不实的消遣节目。这些节目质量太差，以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不必对我们的广播进行干扰。要打好意识形态仗，我们还必须设法发展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微电脑、卫星、录像等等。

在检查我们的对外广播工作时，我们应该重新明确对外宣传应为下述两个目的服务：在实行新闻审查的国家，我们应设法让那里的人民了解他们的政府不愿告诉他们的关于他们国家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我们要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能了解美国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美国的思想及价值观，而目前人们对这些还不了解。

外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像将军们一样，外交官改变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对莫斯科来说，军人和外交官都为同一个目标服务，都是苏联实现它的战略目标的工具。

苏联精通外交为总战略服务的艺术。尽管美国在外交上也取得过一些胜利，但常常认识不到，外交不仅仅是达成妥协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竞争的策略。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苏联人进行谈判的目的，不是为了达成协议，而是为了获得胜利。

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我们应该在这两者之间确定我们的政策。一种看法是，很多职业外交官习惯地认为谈判是唯一的方式。每当我们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他们作出的第一个——常常是唯一的——反应就是与对手进行谈判。他们条件反射似地把争端当作仅仅是极大的误会，而不是无法克服的分歧来对待。他们没有意识到，敌手有时利用谈判来争取时间。为鼓励对方与我们达成协议，美国不仅要进行谈判，常常还需要采取其他行动。有时我们不得不在进行谈判的同时使用武力。如果艾森豪威尔不在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的电文中威胁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共产党人是不会同意停战的。如果美国不在1972年12月轰炸河内，北越不会在1973年1月签署巴黎停战协定。

另一种看法是，有些人认为，同意有必要进行谈判就会落入共产党的圈套。他们的论点是，如果与敌人进行谈判，美国就会陷入瘫痪状态，无法采取必要的强硬行动。在他们看来，与共产党人进行谈判，就等于在共产主义问题上做交易。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二次大战以来，我们已经通过谈判取得了很大成绩。由于我们与南斯拉夫在外交上进行了接触，并给予南斯拉夫外交支持，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决裂了。我们在奥地利和约的签署上发挥了作用，因而使奥地利1955年未被苏联侵占。1971年签署的柏林协议结束了苏联在

柏林与西德之间的走廊上的骚扰，这个地方25年来一直是超级大国冲突的一个潜在爆发点。我们参与了为结束赎罪日战争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结果使埃及与苏联之间的分裂在1973年扩大了。我们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秘密谈判，因而1972年实现了中美和解。卡特总统推动达成了戴维营协议，使埃及与以色列两国之间建立了和平关系，并最终决定了埃及与苏联的政治决裂。这并不意味着谈判可以代替行动。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谈判是实现我们的目标的一种策略。

经济援助。在对外提供经援的竞争方面，美国对苏联的优势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明显；但是，在利用优势方面，美国却遭受了最惨重的失败。美国的经济力量比苏联多一倍，我们完全可以在经援方面胜过苏联。然而，尽管我们在外援价值的美元数额上超过了苏联，但我们在取得的效果上却没有超过苏联。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向外国政府提供了价值1340多亿美元的贷款或经援，而苏联只提供了不到500亿美元。经援是我们外援的主要项目，而莫斯科提供的军援是经援的四倍。我们向150多个国家提供了援助，而苏联集中援助它的共产党附庸国。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援助是利他的，而莫斯科则完全是为了扩大它在全球的影响。

外援计划在美国的政治中从来没有得到过广泛支持。由于预算困难，今天支持外援的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少。要使外援计划能够继续下去，我们必须大力振兴经济。为此，我们必须克服外援是浪费钱财的观念。如果外援使用不当，那确实是白白浪费钱财。在过去十年中，国际社会向坦桑尼亚提供了30亿美元的援助，这是在对非洲最糟糕的经济政策进

行补贴。我们通过国际机构向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提供的许多钱都被滥用了，不是被用在无意义的项目上，就是被贪官污吏挪用了。但是如果使用得当，外援并不是浪费钱财。我们为西欧各国和日本的战后重建提供的140亿美元资金肯定不是浪费。我们向这些国家提供的经援在防止共产主义蔓延到这些国家上所起的作用大于十倍多的军援所起的作用。

我们必须学会通过提供外援来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向中美洲民主国家和巴基斯坦提供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都雄辩地说明，我们能够获得成功。我们的援助帮助萨尔瓦多避免了经济崩溃，防止了共产党在这个国家获得胜利。我们的援助有助于巴基斯坦保持政治稳定，并使伊斯兰堡能够在阿富汗问题上顶住苏联的军事威胁。1986年，我们向萨尔瓦多提供了4.35亿美元的援助，向巴基斯坦提供了6.28亿美元的援助。如果形势恶化，迫使我们出兵中美洲和西南亚去捍卫我们的利益的话，我们花费的钱要比这个数字大得多。如果我们放弃这些利益，我们花费的钱也将比这个数字大得多。

在与苏联进行竞争时，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经济优势。为此，我们应该大幅度地增加在战略外援方面的投资，并争取我们的盟国也增加外援。但我们必须使外援为我们的战略目标服务。我们不应该随便将自己的钱扔到为讨好和报答国际上的支持者而进行的项目上，这不仅会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会损害我们寻求帮助的那些国家的利益。

军事援助。美国人本能地不赞成将大批武器和军事装备运往世界各国。他们不想把自己当作军火商。但军事援助常常是保护我们自己及盟友利益的最佳办法，也是在今后数十

年中苏联将寻求向我们的利益进行挑战的主要方式。

自从40年代末以来，莫斯科只有一次是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吞并一个国家的——1979年入侵阿富汗。苏联在其他地方进行扩张时，克里姆林宫每次都是使用代理人的军队，向他们提供武器，利用他们来完成任务。1950年，北朝鲜侵略了南朝鲜。50年代中期，北越对南越、老挝和柬埔寨进行了颠覆和侵略。1976年，古巴充当代理人，派兵在安哥拉扶植起一个共产党政权。1979年，苏联通过古巴向尼加拉瓜提供援助，协助尼加拉瓜共产党人上台。80年代初期，苏联向它在发展中国家的代理人提供的军援是美国向其盟国和友国提供的经援的两倍。

苏联源源不断地向第三世界输送武器，并非出于慈善目的，而是受扩张主义的驱使。它输出武器的目的是输出共产主义。克里姆林宫今天使用的伎俩比北朝鲜军队越过南朝鲜边界时要高明得多。苏联现在不再越过边界，而是在边界线之内或者周围进行活动。苏联有时煽动革命；有时则利用已经起来的革命。无论哪种情况，军援都是莫斯科用来损害美国的盟国和友国的主要武器。

为此，我们为盟国所做的贡献至少应与苏联为其盟国所做的贡献相等。许多人认为，向遥远的冲突中的人们提供武器从道义上来说是错误的。他们说，这只能是火上浇油。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阻止苏联支持的颠覆活动，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援并不是错误的，援助印支的反共部队也不是错误的。1975年，北越之所以能够征服南越，并不是因为共产党有更大的动力或更得人心。河内之所以获胜，一方面是因为在1973年签署巴黎和约之后，苏联向它在河内的

盟友提供的军援增加了，另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国会在两年中把向西贡提供的援助削减了75％。结果，不仅给印支人民带来了悲剧性的灾难，而且对西方在这一地区的利益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因为在越南海港作业的苏联舰只具有了威胁对日本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的能力。

如果人民不得不孤军奋战，而他们的敌人却可以从几乎是无限大的苏联武库中随时获得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是不愿为自由而进行斗争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向盟友提供足够多的军援，莫斯科的附庸们就会从各条战线上向前推进。到那个时候，我们将面临严峻的选择：或者放弃我们的利益，或者牺牲美国士兵的生命，以保护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我们现在在军援上花一点钱，就可以避免今后既流血牺牲，又花更多的钱。

军事力量。越南战争之后，许多人认为，军事实力在国际政治中已不再有用。美国的军事干预或安全保障及军事存在已使7.07亿人幸免生活在苏联控制之下。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西欧、日本、南朝鲜和西南亚国家今天都可能已不得不屈服于苏联的要求。正是依靠军事实力，美国才能够于50年代初在朝鲜、1957年在黎巴嫩、1965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及1983年在格林纳达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有人认为，既然军事干预能在前而所列举的例子里获得成功，它就能够在其他地方也获得成功。这种假设是危险的。但是更加危险的看法是，越南战争失败了，因此我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得胜。我们一定不能让在越南的失败蒙住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严峻的现实：没有军事实力，没有决心在重要的冲突中果断地有选择地使用军事实力的决心，我们在

与苏联的竞争中就将不战自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军事机构是反对在第三世界的冲突中进行军事干预的人的最强大的同盟。越南战争之后，五角大楼唯一乐于从事的战斗似乎是与国会进行斗争，争取增加军事预算。国防部制定了美国进行军事干预必须符合的五项条件：第一，只有涉及我国或盟国的切身利益时才能采取行动；第二，我们应该把动用军队作为最后一着；第三，我们出兵时，唯一目标是打胜；第四，我们只在有必胜把握时，也就是有取得迅速而无疑的胜利时，才卷入冲突；第五，我们必须事先确保可以获得国会和公众的支持。

如果这些条件有确切的含义，没有人会对它们提出异议。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条件是那么不合情理地严格。实际上，这些条件要求我们只有在事前有获胜的保证的情况下，才进行干预。如果过去规定了这些条件，那就不可能在越南和朝鲜进行干预。我们甚至也不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战区发挥作用，因为直到1944年人们对能否获胜仍无把握。今后，这些基本规定实际上将禁止美国对在第三世界发生的任何冲突进行干预。

军方不愿再次陷入另一个越南泥潭，这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人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但是，越南战争的教训并不是我们永远不应该进行干预。恰恰相反，越南战争的教训是：美国今后进行干预时，必须果断行事，而不要犹豫不决；必须以战略作指导，而不应靠心血来潮；必须使用足够的力量去实现我们的目标，而不应只是想避免失败。

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军事机构集中力量来维持其在欧洲和远东的军队。它把过多的财力物力用于为很可能是一场

永远打不起来的大战做准备，实际上却忽视了为我们可能被迫参与的小型战争做准备。令人遗憾的是，它还忽视了增强我们对第三世界的冲突进行干预的能力。如果我们知道苏联可能在中心战场向我们挑战，而我们的核力量能够阻止他们在那里的挑战，那就不存在问题。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莫斯科很可能通过在第三世界进行侵略来从侧翼包抄欧洲和日本，而我们的核力量在第三世界无用武之地。在这类冲突中，我们只能把军事干预当作最后手段。但是，如果我们不具备在第三世界阻挡苏联发动攻势的能力，我们就会发现自己无力与苏联进行竞争。

战争权力法案是越南战争的又一遗产。尽管我行使了否决权，这一法案还是于1973年获得了通过。这一法律规定：首先，总统在派兵干预武装冲突之前，必须征询国会意见；然后，在国会尚未批准的情况下，总统有权决定继续干预60天；如果他书面说明由于士兵安全的需要，可再延长30天。如果国会届时决定不通过宣战或其它立法程序来批准总统的行动，那么按照战争权力法案的规定，我们的军队必须撤回。

这一法律不仅违反宪法，而且也不正确。它侵犯了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最高法院已经裁定，其它法律中与战争权力法案类似的有关国会否决权的条款是违反宪法的。国父将武装部队的统帅权交给总统是有道理的。国会发挥不了总司令的作用。正如戴高乐所说的，“议会只会使政策无法发挥作用，而不会提出政策。”

目前的国际现实决定了美国有时需要采取全面战争以外的武力行动，必须能够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在535名想要成为总司令的议员们反复权衡干预的利弊时，总统却不得不

一边为捍卫美国利益而斗争，一边不断地回头看钟表。在过去几年中，亲眼目睹国会在预算赤字和其它关键问题上所采取的阻碍行动的人都清楚，最可能采取的行动往往是不采取行动。其结果是，通过不采取任何行动——喋喋不休地辩论——来确保不采取行动，反对总统采取行动的人就能得逞，似乎他们的观点在国会两院都占了上风。

批准战争权力法案的人认为，美国应排除在世界上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尽管这种自我克制在西方可能被视为美德，但将被苏联和其它潜在敌人看作软弱的表现，是为他们继续侵略开的绿灯。美国单方面放弃使用武力将会导致别人对我们使用武力。在美苏竞争中，戈尔巴乔夫可以自由地推行其随心所欲的外交政策。如果我们限制总统采取行动的能力，美国就将像一个一只手被绑在背后只能用另一只手打拳的拳击手。

秘密行动。有时通过公开地提供经援和军援，就能实现我们的目标；有时只能靠直接军事干预来实现。但是，许多时候既不能采用前者，又不能采用后者。美国必须能够以隐蔽方式采取行动。没有这种能力，我们将无法保护美国的重要利益。

有人认为，美国不应该采取秘密行动，特别是在伊朗门事件灾难之后。政府与伊朗打开关系的努力遭到惨败，不是因为这是秘密行动，而是因为实施不当。秘密行动必须为重要的战略目标服务。最初与德黑兰进行接触的目的是与伊朗实现和解，这是值得寻求的目标。但是，一旦政府允许以色列和伊朗将买卖武器的问题带到谈判中来，方向就偏了。只有十足的外行才会相信这种交易在中东能长期保密。武器交

易只能在外交关系打开之后进行，而不是在其之前（美国与中国和解近十年之后，才向北京出售武器）。政府对黎巴嫩人质的命运问题一筹莫展，因而发生了用美国武器换取美国人质的交易，这是错上加错。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决定把向伊朗出售武器得来的款项转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错误变成了彻底的失败。

如果美国不把秘密行动看成实现外交政策的一种手段，那将会犯致命的错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在苏联坚持使用秘密行动这一手段时，我们放弃使用这一手段是明智的吗？克里姆林宫秘密地武装共产党叛乱分子，资助共产党和其他左翼党派，散布假情报，培训国际恐怖主义分子，通过暗杀搞掉对手。这仅是他们所采取的行动的几个例子。我们不去仿效、也不应该去仿效苏联的行为。但如果我们放弃秘密行动这种外交政策手段，我们实际上是在与莫斯科的竞争中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

秘密行动即使获得成功，也很少公布，但常常捍卫了美国的至关重要的利益。例如，在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为帮助伊朗国王上台提供了秘密支持。国王取代了昏庸无能的左翼政府。这一左翼政府对于苏联利用伊朗的不稳定局势来推动信奉共产主义的伊朗人民党上台一事感到高兴，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正是艾森豪威尔采取的秘密行动使伊朗出现了一个25年来一直有利于美国、伊朗人民及我们在该地区盟友的利益的政府。

在过去八年中，我们还进行了另一个秘密行动。美国向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了数亿美元的秘密援助。我们采取的这一秘密行动不仅创造了把苏联帝国从前沿阵地推回去的可能

性，而且使克里姆林宫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苏联领导人今后再进行这样的冒险之前将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与大家的想象相反，大多数秘密行动并不是向叛乱分子提供支持，而是向那些支持美国目标的个人和组织提供资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立即向欧洲民主政治力量提供的援助就是一个例证。当时，欧洲大陆一片废墟，苏联利用当时的形势不惜花费巨额资金，在意大利等国扶植共产党上台。我们向西欧那些寻求重建民主的国家提供了财政援助，这对于维护我们盟国的自由是绝对不可缺少的。

那些嘲笑美国有必要拥有采取秘密行动能力的人应扪心自问，1953年我们应该接受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伊朗吗？今天我们应该抛弃阿富汗抵抗力量吗？40年代末期克里姆林宫将独裁专制强加给东欧各国人民时，我们应该假装没看见吗？

伊朗门事件之后，许多人要求对采取秘密行动实行更严格的限制。有些人说，我们应该停止支持叛乱分子，应该只向当政的政府提供军援。但是，如果实行这样的政策，美国就只能在世界各地作出被动反应，而且不得不抛弃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与此同时，持这种观点的人又常常勉强地把阿富汗抵抗力量视为例外，理由是莫斯科悍然侵略了阿富汗，而且阿富汗抵抗力量领导人比其他反共叛乱分子更具有合法性。但是阿富汗抵抗力量领导人与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领导人一样，都不是选举产生的。这并不是说，阿富汗领导人不是阿富汗人民的合法领袖，他们显然是合法领袖。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逐案审查决定是否支持反共叛乱分子。

还有人认为，美国过去采取的所有的秘密行动都应该公开进行。这种看法是不可行的。例如，如果我们承认向自由

战士提供了援助，就可能使冲突升级，变成政府之间的冲突，我们的朋友很快就会被指责为美国的傀儡。但是，提供武器、培训及支持自由战士并不是典型的秘密行动。秘密行动更多地涉及支持压制性国家内的民主政治运动，资助这种国家内的工会或者报纸。我们通过采取秘密行动，实现了崇高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公开了我们的行动，这些行动就会立即遭到破坏。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政府只能采取合法的、得到有关国会委员会批准的、符合美国政策的、一旦公开会得到美国人民支持的秘密行动。对于前三个条件，谁也不会提出异议。但是，总的来说，不能任由变幻莫测的公众舆论来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是秘密行动。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秘密行动被披露，是会得到美国人民支持的。但也有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罗斯福总统秘密地向英国提供援助。他这样做不仅违反了中立法案，而且也违背了公众中要求中立的强烈感情。但是，回过头来看，我们知道他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接受如下事实：我们选出的领袖是来领导我们的国家的，而不是尾随民意测验结果的。

尽管上述限制条件不合常理，但是我们确实从伊朗门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不应卷入秘密行动的实施。要获得成功，这种秘密行动必须是可以否认的。在采取秘密行动时，我们应使美国能够理直气壮地否认参与此事。但是，如果由老的政府办公大楼来指挥秘密行动，政府就无法予以否认。然而，我们必须对秘密行动与秘密谈判加以区别。总统如果愿意，应该能够启用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担任谈判代表。在大多数谈判中，特别是与极权国家领导人进行的

敏感谈判中，国家安全委员会首脑是比国务卿更合适的人选。

我们不能够保密是对我们进行秘密行动的最大威胁。现在，秘密情报广为传播，新闻界成百上千的普利策[1]像猎狗似地到处无情地探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能对秘密行动保密，那简直是奇迹。但问题不仅仅出在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都泄露情报。强迫有泄密嫌疑的人做测谎测试不是防止泄密的办法。我们不应该根据一次复杂的测试毁掉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相反，总统应该大大减少能够了解有关秘密行动的情报的政府人员。

对于那些一旦泄露就可能危及参与秘密行动人员的生命的情报，总统应制定新的特别的“须知范围”确定办法。只有得到授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才有权在材料和文件上标明密级。目前这种成千上万低级官员都能在文件上盖绝密戳的做法简直是荒谬的。一旦发现有人确实泄露了敏感的秘密行动的情报，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都应判处以强制性监禁。目前的间谍法令还不够完善，没有对这种行为作出规定。那些出于怨恨或因官僚机构内部争斗而泄露情报者，应与有意伤害美国而向外国提供情报者判处同样的刑罚。

此外，国会应建立一个最多由八个专业人员组成的统一联合情报检查委员会，听取关于秘密行动的汇报。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逐渐使美国人民认识到，凡是泄密的人都应使之身败名裂，而不应像丹尼尔·埃尔斯伯格那样获得荣誉勋章。

---

① 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美国报界权威人士，曾捐款设普利策奖金，授予新闻界和文学界中成就卓著者。在新闻领域内，授奖对象为：为公众服务贡献最突出的报纸、最佳新闻报道、最出色的社论、漫画、照片等。——译者

美国必须具备这六个方面的能力，同时还必须能够在正确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战略。我们必须懂得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使用每一种手段。

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区别切身利益、重要利益与边缘利益。哪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具备在任何时候都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捍卫本国的一切利益的人力物力。战略意味着进行选择，进行选择又意味着有一整套的战略重点。我们应该对苏联的威胁做出反应，但在战术上必须是灵活的，同时不忘记我们的战略重点。

那些一旦失去就会直接危及美国安全的是切身利益。西欧、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波斯湾的生存和独立是美国的切身利益所在。它们中任何一个被苏联夺去，都将危及我们自己的安全。如果克里姆林宫企图控制这些地区，我们将别无选择，必要时只能用武力作出反应。

那些一旦失去将对美国的切身利益构成直接威胁的是重要利益。如果莫斯科控制了南朝鲜，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就能轻而易举地威胁日本。如果苏联领导人能够控制巴基斯坦，他们就可以将其海军部署在波斯湾的门口。如果他们能够巩固在中美洲的尼加拉瓜滩头堡，他们就能够发动攻势，破坏包括墨西哥在内的整个地区的稳定。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常常不得不把重要利益当作切身利益来对待，因为苏联采取的威胁美国重要利益的举动只不过是大挑战的前奏曲。如果当希特勒向捷克——内维尔·张伯伦称之为由与我们毫无相同之处的人居住的"遥远的国土"——发起进攻时，英国和法国都把它视为对它们切身利益的威胁，

它们就不必在十个月之后当德国入侵波兰时卷入战争。如果我们等莫斯科威胁到美国的切身利益时才起来反对苏联的扩张主义，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美国的切身利益已受到极大威胁，并将不得不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来捍卫我们的切身利益。

那些一旦失去只会对美国的重要利益或切身利益构成遥远威胁的是边缘利益。尽管我们不愿看到在像马里这样的国家出现亲苏政权，但我们不能认定亲苏政权的出现就一定会危及美国及其盟国的重要利益。

我们的总战略将决定我们采取什么行动来保护自己的战略利益。我们无需派海军陆战队去捍卫我们的边缘利益。但是，为了捍卫我们的切身利益，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动用海军陆战队。我们的承诺必须与我们在一个地区的利益的重要性相一致。我们的能力——及利用这种能力的决心——也必须与我们所面临的威胁相适应。

我们最优先捍卫的应该是我们的切身利益。美国决策者经常因边缘问题分散注意力。尽管加拿大和墨西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但是，我们对这两个国家的重视程度与其重要性不相称。加拿大是北约成员国，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们应该努力使加拿大更加积极地参与，为采取诸如最近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等促进繁荣的措施，为欧洲变得更加安全、世界变得更加稳定做出努力。世界对加拿大来说利益攸关，同时它又能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让加拿大站在一边旁观，不让它在我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上与我们一道工作，这对我们不利。

墨西哥的经济危机是对我国长期安全的一个最大威胁。

对此视而不见，只能危害我们自己。虽然美国解决不了墨西哥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问题视为枝节问题。我们今天的政策就像踩水一样，在短期上缓和了关系，但从长远来看是自寻灾难。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一味无限期地重新安排偿债期限，不过是推迟还债而已，最终将使墨西哥人民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我们必须与墨西哥领导人一起制定一项计划，着手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而不是每次都临时应付危机。

作为一项原则，如果美国的切身利益受到苏联的军事威胁，美国就必须准备使用自己的力量，捍卫自己的利益。只要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仍然威胁着自由世界，我们决不能削弱与西欧和日本的安全关系。但是在我们与莫斯科的竞争中，估计西欧和日本都不是克里姆林宫会进行挑战的地方。在1999年之前的年月里，波斯湾地区将是苏联对美国的切身利益构成最大威胁的地方。也正是在这一地区，美国在捍卫自己的利益方面做得最差。

我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不久出版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把波斯湾称为西方的“石油咽喉”。我曾写道，如果有朝一日苏联控制了波斯湾地区的石油资源，克里姆林宫就可以通过威胁扼杀以石油为动力的西方经济，来对西方进行讹诈。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至少在本世纪剩余的年月里，这种情况仍将继续下去。

是否能够得到波斯湾的石油关系到西方的生死存亡。如果我们只看到今天的低廉油价，而看不到我们必须依赖从中东进口的石油这一事实，就将犯致命的错误。石油仍然是工业国最重要的能源。西方工业化国家所消耗的一半以上的石

油靠进口。而且，西方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在本世纪末以前只会增长，不会减少。

1973年，当石油输出国组织实行禁运，因而出现了长达数英里的天然气管道时，美国使用的石油三分之一靠进口。到1985年，在为保存能源、减少对外国能源资源的依赖方面进行了十年的共同努力之后，我们消耗的27%的石油仍然靠从国外进口，而西欧63%的石油靠进口，日本则100%。尽管美国的大部分石油是从海湾以外的地区进口的，但西欧进口石油的三分之一左右、日本进口石油的三分之二左右来自波斯湾地区。在从波斯湾到日本的7000英里长的航道上，每100英里就有一艘驶往日本港口的油轮。

没有从波斯湾进口的石油，我们盟国的经济就会一落千丈，出现大崩溃。届时，连大萧条时期的主要经济指数与此大崩溃相比都显得是较平稳的下降趋势。谁也不应错误地以为，美国可以免受影响，因为石油价格上涨时，对大家来说都上涨。

我们几乎肯定将越来越依赖从波斯湾进口石油。美国石油产量将继续下降，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美国的石油消耗将继续增长。既然煤炭、天然气或核能不足以弥补供求之间的差距，我们将需要增加石油的进口量。据美国能源部估计，到1995年，美国消耗的石油的50%将靠进口，而西欧将进口所需石油的70%，日本100%靠进口。因为自由世界已探明的石油储量的66%在波斯湾国家，今后工业化民主国家大部分的进口石油将来自这些国家。

只要西方国家的经济靠石油为燃料，波斯湾地区及其资源仍将关系到西方的切身利益。长期以来，中东一直是亚、

非、欧三大洲的交通要道。现在，由于石油已成为现代工业的生命线，波斯湾成了西方的石油咽喉。

克里姆林宫对这一情况一直了如指掌。苏联对石油的兴趣一直是它对南下感兴趣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在与纳粹德国的盟友谈判瓜分世界时，斯大林的外交部长对他的对手说，除了在欧洲的目标以外，“苏联追求的目标”是“波斯湾方向巴统和巴库以南地区”。柏林同意这一设想后，斯大林命令他的将军们制定入侵伊朗的计划。战争计划的开头引用了斯大林的一句话，毫不掩饰地阐明了莫斯科的动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为了：谁占有油田和通向亚洲内地的最重要的通道”。

1941年，纳粹德国调转军队对苏联发动进攻之后，克里姆林宫侵入了伊朗北部，以阻止德国向该地区进军。与此同时，英国和美国的军队开进了伊朗南部。但是战后，英国和美国都如期撤出了自己的军队，而莫斯科为了瓜分伊朗北部，宣布处于苏联控制下的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和库尔德人民共和国已脱离德黑兰，宣布独立。克里姆林宫立即正式表示承认它们的独立。此后，苏联军队及其支持的叛乱部队曾试图向伊朗首都挺进。杜鲁门向莫斯科发出最后通牒，这才使斯大林停止前进并撤退，因为当时美国垄断着核武器。哈里·杜鲁门的这一重要决定在防止苏联控制西欧方面所起的作用，与他作出的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军援的决定同样重要。

一个不祥的预兆是，莫斯科今天比1945年有更大的向南推进的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的油田处于鼎盛时期，产量不断上升。80年代中期，苏联的石油产量已达到顶峰，随之就开始走下坡路，而且回升希望渺茫。这就是尽管

发生了切尔诺贝利灾难事件，苏联仍然坚持搞核能的原因。这是苏联企图控制西欧和日本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寻求控制波斯湾的一个重要原因。

70年代末，克里姆林宫对海湾形成了钳形包围。一边从西南进行包抄。1978年苏联向埃塞俄比亚空运了二万名古巴士兵，以便一方面支持埃塞俄比亚政府与索马里进行战争，一方面从沙特到红海对岸建立军事设施。那年晚些时候，亲苏集团在南也门夺得了政权，使苏联在阿拉伯半岛上有了一个滩头堡。不久，南也门公开向北也门发动军事进攻。恐怖主义分子以南也门为基地对沙特阿拉伯采取行动。游击队也以南也门为基地袭击阿曼的一个边界省份。钳形包围圈的另一边是从东北方向包抄。1978年在阿富汗发生的一场军事政变使共产党上台。阿富汗共产党政府很快就与莫斯科签署了协议。当人民起义威胁要推翻共产党政权时，苏联侵占了这个国家。有了阿富汗的基地，苏联的战斗机、轰炸机便可以飞到霍尔木兹海峡。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从两个方向同时推进，企图控制这一“石油咽喉”。

从1953年到1979年，伊朗国王领导下的伊朗一直是西方在这一地区的安全的主要支柱。60年代，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出。美国因为有50万军队困在越南，无法来填补这一真空，是伊朗国王填补了这一力量真空。他实施了一项使他的武装部队现代化的庞大计划。他派海军巡逻海湾地区，他的陆军对苏联的推进构成巨大的障碍。他保护了沙特阿拉伯及这一地区其他易遭受打击的酋长国，与海湾其他国家共同建立了地区安全的安排。1979年，国王政府倒台，导致了新的权力真空——就在这时莫斯科具有了填补真空的能力。如

果国王能够幸存，苏联不太可能入侵阿富汗。

今天，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在波斯湾保护西方利益的国家。亲西方的波斯湾国家都不够强大，无法承担这项工作。我们的欧洲盟国也都无力或没有决心来完成这项任务。因此，我们必须站起来解决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这样做。

我们必须在军事上采取措施，提高在波斯湾地区显示美国力量的能力。我们已经在这一地区取得了重要进展。卡特总统创建了快速部署部队。里根总统将此部队升级，划归美国中央司令部统帅。国会已经为筹建这支部队拨款几十亿美元。但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在国会整个预算削减中，五角大楼对用于保卫波斯湾的部队的预算经费进行了不成比例的削减。结果是，美国无法迅速实现30天之内在海湾部署四个师的目标。

如果我们不能在那里部署军队，我们就不能保护我们在波斯湾地区的利益，也不能阻止苏联采取损害我们利益的行动。我们需要大量增加投资，提高空运和海运能力。因此，在1999年以前的11年中，这应该成为我们防务预算中最优先考虑的项目。

我们还须在外交战线上采取行动，更加密切与该地区国家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够使用沙特阿拉伯或其他较小的波斯湾国家的空军基地，美国就不可能在波斯湾进行干预。那里必须有基地可以驻扎我们的空军，以便为地面部队在那里建立滩头堡时提供掩护。如果没有空中优势，美国要在波斯湾登陆，就会重演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加利波利登陆的悲剧。

我们要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美国需修补伊朗武器交易所造成的损失。对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朋友来说，霍梅尼的伊朗甚至是比苏联更大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向他们保证，伊朗惨败是反常现象，不会再重演。但是，我们还必须积极努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正是巴勒斯坦问题及我们与以色列的密切关系导致了波斯湾国家与美国保持一段距离。

即使我们采取了上述必要措施，我们的切身利益仍将受到威胁，除非我们有决心捍卫这些利益。那种认为美国无论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都决不动用的看法是危险的。这种看法将使战争的危险增长，因为它诱使侵略者相信，可以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侵略成功。然而，1984年自由派总统候选人轮番许诺，绝不派美国军队去波斯湾打仗，他们鼓励的正是这种观点。无论谁在1988年大选时作出这种绥靖主义的保证，都不配被视为美国及自由世界的负责任的领袖。

美国不能甩手不管目前的波斯湾危机。今天在两伊战争中发生的一切将对我们保护这一地区不受苏联干涉的能力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有一场双方都应战败的战争的话，那是两伊战争。如果有一场美国经不起任何一方失败的战争的话，那也是两伊战争。如果伊拉克被打败了，就会导致伊朗原教旨主义者控制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乃至整个波斯湾地区。如果伊朗人员大量伤亡，国力衰竭，它将很容易遭受苏联的颠覆和威胁。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应该寻求没有胜利的和平，尽管我们对我们的外交官迅速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并不抱幻想。然而，我们同时应该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友国的力量。我们应该鼓励和协助海湾地区最近出现的加强地区防务合作的行动，

鼓励和协助埃及重返阿拉伯世界，而且鼓励和协助它成为阿拉伯波斯湾国家的潜在的军事盟国。我们必须继续在这一地区为挂美国旗的油轮护航，因为我们的存在使我们的朋友有信心藐视伊朗的威胁。如果我们的船只遭到袭击，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并决心对伊朗的军事和经济目标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

同时，国会已经进行了几个月的毫无结果的辩论，现在是对援引“战争权力法”或者容忍、或者闭口的时候了。如果国会议员试图侵犯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应起的作用，他们应该在这个问题的表决上持明确态度。如果他们拉不到足够的票数——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应该靠边站，让总统在没有干涉的情况下工作。现在的情况是，霍梅尼一直在肆无忌惮地袭击我们的油轮和海军，希望促使我们援引“战争权力法”，起动美国60天内撤出的钟表。国会的无休止的辩论，尽管出于好意，只能把我们在波斯湾的军人置于炮火之下。

除了在波斯湾的切身利益以外，美国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有重要利益。这些国家的经济和自然资源与我们的关系极大。有些国家还占据着关键的战略地位，因而成为美苏竞争的主要对象。最为重要的是，第三世界是在美苏竞争中我们能够期待最大收获或最大损失的地方。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发生过120次战争，死了1800万人，其中40多场战争至今仍在继续。除了北爱尔兰冲突、1981年的福克兰群岛冲突及1947年的希腊冲突以外，其他战争都发生在第三世界。美国和苏联之间最激烈的冲突

发生在第三世界。美、苏竞争中最重要的战斗不是发生在我们两国的边界，而是发生在在美国鲜为人知的遥远的乡村和小国。在美、苏斗争中，涉及人民和领土丢失的也正是这些地方。

今天，只寻找冒烟的枪炮已不足以确定苏联是否进行了侵略，我们必须寻找隐藏的黑手。尽管第三世界的冲突不都是苏联的责任，但是，好几场冲突是苏联挑起的，而且它寻求利用其中大多数冲突。我们必须看清苏联及其代理人在煽动和支持反对非共产党政府的叛乱分子中所起的作用——并采取相应的反措施。

为了保护我们在第三世界的利益，我们必须学会对下述三种情况作出反应：（1）一个非共产党政府遭受共产党颠覆；（2）一个非共产党政府虽然享受着和平，但易受共产党叛乱的袭击；（3）一个共产党政府遭到反共武装力量的袭击。

一个友好的非共产党政府受到共产党叛乱的威胁时，美国应准备帮助该国对付这种威胁。在自由与共产主义的斗争中，美国不在前线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就不可能与莫斯科进行有效的竞争。

我们应该干预这些冲突，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且是为了受到威胁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利益。英国的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曾写道，“地缘政治的实质是能够辨别不同程度的灾难。”有些人不懂得这一点，他们不喜欢我们有时不得不支持的非共产党政权，因而反对美国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传播而进行的卷入。我们不喜欢独裁政权。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共产党独裁政权不同于非共产党独裁

政权。非共产党独裁政权允许一些自由，而共产党独裁政权不允许任何自由；非共产党政权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因而使得和平变化有可能发生，而共产党政权不允许反对派存在；非共产党政权可能会支持我国的外交政策，而共产党政府反对我国的外交政策。

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政权寻求输出它们的压迫制度，而非共产党政府不这样做。北越共产党领导集团达不到控制整个印度支那的目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古巴30年来一直在拉丁美洲煽动共产主义革命，1979年他在尼加拉瓜获得了成功，尼加拉瓜共产党人反过来又担负起颠覆萨尔瓦多和其他中美洲国家的任务。

美国的友国和盟国在人权问题上的记录可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它们毫无例外地比莫斯科附庸的记录好得多。古巴人在巴蒂斯塔统治下的生活好于在卡斯特罗统治下的生活；越南人在阮文绍统治下的生活好于在河内共产党统治下的生活；柬埔寨人在朗诺统治下的生活好于在波尔布特时期的生活。自从1945年以来，共产党政府杀死的人是为阻止共产主义而进行的战争中死亡人数的20倍。我们必须记住，共产党领导下的和平时期死亡的人数比反共战争进行时还多。

我们在支持遭到共产党袭击的非共产党政府时，应遵循我1969年在关岛宣布的、被人们称为“尼克松主义”的政策。这一政策表明，今后除非有大国干预第三世界冲突，否则，美国不应该动用战斗部队。我们应该向友国提供军援和经援，击败苏联支持的叛乱需要多少援助，就提供多少。但是，遭到叛乱分子袭击的国家必须提供军队来捍卫自己。如果一个国家获得我们的援助、接受我们训练后仍没有能力和决心

去战斗、去胜利，那么，由我们派兵作战最多也只能赢得暂时的胜利。一旦我们撤离，敌人就会卷土重来。

许多人错误地以为，尼克松主义的宣布意味着美国决定撤退，实行孤立主义，让亚洲各国和其他地区国家自己保卫自己。事实并非如此。尼克松主义不是美国撤出第三世界的政策，而是为美国在第三世界呆下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知道，越南战争以后，已不可能要求美国军队参与打击游击队的战争。尼克松主义使美国得以继续在帮助友国和盟国反对共产党侵略、捍卫独立方面发挥负责任的作用。美国向萨尔瓦多政府提供援助就是尼克松主义的一个范例。我们提供武器、经援和训练，但由萨尔瓦多出战斗部队。

当一个第三世界的政府受到共产党游击队袭击时，保持该国稳定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但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因此，我们只要遵循下述七条基本方针，就能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

第一，我们一定不能动摇盟国领导班子的稳定。除非这个班子不可救药地腐败或无能，或者既腐败又无能，否则美国在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上应该十分谨慎——只有在有更好的选择时才采取行动。要对叛乱进行反击，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的盟国有一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人民支持的强有力的领导人，我们应该让他们有较大的权力采取行动，对付叛乱。对于在他们国家采取什么行动更合适，他们通常比我们更清楚。我们在越南犯的最大的错误是，1963年策动了推翻吴庭艳总统的政变。尽管他的政府有严重失误，然而他的倒台引起了政治上的不稳定，这反过来又损害了南越的军事能力。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我们不得

不承担打仗的主要负担。凡是需要依靠我们扶上台的人，掌权后还将继续依赖我们。

第二，我们必须努力切断叛乱分子的外援渠道。没有外援，叛乱力量是不可能坚持打下去的，除非叛乱分子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或者政府软弱无能。游击队可以依靠缴获的武器弹药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保卫几个农村据点，但是要进行持久的攻势必须有外国的后勤援助。因此，我们在军事上的首要任务是，在外援供应到达叛乱分子手中之前切断它。

第三，为了打败叛乱分子，需要多少军援，我们就提供多少。这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我们不应该吝啬。至少，苏联为其友国和盟国做多少，我们也要做多少，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原则。

第四，我们在必要时必须要求我们的盟国改组他们的武装力量，以便赢得人民的支持。平息叛乱，既是一场军事战争，也是一场政治战争。取得政治胜利是取得军事胜利的先决条件。我们一定不能因军队粗暴对待平民而使共产党赢得人民的支持，那将导致政治上的失败，进而导致军事上的失败。那样，不仅共产党可以补充力量，获得支持，而且美国国内也不可能在政治上继续支持盟国。但是我们进行军事改革时必须有灵活性和耐心。整顿改组武装部队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战争时期，既整顿改组部队，又不影响战斗力，这是走钢丝式的行动，有失败的风险。

第五，我们必须鼓励盟国采纳在村庄一级保卫国家的战略。美国提供军训时，应避免犯按照美国的模式来改造盟国军队的错误。他们的军队必须有能力对付他们面临的游击战威胁。我们的军队适于打常规战争，不适于打非常规的游击

战争。他们过于相信靠技术解决军事问题。如果让他们来处理，他们很快就会用高性能战斗轰炸机和用直升机运载突击队来武装我们在第三世界的盟友。我们必须牢记，在游击战争中，村村都有步兵排比每省都有机械化旅更能有效地保卫人民。

第六，我们一方面要寻求获得军事胜利，同时必须促进经济发展。共产主义本身吸引力很小，共产党是靠利用人民遭受的苦难来吸引人的。我们可以说明，共产党作出的更美好的生活的许诺是骗人的，共产党政府将比现在的政府更加暴虐。但是，我们的这一论点对于生活在赤贫中的第三世界人民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必须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对他们来说，现状是不值得维护的。如果共产党谈论他们的问题，而我们却只谈共产党的问题，他们就会倾向于共产党。作为政治攻势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开展一场发展经济的运动，以协助获得军事胜利。

第七，我们必须准备长期提供援助。很少有10年之内结束的游击战争，许多游击战争已打了一代人的时间。美国人性情急躁，期望迅速取得结果。但是，期待一个国家的政府一夜之间就击败游击队是不合情理的。如果我们的友邦和盟国不能指望我们长期支持他们，我们很快就会失去所有的盟友。

如果非共产党第三世界友国政府没有面临游击战的威胁，美国也不应该以为那里平安无事，因为那可能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制定先发制人的战略。我们必须解决贫穷和压迫问题，这些问题使共产主义具有表面的吸引力。我们现在应该抓住机会，在第三世界进行和平

革命，否则，我们今后将不得不对付暴力革命。我们已经学会如何在世界上显示力量，而且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做得好，但现在我们必须学会戏剧般地显示进步。

回想起来，每当第三世界爆发危机时，我们几乎总能看到许多即将出现麻烦的预兆。我们需要建立早期预警系统，以便在革命之火燃烧起来之前就察觉热点。然后，我们应该在维持现状与实行共产主义之间提出一个积极可行的替代办法。在病人染上不可救药的革命病毒之前，我们就必须配制预防性政治药方，进行医治。

许多西方人希望把立即实行民主作为解决第三世界的一切问题的办法。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求我们向这些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们达到我们在人权上的严格标准，要求我们与那些达不到标准的政权断绝关系。美国协助海地的杜瓦利埃总统和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有人提议对巴基斯坦和南朝鲜也使用这种方法。

他们的意见在分析部分问题方面是正确的，但提出的解决办法是错误的。极权政府很少受人欢迎，但是在第三世界不太可能有民主政府。民主制度犹如一架复杂的钟表，时钟需要有主发条和相互关联的齿轮系统才能走动。民主制度需要人民有自治的愿望，而且需要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机构来使民主制度正常工作。西方的这些机构是经过几百年的进化而形成的，我们不能期望它们一夜之间在第三世界生根开花。

我们应该始终如一地鼓励朝着民主政府的方向前进的进程，鼓励人们更加尊重人权。这一政策不仅符合第三世界人民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政

府是我们更强大、更可靠的盟国。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第三世界不大可能实行符合我们标准的民主。因此，在决定支持哪个政府问题上，我们必须现实一些。

一个非民主政府要得到我们的支持必须符合四个条件：第一，它至少必须允许一些人权和政治权利，它的政治制度必须有实现和平变革的前景。独裁政府还允许诸如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而共产党极权政权禁止一切权利。如果我们同所有不符合美国的自由和正义标准的国家断绝关系，我们将不得不同世界上三分之二国家断绝来往。我们不应该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相反，我们应尽力影响这些政府，以促使它们更加尊重人权。同时，我们要谨慎地拉开与那些确实令人讨厌的政权的距离，以免因与压迫者的关系而使自己的形象在这些国家的人民的眼中受到玷污。譬如，如果我们像一些人建议的那样对南朝鲜实行经济制裁，那将会削弱我们对南朝鲜政府的影响力。我们可以对南朝鲜政府施加影响，促使它通过改革选举制度改善民主情况。对其它国家实行高压政策，在美国政治上可能是好的，但在国外一般来说是坏政策。

第二，该政府必须有能干的、特别是懂经济的领导人。一个国家的人民会接受暂时限制他们的政治权利，以换取经济发展。但是，他们不会安于忍受政治压迫和经济停滞的双重重压。如果我们的战略利益要求我们与独裁政府建立密切关系，我们应该运用我们拥有的影响力，促使它实行那种真正给人民带来发展的经济政策。我们还必须看到，光有经济发展是不够的。就像光有经济发展没有自由一样，如果只有自由而没有经济发展，这种自由是短命的。从长远来说，两

者缺一不可。我们应该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确保两者齐头并进。

第三，该政府必须有一支能攻善守的军队，既能维持国内秩序，又能防止发生共产党叛乱。有时我们不得不支持不受人民欢迎的政府，但我们不能与共产主义运动一旦兴起就无力捍卫自己的政府保持过密的关系。如果我们与这样的政府关系过密，我们将像坐在导火线通向苏联政治局的火药桶上，将受莫斯科摆布，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是不会怜悯人的。

第四，只有在不存在能站得住脚的主张民主的反对派领袖的情况下，我们才支持独裁政府。与独裁政权关系过密，将使政治力量发生不利于美国的两极分化，促使政界中想开放政治制度的温和派人士与极左派结盟，攻击美国。如果我们必须与独裁政府合作，我们至少必须与反对派保持接触。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悄悄地但坚决地压政府实行政治改革，保护人权，扩大自由。

以上四条应该成为我们与第三世界非共产党独裁政权发展关系的指导方针。但是，我们在第三世界的政策应超越政治关系。一方面，我们寻求阻止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扩张。另一方面，我们也寻求实行旨在扩大自由的政策。

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已经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即：美国只有共产党侵略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才会在第三世界积极卷入。我们现在必须制定符合他们利益的政策。我们应该表明，即使没有共产党威胁，我们也将积极努力减轻他们祖祖辈辈遭受的贫穷、非正义及腐败等痛苦。我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不仅符合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且符合我

们自己的利益。此外，还将使莫斯科及其附庸在与美国竞争中无法利用这些问题。

当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的人民起来推翻压迫他们的统治者时，美国面临的难题是，是否支持他们。有人说，袖手旁观是不道德的。另一些人则说，卷入别国的内战是不道德的。这两种意见都有正确的一面。对于应该支持谁，我们必须在进行冷静、实事求是的分析的基础上作出选择。

一方面，里根总统说我们原则上总是应该支持那些抵抗共产主义侵略的国家。当十三个美洲殖民地脱离英国时，乔治三世并没有在古拉格岛监禁政治犯。而莫斯科在第三世界的附庸们却擅长关押政治犯。如果法国出于最为可笑的动机支持美国革命是正确的话，美国出于利他主义动机支持反对共产主义的革命也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反对“里根主义”的人正确地指出，“为了捍卫自由而支持朋友、反对敌人”的呼吁是好言词，但不是好政策。因为那将使美国不顾其利益和能力在世界各地卷入一切反对侵犯人权的斗争。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不可能支持一切要求我们帮助的反共革命运动，尽管这一点对于理解极权暴政强加给人们痛苦的美国人来说可能是痛苦的。

如果我们对何时应该实行“里根主义”进行正确估计，这两种观点是可以调和的。谨慎地实行“里根主义”具有战略意义。“里根主义”是自卫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因为它至少可以阻止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赢得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侵略。“里根主义”可以把苏联从它已夺取的地方推回，因为那些地方处于苏联帝国的边缘，苏联的切身利益在那里并未受到威胁。“里根主义”不让我们自

己的军队卷入。“里根主义”是一项低风险、低代价政策。

当共产党政府在外国军队公开入侵之后夺取政权时，保守派和自由派一致支持反共力量。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抵抗力量获得了美国人民的同情一样，阿富汗抵抗力量和抵抗越南占领军的柬埔寨非共产党力量几乎享有全世界的支持。

但是，当反共革命者寻求推翻一个靠苏联支持的叛乱获胜并夺取政权的政府时，出现了尖锐的分歧。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里根主义”就是干涉他国的内政，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看法的基点是法律。既然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实施国际法的世界政府，国际法的实施必须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一旦一方的行动背离了国际法准则，另一方则不受国际法的约束。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莫斯科一直在支持所谓的“民族解放战争”。因此，不管国际法的辩护者们怎么说，我们也有这样做的自由。当莫斯科用不正当手段袭击我们时，我们就可以不再遵守昆斯伯里拳击基本规则。

反共革命运动要赢得我们的支持，必须符合下述三个条件：1.它必须符合该国人民的利益；2.它必须符合美国的利益。通常情况下，它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因为接受苏联援助它的为建立暴政而奋斗的同志这一事实，又拒绝支持我们的为自由而战的朋友，这在战略上是站不住脚的；3.必须存在成功的可能性。反共革命如不可能获胜，我们就不应该鼓励自由战士去从事实际上的自杀行动。

共产党在一个国家掌权这一点本身并不使美国有理由支持该国的反政府的反共叛乱。中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北京剥夺了它的人民许多我们珍惜的自由，一个非共产党政府

显然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但是，中国政府今天并没有威胁美国及其盟友及它们的利益。相反，中国是一支不可缺少的抗衡苏联的力量。此外，最近对学生示威游行的镇压表明，反对稳固的中国共产党政府，连示威者都不可能获得成功，更不用说自由战士了。

波兰是又一个例子。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很少有民族像波兰人那样有那么悲惨的经历，因此，波兰最应该获得自由。支持反共叛乱符合波兰人民和美国的利益。但是，可悲的事实是，反共叛乱根本不可能取得成功。正如我们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81年在波兰所看到的，为了镇压旨在寻求解放东欧卫星国的叛乱，苏联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包括肆无忌惮的军事入侵。如果支持反对共产党暴政的革命，然后又无可奈何地看着莫斯科将革命镇压下去，这是道德错误和战略错误。

对于反共革命是否给予支持，我们应该逐案研定。我们不可能支持世界上所有的自由战士，但是我们绝不应该遗弃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我们随便抛弃那些反对世界上极权政府的人，我们就丧失了民族的灵魂。

一旦决定支持反共事业，我们就不能半心半意地支持。我们向自由战士提供的武器弹药绝不应该只够他们在为自己的国家进行的斗争中牺牲，而应该使他们能够解放自己的国家。否则，那是最不道德的。他们愿意为自由事业作出最大的牺牲。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工具，以便他们能够达到目的。否则，我们将不仅是在欺骗朋友，而且是在欺骗自己。

我们必须承认，大国并非总能获胜。但是，我们也必须懂得，如果不冒任何风险，就永远不会获胜。获胜就意味着

冒风险。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在美苏斗争中，没有永久的胜利。共产党人即使在一场斗争中失败了，也不会就此洗手不干了，而只会暂时撤退，重新组织力量，等待明天。美国人失败后常常认为事情到此完结，而实际上只不过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历史上，每一次高潮之后，随之而来的都是低潮。20世纪70年代，苏联在第三世界处于高潮。但是，共产党一旦掌权，就不能再真正受到人民欢迎。要保持高潮就必须对人民有吸引力。然而，如果美国不运用“里根主义”来支持反共的革命者，这一赤色潮流就永远不会落潮。如果我们认为苏联的胜利是永久的、不可逆转的，那么我们就会使共产主义成为未来的潮流。

在中美洲、西南亚、南部非洲和东南亚的目前冲突中，我们应该运用这些外交政策理论。

在中美洲，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冲突尽管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切身利益，但是，这些斗争确实涉及美国阻止苏联在这一地区建立桥头堡的重要利益。苏联在这一地区建立桥头堡将使克里姆林宫离威胁巴拿马运河和墨西哥不远了。中美洲危机可能不会立即威胁到美国的这些切身利益，但最终将会威胁到它们。

在尼加拉瓜，我们所关注的并不是马那瓜政府是否尊重人权，是否讲美国的好话。独裁政府，甚至是极权政府，并不威胁美国的利益。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的反美言论虽然令人恼怒，但并无损害。只有当尼加拉瓜与苏联集团建立了联系，成为苏联在中美洲进行扩张的基地时，才影响到我国的

利益。问题不在于桑地诺政府是共产党政府，而在于尼加拉瓜共产党政府本能地推行扩张主义。

一些左翼人士对尼加拉瓜是否对邻国构成威胁提出异议。他们不得不承认，桑地诺政府已经建立了中美洲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但是，他们说，创建这支军队完全是为了自卫，为了与美国援助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力量作战。他们这么说是大错而特错了。他们忽视了尼加拉瓜军队是在反政府武装力量出现之前创建的这一事实。还有重要的一点他们没有看到，这就是尼加拉瓜对中美洲的真正威胁不是用常规力量进行公开侵略，而是用非常规力量进行秘密颠覆。

尼加拉瓜共产党领导人也不会不同意这些事实。他们坦白地承认，甚至吹嘘，他们要在中美洲进行一场"没有疆界的革命"——直率地供认，他们欲将共产主义强加给邻国。桑地诺在尼加拉瓜获胜后，游击队对萨尔瓦多的威胁急剧增加。这是因果关系，而不是巧合。如果尼加拉瓜成了共产党革命者的安全庇护所，成了他们武器供应的通道，这一地区今后几十年都将面临混乱的反叛乱战争，莫斯科将能轻而易举地征服中美洲。

如果美国现在不采取行动对付这一威胁，今后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威胁。那些建议对尼加拉瓜实行遏制政策的人实际上是要求我们等待，让我们等到安全问题变得尖锐时才采取行动。这种做法可能破坏美国在全世界的地位。遏制只对公开进攻有效，而对颠覆则不起作用。如果尼加拉瓜成功地在其他中美洲国家点燃共产主义革命之火，我们的反应也是寻求对这些国家进行遏制。或早或迟，我们将听到那些现在呼吁在洪都拉斯边界划线的人提议在墨西哥边界划线，以实施

遏制共产党墨西哥的政策。

这样做将给西方带来战略性的灾难。美国现在之所以能在欧洲部署35万兵力，在朝鲜半岛部署 4 万，唯一的原因是，美国无须捍卫自己的边界。如果尼加拉瓜共产党人巩固了国内政权，向国外输出共产主义，美国将不得不重新部署兵力，从欧洲撤回相当数量的兵力，用以捍卫我们的南翼。应该引起注意的是，马那瓜军事力量的增强已经迫使美国将两千兵力半永久性地驻防在洪都拉斯。

美国不能接受与苏联绑在一起、寻求颠覆邻国的尼加拉瓜政府，而这正是尼加拉瓜现政权想做的。因此，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引导桑地诺政府改变其侵略邻国的政策。

许多人认为，这一地区的国家应该通过实施哥斯达黎加总统奥斯卡·阿里亚斯提出的和平计划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里根总统已经表示接受这一计划，但是美国必须避免重复孔塔多拉和平谈判的失败。尼加拉瓜利用那些谈判赢得了时间，巩固了军事阵地。六年来，双方各谈各的。里根政府和中美洲的民主国家希望达成一项协议，要求桑地诺政府与反政府武装力量就尼加拉瓜的政治前途进行谈判。而桑地诺分子则希望达成一项要求美国及其友国停止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援助的协议。尽管阿里亚斯的和平计划出于良好的愿望，但有陷入同样僵局的危险。

在另一个极端上，有人主张美国应该硬着头皮去做伤脑筋的事，派美国的军队去尼加拉瓜进行干预。如果我们侵入尼加拉瓜，我们毫无疑问是有力量取胜的，而且能速战速胜。对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尼加拉瓜的军队庞大，装备精良。但是，它的官兵大多是被迫征募来的，他们在与反

政府武装力量的战斗中士气低落，连吃败仗，而且尼军与古巴和苏联之间的供应线会被立即切断。与格林纳达的情况不同，美国进行干预将遭受大量伤亡，但不会成为又一个越南，我们会获得胜利。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能否获胜，而在于获胜以后怎么办。无论反政府武装力量可能成为一支多么有效的游击力量，但他们并没有具备执政能力。如果美国进行干预，就应准备长期呆下去。当时同盟国花了六年时间才在西德建起一个政府，美国也花了六年时间才在日本建立起政府。要在尼加拉瓜建立政府，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既然单靠谈判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既然美国长期军事卷入也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办法，阻止桑地诺侵略的唯一办法是将和平谈判与继续支持反政府武装力量结合起来。尼加拉瓜的共产党领导人是狂热分子，在他们的工作日程上有征服这一项。他们竭力要推翻中美洲新生的民主国家。光靠善意是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的。除非美国向桑地诺分子施加某种压力，否则他们不会改变通过颠覆进行侵略的政策。

美国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援助是符合尼加拉瓜人民的利益的。有人支持政府，但大多数人反对。尼加拉瓜各界人士曾参加了反对索摩查的革命，为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政府。然而，结果恰恰相反，他们得到的是一个比索摩查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暴政。桑地诺分子践踏人权，搞选举舞弊，骚扰教堂，查封新闻社，利用国家支持的暴徒来恐吓国内的反对派，用从苏联运来的武器来强化政权。这个共产党政府打破了人民的民主梦想，自然遭到了人民的仇恨。

另一方面，由于尼反政府武装力量施加压力，桑地诺分

子的压迫减轻了。在尼加拉瓜革命后的第一年，美国向尼加拉瓜提供了将近三亿美元的经援，桑地诺分子以最快的速度奠定了极权政府的基础。当美国停止了这种经援，开始向尼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援助时，桑地诺分子放慢了速度。但是，当国会决定中止对尼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援助时，桑地诺分子加紧了镇压行动，以实现对尼加拉瓜人民的完全控制。反对向尼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援助的最轻率的理由是“再也不要第二个越南”。然而，避免第二个越南的办法，正是现在向尼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援助，而不要等以后美国不得不出兵去清除苏联在西半球的基地。

有些人说，尼反政府武装力量没有获胜的希望。他们的意见正确与否，取决于胜利的定义。如果胜利意味着一年内进军马那瓜，那么，他们是正确的。如果胜利意味着迫使桑地诺领导集团谈判解决问题，那他们是错误的。

尼反政府武装力量如能持续不断地获得美国的援助，就有力量开展一场长期的游击消耗战。尼反政府武装力量现已有2万兵力在战场上作战，比当年推翻索摩查时的桑地诺部队强大得多。尼加拉瓜的正规部队约有6万人，拥有苏联的现代化装备，但战绩不佳。而尼反政府武装力量即使在没有获得美国的正式军援时，也能在洪都拉斯的基地击退桑地诺部队的进攻。尼政府军未能阻止尼反政府武装力量将数千名官兵和几吨重的武器弹药运进尼加拉瓜。现在的军事形势是，马那瓜无法阻止尼反政府武装力量开展强大的游击战。

我们如能向尼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足够的援助，桑地诺分子将无法指望苏联来拯救他们。25年前的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已表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绝不会冒与离苏联一万英里远

的美国进行直接对抗的危险。他们不可能派常规部队到这么远的地方来。虽然苏联的核能力比1962年增强了，但它不会为挽救马那瓜的附庸而冒与美国进行核战争的危险。如果到了紧要关头，苏联会撤手不管，让尼加拉瓜政府自己保卫自己。这一情况使美国拥有重要影响力。

我们必须有一项双轨政策。一方面，我们应该使按照阿里亚斯和平计划而进行的谈判有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承诺进行无限期的谈判，这种谈判必须有一最终期限。

阿里亚斯和平计划呼吁中美洲所有国家采取反政府叛乱分子可以参加的民主政府形式，以此来结束内战。我们在该地区的友国——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等——都已经按此条件做了。但是，尼加拉瓜却没有。在尼加拉瓜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这个关键问题上，我们必须确保阿里亚斯总统和其他中美洲国家领导人要求桑地诺分子采取行动。我们还必须坚持要求尼加拉瓜削减其庞大的武装部队，停止从苏联集团大量运进武器。仅仅苏联停止援助还不够，因为古巴和共产党集团的其它国家会继续提供援助。如果在这些问题上谈判失败了，我们必须准备实行双轨政策中的第二种政策，即向马那瓜施加军事压力。

对桑地诺分子的政治活动的动机，我们必须有现实的看法。他们心中有一个目标：解散尼反政府武装力量。有些美国政界人士令人难以置信地天真，他们与桑地诺分子见过面后，就喋喋不休地谈论尼加拉瓜人真诚希望和平。只有当和平意味着共产党政府战胜反共的反对派时，奥尔特加及其助手才想要和平。

阿里亚斯总统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敦促美国立即停止向尼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援助——军援和非军事援助，这是不幸的。这将给尼加拉瓜带来共产党所要的和平，这种和平将意味着反政府武装力量的灭亡、尼加拉瓜人民的贫困，并将意味着出现共产党颠覆侵略新生的中美洲国家的新浪潮。

桑地诺领导人在政治上讲究策略。他们巧妙地制造了尼加拉瓜政治进步的假象，以便诱使美国国会切断向尼加拉瓜自由战士提供资金。他们释放了约一千名政治犯，允许教堂电台恢复广播，允许《新闻报》恢复出版，甚至与反政府武装力量举行间接谈判。但是，桑地诺分子仍然监禁着四千多名政治犯，禁止教堂电台播放新闻，并对新闻进行检查。更重要的是，桑地诺分子在间接谈判中只愿意谈尼反政府武装力量投降的条件，而不愿坐下来制定举行民主选举的程序。

为了对付桑地诺分子的战略，里根政府应该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合法手段使反共力量幸存下来。无论是为了在谈判中向桑地诺分子施加压力，还是为了为谈判失败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都需要保存反共力量。国会中那些想扼杀尼加拉瓜民主事业的人应该记住，在外交事务中，只要立法机构夺取行政机构的权力，就应对其后果负责。政府的赖特式人物[1]已经使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力量处于十分不稳固的地位。如果桑地诺分子牢牢地控制了尼加拉瓜，其后果是，在中美洲到处出现共产党叛乱，整个地区更加不稳定。国会应对此负责。

如果阿里亚斯的和平计划失败了，国会必须恢复向尼反

---

[1] 意指美国政府那一些反对尼政府武装力量的人。——译者

政府武装力量提供军援，援助的规模比迄今为止我们所提供的援助要大得多。但是，我们不应该把保卫我们在中美洲的重要利益的任务完全交给像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力量这样的代理人去完成。我们应该使用自己的力量来孤立尼加拉瓜。我们应该阻止尼加拉瓜从事扩张、压迫的共产党政府继续从苏联和古巴获得武器和供给。桑地诺分子自执政以来一直在中美洲到处放火。美国一方面到处灭火，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却让纵火犯继续获得供给，进一步放火，这是不合逻辑的。

我们必须宣布新的门罗主义。我们应该声明，我们将抵制外国政府或外国控制的拉美国家政府对拉美事务的干预。在军事上孤立尼加拉瓜将是这一政策的一部分。这样做将防止马那瓜颠覆我们在这一地区的朋友，也将使尼反政府武装力量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向桑地诺分子施加最大的压力，使桑地诺分子同意在尼加拉瓜开始真正的民主进程的解决办法，这也是中美洲危机的唯一可行的长久解决办法。

在西南亚，阿富汗战争是美、苏之间的主要冲突。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之后，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曾预言："围绕着石油仓库的战斗已经开始。"他的话是非常正确的。

如果克里姆林宫成功地巩固了它对阿富汗的控制，这将使它处于极好的地位，能够由此威胁我们在该地区的切身利益。莫斯科将能够以阿富汗为基地，破坏巴基斯坦和伊朗的稳定。它还将牢牢地控制通往波斯湾的海上通道，或者波斯湾本身，进而控制石油咽喉。我们必须把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的战争看成是我们与莫斯科竞争中的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而不应该把它看成是发生在遥远地方的一场边缘冲突。

在目前的卷入水平上，苏联只赢得了一个僵局，八年的战争并没有使苏联比在战争开始时更接近最后胜利。因为它的军队未能在战场上消灭阿富汗抵抗力量，所以莫斯科已经在实行消耗战略。它企图通过对平民进行残忍的袭击、来削弱阿富汗人民的抵抗意志。阿富汗的每个村庄都遭受过苏联飞机的袭击。但是，这种恐怖轰炸并没能使阿富汗人民屈服。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事懂得，要巩固对兴都库什山脉顶峰的控制，他们仍面临着艰难的旷日持久的战斗。

因此，克里姆林宫一直在寻求通向胜利的捷径。莫斯科正努力消除外部对抵抗力量的支持，这使巴基斯坦成为战争的关键。来自美国、中国及具有丰富石油资源的中东国家等外国的援助，主要通过巴基斯坦运到阿富汗人民手中。苏联已经向伊斯兰堡施加了强大压力，以迫使它中断援助运输线。1987年，苏联和阿富汗政府出动喷气式战斗机和直升飞机对巴基斯坦进行空袭，炸死了成百名巴基斯坦人。苏联支持的恐怖主义分子在巴基斯坦城市里安装了250多颗炸弹，苏联军队也已经武装了阿巴边境地区的分裂主义部族。

莫斯科一边发动战争，一边高喊和平。它放出了和平倡议烟幕弹，以软化西方的态度，在巴基斯坦国内制造压力，迫使巴基斯坦按照莫斯科的条件签署协议。六年来，联合国发起的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谈判缓慢地朝着结束战争的方向前进。初步协议包括两条关键条款：第一条写明，一旦各方签署了协议，向抵抗力量提供的援助必须立即停止。第二条说，协议签署后，苏联将在一定时间之内撤出它的部队。把军队开进阿富汗只用了两天，面苏联一直要求有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撤军，这样就使莫斯科在军队不得不撤离之前有

时间大量屠杀抵抗力量。

我们在阿富汗必须寻求达到两个目标——苏联撤军和阿富汗人民自决。如果我们达到了第一个目标，而没有达到第二个目标，那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抵抗力量的利益。为了达到我们的目标，美国必须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上进行努力。我们必须援助阿富汗抵抗力量，保护巴基斯坦，与莫斯科进行谈判。

阿富汗抵抗力量能够有效地使用多少军事和财金援助，我们就应该提供多少。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增加援助的数量，提高质量。美国1986年决定提供一种尖端的防空导弹——毒刺导弹，对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六年之前就应该这样做。我们绝不能减轻对苏联的压力，绝不能只微量地增加战争强度。如果我们想诱使苏联达成交易，那么抵抗力量能够有效地使用多少援助，我们就应该提供多少。

我们增加对阿富汗人民的援助符合美国和巴基斯坦的利益，因为提高苏联的战争的军事和政治代价是迫使苏联接受外交解决办法的唯一途径。外交解决办法符合阿富汗人民的利益，因为这是解放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唯一办法。外交解决办法有成功的可能性，因为苏联在谈判桌上的灵活性与战场上战斗的激烈程度有直接关系。在美国向抵抗力量提供了毒刺导弹之后，莫斯科最近表示愿意将撤军时间由六年减为一年，这不是巧合。

我们也必须保护巴基斯坦免受苏联的恫吓。1959年，我们作出了在受到共产党袭击时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的保证。今天，我们必须履行这一诺言。国会一定不能减少对巴基斯

坦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数额，尽管我们对伊斯兰堡正拥有发展核武器的能力感到担心。我们应该同意巴基斯坦购买机载雷达的要求，以使它的空军有能力击落苏联和阿富汗政权用以进行轰炸的喷气式飞机和直升机。我们必须承认，如果我们不能够确保巴基斯坦不受苏联的威胁，我们就不能够确保阿富汗战争得到公正的解决。

虽然齐亚·哈克总统的政府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民主政府，但是它确实符合美国提供援助的四个条件。它允许一些自由，包括新闻自由；它有议会，创造了通过选举程序进行变化的可能性；它有一个能干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上的记录良好；它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有能力维持秩序。如果现在的反对派领导人成功地夺得政权，那对巴基斯坦将意味着一场灾难。

在外交战线上，我们一定不能够允许莫斯科在谈判桌上赢得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阿富汗不是一个像文化交流计划那样的小问题，不应该在首脑会晤中为了缓和气氛而把它放弃掉。它是一场重要冲突，将决定谁在美苏争夺中获胜。

首先，我们必须纠正关于如何处理阿富汗问题的两个错误看法。第一个错误看法是，苏联想得到他们能够得到的任何解决办法。恰恰相反，他们想要通过一种解决办法来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莫斯科的目标是当共产党政府牢固地站稳脚跟之后才撤出。戈尔巴乔夫提出长时间撤军建议，是为了使苏军在撤离之前消灭缺乏弹药和供给的抵抗力量。第二个错误看法是，如果我们向抵抗力量提供足够的援助，阿富汗人民就将能够把苏联从他们的国家赶出去。无论抵抗力量多么勇敢坚强，他们不可能在战争中赢得像同盟国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中赢得的那种胜利。如果莫斯科愿意继续打下去，它能够在军事上获胜。因此，我们在阿富汗抵抗力量的朋友只能够通过政治解决来解放他们的国家。

我们必须把实现公正的解决作为美苏日程上最优先的议程。我们掌握着获得胜利的杠杆。如果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愿意付出代价，莫斯科能够取得胜利，但我们能够提高苏联付出的代价。我们应该打掉关于阿富汗的联合国谈判，而改为在双边会谈中处理这个问题。这种会谈应该解决关键问题：阿富汗人未来的国内和国际政治地位。我们应该承认，苏联在阿富汗有一个——只有一个——合法权益，即阿富汗成为一个不结盟国家。苏联和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权决定阿富汗政治制度的性质。

这是公正解决的基础。在苏军撤离时，组成一个由既不是共产党员又不是抵抗力量成员的阿富汗人组成的、或许由阿富汗前国王为首的过渡政府。苏联撤军之后，可以由选举或全国部族委员会来决定未来政府的体制。这个政府应该事先保证在国际上保持不结盟地位，美国、中国及苏联应该签订一项协议，为这种地位提供保证。

我们一定不能同意给予苏联半年以上撤军时间的协议。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不能中断美国对抵抗力量的援助，直至苏联从阿富汗撤出它的全部军队，尽管我们可以随着苏联军队的减少而减少我们提供的援助。协议应该要求苏联在撤军之后停止援助它的共产党附庸，与此同时美国停止对抵抗力量的援助。然而，如果苏联违反武器禁运，美国必须做出同样的反应。在这些问题上不符合要求的任何政策都将是出卖。

这样的协议将保护战争各方的利益，其中包括苏联的利益。一个自由中立的芬兰对莫斯科并不构成威胁。莫斯科根据1955年与美国签订的条约，从奥地利撤出了战后占领军，承认了奥地利的中立。在阿富汗共产党1978年政变上台之前的60年里，莫斯科一直接受一个不结盟但自由的阿富汗。戈尔巴乔夫今天应该同意恢复阿富汗的不结盟地位。

我们应该在美苏直接谈判中积极地谋求这种解决办法。但是，我们也必须懂得，除非我们保护巴基斯坦免受苏联的威胁，帮助阿富汗人民增加苏联占领付出的代价，否则永远达不成这样的协议。如果戈尔巴乔夫想要减少在阿富汗遭受的损失，如果他接受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把苏军的撤退只当作保持政治控制的烟幕，那么我们就应该成全他。

在整个南部非洲都存在着反政府叛乱，但是安哥拉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一地区本身涉及西方的重要利益。它有西方工业化经济所依赖的大量战略矿藏，像铂、铬、锰和钴等。苏联是一些矿物质的唯一替代来源。除非我们想向克里姆林宫交付垄断价格，否则美国必须寻求减少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利用葡萄牙帝国的衰落，在南部非洲建立了几个共产党国家。在安哥拉，三党政府中的共产党成员破坏了联合政府，通过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的朋友命令35000名古巴军人控制这个国家。从西方利益的观点看，更为糟糕的是这些军队被用来对邻国扎伊尔矿产丰富的沙巴省进行短暂的侵略。只是因为法国和美国联合进行干预，才阻止了古巴获得胜利。

在原来的殖民地独立后，联合政府中被简称为安盟的一方后来拿起了武器，反对罗安达的共产党人。根据1976年的克拉克修正案，国会禁止美国向安盟提供援助，使安盟别无选择，只能转而接受南非的物资援助。安盟得到了安哥拉大多数人的支持，迅速牢固地控制了安哥拉三分之一的国土，只是由于古巴代理军队的保护，才阻止了安盟对首都的围困。1985年，国会废除了克拉克修正案，里根政府重新开始向安哥拉自由战士提供援助。

我们应该继续并增加这种支持。增加古巴军队继续呆在安哥拉需付出的代价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没有其他办法能诱使克里姆林宫将古巴军队撤走。共产党的统治使他们的国家变成了经济废墟。结束共产党的统治符合安哥拉人民的利益。安盟领导人萨文比寻求的不是无条件的投降，而是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他计划实行的不是更加集中的计划，而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更为重要的是，安盟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在过去两年中，在古巴和苏联的指挥下对安盟控制的领土发动的军事进攻惨遭失败，部分原因是南非进行了空袭，但主要是由于安盟有力量。无论如何，莫斯科据信可以在阿富汗无限期地承受损失，而古巴在安哥拉能否长期忍受损失肯定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东南亚，在美国和苏联的竞争中，关键冲突是柬埔寨战争和菲律宾的叛乱。

自从越南入侵柬埔寨以来，美国全国上下一致认为，柬埔寨抵抗力量应该得到我们的帮助，削弱越南占领军的力量符合我们的利益。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柬埔寨是美国的

一个边缘利益。另外，共产党红色高棉的力量占柬埔寨抵抗力量的大部分，因此抵抗力量的胜利有可能使1975年至1978年屠杀了200万柬埔寨人的人重新上台，那不符合柬埔寨人民的利益。我们成功地协助组成一个非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那样我们需要提供大量用以对付越南的供给。可悲的事实是，我们简直没有能力把越南人赶出去。在这一地区，应该打头阵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菲律宾关系美国的重要利益。我们在苏比克的海军基地和在克拉克的空军基地是美国在国外的两个最大的军事设施。它们对于我们保持在太平洋的存在及在印度洋和波斯湾显示武力的能力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在东南亚没有任何其他合适的替代地方。在菲律宾，美国经受不了反美力量的胜利。

当支持科拉松·阿基诺的力量取代马科斯总统的政府时，我们作出了旁观的正确决定。在马科斯开始执政的年月里，他是一位杰出的菲律宾领导人，是美国的可靠盟友。但是，在获得了几年成功之后，他的政府开始失败。虽然他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允许自由，但是他阻碍了通过选举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如果他继续掌权，肯定会导致一场政治爆炸。虽然腐化并不是由他开始的——腐化在菲律宾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司空见惯，但他允许他的亲朋好友和家属没有任何合理限度地发财致富。几乎所有自由国家的经济都在迅速发展，而菲律宾却成了一个经济灾区。在那里，政府支持的垄断企业妨碍了个人的积极性；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人民军的力量迅速发展的时候，他忽视了建设和提高军队能力的必要性。如果马科斯继续执政，形势将逐渐——迅速地——恶化。

在菲律宾，我们也有一个可以替代马科斯的领导人，她

有希望改变这种形势。但是，阿基诺总统能否取得成功仍是一个未知数。革命将引起不稳定，共产党领导的新人民军可以从不稳定中获益。现在还不清楚，菲律宾新领导人是否经得起考验。已经清楚的是，美国不能错误地相信，马科斯的离开解决了我们的一切问题。我们需要帮助菲律宾恢复经济发展。我们必须向菲律宾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协助新政府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以刺激经济发展，协助改组和重新武装菲律宾的武装力量，以使它能够打败共产党。

美国无论何时卷入了用一个领导人取代另一个领导人的进程，就要担负起确保新政府比前一届政府做得更好的责任。我们已经作出帮助菲律宾的保证，但还有待提供阿基诺总统实现目标所需要的物力财力。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关系到南太平洋的未来和美国作为太平洋国家的未来。

我们与莫斯科的竞争绝不能只限于非共产党世界。接受共产党人有权在自由世界与我们竞争而我们没有权力在共产党世界与他们竞争的主张是自寻失败的道路。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政策，使苏联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以在他们的制度中促进和平演变。

除非我们发动攻势——但是是和平攻势，否则我们不能在美苏之间的争斗中获得胜利。我们应该制定在铁幕两边与莫斯科进行和平竞争的战略，不仅在东欧而且在苏联国内同苏联进行和平竞争。我们必须承认，从长远看，和平竞争与保持我们的军事威慑力量对于美苏争斗的结果同等重要。

我们最困难的问题是找到在苏联集团内进行这种竞争的办法。鉴于克里姆林宫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我们肯定是在不

利的情况下进行竞争的。但是，暂时的不利并不能决定竞赛结果。我们虽然没有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与莫斯科进行竞争的完美无缺的办法，但我们一定不能放弃使用有缺陷的办法。苏联在东欧驻扎了31个师，用以防止莫斯科的卫星国脱离轨道。然而，这些国家人民的愿望及我们的制度和理想的优越性使他们受到西方的吸引。

有人认为，东欧国家算是已经失去了。在他们看来，雅尔塔的出卖无论多么令人遗憾，莫斯科对这些国家的征服是不可改变的现实。他们说，军事演变太危险，而和平演变不可能。他们在第一点上是正确的，然而在第二点上是错误的。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务，即使是站稳脚跟的共产党政府，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演变力量的影响。今天的东欧与1950年的东欧相比有根本区别，1999年的东欧将与今天的东欧有根本区别。我们采取的行动将影响那里发生的变化。如果我们接受那些主张放弃东欧的人的观点，那么促使要实现积极变化的力量取得胜利将更加困难。我们不能够决定在东欧发生什么事情，但我们能够影响那里的事态。如果我们在东欧与莫斯科竞争中采取负责任的政策，我们就能够帮助积极变化进程的形成和加速发展。

苏联的控制尽管是紧的，但却是不完全的。苏联和东欧国家不是铁板一块。这些国家的人民完全拒绝苏联的控制，即使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也没有共同利益。苏联的军事力量确实严重地限制了东欧领导人在国内和国际上独立行动的范围。但是在苏联与它的附庸国之间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出现——个人、政治、民族、甚至意识形态分歧。

我们必须把政策建立在深刻地理解东欧三股重要政治力量的动机的基础之上：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东欧人民，及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

莫斯科领导人是想要控制东欧的残酷无情的帝国主义者。东欧是他们帝国的一部分，他们不想放弃。帝国主义的扩张欲望在克里姆林宫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正像自由欲望在我们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一样。苏联用“社会主义国家兄弟阵营”的说法来掩盖它们实行的帝国主义控制，那只不过是粉饰门面。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向勃列日涅夫提出，在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继续留在华沙条约组织的同时，捷克实行改革，使他的国家自由化。苏联领导人丢掉了伪装。“不要对我讲什么‘社会主义’，”勃列日涅夫对杜布切克说，“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决不放弃。”

但是，与此同时，苏联不可能完全控制每个东欧国家政府政策的每一个细节。他们拥有极大的权力，能够决定谁在卫星国中掌权。通过使用这种权力，他们能够决定这些国家的基本政治和经济政策。但是，他们对于政策的细节的控制就小得多。莫斯科不会因为小事情而罢免它的附庸的官，因为它希望保持稳定。除非他们愿意清洗主要东欧共产党领导人，或者使用军事力量进行干预，否则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常常不得不容忍他们的附庸的决定，即使他们对此并不赞成。

东欧国家的政府是苏联的盟友，而东欧人民是我们的盟友。遭受苏联压迫的人比任何人都更懂得有必要阻止苏联的扩张。许多分析家把今天的反共自由战士的出现作为史无前例的事态发展大加赞扬，其实情况并非如此。我们肯定记得，

东欧人民并不是平静地进入极权之夜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反对把共产主义强加给他们的国家，因而被杀害。此后，又有几万人在为解放他们的国土而进行的斗争中献身。

今天，很少有人记得，苏联军队1956年入侵匈牙利、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遇到的反抗。我们常常读到关于苏联的坦克是如何开进这些国家的文章，好像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看到坦克就转过身去。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我们要理解今天的东欧，我们必须记住，东欧对于苏联军队的抵抗与阿富汗人今天对苏联军队的抵抗一样给人以深刻印象。

莫斯科1956年入侵匈牙利后不久，我来到奥地利与匈牙利的边界。华约出动了20万军队经过三个星期的战斗才将人民的起义镇压下去。苏联军队打死了2.5万匈牙利人，打伤了15万，监禁了2万，他们中许多人后来被处死。20万难民逃到奥地利。匈牙利军队的大多数军人叛逃到抵抗力量一边。但是，在这场斗争中，武器装备相差悬殊。匈牙利人用步枪、手榴弹和莫洛托夫燃烧瓶与苏联的T—54坦克作战。布达佩斯的许多地方遭受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严重的破坏。在电视上接受记者采访时，我把赫鲁晓夫称为“布达佩斯的刽子手”。这个称号恰如其分，因而被沿用下来。

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50万军队用了几周时间才恢复了苏联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抵抗力量虽然手无寸铁，但使苏联军队瘫痪了几周。人们成群地坐在坦克前面，一些勇敢的人把罐头盒扔进炮筒里。人们云集在中央电台、电视台周围，阻止入侵者占领这些地方。平民开展有组织的消极抵抗运动。

人们彻底地抵制军队，因而使苏联人的士气一落千丈。人民几乎一致响应抵抗力量发出的“不给占领者一滴水”的号召，苏联军队因严重缺水而处于困境。

代表东欧基本政治现实的是这些国家人民的起义，而不是在华沙条约会议上用香槟酒祝酒。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东德人、罗马尼亚人及保加利亚人是坚强的人民。他们是我们在美苏竞争中的盟友，我们的和平演变战略必须依靠他们的力量。

东欧共产党领导人被两个因素拉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这两个因素是：他们希望在自己人民眼中具有合法性，又希望依靠苏联继续执政。这些政府是不合法的，它们是靠苏联武力强加给这些国家的，是靠苏联武器来维持的。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人——即使是政府成员——会对这一事实提出异议。因此，东欧共产党领导人非常希望被视为合法统治者。这是我见到过的每一个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一心想要实现的目标。

匈牙利当时的斯大林式的总理赫格居什·安德拉什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匈牙利起义事件时，以明确清楚的语言表明了严重的不安全感。他写道：“我……站起来，从窗口往外看去，我可以看到，游行队伍的头已经到了玛格里特大桥（在通往政府大楼的道路上）。那是令人胆颤心惊的情景。即使我没有看到它们的到来，我当时应该意识到，它们正在发展成为反对中央领导、反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老领导人的政策的全国抵抗力量。我看得一清二楚，情况就是这样，人民起来了。”

东欧共产党领导人面临着一个左右为难的选择。合法性只能来源于更大的国家独立性或更好的经济发展。获得独立

需要实行使自己的国家与苏联拉开距离的政策，经济发展要求进行摆脱苏联模式的改革。这两个做法都会使苏联领导人感到不快——而东欧统治者能否掌权是由苏联随意决定的。这种根本性困难产生了不同类型的东欧共产党领导人。有些人，像赫格居什，把自己与苏联紧紧地拴在一起。大多数人在不割断他们通往莫斯科的生命线、不招致苏联入侵的情况下创造独立的余地。有些人，像杜布切克，真诚地希望从内部改变制度。

今天，在东欧实现积极的和平演变的条件已经成熟。1983年，我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及捷克旅行，见到了几位东欧集团领导人和几百名普通平民。我得到了一个清楚强烈的信息：空想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动力已经死亡。普通人在生活中闷闷不乐的样子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与东欧领导人的谈话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承认，他们国家的利益与苏联的利益是根本不相容的，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不适用于东欧。

苏联模式的经济计划甚至没有能够向东欧人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与它们的西欧邻国形成鲜明对照，这些国家实际上进入了经济下降的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它们的经济年增长率不到1%，而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因而人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下降了。东欧国家面临着严峻而又无法改变的事实：僵死的政府计划不能够创造有生气的经济。东欧国家必须实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不进行这种改革，它们将陷入经济滞胀的流沙中。试图混过去，只能使自己越陷越深。

东欧共产党人完全失去了信念。他们大多数是野心家和官僚，已经丧失共产党的意志和信心。他们中的许多领导人

想要脱离苏联经济模式，改善本国与西方的关系，以便为在国内进行改革创造可能性。新的一代东欧人不是空想家，而是务实主义者——务实主义为和平演变创造了开端。

现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情况尤其如此。他呼吁东方集团国家之间在经济上进行更多的协调，停止苏联在诸如石油等一些出口商品上的补贴，使东欧领导人对苏联更加疏远。但是，他的“公开化”政策将减少而不是增加他对东欧的控制。他呼吁在公众批评上更加公开，这必然将导致东欧国家和共产党内部出现要求与莫斯科拉开更大距离的压力。戈尔巴乔夫可能想把“公开化”运动作为公众不满情绪的安全阀和与他的政治敌手进行斗争的武器。他可能无意让人们照字义理解他的话，但东欧人会这样理解的。

如果苏联及其附庸犹豫不决地面对他们面临的挑战，它们可能会暂时取得一些有限的进展，但是将不能动员东欧人民支持他们的政府。这将产生要求更大变化的更大压力。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帝国主义建筑的金属板一直靠在东欧民族主义的金属板上。这种力量在过去已经产生了震动，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沿着裂痕将逐渐形成前所未有的压力。不进行真正的改革，东欧在1999年以前将不可避免地发生政治地震。

戈尔巴乔夫已经宣布愿意允许东欧卫星国独立地进行国内改革。但是，他也表明，有两条限制必须遵守：共产主义制度必须保持原封不动；苏联必须拥有不可争辩的最后控制。他未能认识到，东欧的经济滞胀不只是实行极端愚蠢的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结果，也是苏联帝国主义实行高压政策的结果。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北方自由人的人均产值远远超过

南方奴隶的产值。压迫，包括对个人和民族的压迫，滋生社会和经济滞胀。东欧人民真正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之前，这种惰性是不打不破的。

我们面临着制定一项战略的挑战，以增加从这些固有的压力中产生积极和平变化的可能性。我们首先必须澄清我们不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我们决不能把在东欧制造反对并公开与苏联敌对的同盟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政策也不应该是通过支持这些国家境内的自由战士在这些国家制造动乱。鉴于苏联在这一地区拥有的绝对军事优势，那样做只不过是把自由战士送去残遭杀戮。

我们的长期目标应该是制造在国内实行社会开放、对苏联不构成威胁的独立国家。在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的目标是使东欧国家芬兰化。我们的政策应该是鼓励东欧人民努力争取逐渐增加自由；为他们的政府创造赐予自由的刺激，及努力争取逐渐增加对苏联的独立性。不可能一个东欧国家人民每次扩大自由交流的范围，或东欧国家政府每次允许市场力量增加对经济价格的影响力，莫斯科就入侵一个东欧国家。我们需要帮助创造一个积累微小收益的进程。这看起来可能令人气馁，甚至徒劳无益。但这是这些国家实现一定的民族独立的唯一途径。

美国如何促进这种进程呢？实现和平演变的先决条件是军事威慑。使苏联不被视为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一旦西方表明不会屈服于恐吓，东方人民就将更加积极地坚持自己的权利。如果西方不能够集聚足够大的军事威慑力量来对付苏联的威胁，我们就不可能期待东欧人民抗拒克里姆林宫。

除了威慑，我们在东欧实现和平变化的战略必须有四个因素。第一，我们必须寻求缓和美苏关系。许多西方反共分子咒骂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担任总统时实行的缓和政策，而东方的反共分子全心全意地支持这种政策。国际紧张局势强化独裁政权，紧张局势的缓和削弱独裁政权。没有人会否认，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的缓和政策大大有助于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产生。

缓和政策最强烈（虽然是最负责任的）批评者之一理查德·派普斯在他撰写的关于这种政策对苏联制度的影响的文章中也承认这一点。他写道，缓和“无疑加速了苏联社会开始抵制控制的进程”。他补充写道，对于苏联来说，“宣布冷战已经结束——即使令人作呕地重申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必须继续进行到底——就意味着对苏联压制政权是否有必要存在提出疑问”。如果缓和在苏联产生了这种影响，那么它对东欧产生的影响将大十倍。

紧张局势的缓和破坏了共产党政府的理论，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需要做许多说服工作。他们必须解释他们为什么依附于莫斯科，为什么压制政治和学术自由，为什么未能克服经济落后状况，为什么允许基于政治地位的社会特权。他们以假定的来自西方的威胁来为这一切辩护，美苏关系的改善使这种理论站不住脚，使共产党统治作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无情地推动共产党人通过实行改革或获得更大的民族独立性来寻求合法化。

第二，我们必须寻求最大限度地增加西方与东欧人民的往来。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有利于往来的增加。但是，我们必须积极促进这种往来。我们应该增加与东欧的贸

易和文化交流项目，必须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对这一地区的外语电台广播。我们与东方的来往越多，我们向东方显示西方榜样的力量的机会就越多。西方榜样的力量是即使共产党上层人物也难以抵抗的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面临着苏联提不出解决办法的大问题。譬如，在1999年之前的年月里，东欧将遇到严重的生态危机。西方20年来努力解决工业污染问题，而苏联集团国家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美国研究环境污染问题的专家在20世纪60年代预报的恶梦很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在东欧变成现实。莫斯科受到自身生态问题的困扰，在这一领域没有什么可向东欧提供的，而我们西方有东西可以向东欧提供——而且我们应该采取主动，因为通过我们的行动，我们可以显著地改善东欧人民的生活。

第三，我们必须寻求削减美国和苏联在欧洲的常规武器。苏联在东欧的军事力量越少，它对东欧的控制就越小。莫斯科在罗马尼亚没有军队，罗马尼亚不给予莫斯科在和平时期在那里驻扎任何军队的权利，这使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能够在国际问题上持不同于苏联的立场。没有人能够宣称他的国内政策不具有极大的压制性；但没有人能否认他在外交政策上已经赢得了一定程度的民族独立。因此，我们必须把削减常规武器作为军备控制的主要问题。

第四，我们必须寻求与希望实行真正改革的东欧共产党领导人进行合作。有人争论说，共产党人就是共产党人，所有东欧领导人都不在合作之列。按照这种观点，美国应该与这些政权断绝一切联系。这是我们可能犯的最严重的错误。

我们应该始终记住，对苏联控制东欧的最大挑战将在卫星国共产党内出现。1948年，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元帅率领南斯拉夫脱离苏联集团。1956年，伊姆雷·纳吉领导了匈牙利叛乱。1956年，哥穆尔卡在波兰农业集体化这一关键问题上挫败了赫鲁晓夫。1961年，恩维尔·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与苏联分裂。20世纪60年代，齐奥塞斯库使罗马尼亚在一些国际问题上与苏联路线拉开了距离。1968年，杜布切克发起了"布拉格之春"。1979年，爱德华·盖莱克政权同意与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谈判，并达成协议。20世纪80年代，亚诺什·卡达尔使匈牙利经济逐渐实现了自由化。

这并不意味着东欧共产党领导人是几乎等不及召开市政会议的纸上谈兵的托马斯·杰斐逊主义派民主党人。但是，这确实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无视苏联共产党人与东欧共产党人之间发生固有冲突的可能性。关键是区别对真正的改革感兴趣或不感兴趣这两种领导人。我们应该根据他们的言行来确定对他们的政策。如果一个东欧政府采取更加自由的政策，或者与莫斯科疏远，我们就应该以与西方更好的经济关系来鼓励这个政府的领导人，他们的国家迫切需要与西方有较好的关系。

匈牙利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卡达尔总书记已经使他的国家的经济广泛地实现了自由化，而他是赫鲁晓夫在苏联1956年入侵之后任命的。他没有创造奇迹，但实现了积极的变化。我在1963年所看到的布达佩斯只能被形容为昏暗阴森，死气沉沉。我1983年再次来到布达佩斯时，这里阳光明媚，生气勃勃——这足以证明一点自由能够产生多大效果。卡达尔允许西方电视和电台节目不受干扰地向他的国家广播，现在在

布达佩斯甚至能够买到一些西方报纸。这些改革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匈牙利人民的生活——而且为未来的政府在务实的基础上实行更多的改革奠定了基础。我们必须对这种积极变化表示欢迎，因为它们的成功与我们利害攸关。我们绝不该采取从一开始就孕育着失败的政策——如孤立整个东欧集团的政策。

我们在东欧进行和平竞赛的战略必须建立在务实主义的基础之上。那不是一个成败在此一举的冒险。我们必须像列宁那样，愿意采取“走两步、退一步”的战略。一些东欧国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每一股改革潮流都巩固了前一次改革的成果，并为以后更多的改革开辟了道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波兰，一个大问题是克里姆林宫是否能够强迫它在华约的附庸实行农业集体化，波兰对莫斯科进行了抵制。今天，它在连续成功地实现和平变化之后，土地所有权问题不再是辩论的题目。“团结工会运动”将自由的界限扩大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尽管实行了军事管制法，波兰政府仍未能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华沙不得不接受几千种独立报刊的存在。团结工会领导人仍然很活跃，波兰政府甚至不得不适应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存在的事实。斯大林一定正在坟墓中捻胡须。

推动这种和平变化，是我们与莫斯科在东欧进行竞争的办法。如何保持对这些国家的控制，这是克里姆林宫面临的永久问题。自由是经过努力获得的爱好。和俄国人不同，东欧人过去已品尝过自由的味道——并且他们现在仍喜欢自由。和平变化能够使东欧国家在获得真正的独立和内部自由上走多远，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定不能因没有做能做的推动工作，而使这一问题成为未解决的问题。

我们也应该把这种和平竞争扩大到苏联本身。对于许多美国人，这听起来似乎是一种敌对行动。然而，它不是。苏联的评论家现在定期在美国的新闻广播上露面，兜售苏联在国际问题上的路线。美国也必须向苏联播放新闻和信息。根据国际法，我们完全有权这样做。我们应该使用这种权力。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之战中采取单方面自我限制的政策，那将等于放弃我们在美苏竞争中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鼓励苏联下放权力。这肯定是一个长期目标——但是是可以达到的目标。虽然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监禁了成千上万名政治犯，但是斯大林的群众恐怖时代已经结束。没有恐怖，莫斯科简直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实行完全的控制。这将使制度松散，为个人和团体脱离中央政府的法令创造机会。我们对苏联的广播应该推动苏联人民争取逐渐摆脱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控制。

有人说，在像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中，进行这种改革是不可能的。他们错了。虽然变化的速度极其缓慢，但确实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寻求对变化的方向施加影响。

“自由之声”电台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我们的广播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上。莫斯科统治着地球上最后一个多民族帝国。俄罗斯族人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另外一半包括乌克兰族、乌兹别克族、白俄罗斯族、哈萨克族、鞑靼族、阿塞拜疆族、亚美尼亚族、吉尔吉斯族、摩尔达维亚族、塔吉克族、立陶宛族、土库曼族、格鲁吉亚族及其他十几个民族。苏联有100多个相互各异的民族。我们应该用它们自己民族的语言向这些民族的人民进行广播，向他们提供俄罗斯人占统治地位的政府拒绝播放的关

于他们自己地区和历史的消息。

几乎所有的非俄罗斯民族都认为苏联政府是由俄罗斯人控制、为俄罗斯人服务的政府。这些民族的人民知道，俄罗斯人只允许其他民族的代表在中央政府中象征性地占据一些最高级职位。他们仍然没有忘记，俄罗斯族军队征服了他们的土地，俄罗斯殖民主义者迅速移居到那里，俄罗斯少数民族现在霸占着省级政府和经济部门的关键职位。对于呼吁苏联下放权力的信息，他们将会是非常愿意接受的听众。如果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满足这些民族人民的要求上，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和平。

美国人常常忘记，人们对于历史上非正义的记忆可能是非常强烈和持久的。他们错误地认为，并入苏联的非俄罗斯民族的人民已经融化在俄罗斯民族人民之间，就像移民到了美国那样。但是，以乌克兰族为例，5500万乌克兰族人从未忘记，他们是世界上没有国家的最大民族。他们也没有忘记，在农业集体化和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清洗中，克里姆林宫杀死了800多万乌克兰人。他们没有忘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的民族遭受的压迫如此严重，以致当希特勒的德国占领这一地区时，由四万游击队员组成的乌克兰抵抗部队既与苏联人打仗，又与纳粹打仗。我们可以肯定，乌克兰人民族自决的愿望不会很快减弱。

在苏联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在这方面的情况相同。他们没有忘记，斯大林20世纪30年代为了巩固苏维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残忍地停止对中亚地区提供粮食，致使150多万人饿死。他们知道，俄罗斯殖民主义者控制着他们的地方政府。他们知道，克里姆林宫决定把经济复兴项目集中在苏联的欧洲地

区，这决定了他们的家乡将遭受经济滞胀，他们的人民将遭受贫困。他们知道，未来的世世代代为了寻求工作，不得不移居他乡，或者面临失业。

这些历史记忆和目前的政治现实使中亚地区人民成为争取和平变化的潜在力量。他们认为共产主义是外来的、压制性的意识形态，他们容易受世界范围的伊斯兰复兴的影响。他们知道，苏联军队正对阿富汗人民进行种族灭绝性屠杀——中亚人与阿富汗人在民族、文化及宗教等方面的共同点远远多于与克里姆林宫统治者的共同点。苏联虽然靠武力暂时征服了这些民族的人民，但是民族主义是20世纪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它在苏联并没有死亡。戈尔巴乔夫以俄罗斯人替换了哈萨克族省级领导人之后，发生了有成千上万人参加的暴乱。暴乱席卷整个阿拉木图城，持续了好几天。甚至苏联官员也承认，这是“民族主义的表现”。人口达5500万的中亚地区人民——人口增长率远远超过俄罗斯人——在1999年之后的年月里将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美国人只有一次可以勉强地与非俄罗斯民族的历史遭遇相提并论的历史遭遇：南北战争和重建运动。在南北战争中，有几十万人丧生，这与在苏联压迫下有几百万人死亡的事实几乎是不可类比的。然而，南北战争确实在美国制造了长期的地区分裂。一百多年过去了，南方才重新参与到美国的国家生活中去。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的记忆和偏见至今仍然存在。从莫斯科的共产党领导人征服非俄罗斯民族至今还不到一个世纪，那些民族仇恨仍然非常强烈。如果任何人不相信这一点，那他是在墓地里边走边吹口哨。

我们在苏联国内进行和平竞争的唯一途径是外语广播和

文化交流项目。我们的广播不应该煽动叛乱或其他暴乱，但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民族主义上，应该鼓励这些民族的人民争取获得民族权利。在苏联制度之内，围绕着资源和边远省份的关键政治职位，俄罗斯人与非俄罗斯人不断发生官僚政治战争。如果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越来越重视非俄罗斯民族，在这种斗争中作出让步，那么发生积极变化的大门就打开了。

我们进行和平竞争的战略也必须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政策。许多西方人一直在搓手，对这种新态度感到担心。东方人有这种担心是合情合理的。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俄国害怕我们的敌对，但更害怕我们的友谊"。他懂得，对苏联制度的最大威胁是，他们的思想与我们的思想进行交流，他们的人民与我们的人民进行交流，他们的社会与我们的社会进行交流。这种交流会引起不受欢迎的对比，打破克里姆林宫对信息的垄断，播下有一天会开出和平演变之花的思想种子。

我们必须采取最大限度地增加这种交流的政策。当戈尔巴乔夫呼吁更加开放时，我们应该相信他说的话。西方领导人在苏联电视电台上露面，向苏联听众发表讲话时，不应该对苏联的国内和国际政策闪烁其词。我们必须成倍地增加对苏联的电台广播，同时在广播中使用新技术。我们应该把能够向整个苏联播放电视节目的卫星送入轨道作为1999年之前要达到的目标。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全球竞争的挑战。30年来，莫斯科与美国进行全面竞争。现在是美国和西方接受挑战，采取与莫斯科竞争的全面战略的时候了。我们必须保持在世界各地保护我们的切身利益所必需的力量，必

须发展对苏联对我们较为边缘的利益进行挑战作出有节制的反应的能力，必须在苏联集团之内和苏联国内与克里姆林宫进行竞争。在1999年之前的岁月里，我们必须对莫斯科进行威慑，学会与莫斯科进行竞争。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两点，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我们将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第　五　章

如何与莫斯科谈判

如果我们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进行威慑，我们就可以与他们进行谈判；如果我们与他们进行有效的竞争，他们就将愿意进行谈判。威慑、竞争及谈判，这些因素在我们为实现真正和平而制定的全面战略中具有同等重要性。然而，它们之间有区别。我们可以无须借助谈判而成功地对莫斯科进行威慑，并与之竞争；然而，如果没有有效的威慑和竞争的政策，我们就不可能成功地进行谈判。

与苏联进行谈判时，我们必须牢记三点。第一，只有在我们采取一切必要行动阻止苏联侵略之后，我们才可能通过谈判达成稳定战略平衡的协议。军备控制不能代替威慑，但能起补充作用。第二，只有当我们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在全世界保护美国的利益之后，我们才可能通过谈判达成稳定地区冲突的谅解。除非我们挺身而出捍卫西方的利益，否则就不能使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与我们一起坐到谈判桌上来。第三，超级大国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并不能结束美、苏冲突。谈判可能带来有限的合作，但有限的合作并不意味着竞争的结束。

但这并不意味着谈判不重要。谈判可以减少超级大国之

间发生核战争的危险，可以对数百万人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莫斯科一枪未发就赢得了东欧。斯大林的胜利是从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的会议桌上赢得的，而不是从中欧战场上获得的。因此，在1999年以前，我们需要有能力同莫斯科进行卓有成效的谈判。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懂得为什么要进行谈判，应该谈什么，如何进行谈判，以及在美苏首脑一级进行谈判时应该如何谈。

在我们是否应该与莫斯科进行谈判的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一些人认为，与克里姆林宫进行任何谈判，轻则无益，重则危险。他们正确地指出，我们的谈判目标与莫斯科的谈判目标截然不同。他们引用斯大林的一句名言："一个外交官的言语必须与行动毫不相关，否则，搞什么外交呢？"苏联领导人利用谈判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而我们常常只是利用谈判实现没有胜利的和平。对他们来说，谈判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对我们来说，谈判本身往往就是目的。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谈判进程本身对苏联有利。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可以完全无视苏联人民的意见，而人们对改善东、西方关系的希望和期冀对西方领导人形成强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为达成协议而单方面作出让步。他们还指出，苏联领导人像恶魔般狡猾，口是心非，不可信任。他们无情地利用了西方的和平愿望，无情地利用了条约中模棱两可的语言，一再违背协议，为自己谋取私利。

他们的这些意见有正确的成份。但是，必须拒绝他们把与莫斯科谈判越少越好作为美国的基本政策，这有五个方面

的原因。

首先，如果具有毁灭对方及世界其它地区能力的两个超级大国不去探索减少核战争危险的一切可能的途径，那它们是不负责任的。对话产生不了和平，但它确实能使双方相互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因而减少因错误估计而导致战争的危险。不进行接触，双方都将无限制地扩充军备，激烈地相互攻击，这就把美苏关系置于一点就着的半战争状态。我们之间的利益就将不可避免地在像中东这样的世界火药桶中发生磨擦，可能迸发出火花，点燃核战争。

其次，不主动倡议谈判，政治上将难以坚持威慑和竞争所必需的政策。如果苏联领导人要美国总统坐下来谈判，而美国总统在外交上仍然保持敌对姿态，那么他的政策将难以被美国人民理解。他们并不期望美苏关系出现突破，但是他们确实希望他们的领导人竭尽全力减少核世界的危险。因此，反对谈判的总统的政策在国会必然成为釜底游鱼。

第三，没有一项进行积极谈判的政策，不可能使北约盟国保持团结。盟国是出于害怕而结盟的。40年来，苏联扩张主义的威胁一直是维持北约团结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尽管克里姆林宫现在的军事力量比北约初建时要强大得多，但今天的欧洲对核战争的恐惧超过了对苏联侵略的害怕。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开展的出色的公共关系“和平”攻势以及里根总统在其第一任期内发表的有关苏联的敌对言论。这使得除法国人以外的大多数欧洲人相信，戈尔巴乔夫比里根更致力于和平。

因此，我们必须用道理，而不仅仅利用人们的恐惧感来维持盟国的团结。要不是当时同时进行了旨在削减欧洲的中

程核力量的谈判，我们决不可能在1983年开始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我们的政策要求我们必须使西欧人民看到，存在着苏联侵略和核战争的双重威胁，并使他们相信，美国和盟国已经实行了慎重一致的政策来对付这两个威胁。要达到这一目的，美苏谈判是不可缺少的。要使欧洲人民和美国人民继续支持保持威慑所需要的军事力量，而威慑是稳定赖以存在的基础，使人们对和平抱有希望是必要的。从长远来看，丧失了对和平的希望将助长绥靖力量的发展。

第四，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简单的事实：即使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具有治国本领也十分重要。谈判可以产生积极影响。正是美苏谈判导致了1955年奥地利和约的签订，使苏联占领军从包括维也纳在内的半个奥地利撤出。反对与共产党进行谈判的人反对与共产党中国进行任何接触。但是，一个强大独立的、与西方有良好关系的中国，而不是一个与苏联绑在一起的、贫穷软弱的中国，将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安全。

第五，东、西方紧张关系的缓和在东方比在西方造成更严重的分裂。因为莫斯科以必须面对东、西方冲突为由严格控制其它东方集团成员以及苏联人民。因此，实行积极进行谈判的政策，将破坏这种理论，使克里姆林宫越来越难以使压制合法化。反过来，这又将开始一个卫星国逐渐增加活动余地的微妙进程。如果重开冷战，造成国际局势高度紧张，就不可能发生积极的和平变化。冲突强化独裁，而接触和谈判可以削弱独裁。

另一种观点是，有人认为，美国和苏联可以通过谈判和签署协议来消除相互间的误解和猜疑，实现和平。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消除一种错误的想法，即：苏联和美

因是因为存在很深的误解而产生分歧，只要进行大妥协，这些分歧就能克服。我们并不是因为有误解才产生分歧的；相反，是因为存在分歧，我们才发生误解。美苏冲突的根子在于两个超级大国在意识形态、利益及意图上存在着深刻的差异。我们必须懂得，谈判永远不会产生永久的、完美无缺的和平。

戈尔巴乔夫懂得这一点，问题是美国人是否懂得这一点。有两种和平：现实的和平，这意味着有冲突但没有战争；完美的和平，这意味着一个没有冲突的世界。戈尔巴乔夫寻求的只是第一种和平。而西方领导人则常常对第二种和平过分热情。戈尔巴乔夫是个列宁主义者，他认为，只要世界上存在非共产党国家，就不可能有完美的和平。在我与他的会晤中，他直接了当地承认，双方存在的分歧太深，很可能永远也消除不了。他决定放弃公开的军事侵略，这一决定并不是受多愁善感的情感所驱使，而是因为他冷静地意识到，目前的均势或用他的话说“力量的相互关系”不利于公开进行军事侵略的政策。他参加谈判，不是为了开辟完美无缺的和平新时代（他认为这是幻想），而是为了改善苏联在世界上的军事和政治地位。

这种态度在军控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如果苏联在数量上落后，它就要求平衡；如果领先，它则要求均衡削减，改善其相对地位。一旦美国准备利用技术优势，例如战略防御计划，苏联就要求禁止这类发展。如果美国准备使一些武器体系现代化，苏联就提出实际上阻止部署这类武器或把部署降到最低限度的条件。与此同时，苏联部署新式武器是不可谈判的，或者根据苏联的协议条件是允许的。因此，苏联甚至不承认有诸如战略防御武器等新技术研究计划。

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拒绝就军控问题进行谈判；而是说，我们应该只签署符合我们战略利益的协议。军备控制是可以发挥作用的。没有军备控制，美、苏核弹头的数量将继续成倍增长。没有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尽管它有缺陷，苏联可能已经发展了可以导致更加不稳定的武器系统。没有军备控制，就会出现苏联在军备竞赛中全速前进而美国则缓慢爬行的危险。鉴于我们拥有的经济实力，在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中，我们能够获胜，只要我们跑步前进。由于民主国家的国防预算难以预测，我们能否跑步竞赛始终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谈判时，如果我们谋求不现实的完美的和平，而莫斯科则谋求实际好处，那么我们将成为历史上最好的地缘政治活动家们容易击中的目标。

在与莫斯科谈判时，我们必须在这两种观点中采取中间道路。我们需要谈判，但是对谈判可能取得的结果的限度必须有现实态度。我们必须坚定地承认，美苏冲突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状态，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我们的态度。问题可以加以解决，而状态只能对待。苏联不改变其侵略本性，我们与莫斯科的斗争就不会改变。即使苏联真的改变其侵略本性，那也将是几代人以后的事。我们不能欺骗自己，以为美国的总统可以靠个人的魅力，或在谈判桌上向对方偷偷地塞进更有吸引力的谈判意见，就能改变克里姆林宫的本性。如果说我从政40多年学到一点经验教训的话，那就是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谈判跟与乔治·米尼[1]进行谈判大不相

---

① 乔治·米尼——美国劳工领袖。从1955年起到1979年退休，他一直担任劳联-产联主席，终身为民主党人。——译者

同。

我们不能靠谈判结束美苏冲突，但是我们一定不能低估谈判在我们与莫斯科的竞争及减少竞争引起战争的危险性方面的潜在重要性。苏联领导人把谈判看成是与美国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策略。美国领导人往往喜欢把超级大国之间达成协议看成是在争取完美和平方面取得了进展。在谈判中，我们往往只求达成协议；而他们则寻求达成符合他们的更大的战略目标的协议。通常说来，我们不应该把克里姆林宫的治国方法当作我们可以仿效的行动模式。但是，我们必须在未来的岁月里学会苏联那种将谈判与总体战略结合起来的本领。

我们首先必须确定应该谈判的问题及应该达到的目标。美苏问题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两国利益相冲突因而谈判无法解决的问题。就这类问题而言，唯一现实的谈判目标是减少因分歧而引起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第二类是我们两国的利益并行不悖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谈判达成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协议是可能的。

在第一类问题中，军备控制和政治冲突，例如中东、波斯湾、阿富汗、中美洲等可能导致使用武力的政治冲突，是关键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苏联的目标是争夺军事优势和实现地缘政治扩张；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军事稳定和这些地区人民的政治自决。两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妥协的余地。我们之间的分歧简直是不可调和的。无论是否进行谈判，苏联都会以其特有的无情谋求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也必须如法炮制。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绝不应该寻求通过谈判取得永久性的解决，这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是应该寻求限制双方为实现相互冲突的目标所采用的手段。我们绝不可能通过谈判达成一劳永逸的军备控制协议，也绝不可能成功地消除地球表面的核武器。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坚韧不拔、巧妙娴熟的外交努力达成一项有助于稳定战略均势的军备协议，这样的协议将使双方都不易遭受第一次打击。我们永远也不可能通过谈判来一劳永逸地解决世界上的冲突爆发点。然而，我们可以就竞争的规则达成共同谅解，以便根据规则进行长期竞争，而不诉诸核战争。

人权也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我们寻求推动苏联尊重人权，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决不会自愿赐予人民以自由，因为那样做的结果将是反对乃至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共产党政权会同意自杀。在新闻检查的大坝上出现一个漏洞，就会爆发对党和国家进行指责的洪水。如果在禁止移民的大门上出现一条裂缝，那么就会出现到海外去寻求更好生活的人流。因此，在谈判中，我们不可能要求苏联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尊重《人权法案》[1]中规定的一切自由权，这是不现实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该放弃努力。在秘密谈判时，我们应该压苏联人允许更多的移民出国，释放特指的持不同政见者，让更多的西方消息传入苏联，以履行赫尔辛基条约签约国所应承担的义务。我们不能期望实现我们所有的愿望。但是，我们得到的东西，对于受压迫的苏联人民来说，意义重大。

在第二大类问题中，增加商业往来。控制核扩散、减少

① 《人权法案》：美国宪法的第一个修正案，1789年通过。——译者

偶发战争的危险、探讨解决海上事件的方式、开展环保合作等问题都是重要问题。还有一些不那么重要但有意义的问题，例如：扩大文化交流。在这些问题上，美苏两国可以达成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协议。

甚至在与恐怖主义作斗争方面，我们也能够进行合作。尽管在过去的20多年中，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一直积极支持恐怖主义组织，但是，莫斯科自己成为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时候可能很快就要到了，而且技术的迅速发展可能会使苏联不得不进行合作。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技术上追求小型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不仅国家甚至个人都可能在哪一天迈进核门槛。一架没有武装的赛斯纳飞机能够在克里姆林宫门前降落，这一事实值得任何国家冷静思考。

低估美国与苏联之间扩大合作的可能性是错误的，但是高估这种合作对美苏关系的意义则是更大的错误。20世纪70年代，闻名遐迩的苏联大芭蕾舞团在华盛顿的演出并没有妨碍红军闪电般地进入阿富汗。

我们与苏联谈判的记录并不好。他们最善于在谈判中尽可能多地从对手获得，尽可能少地让步。丘吉尔曾经说，从来没有外交官像他们那样能以如此之少换取如此之多。因此，我们必须懂得谈判的战略和策略。

要懂得谈判的战略意义，就必须掌握治国的本领。传统上，美国人一向不喜欢治国术。培训外交官、军事指挥员和情报分析员的进修学校都不设综合治国术课程。这些学校出来的毕业生对于细微的小事无所不晓，而对大事则一窍不通。在我们的外交决策机构中，没有人掌握治国的才能。我们有

许多专门专家，但缺少多面手专家。但是，在未来的岁月中，最重要的才能是治国本领。

治国本领不仅仅涉及拼凑一份外交公报或达成一笔贸易交易所需的复杂艺术，或者为在各级别上对潜在冲突保持威慑所必须的复杂的军事科学知识。治国本领是指能够将我们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秘密行动能力、宣传和外交等各方面的能力溶进一项符合我们总战略的政策。作为治国术一部分的谈判是在最高级别玩弄政治花招的艺术。

没有哪一届政府，包括我自己的政府在内，明确地落实成文字地制定过一项综合考虑我们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权力工具的美国战略。每当我们宣布国家战略时，往往只想到军事力量，忽视或无视使用我们的经济和政治资产。在实践中，有些总统制定的战略比较全面些。但是，我们需要开创一个系统地开发美国治国术的进程。

在与莫斯科的谈判中，我们必须增强拟定建议的能力。我们的建议必须既能实现我们的目标，又给苏联带来政治压力，迫使它接受我们的条件。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提出的建议对方虽不愿接受，但又感到无法拒绝。我们须向克里姆林宫提供选择的机会——拒绝建议将使苏联在政治上受到损害，而接受建议又不符合莫斯科的本意。如果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拒绝我们的建议，我们将在政治竞争中得分；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就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最近，关于中程核力量的军控协议的签署证明戈尔巴乔夫精通这种技巧。1981年11月，美国提出了“零点方案”，当时并不是因为决策者以为这种方案对西方有利，而是因为他们估计苏联会拒绝这一建议，因而在政治上遭受损失。他

们以为，这项建议既能使欧洲在政治上得分，又能使美国在北约成员国部署中程核武器。只要苏联上了圈套，在谈判桌上坚持顽固态度，这个策略就能奏效。

然而，戈尔巴乔夫很快发现，“双零点方案”将最终对莫斯科有利，因为它可以使美国丧失从欧洲进行报复的能力，而不影响苏联袭击欧洲的能力。当戈尔巴乔夫接受美国建议时，里根政府感到只能继续就这一协议进行谈判，别无选择，尽管国防部、前北约司令伯纳德·罗杰斯及欧洲盟国对此都有严重的保留。勉强支持这一协议的人用来解释他们立场的一条主要理由是，拒绝我们自己提出的建议，将使我们在西欧的公众舆论中付出太大的政治代价。通过戈尔巴乔夫机敏的谈判，莫斯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要对如何使谈判成为总战略的一部分作一简要分析，需回答下述三个基本问题：

1. 我们希望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什么？谈判开始后我们不应该犹豫不决。相反，我们需要非常具体地确定我们想要取得的结果。在战略武器谈判方面，寻求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武器库一概削减50％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大幅度削减苏联用于进行第一次打击的武器，以使莫斯科永远丧失进行第一次有效打击的能力。在关于欧洲力量均衡的谈判时，寻求消除战术核武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需要以战术核武器来抗衡华沙条约国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相反，我们应该寻求将华约的常规武器削减到北约在必要时能够捍卫自己而无须使用核武器的水平。

2. 为了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我们愿意作出什么让步？戈尔巴乔夫既非慈善家，又非笨蛋。要说服苏联人相

信，我们两国都应追求战略稳定等抽象的概念，那是白浪费时间。他们不这样考虑问题。戈尔巴乔夫对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毫无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他能获得什么好处。为了达成他想要的“双零点”中程核力量协议，他愿意放弃比我们多几倍的核弹头。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让步，甚至连谈都是白费时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会做交易，但是，他们绝不会单方面让步。

3. 我们能够采取什么行动向苏联领导人施加政治压力，促其以我们愿意付出的代价与我们达成我们所希望的交易。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是可以做到的。首先，美国决策者必须了解苏联的动机和弱点，还必须善于使用制胜绝招，最为重要的是，必须有能力在提出建议时考虑到公共关系。除非我们的建议得到西方各国人民的支持，否则，我们不可能成功地进行谈判。另一方面，不惜任何代价促成交易的压力可能使决策者丧失较好的判断力。与此同时，政治上协调一致的建议能够促成西方国家组成统一战线，这将对苏联构成最大的压力，迫使它按照我们的条件来进行谈判。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已经阐述了控制常规军备的设想——大幅度削减在欧洲的坦克部队，在中欧建立无坦克区。这个设想能解决存在的问题。尽管还有待军事专家拟定实际建议的具体内容，但这一设想有很大潜力。这个设想突出了关键的问题，即：苏联在坦克部队方面一直享有极大优势，造成进攻性威胁；同时它又作出了有助于动员公众支持的外交反应。它教育西方的公共舆论认清我们在常规武器方面所面临的真正威胁。更重要的是，这一设想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苏联实行的威胁和平、因而需要改变的政策上来，以迫

使苏联让步。即使莫斯科拒绝关于建立无坦克区的设想，我们也不应该后退。相反，我们应该利用一切机会指出，苏联领导人拒绝采取减少大战危险的措施。我们应该不断强调，就欧洲来说，我们需要核武器的唯一原因是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占有优势。

戈尔巴乔夫1987年12月在华盛顿首脑会晤中表示，苏联接受均衡削减的原则。他说，在莫斯科占优势的领域，他愿意削减得多一些，以实现均衡。我们应该利用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在这方面迅速采取行动。我们应该利用这些讲话施加政治影响。里根总统应该告诉戈尔巴乔夫一则美国谚语“一言既出，钱必花到”，建议戈尔巴乔夫做到“一言既出，坦克必减”。达成一项能被接受的常规军备控制协议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这就是，苏联必须削减它的进攻性坦克部队，以在北约和华约之间实现平衡。

不幸的是，我们的外交决策机构几乎从未提出过这种战略思想。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是杰出的例外，他的这一政策导致了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的诞生。作为总统，我在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见到过许多非常有才干的人。但是，我不记得这些机构在重大问题上提出过任何真正有创见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必须在白宫制定主动行动的原因。当向这些机构提出问题时，它们才掸去卷宗上的灰尘，拿出卷宗，提出他们的学校式标准解决方案。他们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博物馆馆长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把现行政策当作博物馆的陈列品来看待，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存。他们把新思想视为对他们珍贵的工艺品的致命威胁。他们在策略上是专家，但在战略上是外行。我们决不应该成为这种僵化思想的牺牲

品。这种僵化思想是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上与莫斯科竞争的致命的指针。

没有好的策略就不可能实施好的战略。但是，好策略除非是一项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否则是没有用的。我们的战略决定我们应该参加什么样的谈判，我们的策略决定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交易。

如果不建立坚实的外交政策进程，只靠策略进行谈判，哪一届政府都不会在谈判中获胜。要建立坚实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是要求总统足够详尽地理解外交政策的实质，以便能够在几种选择之中作出符合情况的决定。美国在本世纪遭受外交政策灾难，大多数是因为总统对谈判对手抱有天真的看法，或因不太了解关系到我国安全的政策。例如，威尔逊1919年在凡尔赛以及罗斯福1944年在雅尔塔遇到的灾难。在今年的大选中，美国人应该把外交决策能力作为决定投谁的票时优先考虑的问题。

在选举领导人时，我们必须记住，他们不是圣人的候选人。个人特性始终应该是辩论和审查的合适的内容。但是，候选人是否有力量和智慧在谈判桌上对付戈尔巴乔夫，比他在大学里是否吸过大麻要重要得多。如果过去把一个人是否是圣人作为在美国担任高级职务的条件，我们过去就可能已经失去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和政治领袖。克利夫兰有一个私生子，但他胜任总统工作。格兰特[1]是个酒鬼，但他是率领联邦军队在南北战争中获胜的将军。林肯虽患有精神抑郁症，但是他解放了奴隶，维护了联邦共和国。政治评论家一直在

[1] 格兰特：美国军事家，第18任美国总统。在南北战争中，他任联邦军队少将、中将，指挥联邦军队所有部队作战，打败了南方邦联。——译者

嘲笑我们领导人的素质。但是，美国的政治已经越来越糟，现在任何珍惜私生活的人在进入公共生活之前都要三思而后行，因为这将使他和他全家成为热衷于写耸人听闻报道的记者的激烈攻击的目标，并且将被迫接受参议员在电视镜头前的质询。

要使我们外交政策的决策程序正常进行，须有三个关键的因素。首先，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人，一个能够从顾问中吸取最好的意见，从他手下各部门收集重要信息，并在外交政策上作出独立判断的总统。在19世纪，总统也许可以将外交政策事项完全交给国务卿去处理。但在那个时代，重大外交政策问题是关税标准，而不是生存问题。现在许多问题与存亡攸关，总统必须亲自领导。

作为总统，必须有历史感。曾出色地担任过澳大利亚总理的罗伯特·孟席斯爵士贴切地说过，领导人过多地考虑“历史的决定”，只能使“政治家们不去注意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的迫切需要”。在他看来，重要的是，领导人必须具有“历史感”，“这是我用来形容一种从有记载的历史中吸取力量和启发的思维状态的词组，而不是用来描写渴望在尚未记载的未来历史上留名的心境”。在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进行谈判时，除非我们对已经走过的路程以及是如何走过来的有深刻的理解，否则，我们决不可能达到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

第二，总统必须任命有领导能力而不是尾随他们所主管的部门的人担任国务卿、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妨碍客观地进行分析和提出建议的思想方法在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的永久官员脑子中是根深蒂固的。任命一个缺乏

经验的人，无论他多么能干，都难免成为那个部门的路线的俘虏或受骗上当者，从而失去对总统的用途。他就会成为该部门向总统派出的代表，而不是总统在该部门的代表。

第三，总统必须保留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在关于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后，华盛顿政治评论家的一致看法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及其一班人的权力太大了，应该降低到只是催办文件的地位。有人直截了当地指出："恢复国务院的外交政策决策权。"下一任总统如果听从这一建议，他就将犯最大的错误。总统所需要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不仅仅是一个办事员。他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组织决策过程、阐明政策选择及管理其部下使他们与国家的路线保持一致的强人。总统通过作决定来指导政策，但真正接触实际的是各部门。如果没有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来认真检查总统决定的执行情况，总统就会发现，在他的要求与实际结果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没有这三条，决策程序将是凌乱的。这些机构部门将像没有轴的轮子——它们仍然会滚动，但将脱离轨道，朝着自己的方向滚动。最重要的是，它们将不会向总统提供与莫斯科谈判所必须了解的情况及采取正确的策略行动的建议。

下一个问题是应该由谁来同苏联人进行谈判。智囊团、大学研讨会和电视演讲所进行的秘密辩论得出的典型结论是，应该由国务院来主持一切谈判。但与莫斯科进行谈判不能这样做。在这种谈判中，我们需要对应该通过正式政府渠道处理的问题与应该由国与国领导人之间在个人基础上进行讨论的问题加以区别。

只有在双方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由国务院主持政府间

的谈判才能发挥作用。在与盟国打交道时，我们的外交官例行地通过官方渠道解决了大多数问题。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只有在我们的利益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相吻合的具体问题上才能这样做。减少偶发战争的危险的措施和签署促进文化交流的协议属于这一类问题。我们的外交官特别善于设计对双方都有利的妥协方案。但是，由于利益相互冲突而不可能进行妥协时，这种能力便无用武之地了。

当我们与莫斯科就美苏两国利益不可调和的问题进行谈判时，我们不可能通过官方外交渠道取得有意义的结果。总统必须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国家元首一级进行谈判。在最高一级提出这些问题，表明我们重视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利益，同时也表明已经不可能通过其他讲坛取得进展了。有些人可能仍然相信，通过助理国务卿与苏联副外长会晤，宣读预先准备好的阐明自己立场的讲话稿，能够在像阿富汗和中美洲等困难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是生活在幻想世界中。

在与共产党政权打交道时，我们必须记住党、政官员的区别。作决定的是党，而不是政府。政府官员是党的领袖的陪衬。我们可以尽最大努力去说服苏联的政府谈判代表，但是在重大问题上，他不会自作主张改变立场，他不会从原来的立场上移动一步。赫鲁晓夫曾嘲笑一个通过举行外长会晤解决一个问题的建议，他认为这与外长们无关，还说，如果他下令让他的外长坐在冰块上，外长就会欣然遵命。现在的情况仍然如此。要想使关于重大问题的谈判取得进展，美国总统必须与苏联共产党领袖打交道。

戈尔巴乔夫也许选择通过他的驻华盛顿大使、外交部长

或者他的其他代表进行谈判。总统必须随时准备采取同样措施。他有时可以启用国务卿，有时可以使用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有时可以使用特别代表，甚至启用非政府官员。关键的一条是，总统委派的人必须被戈尔巴乔夫承认是总统的个人代表。如果选派国务卿，必须明确他履行这一使命的身份不是内阁一个部的领导人，而是总统特使。戈尔巴乔夫必须清楚，不管委派谁，他是代表总统的，并且只向总统汇报。

这样的谈判必须秘密进行。在美国，“保密”有一种不好的含义。在我们的名牌大学里，政治系的教授们仍然喋喋不休地谈论威尔逊的格言：“以公开的方式达成公开的协议。”但是，他们不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苏联人达成公开协议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秘密谈判。秘密条约与秘密谈判之间有天壤之别。民主国家不能够也不应该容忍在重大问题上达成秘密协议。但是，通过秘密谈判达成重要协议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正确的。

与共产党国家进行谈判尤其如此。所有的极权国家，不仅仅是苏联，都热衷于保密。如果不进行秘密谈判，就不可能在1972年打开与中国的关系，也不可能在1973年在越南达成和平协议。有人可能要提出，美国与中国和越南都没有外交关系，因此在这两件事上进行秘密谈判是合适的。然而，如果不进行秘密谈判，甚至也不可能与苏联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

有必要保密还出于更基本的原因。首先，从本质上说，搞外交必须远离摄像机镜头和麦克风。与莫斯科进行谈判不同于在东方市场上与地毯商进行讨价还价。相反，谈判是摸

索对方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进行谈判和试探各种双方有得有失的方案的静悄悄但微妙的过程。双方都应该能够提出探讨性的建议，试验假设性的选择方案，试探对方的反应。双方都应该有机会提出建议，而且不受所提建议的约束。只有在秘密谈判中，谈判代表才能这样做。

第二，真正的谈判要求各方在具体利益上进行妥协，以利于双方的总利益。这又要求双方作出让步。每当美苏谈判在高度公开的情况下进行时，例如历时13年之久的维也纳共同均衡减少部队的谈判，谈判将一无所获。任何一方要公开作出重大让步都是非常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如果一方必须从其最初的立场上后退，这将使国内不赞成通过谈判达成任何妥协的反对派明朗化，阻止取得新的进展。在美国是这样，在苏联更是如此。在苏联，每一点妥协都必须看起来像是胜利。每一方都能够把公平的协议当成是有益的交易；但哪一方也不能把具体让步说成无害。

因此，在与苏联进行谈判时，总统在政府机构外建立秘密渠道是明智的。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进行联系，必须在正式渠道外有一个可以避开无孔不入的电视摄像机镜头的秘密渠道。在我执政期间，秘密渠道包括亨利·基辛格与非常能干、有经验的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之间谨慎的定期会晤。这些会晤在我们会谈的初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双方都在摸对方的立场。那些工作会晤所取得的进展远远超过我们大肆宣扬的正式谈判。

要在潜在危机公开化、双方不得不坚持自己立场之前消除危机，秘密渠道是必不可缺的。1969年，苏联企图在古巴西恩富戈斯建造核潜艇基地，秘密渠道使我们避免了一场大

危机。秘密渠道还使我们得以防止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战争升级为美苏冲突。下一任总统应该与苏联人建立秘密渠道，因为秘密渠道能将情况泄露及妨碍两国最高领导人坦率交换意见的不利因素降到最低限度，它最大限度地增加了成功地解决有争论的问题的机会。

在实际谈判中，美国必须采取六条关键性策略：

包抄行动。我们在谈判之外所做的事情与我们在谈判中所做的事情同等重要。根据地缘政治学公理，在谈判桌上不可能比在战场上赢得更多的东西。这一条也适用于其他谈判。如果在谈判中只提出词藻优美的建议，不作任何其他努力，我们将一无所得。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从侧翼包抄，挫败莫斯科的立场。在军控谈判上，我们必须部署足以确保我们的战略安全的武器系统，并动员美国人民和盟国来支持我们的谈判立场。如果要想使苏联同意撤出阿富汗，我们就必须帮助阿富汗抵抗力量，增加莫斯科占领这个国家所要付出的代价。苏联人是强硬的谈判对手。只有当我们采取的行动使苏联人如果不同我们达成协议便会陷入更糟的境地时，他们才会同我们达成我们所希望达成的协议。

联系。对这种把在一个问题上的进展与另一个问题上的进展相联系的策略是颇有争议的。在我担任总统期间采用这一策略时，政治评论家和职业外交家几乎一致反对。但是，“联系”策略对真正改善美苏关系是绝对必要的。

除非我们在超级大国谈判中对问题实行“联系”原则，否则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将彻底战胜美国。双方并不是对在所有问题上取得进展都抱有同等强烈的兴趣。对于贸易一类的问题，苏联更关心。对于诸如阻挡苏联在第三世界冒险等其

它问题，美国则更关心。莫斯科最希望只就前者进行谈判。如果美国默许这种不平衡的态度，不把这两类问题联系起来，这将使苏联得以控制谈判议程，我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失败者。

不管是涉及贸易，还是涉及军控谈判，莫斯科总是反对明显的“联系”。然而，尽管他们不愿实行“联系”原则，但他们将会适应“联系”的现实。在我执政期间，我们将苏联人最为关心的禁止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谈判与我们最为关心的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系统的谈判“联系”起来。如果我们不坚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我们绝不可能缔结“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苏联可能会同意就“反弹道导弹条约”进行谈判，而在进攻性武器系统临时协议问题上进行拖延，这样就可以腾出手来加强核力量的建设。我们还把苏联重视的关于发展东西方贸易问题的谈判的进展与苏联在其他地区的行动“挂钩”。当克里姆林宫采取的行动威胁到我们的利益时，我们就放慢谈判速度，苏联人很快就明白了。他们尽管不喜欢，但他们的确会对此作出反应。

世界事务本身是相互联系的。但是，要从“联系”中受益，美国必须实行这种策略。我们必须把美苏全面关系的改善与苏联在全世界各地的行动挂钩。如果苏联坚持侵略阿富汗，向中美洲运送成百上千吨的武器装备，威胁美国的利益，我们就绝不能继续军控谈判，绝不能扩大贸易。如果我们不顾苏联的行动而签署重要协议，那将给莫斯科一个错误的信息。我们等于在告诉人们，侵略可以得逞，那将是在促使我们自己的毁灭。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我们不将问题“挂钩”，那些

反对"挂钩"最厉害的军控院外活动集团损失最大。"挂钩"是严酷的国际现实。我们可以不顾苏联的扩张主义而谈判军备控制条约。但是，当苏联践踏西方利益时，参议院绝对不会投票批准这类条约。归根结底，是莫斯科对阿富汗的侵略破坏了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希望美苏关系得到真正持久的改善，我们就必须把在军备控制谈判中的进展与在可能导致使用这些武器的政治冲突中的进展"挂钩"。

莫斯科已经把军控谈判列为美苏谈判中的第一重点，部分原因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的注意。我们绝不应把苏联的扩张主义和压制等问题看成是次要问题，看成是影响在军备控制问题上取得进展的不幸的障碍，从而让苏联达到目的。我们必须迫使克里姆林宫解决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唯一的办法是"挂钩"。如果他们要促进真正和平的事业，在军备问题上的交易必须伴之以苏联政策的改变。正如布赖恩·克罗泽所写的，"苏联人或其代理人在中美洲或南部非洲的所作所为是实体，军备交易是阴影。"如果里根政府只在军备控制问题上寻求进展，而不进行"挂钩"，那将冒制造危险的虚假欢欣的风险。在那种情况下，敢于提出苏联在世界各地进行侵略的问题的人将会被指责为毒化美苏关系的气氛。

但是要"联系"或"挂钩"得巧妙。美国总统不能走到照相机前宣布，他准备利用下一个军控协议来压苏联在某一问题上让步。总统必须在秘密谈判中实行挂钩，在人权问题上尤其需要这样做。由于我的政府私下里向苏联施加压力，苏联犹太移民出国从1968年的400人增至1973年的近35000

人。然而，当国会通过了明显地将贸易与苏联移民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时，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再次把门关死了。没有哪一个强国会允许外国来告诉它实行什么内部政策。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向苏联施加压力，这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且因为苏联侵犯人权将影响美苏关系的全面改善。但是，我们必须懂得，要成功，最好是私下施加压力，而不是哗众取宠。

经济实力。在美苏谈判中，尤其是在与戈尔巴乔夫的谈判中，我们最大的王牌是我们的经济实力。他已经表明，他的首要目标是加速发展苏联的经济。他知道，一旦失败，苏联在下一个世纪将丧失大国地位。为此，他迫切需要获得更多的西方技术和信贷。因此，我们今天处于最好的谈判地位。

贸易应该是下一次美苏首脑会晤的一个重要议题。增加贸易额的可能性极大。去年，我们与迄今仍然是农业国的中国的贸易额是100亿美元，而与重要工业国苏联的贸易额只有70亿美元。从经济上说，这不合逻辑。但是必须记住，我们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是在中国向西方开放并停止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之后才开始发展的。进行非战略商品贸易可能会促使苏联在国内采取更加人道主义的政策，在国际上实行侵略性较小的政策。随着两国关系的改善，我国政府应要求国会给予苏联最惠国地位。这将为苏美非战略物品贸易的大幅度增长打开大门。

西方需要与莫斯科发展贸易，而莫斯科更需要与西方进行贸易。对于这一点，我们清楚，苏联也清楚。我们应该利

用这一点。美国与苏联之间的贸易主要是西方的技术与苏联的原料进行交换。如有必要，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购买苏联的产品。但他们没有得到我们产品的其他来源。这使我们具有影响力。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争取他们在其他问题上作出让步。我们应该向莫斯科出售西方的商品，但是在这些商品上，我们不但应该贴上经济价格标签，而且应该贴上政治价格标签。戈尔巴乔夫可以进行选择，但他不能既要贸易又要侵略。

贸易应该成为我们与苏联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我们应该抛弃贸易可以带来和平的错误想法。相互进行贸易的国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相互残杀，致使成百万人死亡。单靠贸易不能实现和平，也不能阻止战争。许多人认为，如果我们增加与苏联的贸易，他们将会减少侵略。但是，克里姆林宫是收买不了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们已经表明，他们既想做生意，又要进行侵略。最基本的一点是，经济关系永远不能代替威慑和竞争。但如果正确地处理经济关系，就能够加强威慑和竞争力。

如果我们准备增加贸易，那么我们就应该精心策划，通过增加贸易来鼓励苏联停止侵略政策。如果莫斯科领导人最想得到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而我们却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这样的贸易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不能利用我们的经济实力，那将表明，苏联只要改善两国关系的气氛，就能获得好处，甚至可以通过侵略来谋取其他好处。我们不能开创这样的先例。

如果没有我们北约和日本盟国的合作，我们就不可能利用我们的经济实力。西方的集体经济力量使东方的集体经济

力量相形见绌，因为我们的经济制度是可行的，而他们的经济制度是不可行的。北约和日本的产值以五比一的比例超过苏联和华约成员国的产值。但是，如果我们在与莫斯科进行贸易时不协调我们的政策，我们将失去这一优势。

政策协调至少必须包括严格控制有用的军事技术的出口，停止向苏联提供补贴性的出口信贷。此外，我们还需在控制东、西方的贸易水平方面进行合作。我们必须立即协调行动。戈尔巴乔夫一直在明确地谈论，缓和紧张关系在经济上将导致贸易的发展。苏联的贸易代表团已经开始周游西方各国。因此，我们在美国及在整个西方盟国有必要建立“对外经济政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在我们如何利用经济实力对付苏联方面进行协调。

里根政府取消了卡特总统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对苏联开始实行的粮食禁运，但没有得到任何相应的让步，这是一大错误。美国在没有与其他问题挂钩的情况下签订了新的粮食协议，这是错上加错。而且不幸的是，政府贸易官员遵循了对我们与莫斯科贸易的唯一限制是苏联的港口吞吐能力这一错误的原则。下一届政府应该改变这种态度。首先，应该集中西方的经济力量，然后，坐下来与莫斯科就发展贸易的政治条件进行谈判。

列宁曾轻蔑地说，资本主义国家如此贪婪，如此目光短浅，以致他们会将用来吊死自己的绳子卖给苏联。不幸的是，西方有些政治家和商人正是这样。他们卖给苏联的不只是绳子，而且还有断头台和刽子手指南。我们必须拒绝那些狭隘地把最低方针视为东、西方贸易政策的唯一指导方针的人的建议。如果我们接受他们的意见，除了少数西方人能在经济

上获得好处以外，只有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能在地缘政治方面获益。

坚韧不拔。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处于革命时代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靠在会议上呆的时间比其他左派分子长而战胜了后者。列宁的追随者往往无休止地就最琐碎细小的问题进行辩论，把反对派搞得厌倦不堪，一些代表因此溜出了会场。一旦反对派的人数减到足够少的数量，列宁的政党就要求投票，从而获得胜利，尽管布尔什维克在开始时是少数。今天，苏联的谈判代表并未丧失这种靠持久谈判获胜的才能。

我们的外交官在与莫斯科打交道时常犯两个根本性的错误。第一，他们常常低估对手，看不起苏联人，认为他们笨拙、粗鲁、野蛮。然而，他们没有认识到，风格与能力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斯大林可能不像罗斯福那样有风度，但他在雅尔塔谈判中赢得了东欧。我们的谈判代表必须下苦功为谈判做好充分准备，他们必须坚韧不拔，一丝不苟，有耐心和毅力。亨利·基辛格有许多才能，然而正是上述这些能力是他与苏联人、中国人和越南人进行谈判的主要力量。马克斯·坎珀尔曼在日内瓦马拉松式的军控谈判中表现出他具有这些能力。能使苏联谈判代表作出让步的是上司作出的政治决定，而不是来自谈判桌对面的说理。但是，我国谈判代表团必须有能力与无限期固守自己立场的做法作斗争，以便诱使克里姆林宫改变其原来的立场。我们决不应该在有最后期限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如果我们显得急于求成，苏联只会高兴地催促我们达成对我们不利的协议。

第二，我们的外交官普遍有替苏联与自己进行谈判的倾向。在美国政府内部进行讨论时，每一个强硬的谈判选择方

案都遇到一阵嘲笑，理由是“俄国人决不会接受”。然后，一群外交官员在他们在国会和新闻界的朋友们的协助下，敦促我们改变立场——甚至在谈判开始之前——使我们的建议更符合克里姆林宫的口味。这样做简直愚蠢透顶。我们绝不能根据苏联是否会接受来修改我们的建议，而只能是根据按照我们的观点建议中的条件是否合乎需要来决定是否修改。

莫斯科的外交官是进行美苏谈判政治阵地战的名副其实的专家。他们深入研究自己的立场，设想出10多个辩论方案，以加强舌战防御工事，只有在多次遭受对手的正面攻击之后才后退。即使在这个时候，我方仍然必须一个一个地消灭他们的阵地，因为当他们在一条战线上退却时，他们就会在另一条战线上制造虚假的争论问题，以便在第三条战线上赢得真正的让步。苏联的谈判代表堪称世界上最能干的谈判家，他们肯定会捍卫苏联的利益。在这方面，无须我们先作让步，来帮助他们维护他们的利益

如果我们的立场强硬并合乎逻辑，我们就应该坚持。老资格的驻莫斯科记者约瑟夫·盖洛韦曾写道：“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坚定地阐明宗旨、目标及途径，然后用最大的决心和韧性坚持不让。哪怕在自己的原则上只作微小让步，也会使对方相信至少存在着作出更大原则让步的可能性，这就足以使俄国人没完没了地做你的工作。”

我们的谈判代表必须学会把我们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然后才考虑他们要签署协议的愿望。“战略防御计划”就是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外交决策机关内，一直有人鼓吹，为了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我们有必要在“战略防御计划”方面向苏联作出让步。他们把“战略防御计划”

看成是似乎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需要莫斯科解决的问题。我们不应该不知所措地搓手，自己不停地问自己："战略防御计划"怎么办？相反，我们应该稳坐钓鱼台，向苏联人提问：他们准备如何处理他们在战略核武器上的优势？正是因为苏联在战略核武器上占有优势，我们才要搞战略防御计划。

我们的根本方针必须是，在没有得到回报的情况下绝不让步。我们决不能让苏联人白坐车。如果我们为了赢得莫斯科的善意而主动让步，苏联人就会接受我们的让步，然后要求我们作更多让步。正如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谈判代表所说的，苏联人很少对他人的帮助给予报答。

说话温和，行动坚决。外交上的男子气概可能会在国内得分，但在国外并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苏联人精通讹诈术。玩扑克的人都知道，对他人进行讹诈的人一般都会识破对手进行的讹诈。与苏联人打交道的最好办法是说话温和，行动坚决。

不可预测性。我们的外交官常常在尚未看到苏联的牌的时候，就先在桌子上摊开自己的牌。他们应该牢记与苏联人打交道的外交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戈尔巴乔夫善于出其不意地采取行动，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地不可预测。

如果我们学会把温和的调子与强硬的行动结合起来、学会采取迂回包抄的行动、实行"挂钩"原则、利用经济实力、不屈不挠地进行讨价还价以及具有不可预测性，我们就可以在贸易、军备控制等问题上与苏联达成有利的交易。但是，与莫斯科的谈判并非到此结束，美国还需要认真核查莫斯科

遵守协议的情况。首先，这意味着所有的协议必须规定极其严密的核查程序。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情况使我们认识到，甚至是最小的漏洞，苏联都会无情地加以利用。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苏联将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项协议。只要是允许的，只要他们能够侥幸做成的，他们都会干得出来。我们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有人认为，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使苏联在战略武器系统方面领先于美国，这是错怪了人。我们在战略武器方面落后于苏联，并不是因为有了这个条约，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做条约所允许做的一切事情。在签订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B－1轰炸机、MX导弹、三叉戟潜水艇等一大批战略项目已经在实施。但是，在70年代中期，国会砍掉了这些项目的拨款。卡特政府取消了一些武器的部署，延长了一批战略武器的部署时间。如果我们做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允许范围内的一切事情，“易受打击的窗口”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

此外，在进行其他谈判时，我们绝不应该把苏联违反军备控制条约的事放在脑后。里根总统正确地坚持，美国应针对苏联违反条约的行动采取相应步骤。既然苏联已经突破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规定的最高数量限额，美国也应该这样做。既然苏联已经突破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规定，部署了新的导弹，我们应该加紧部署MX导弹和侏儒导弹。既然苏联在试射导弹时使用了遥测术，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在谈判中，我们必须先坚持解决守约的问题，然后才能谈判签署新的协议。这不仅仅是一个微妙的外交问题。我们

必须不厌其烦地向那些想把这一问题搁置在一边的人指出，这个问题最终将影响我们国家的兴亡。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不厌其烦地向克里姆林宫指出，如果他们拒不解决他们违反过去的条约的问题，参议院将不会、也不应该批准新的条约。如果我们坚持这一立场，苏联最终将会回心转意。

反对与苏联进行谈判的人也反对超级大国之间举行首脑会晤。在他们看来，首脑会晤不仅总的来说具有谈判所固有的缺陷，而且过份有利于苏联。美苏首脑会晤必然有香槟酒祝酒和外交上的友好表示，这就使在阿富汗等遥远的地方实行残暴政策的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在世人的眼中合法化了。

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在历次首脑会晤中成绩不佳。我们常常看到美国总统只认准一条，即：只要他与苏联元首相互了解，在他们的关系中成功地创建一种新调子或新精神，就可以解决美苏之间的问题，缓和它们间的紧张关系。正是这种想法带来了自我吹嘘的1955年的"日内瓦精神"、1959年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的"维也纳精神"、1967年的"葛拉斯堡罗精神"及1985年的"日内瓦精神"。尽管这些精神改善了美苏关系的气氛，但并没有解决主要的基本问题。如果首脑会晤只有精神，没有实质内容，那么精神很快就会烟消云散。

我们必须正视严峻的现实，这就是，只有当具有相似或一致的利益的国家领导人间产生误解但可以通过增进了解加以消除时，这种精神和调子才显示出其重要性。这种短期因素，对于像美国和苏联这样具有不可调和的分歧的国家，是不起作用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苏首脑会晤毫无益处。首脑会晤可以在维护和平方面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只有在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两国间的紧张关系不是由误解造成，而是因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利益所致之后，举行首脑会晤才会有助于东、西方关系的真正改善。我们与苏联之间的大多数分歧是永远也消除不了的。但是两国有一个共同的大目标：生存。双方都握着对方生存的钥匙。首脑会晤的目的，是制定防止深刻的分歧导致两败俱伤的武装冲突的竞争规则。

我们必须承认，尽管已经有了44年的和平，但是，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按照可能性大小，有下述七大可能引起这类冲突的原因：（1）苏联领导人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对美国进行“第一次打击”的决定；（2）华约军队对北约军队进行袭击，或苏联对日本进行袭击；（3）偶发战争。由于某种机器故障，一方发动核袭击；（4）核扩散。核武器流入了未成熟的革命小国或恐怖主义小国领导人手中，他们不像大国领导人那样在使用核武器上持谨慎态度；（5）苏联为摧毁中国的核武库而向中国发起先发制人的袭击，这样的战争必然把美国卷进去；（6）在像中东和波斯湾这样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利益相互冲突的地区的小规模战争不断升级；（7）错误估计，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低估了他的对手为捍卫本国利益不惜冒最大风险的决心。

减少上述七种情况所涉及的危险和风险是美国和苏联的共同利益。在减少每一种情况所涉及的风险方面，超级大国之间的首脑会晤都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这种首脑会晤如果进行得好，可以促进为减少偶发战争或防止核扩散所必需

的合作。同时，这些会晤也使我们有机会表明我们抵抗苏联侵犯西方利益的决心，这样就将减少莫斯科考验我们意志的可能性。

首脑会晤为美国总统提供了一系列独特的机会，同时也对他提出独特的挑战。他可以通过首脑会晤来打破美苏两国政府间进行谈判的缓慢速度。他可以在这种首脑会晤的炉煌里铸造美苏之间各种问题之间的“联系”，而且这种首脑会晤也是苏联领导人——不管是好是坏——对美国作估价的地方。但是，首脑会晤是有危险的。美国总统有落入苏联外交圈套的危险，或者不知不觉地为美苏关系定下调子，使公众产生一种起反作用的欣快症、过分乐观地认为有可能最终结束超级大国之间的争斗。

在我42年的公职生活中，我亲眼目睹了九次首脑会晤，作为总统，参加了其中三次。回顾我们的成功和失败，我认为，下一任总统在首脑会晤中应切记下述五条重要原则：

不要期望与苏联领导人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会促使国家关系的改善。如果相信一个有超凡魅力的美国总统能够诱使苏联领导人在世界各地放弃侵略政策，那将是最危险的幻想。苏联领导人特别善于利用美国人的盲点。出使莫斯科六年的意大利大使曼利奥·布罗西奥识破了这种文字游戏。“我了解俄国人，”他1967年对我说，“他们是伟大的说谎者，聪明的骗子，出色的演员。他们是不可信任的。他们把欺骗和撒谎视为义务。”

从富兰克林·D·罗斯福开始，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曾在某段时间相信过，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建立起特殊的个人关系将有助于实现外交突破，进而缓和美苏关系。但是当苏联

人一只手向我们敬酒，另一只手在我们背上捅刀子时，他们都醒悟了。我们必须承认，通向外交灾难的道路是由天真幼稚的想法铺设的。

这并不是说，个人外交毫无作用。个人外交在首脑会晤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在我们面前爆炸。我们必须懂得，关键的因素不是充满激情的友谊，而是冷静的互相尊重。总统无须对苏联人捶胸顿足，以证明其男子气概。相反，他在谈判中应该努力采取严肃务实的态度，给予苏联领导人以一个超级大国领导人应得到的尊重。但与此同时，总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是两国间不可调和的分歧使两国对立，而这种不可调和的分歧是无法通过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外交来弥合的。

在与戈尔巴乔夫打交道时，美国总统特别需要现实地看待个人外交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善于使用魅力。他在接受采访时，把美国一些最厉害的记者变成了叭儿狗。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戈尔巴乔夫自己善于使用魅力，他不会受魅力的影响。他知道所有的花招，因为他自己已经使用过上百次了。如果总统试图靠魅力取胜，他赢得的将不是友谊，而是蔑视。

不要假设首脑会晤只要开成功一次就会带来永久和平。成功的首脑会议往往产生过份乐观的期望，产生欣快症。但是，不可能靠美、苏两国领导人的一次会晤改变整个世界，结束两国之间的争夺。欣快症是一种幻觉，它导致失望，使人优柔寡断。事实上，乌托邦式的期望对美国和我们的盟国都不利。使我们对改善美苏关系抱有过份乐观的幻觉，产生欣快症正是苏联的目标，因为这种欣快症有助于促进东、西

方贸易的增长和西方防务费用的削减。如果我们听任、甚至鼓励这种欣快症，那么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不仅会得到、而且会以更小的代价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我们一定不能误以为，戈尔巴乔夫愿意缓和紧张局势就意味着他已经放弃了把无情地寻求私利当作指导方针了。

作为总统，我清楚地知道，1972年的极其成功的首脑会晤可能会使美国人民滋长过于乐观的期望。虽然我知道，这种过于乐观的期望在政治上对我有利，但我努力打消它，使人民能正确地看待我们的这次成功。我之所以这样做，特别是因为勃列日涅夫当时反复向我强调，紧张关系的缓和并不会使苏联停止对他称之为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我从莫斯科一回国就立即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坦率地声明，我们并没有“从莫斯科带回立即实现和平的许诺，但我们确实开始了能导致持久和平的进程。”我又说，“苏联的意识形态与我们美国的一些基本价值观相对立。苏联领导人仍然信奉那种思想意识。”事实证明，我说得还不够。尽管我提醒了，但是在国会和新闻界还是滋长了过份乐观的欣快症。1973年在中东，共产党人采取了共产党的行动，我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但这使许多美国人感到震惊，他们以为我们已经进入了和平与诚意的新时代。不幸的是，在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之前，这种过份乐观的欣快症一直没有完全消失。

1987年12月华盛顿首脑会晤之后，整个首都都感染上了这种过份乐观的情绪。在首脑会晤后，里根总统向美国人民发表的讲话是平衡的，他对美苏关系的分析是负责任的。但是一些政府官员却预言，在解决复杂问题上将迅速取得进展，

描绘了世界事务新时代的曙光，点燃了欣快症之火。这种言过其实的论调使国内人们抱过高的期望，削弱了我们的谈判立场。今后每位总统参加首脑会晤都应对自己的部下严加管束。

我们必须记住，首脑会晤中签署的任何条约都不会消除苏联侵略的威胁，至多只能减少那种威胁升级为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应该寻求达成符合我们利益的条约，另一方面，我们决不能认为，任何条约会改变美苏冲突的性质，或改变克里姆林宫的全球意图的侵略性质。

不要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匆忙举行的首脑会晤。接受参加毫无准备的首脑会晤的邀请，就等于接受走向外交灾难的邀请。莫斯科靠这种会晤取胜，因为它可以利用新闻报道进行宣传，而无须作任何实质性让步。匆忙举行的首脑会晤的消息一公布就引起人们期望取得成果，滋生不现实的希望。这种希望不可避免地不能成为现实时，就会产生不符合实际的忧虑和失望。这种首脑会晤在政治上可能会带来短期好处，但这种因一时冲动而举行的首脑会晤最终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从长远来看，它破坏了美苏改善关系的前景。

我们应该从20世纪60年代的首脑会晤经历中吸取教训。1961年维也纳首脑会晤之后，一些最热情支持总统的新闻报道说，赫鲁晓夫粗鲁地对待毫无准备的可怜的肯尼迪。肯尼迪当时尚未从猪湾事件和柏林事件的失败中恢复过来。这次首脑会晤使赫鲁晓夫错误地认为肯尼迪是一个软弱的总统，因而促使苏联领导人决定进行近乎致命的赌博——第二年在古巴部署导弹。1968年匆匆忙忙在葛拉斯堡罗举行的首脑会议中，约翰逊除了帮助世人忘却苏联前不久对捷克斯洛伐克

的残暴入侵以外，其他一无所获。

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会晤是如何举行首脑会晤的最好的反面例子。因如此缺乏深谋远虑而使这么多利益面临危险，这是史无前例的。在与戈尔巴乔夫的一次会晤中，里根总统实际上是根据他的助手在一张废纸上随手写的10多条谈话要点面与苏联就消除弹道导弹以及所有其它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要不是总统坚决拒绝以战略防御计划作交易——这是他的功劳，美国可能已经抛弃了西方防务战略的核心，而且并没有与盟国磋商，甚至也没有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协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即使推行战略防御计划的结果并不部署任何武器，这一计划已经挽救了西方一次，使它免遭灾难。

从西方利益来说，毫无准备的雷克雅未克会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首先，它使苏联人摆脱了因前不久绑架美国记者尼古拉斯、达尼洛夫而陷入的困境。第二，它使戈尔巴乔夫得以把战略防御计划说成是达成全面军备控制协议的主要障碍。第三，在消除核武器问题上，首脑会晤中的随便谈论使整个西方世界感到震惊。雷克雅未克的两天会晤是自雅尔塔会议以来对西方的利益的首次最严重威胁。随心所欲举行的首脑会晤都不可避免地招致灾难。

不要让军控问题占据首脑会议的整个日程。在首脑会晤中，总统必须对美苏关系中的所有问题给予适当注意。事实上，首脑会晤不应把军备控制问题放在首位，而应把美苏冲突的潜在爆发点放在首位。归根结底，不是武器，而是政治分歧，导致了武器的使用，进而引起战争。如果对这些政治分歧不给予持续不断的重视，就会使克里姆林宫得到一个错误的信息。在首脑会晤时，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密切观察他的

对手。我们对要谈问题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信号：我们谈论的问题是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回避一个问题，他们就会以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将会听凭他们随心所欲。

第三世界的冲突是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必须使苏联人明白，如果美国和西方接受苏联有权支持所谓的非共产党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论调，而不坚持我们有权保护我们那些受到袭击的盟国和友国，不坚持我们有权支持第三世界反对亲苏政权的真正的解放运动，那将是不合情理的，不道德的。我们不能期望苏联人变成不再致力于扩大影响和控制的共产党人，这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必须在首脑一级表明，进行军事冒险将破坏美苏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使莫斯科丧失本来可能从缓和紧张关系中获益的机会。

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首脑会晤和1987年的华盛顿首脑会晤主要是关于军备控制问题的首脑会晤。戈尔巴乔夫成功地阻止了会晤取得进展，事实上他成功地阻止了在任何问题上进行任何真正的谈判。在下次首脑会晤时，美国应该坚持对战争的根源和对可以用来发动战争的武器问题给予同等重视。军控谈判是重要的，可以为我们的利益服务。但是，有关这一问题的谈判应该与日程上其它问题的谈判协调地、明确联系在一起进行。仅仅建立在军控基础之上、使苏联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扩张的缓和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和平，而只会使人们产生虚幻的企望和失控的欣快症。

不要在有最后期限的情况下进行谈判。我们往往以四年为周期来制定外交政策。美国总统的典型做法是希望全面检查美国的对苏政策，并在下次总统大选之前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他急于求成，并可以明显地看出他对时钟

的嘀嗒声感到关切。克里姆林宫领导人非常清楚地知道时间对美国总统的压力，而且有能力无情地利用这一点。因此，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必须对希望达到的目标采取更加现实的态度。哪一位总统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一个问题。在首脑会晤中，如果条件不合适，我们应该高兴地在达不成交易的情况下结束会晤。任何总统在有最后期限的情况下进行谈判都将犯致命的错误。归根结底，戈尔巴乔夫有25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进行谈判。

建立年度首脑会晤制。如果一位总统遵守这五条基本原则，他在首脑会晤中可以与任何苏联领导人平起平坐。作为他总谈判战略的一部分，他应该寻求建立每年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首脑会晤的进程。

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晤是有益的，理由有下列三条：第一，由于双方领导人都想在首脑会晤中达成实质性协议，确定每年举行一次首脑会晤有助于推动各官僚机构陷入困境的谈判。这也是美国迫使苏联改变其顽固立场的最佳途径之一。尽管不应该完全为达成协议而达成协议，或者为了赶在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而进行谈判，但是，预订年度首脑会晤可能有助于打破谈判僵局。第二，每年定期讨论政治分歧将减少两国领导人相互错误估计对方反应的可能性。双方都有充分的时间阐述自己的立场，显示维护自己利益的意志。两国领导人可能互不喜欢，但他们会相互理解。这就可以减少因一方错误估计另一方而触发一场双方都不愿打的战争的可能性。第三，首脑会晤日期确定后，可以防止苏联在会晤前采取侵略行动。两国领导人都不愿受到毒化首脑会晤前气氛的指责。

有些人可能会由此得出结论，民主国家无望与极权国家进行平等谈判。但是，过去我们已经缔结了一些好条约。1955年的奥地利和约、1962年的有限禁止核试验条约、1971年的柏林协议以及1972年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都体现了美苏关系的重大进展。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每一项条约的签署并不标志着超级大国冲突的结束，而仅仅是在确立一个与持续不断的冲突共处的进程中向前迈了一步。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些首脑会晤的局限性，如果我们遵循进行首脑会晤的正确的准则，与莫斯科进行谈判可以为有益的目的服务，实际上可以为不进行战争的竞争制定规则。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总战略的其它方面面孤立地寻求谈判。只有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来保持威慑，继续竞争，我们才能继续进行谈判。在没有威慑的情况下进行谈判，结果将是逐步妥协和投降。只进行谈判，不再进行竞争，将导致对苏联侵略的默许。如果我们学会将威慑、竞争和谈判三者结合起来，我们将可能在1999年之后实现真正的和平。

第　六　章

分裂的巨人

1999年以后，世界的力量对比将反映出美国和苏联统治地位的日益下降，以及西欧、日本和中国这三个全球性地缘政治巨人重要性的不断上升。这几个力量中心是加强东方还是加强西方的力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界的未来。因此，在1999年到来之前，美国必须作出协调一致的努力，把世界上这三个新兴的力量中心结合到一个为遏制苏联侵略、建立更强大的世界秩序的广泛联盟中来。

有人会对这一观点所论及的西欧的作用表示异议。他们认为北约已无足轻重，在对世界力量对比的消长进行总结时，他们把19世纪称为欧洲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为太平洋世纪。他们的观点是，欧洲作为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因素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欧洲国家都没有资格独自成为超级大国。甚至一度是世界头号军事和经济强国的英国、法国和德国，现在都已是软弱而衰颓，看不到自己的利益所在，更不用说调动意志力量来保卫这些利益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一心只想满足这些福利国家的欲壑，而不考虑如何在世界上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那些对欧洲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这些国家在起地缘政治作用方面已是日暮途穷。他们的结论是，美

国因此应把欧洲弃而不顾，转向太平洋地区或在世界上单枪匹马地行动。

从一方面说，这种观点是正确的：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各国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欧洲政体一半的君主专制均被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在所有欧洲大帝国的殖民地上播下了瓦解的种子。正如1969年戴高乐对我说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欧洲国家都溃败了；两个国家则被打败了。"欧洲这个大陆是拖着历史给它造成的疲惫之躯进入战后时期的。在本世纪上半叶，欧洲人民经历过两次灾难性的战争，幸而生存了下来。他们本能地从世界上隐退并染上了地区主义观点。

但是批评欧洲的人忽视了情况的积极面。英国和法国已不再争雄，法国和德国也不再相互为敌。西欧国家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已大有进展，并已为政治团结初步采取了一些谨慎的步骤。将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惯于把土耳其称为"欧洲病夫"。而今天，土耳其在建立一个健康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和政治局面方面已取得不小的成绩，它向北约提供的兵力多于任何其它国家。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后来建立了民主政府，并加入了北约。尽管在关于美国空军基地的前途问题上有争议，但社会党总理费利佩·冈萨雷斯仍允诺继续作为该联盟的一员。

尽管欧洲这个分崩离析的巨人距离实现真正团结仍有很长一段路，但我们也不应忽视，自从1945年以来西欧各国已大有长进。我们完全可以预言，这些在1945年前的100年里发生的数十次危机中相互冲突的国家，在下个世纪里不会再次兵戎相见。而这是自1500年前的罗马帝国时期的和平之后就没

有过的事情。

此外，美国继续留在北约并保持在西欧的军事存在仍然符合美国的利益。西欧的人口多于美国，几乎和苏联相等。我们北约盟国的领土面积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苏联的八分之一，国民生产总值加起来几乎与美国相等，超过苏联50%以上。西欧人民教育水平高，有能力开发高技术的巨大潜力。最重要的是，西欧各国都建立了民主政府，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因此，对美国来说，西欧仍然是世界上唯一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它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经济实力，是抵御苏联的前沿阵地。但是，当前一场深刻的危机正威胁着这个大西洋联盟的未来。哈罗德·麦克米伦[1]30年前就预计到了这一点，当时他对我说："维系联盟的是恐惧，而不是友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前苏联的威胁更加严重了，然而对苏联侵略的恐惧却减少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1949年建立时，是对当时我们面临的威胁的一个恰如其份的反应。但自从那时以来，世界发生了变化。如果北约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它就将无法生存。北约需要发展以迎接我们面临的新挑战，否则它就会消亡。

北约的危机来自于过去40年中整个世界所发生的深刻的变化。

1949年，当北约12个创始国的领导人聚集在华盛顿签署其宪章时，他们都是基于以下四点共同的想法而决定加入这个联盟的：

---

1 Harold MacMillan （1894－1986）：英国首相（1957－1963年）。——译者

1. **莫斯科给西欧造成了危险的军事威胁**。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使西方领导人坐卧不安的恶梦是，几十个师的红军席卷欧洲，直扑英吉利海峡。欧洲各国共产党对苏联的路线亦步亦趋，并强烈谴责任何参加“马歇尔计划”的西欧国家，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心目中一个充满敌意的苏联的形象。结果，所有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甚至欧洲各社会党的领导人都不否认危险的存在。西欧各民主政党一致认为，克里姆林宫的军事入侵是个现实的威胁。

2. **美国的核优势足以对付苏联的常规力量优势**。1950年，北约国家的地面部队不到60万人，而苏联却有150万人。但由于美国的绝对核优势，西方领导人在苏联二比一的常规优势面前毫不动摇。美国的武库中拥有300枚核弹，而莫斯科仅在不到一年前才试验了第一个粗糙的核爆炸装置。因此，北约各国设想，在可预见的未来，核武器能够保证西欧的军事安全。

3. **与西欧相比，美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能够承担欧洲常规防务的大部分财政负担**。1950年，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一半以上，而西欧各国仍忍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它们的经济造成的破坏。美国的经济已登峰造极；而欧洲还在捡破烂。西欧不得不复员军队，以便将资源用于恢复经济。结果，美国进来填补了空白。到1953年时，美国已在欧洲部署了435000人的地面部队，并在“马歇尔计划”项下按1987年美元计算花费了600亿美元。

4. **莫斯科的军事威胁主要针对欧洲大陆**。在战后初期，北约成员国认为克里姆林宫的侵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西欧。他们认为，如果莫斯科发动侵略战争，其军队将横扫欧洲平

原。此外，苏联当时还不是世界性的超级大国。莫斯科当时还没有能力向其周围国家以外的地区投放军事力量。因此，威胁仅及于欧洲，反应也要由欧洲作出。

1988年，以上各点已都不再是所有北约国家领导人的一致看法。

首先，大西洋两岸的北约领导人已在苏联对西方的威胁有多大这一问题上产生了深刻的分歧。总的来说，美国人认为苏联威胁和过去一样严重，甚至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重。他们以苏联大规模扩充其战略和常规力量，继续统治东欧，以及70年代莫斯科在地缘政治方面接连得手为例，说明克里姆林宫与西方为敌的意图。

西欧许多人同意美国对东西方冲突的看法。他们仍记得1948年的柏林危机。当时，只是由于西方国家实行空运，莫斯科才没能使西柏林陷于饥饿。他们仍记得赫鲁晓夫在修建柏林墙时恶毒地拍手称快的模样，而这是有史以来唯一不是为了抵御外敌入侵，而是用于防止本国公民外逃的一堵墙。他们深知在东欧共产主义统治下人民生活的艰难。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华约部队接受的训练从来是为了进攻，而不是为了防卫。

但近年来，在西欧人中，尤其是（但却不仅限于）左派人士中出现了用另一种眼光看苏联的倾向。对于美国的观点，较负责任的批评者认为美国人对一种确实存在、但却被夸大了的威胁做出了过火的反应。他们辩解说苏联威胁并不是如此严重、如此迫在眉睫，反应不必如此仓皇。他们指出，苏联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成功的历史现象。鉴于克里姆林宫的国内问题很大，以及维系其东欧帝国日益困难，苏联无法

对西欧构成严重威胁。在他们看来，只有克里姆林宫里的疯子才会考虑发动一场跨越中欧平原的侵略战争。苏联进行核袭击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任何神志清醒的领导人都不会把统治一个城毁人亡的欧洲作为战争的合理目标。因此，他们认为美国人的忧虑和提高警惕、做好战备的要求是一个不成熟的世界大国所做出的过火反应。

那些对美国进行不大负责任的批评的欧洲人把这一分析更推前了一步。他们认为美国比苏联对和平的威胁更大。他们提出，西欧应该退出东西方斗争。他们以激烈的言辞指责美国强迫西欧加入美苏之间的"冷战"，并居心不良地将美国在西欧的驻军称为"占领军"。他们认为美国的轻举妄动比苏联的侵略更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幸的是，欧洲的两大社会党，即英国的工党和西德的社会民主党都已屈从于这些观点。在不久前的竞选中，它们的纲领都要求完全撤走美国在欧洲的核力量，还提出了其它将直接导致解散北约的措施。

这一问题在得到缓解之前，无疑会变得更加严重。北约成了自己成功的受害者。主要由于联盟的建立，西欧取得了空前未有的稳定、繁荣和安全。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所指出："只需要一代人成功地维持了和平，人们就会以为和平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只有那些以备战为职业的人才会威胁和平。"北约成功地遏制了苏联的进攻，使许多人怀疑究竟是否存在过威胁。由于在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新领导班子更加注意公共关系，这一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一些民意测验已表明西欧人认为美国的行动对和平构成的威胁不亚于甚至超过苏联行动所构成的威胁。如果这种看法变成一种潮流，那么它将

使中立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成为欧洲未来的浪潮。

第二个主要变化在于整个东西方战略和常规力量的对比，这给北约的西欧防卫战略带来了深远的后果。

在常规力量方面，苏联仍占一定的决定性优势。在欧洲，华约有2700万军队，47000辆大型作战坦克、5400架战术飞机。北约则有2400万军队，23000辆坦克、4000架飞机。华约在几英里外的苏联就有大批的潜在储备力量，而北约的储备力量却远在4000英里以外的美国。尽管北约部队具有技术优势这一有利条件，但他们缺乏一个一体化的指挥系统，并需保卫长达4200英里的战线，而完全一体化的华约部队只需要从一个点上进行突破。此外，西欧国家一直懈于备战，一旦打起常规战争，北约的弹药很快就会用完。

最令人不安的是，今日的美国已不是冷战初期的美国，已经没有绝对的核优势对付苏联军队的威胁。从1945年到1949年，美国垄断了核武器。从1949年到50年代中期，美国垄断了向对方领土进行重大的核打击的手段。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美国仍享有相当的核优势，但这种优势已在逐渐消失。从7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苏联先是在战略武器上与美国取得了均势，然后又继续前进，在陆基弹道导弹方面取得了相当程度的优势。

美国在享有绝对核优势的时候，采用的是“大规模报复”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如果苏军突破了中欧的防线，美国的反应不仅是向进攻的苏军发射战术核武器，而且将以美国的战略力量全力打击苏联本土。但我们之所以能够以大规模核报复相威胁，只是因为莫斯科当时还没有能力以牙还牙。一旦苏联建立起自己的大型战略武库，美国对常规入侵施以

核报复会在几小时内招致数百万美国人的伤亡。因此，大规模报复的威胁成了双方都要自杀的威胁，因而失去了其可信性。

结果，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60年代采取了“灵活反应”的理论。一旦苏联发动常规袭击，这种理论要求北约部队动用任何必要的力量来阻止敌军前进，但暴力水平越低越好。如果常规力量无法阻止华约的进攻，北约将首先使用战场核武器，然后使用中程战区核力量，最后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美国的战略武器。这样，美国领导人就能根据战场形势作出灵活反应。

尽管美国的核优势当时正在消失，但灵活反应理论保住了欧洲的安全。由于北约完全能够用战场和战区核武器阻止苏军前进，灵活反应理论将最终决定是否把战争升级为全面战略核战争这一难题准确无误地交给了克里姆林宫。因此，苏联领导人在估算发动任何战争的风险时，就不得不把全面战争的风险考虑在内。这就减少了莫斯科利用其常规优势的威胁讹诈西欧的可能性。

战区核力量又称中程核力量，即美国部署在西欧、能打击苏联腹地的导弹和轰炸机，被视为灵活反应理论的关键。只有这些武器才能执行将苏联常规增援部队在远未抵达前线时就将其消灭这一重要任务。此外，也只有这些武器才能保持在欧洲的威慑力量的可信性。战略均势已使美国对常规进攻进行战略报复的威胁的可信性有所下降。因此，为了加强威慑，美国需要发展能够以从欧洲向苏联实行报复相威胁的能力。

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因此，1979年，北约中的西欧成员国要求美国在欧洲部署陆基巡航导弹和潘

兴Ⅱ式导弹。我们的盟国知道，一旦爆发战争，北约的轰炸机不仅无法突破苏联的空防，而且这些轰炸机亟需在前线执行常规轰炸任务。他们还知道美国的海基导弹命中率不高，不足以击中苏联内的军事目标。因此，这些陆基导弹对于在欧洲的威慑力量至关重要。正因为如此，西欧各国政府不顾声势浩大的街头反核示威游行，甘愿付出政治代价，换取美国在1983年部署这些导弹。

西欧有了这些武器，北约遏制苏军入侵的战略可谓天衣无缝。莫斯科知道，即使它的常规入侵在初期得手，也必将招致对苏联本土的核打击——这正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所不敢冒的风险。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导弹，北约的威慑便会出现一个缺口。最好的结果是，美国是否会动用其战略武库（从而肯定会招致对美国城市的大规模核反击）以免北约在常规战中失败将大可置疑；而最坏的结果是，这可能使西欧国家在危机中极易受到恐吓和讹诈。因此莫斯科也许会不发一枪就在欧洲取胜。

正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才把消除美国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列为他军备控制中的最优先项目。他之所以拼命想得到他最近与里根总统签署的协定，并非出于那些轻信的观察家们所说的目的——节省资金用于急需的国内项目。核武器造价低廉，节省下来的钱很有限。

一些天真的热衷于军备控制的人争辩说苏联接受双零点方案是西方的胜利，因为戈尔巴乔夫在欧洲放弃的核弹头是我们的四倍。他们却没有问问自己："为什么？"戈尔巴乔夫不是慈善家，也不是反战运动分子。俄国人是世界上最好

的棋手，而下棋的关键在于早作布局，总要多想几步，预见对手最可能走哪几步并预谋对策。美国的谈判者只顾眼前的一步，即减少核武器的数目。戈尔巴乔夫则集中注意战略全局的另一方面：他的目标是要使北约内部脱钩，尤其是使西德同美国脱钩。他成功地瓦解了我们在德国最坚定的朋友们的斗志，并得到了反核活动家的喝彩。由于最近签署的军控协议，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赢得欧洲，但却改善了今后某个时机苏联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地位。

北约建立以来的第三个关键性的变化是经济财富的分布。战后初期美国领导人自愿负担保卫欧洲的大部分费用是因为当时欧洲人自己没有这样做的经济能力。但这一情况已经改变。西欧早已从二战的废墟上得以重建。今天的西欧在经济上与美国平起平坐，它的国民生产总值达35000亿美元，比美国的40000亿美元只略逊一筹。此外，美国有庞大的政府赤字，已不能够为将华约军队阻挡在两个德国边界的那一边而承担大部分的费用了。

然而，虽然西欧已有能力，但它对共同防务所出的钱仍然低得极为不合比例。美国的防务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而西欧国家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5％。正如前北约总司令亚历山大·黑格多次所指出，我们不应低估盟国对欧洲防务的贡献。它们提供了北约的大部分兵力，并仍然实行征兵制，而美国则没有。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绝对值看，美国人为保卫西欧免遭苏联进攻所花的钱比欧洲人花的多。

最后，自北约创建以来的第四个根本变化在于各成员国对于西方在欧洲以外应采取什么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分歧。

1949年时，各成员国一致认为苏联的主攻方向很可能是欧洲，因此当时不大考虑在别处对付苏联的扩张。但除了对殖民主义问题有争议外，所有北约成员国都普遍同意它们具有共同的全球利益，包括防止共产主义扩散。因此，当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发生共产党暴乱时，英国和法国便期待盟国支持制止暴乱。当北朝鲜入侵南朝鲜时，美国则期待盟国派兵参战。

但是这种礼尚往来的做法在50年代和60年代失灵了，今天则几乎已不存在。对盟国在欧洲以外合作的一次最大打击是，1956年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美国决定反对英、法以武力收复运河的做法。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时反对是有理由的：关于夺取运河的计划，英国和法国对他秘而不宣，甚至向他撒谎；而他也不希望被人认为支持明目张胆的帝国主义行动。英法所选择的行动时间也极为不宜，正是我们刚刚谴责赫鲁晓夫派兵进入匈牙利的两个星期之后，而再过一个星期美国就要大选，艾森豪威尔的竞选纲领又恰是和平与繁荣。

当时我是支持这个决定的，但回顾起来，我们反对英、法保卫其苏伊士运河利益的努力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最大错误。我有理由认为艾森豪威尔在卸任后也持同样的看法。问题的根本在于我们当时没有设身处地为盟国着想，没有考虑这会给西方团结带来长远的损害。对于他们来说，苏伊士运河代表着极关重要的利益。对苏伊士的干涉行动的失败最后造成的灾难性结果是：我们的盟国从此不再发挥世界大国的作用了，并开始仓促撤出它们在全球各处的阵地。

在它们撤出的时候，我们要么是不得不取而代之，要么是甘冒由苏联人取而代之的风险。莫斯科对此心领神会，于是苏联威胁的重点转移了。50年代中期，北约已巩固了欧洲的中部防线，因此克里姆林宫便转而进攻两翼。随着莫斯科试图进入欧洲帝国撤出所留下的权力真空，新的扩张主义将出现在第三世界。在其后的几十年里，苏联成为令人生畏的世界大国，它已能将其力量投放到世界各地，威胁西方的利益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通道、石油储备和矿藏。这一挑战是北约从未遇到的，对付这种挑战的稳妥的战略也有待这个联盟制定。

此外，正当我们的欧洲盟国放弃它们驾驭世界事态发展进程的责任之时，一些政治领导人对发生在第三世界的重大东西方冲突所采取的立场变得越来越不负责任了。在越南战争时期，对美国为防止河内残暴的极权主义军阀控制整个印度支那所做的努力，一些欧洲人谴责之为不道德。他们还将减少欧洲紧张局势当成一件有绝对价值、其本身就是目的的事情来追求，而不管苏联在其它地区的行为是否威胁了西方的利益。在这些人看来，苏联在非洲发动的代理人战争不值得做出反应。苏联1979年直接入侵阿富汗后，他们也只是口头上谴责，此外不采取任何行动。甚至对莫斯科1981年镇压波兰团结工会，他们也只是口头上慷慨陈辞，而行动上却不冷不热。

当前，北约内部在欧洲以外的问题上存在的分歧是前所未有的。在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中，盟国不允许我们从它们的领土向以色列补充给养。1986年，玛格丽特·撒切尔由于决定同意美国飞机从英国空军基地起飞袭击利比亚而受到

反对者们的激烈批评。法国拒绝允许我们的轰炸机途中飞越法国领土，迫使这些轰炸机多飞了数千英里。今天，北约盟国只是勉强同意与美国合作保护波斯湾的航行自由，美国为防止苏联在中美洲建立桥头堡所作的努力也是和者甚寡，得到的却是许多没有见识的吹毛求疵的批评。

目前北约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威胁，而是欧洲批评所带来的有害后果。它使北约失去了国会议员的好感。70年代，国会中的自由派孤立主义分子曾攻击过北约，他们几乎通过了裁减驻欧美军的《曼斯菲尔德修正案》。今天，反对北约的是保守派分子。他们不仅认为盟国在防务开支上占了便宜，而且还认为这个联盟对美国在第三世界捍卫自己的利益起束缚作用。他们甚至扬言北约削弱了西方，破坏了美国的国家安全。1949年时，美国国会两党绝大多数人支持北约，如今这种支持已烟消云散了。

由于当初作为北约诞生基础的共同认识发生了以上四方面深刻的变化，因此，这显然已不是过去那种使人们每隔几年便要求对这个联盟作一次“痛苦的重新估价”的那种司空见惯的危机了。

现在北约存在着心理上脱钩的现实危险。任何联盟，如果其成员对联盟本身存在的中心目的产生歧见，这个联盟便不可能存在下去；任何联盟，如果其成员拒绝公平分担集体安全的财务负担，这个联盟便不可能存在下去；任何联盟，如果其成员在它们的安全受到什么威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这个联盟便不可能存在下去；任何联盟，如果其成员怀疑它的一些伙伴的诚意和良好的意图，这个联盟便不可能存在下

去。

除非美国及其西欧盟国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当我们在1999年回首往事时，我们会看到今天的分歧正是北约终于解体的最初迹象。

作为总统，我力图将1973年作为“欧洲年”，以便使我这届政府集中精力于解决时代变化所带来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取得我认为本来能够取得的进展，而在我之后的历届政府也没有为处理这些问题做出协调一致的努力。因此，不管是谁在1989年接替里根总统，他都应该把上任后头一年用来解决大西洋伙伴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下一任总统会很想把苏美关系列为议事日程中的第一项。有些人会敦促他谋求早日同戈尔巴乔夫举行首脑会晤。那将是一个错误。在谋求改善同对手的关系之前，我们应先修复与朋友的关系。这意味着在同苏联人会晤以前，必须同我们在北约的主要盟国认真磋商，而不是事后才敷衍了事地向他们通报。

下届总统上任后，应会集北约各国政府首脑，就我们之间具有分歧的问题开始进行部长级谈判。这些谈判应为这个联盟重建联系的纽带，并促成年底召开一次北约战略首脑会议。这将是庆祝北约成立40周年最合适的方式，并将使北约在1999年成立50周年的时候，呈现新的活力和目的。

我们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这一联盟，这是至关重要的。欧洲仍然是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地缘政治目标。一个芬兰化的欧洲会极大地加强苏联的经济实力，并导致美国的经济灾难。美国也不能陷入自得其乐的新孤立主义。美国需要盟国来帮助捍卫西方在全世界的利益。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45

年所说："我们已经领会到我们独自生活在和平中是不可能的。"

此外，与欧洲决裂将割断我们的历史脉络。我们基本上是由欧洲的民族和理想所组成的。我们与欧洲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信念、文化和哲学传统。我们之间的军事联盟和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不仅反映了我们所面临的共同外来威胁，也反映了我们的共同传统。

在一个新的"欧洲年"，我们应集中精力重新锻造北约的战略基础。近年来，这个联盟的拿手好戏是以模棱两可和晦暗难懂的语言发表毫无意义的公报。其领导人宁愿掩饰分歧，而不愿努力达成一个明确的协议。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一清二楚地阐明我们对北约安全所受到的威胁的共同理解和我们所应采取的共同战略反应。直截了当地说，那就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威胁，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北约来对付它。

首先，我们应就对手的性质取得一致看法。许多人声称，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之下的苏联对西方已不再是一个危险的威胁，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迄今还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戈尔巴乔夫已改变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地缘政治主攻方向。他并未停止扩充苏联的军备，也未减少对它在第三世界代理国的支持，也没有改变在东欧的苏联卫星国的地位。

如果戈尔巴乔夫的确改变了苏联国内的状况，在国外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西方应该欢迎他的行动。但我们一定要等他做出这些改变之后，才宣布这些应归功于他。应等他改变了对我们的政策之后，我们才能以改变我们对他的政策作为回报。不能让他两者兼得——既缓合了同西方的紧张关系，又继续采取威胁西方利益的行动。

我们还必须对苏联威胁的性质取得一致看法。事实是，莫斯科既在欧洲中部前线，也在第三世界威胁着西方的利益。要认识对欧洲的这种威胁很容易，因为其表现形式是100个师的训练有素、时刻准备着开往西方的部队。苏联在第三世界的黑手较难察觉，但其威胁同样是千真万确的。虽说美国的超级鹰派应承认并非所有的反西方运动和叛乱都是由苏联的行动所造成，但西欧人也有必要承认其中一些的确不乏苏联背景，西方必须对这种间接侵略作出反应。

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尽管苏联人的长期主要目标是西欧，但他们眼前所威胁的却是那些其自然资源对欧洲的生存是不可缺少的国家。苏联无需在欧洲发动战争就能够统治欧洲。欧洲已有40年未发生战争，这证明了北约是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但是，虽然苏联没有在欧洲向北约直接发动战争，但它却在过去的40年里成功地在第三世界间接地向北约发动战争。它现在还在这样做。如果北约不制定出对付这种威胁的战略，苏联人不必直接进攻就能实现其统治欧洲的目的。北约在欧洲的常规部队实际上将成为一道受敌人包围而变得毫无用处的马奇诺防线。

因此，北约的主要成员国必须明确西方在世界各地的关键性利益所在，并制定出进行合作的保卫措施。我们必须不屈不挠地为重振我们的战略联盟而努力。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基本战略、重新组织西方的军事力量，并重新确立过去一度存在过的把东西方之间的总的关系同莫斯科在世界各地的行动相联系的做法。

欧洲的防卫依然是北约的核心任务。欧洲爆发战争是极

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不会发生。谁也不曾想到，奥地利大公遇刺会触发一场长达四年、使1400万人丧生的战争。大多数人当时都认为这场可怕的冲突是“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而结果却是20年后又爆发了另一场战争。战争最好的盟友正是那些声称战争绝不会爆发的人。

因此，在考虑欧洲防务时，我们不能首先认为战争永远不可能爆发。如果不存在苏联入侵的可能性，美国防务预算中直接用于欧洲防务的一千多亿美元可以有许多更好的用途。除了对付华约的威胁之外，北约的存在没有别的理由。但如果战争可能爆发——即使可能性很小——我们就不能仅仅因为现任的苏联总书记笑容和蔼可亲、握手坚定有力而放松我们的警惕。

在欧洲防务中，北约必须首先全力解决核武器的作用问题。核武器对于欧洲既是福也是祸。北约的核武库为西欧提供了廉价的手段来对付苏联在战后的常规优势。这在经济上帮助了欧洲人。但西欧人在经济恢复后没有重新考虑他们对核威慑的依赖，核武器便成了他们安全的唯一支柱。欧洲人把他们的灵魂卖给了核时代。他们的决定降低了自己的全球性作用，在政治上对他们不利。这些一度称雄世界的国家把自己贬入了地区性国家的行列之中。

但是鉴于目前常规力量的对比，北约还不能放弃核武器。没有核武器，一旦爆发战争，北约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在常规战中被打败，要么打一场全面的战略核战争。由于签署了新的军控协议，要摆脱这种困境就更困难了。因此，当务之急是随着拆除美苏中短程核力量工作的开始，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如何使北约保持核威慑力量。

首先，我们必须抵制这样的政治诱惑，即把消除在欧洲的所有核武器作为我们军备控制的目标。在欧洲已经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政治压力，要求使新的军控协议更上一层楼并禁止战场核武器。但轻易地在政治上得分会带来战略灾难。苏联人的长远目标一直是使欧洲成为无核区。莫斯科知道美国人威胁要以全面战略战争对付常规入侵的说法并不可信。在欧洲全面禁止核武器会进一步损害早已磨损了的在欧洲的美国绊网。这将使美国的盟国成为苏联的常规军事威胁的牺牲品。

第二，我们必须加强美国核力量与欧洲防务之间的联系。新的军控协议将在今后三年内消除美国在欧洲的导弹。这使北约有足够的时间调整军事态势，保持威慑力量。我们应增加能够深入华沙条约组织国领土执行核打击任务的轰炸机的数量。我们应在拨给北约使用的美国军舰上部署更多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美国新型的三叉戟Ⅱ型潜艇装备有命中率高、用于对付硬目标的弹头，我们应将一些这类潜艇拨给北约专用，作为我们对北约承担的义务的一部分。

第三，我们应放弃要求在十年内消除所有核武器的雷克雅未克方案。下一届政府应自觉地与这个天真的观念决裂。在可预见的未来，核武器和核战争的威胁都将存在。这是国际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核武器必须成为我们制止战争爆发的战略的一部分。就盟国对美国的信心而言，最深重的打击莫过于美国在雷克雅未克的谈判立场中采纳了无核化的幻想。应该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现实主义取代雷克雅未克的宣传词藻。撒切尔夫人在1987年告诉戈尔巴乔夫："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可能是个梦想。但你不

能把可靠的防务建立在梦想之上。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对我们所有人都将是更不稳定和更危险的。”

我们还必须弃绝那种不负责任地指责核威慑是不道德的说法。这种说法根本是错误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我们不会需要以核武器进行威慑。不管怎样，我们都应尽量减少对这些武器的依赖。但世界的现实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拥有核武器来遏制潜在的侵略者发动战争或迫使我们不战而降。这是以实际中现有的最好手段去争取实现的合乎道德规范的目标。

第四，我们必须设法把西德结合进我们的威慑战略中来。1979年，正是西德——当时在社民党赫尔穆特·施密特总理的领导下——首先要求在西欧部署美国的中程导弹。新的军控协议撤走了这些导弹和相应的苏方导弹。但是莫斯科库存的数千枚远程导弹仍可打击西欧的每一个目标。消除中短程核武器并未减少苏联对欧洲或美国的核威胁，但却使北约无力从欧洲用核武器反击苏联对欧洲的进攻。西德没有自己的核武器，因而特别经不起苏联用核武器或常规武器进行讹诈。在这个问题上，下一届政府必须设法使德国人放心。

第五，为了提高需要使用核武器的门槛，我们必须加强北约的常规力量。正是由于北约的常规劣势，美国才在欧洲部署核武器。倘若战争爆发，今日的北约将很难不立即把战争升级到战略核水平，以阻止克里姆林宫常规部队的推进。但情况也可以不必如此。北约可以通过纠正当前常规力量的失衡以减少不得不作出那种可怕决定的可能性。事实上，战略防御计划研究的副产品给研制新的常规武器、帮助恢复欧洲的力量平衡带来了希望。但是，我们应认识到，增强北约

的常规力量是加强核威慑，而不是取代核威慑。它大大地加长了核引信。

提高核门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西欧都有好处。对核战争的恐惧瓦解了欧洲的士气。建立在会带来这种灾难性后果的威胁基础之上的防务政策肯定不可能持久。欧洲人已开始感受到他们自己的防务所带来的威胁。因此，他们应该采取一种以可靠的西欧常规防务为基础的战略。如果我们的盟国有一种能够真正保卫它们的防务，而不是依赖某种到头来可能只是放空炮的防务，它们就会感到更加安全，从而也更有信心。

要使威慑政策具有可信性，就必须重新使欧洲人确信执行这种政策的好处大于付出的代价。当前的核威慑经不起这一检验。人们害怕核战争甚于害怕俄国人。以核威慑为后盾的可靠的常规防务则会经得起这一检验。

在制定战略时，北约必须拒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诱人但却是危险的概念。苏联人宣扬这一概念是因为他们知道北约的战略纯属防卫性战略。任何严肃的观察家都不会认为北约会对华约部队发动进攻性的常规袭击。而另一方面，苏联人的战略却公然是进攻性的。北约战略的唯一目的就是以威慑防止苏联进攻。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就取消一个重要的威慑因素。必须使苏联的军事计划人员意识到，如果北约的常规防卫不能奏效，他们就有遭到核报复的风险。

美国可以就欧洲的常规防务提出倡议，但实现这种防务的政治行动必须要靠欧洲。今天，美国在西欧的军事存在已达到30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用于北约的开支不可能增加，

相反却有大量减少的危险。如果西欧人珍视美国的军事存在，他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就有失去它的危险。

鹰派已经同鸽派一起提出美国应从西欧撤出相当一部分美国部队，以迫使欧洲人采取行动。他们指出，只要美国人付旅费，西欧人就会愿意继续这种免费旅行。这种观点在国会已相当普遍。当美国在欧洲的存在达到高潮时，国会对保持这种存在的支持却处于低潮。

对北约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许多欧洲人的自鸣得意的态度，认为美国绝不敢退出这个联盟。我要警告欧洲人不要有这种想法。我任总统时曾为了打掉旨在大量减少驻欧美军的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而同国会反复斗争，结果我只是险胜而已。我坚信欧洲的重要性，并坚信美国有必要支持北约。但我也了解国会。事实是，欧洲人没有交上几个新朋友，却使许多老盟友灰心失望。如果西欧试图混过目前的危机，国会中的怀疑派肯定会组织一个联盟，新的自由派孤立主义者将和老的保守派孤立主义者合流，要求削减驻欧美军——这一次他们会有足够的票数获胜。

说到底，西欧人不能再以低廉的代价得到他们的防务了。欧洲不能再单单依靠美国核升级的威胁来弥补北约的常规劣势，因为在美苏均势的时代这种威胁已失去可信性。美国也绝不会承担责任使常规力量能与苏联匹敌。西欧人必须认识，他们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能否省钱，而是能否保住联盟。

因此，欧洲必须用欧洲的办法来解决欧洲的常规防务问题。这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涉及西欧各国军队的一体化。这一想法在1954年因法国投票反对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建议

而受到否定。1965年，由于法国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部，使这种想法无法实行。但是现在采纳防卫力量一体化想法的时候已经到来。

在过去的40年里，尽管一些欧洲人曾在海外与非正规的游击力量作战，但除了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进行干涉和1981年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以外，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曾在欧洲以外的重大常规冲突中作战过。除了防卫欧洲，我们盟国的常规部队几乎没有存在的理由。因此，充分发挥这些部队完成其主要目标的效用是合乎情理的。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再次提出建立真正欧洲集体防务的思想，从把在德国的中部战线的兵力完全一体化入手，继而在实际可行的基础上将一体化扩大到其它地区。法国将需要改变它与北约的关系，但法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需要同盟国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西德和法国拟建立一个联合旅的计划就是明显的例子。

随着西欧人对自己的防务承担更大的责任，应指定一个欧洲人为盟军最高统帅，欧洲的军备控制谈判也应由欧洲人负责。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推卸责任。只要美国的军队仍在欧洲出生入死，它就必须在制定涉及他们安全的东西方协议中有重要的发言权。但是，我们的作用应只是指明我们希望达成什么样的协议。总的来说，由于欧洲的军备控制对欧洲安全的影响甚于对我们安全的影响，谈判应由欧洲人牵头。

进一步在欧洲实行控制军备的谈判，重点应是讨论常规力量的对比。正是由于常规进攻战争的手段——大炮、坦克和军队——的不平衡才造成了战争的威胁，因而有必要进行核威慑。15年来，我们一直谋求在均衡裁减军备谈判中解决这一问题。莫斯科进行阻挠，我们默许了按照苏方的核日程

进行谈判，而不是迫使苏联人谈判那些使我们只好求助于核武器的苏联常规力量优势。结果，我们在军控方面的努力一直是只治标，而疾病却任其发展。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当欧洲负责军备控制时，它必须把重点放在对和平的这一大威胁：苏联在常规力量方面的优势。

北约在加强其力量的同时，也应该扩大自己的任务范围。当苏联的势力在第三世界的关键地区扩张时，受影响的不仅是美国的利益，也有欧洲的利益。当莫斯科成功地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地缘政治目标时，这是对大西洋两岸各国安全的进攻。由于我们利益相近，我们就须作出联合的反应。

我们必须认识到，自从1949年以来，苏联已改变了它的战略。苏联的主攻方向已不再是中部战线，而是暴露着的两翼。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知道工业化民主国家高度依赖关键性的海上通道和第三世界的资源。即使西欧已有一项用核能源代替石油的长期计划，1995年它仍将有三分之二的能源靠进口的石油。莫斯科集中力量利用这个致命弱点，在一些资源丰富的国家煽动革命、网罗代理军。

如果中段战线被占领，西方将垮台，而如果在第三世界被包抄，西方也一定会垮台。欧洲各国的经济如果不能获得世界各地的资源和市场就会无法生存。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推进对西方联盟的打击不亚于欧洲。西欧不应期待美国独自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这种思想已经过时了。维护和平人人有责。我们需要的是一支保安队伍而不是一个孤侠来维持和平。只有所有的国家都为建立和维护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建立现实的和平。欧洲人尤其应该这样，因为极而言之，美

国能够单独生存，而西欧却不能。

北约各国应在捍卫西方在世界各地的利益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并进行合作。这些国家在世界事务方面有数百年的经验可以利用，尤其是在那些它们曾是殖民国的地区。法国在非洲中部和撒哈拉以南地区的行动便是一个很好的典范。过去40年里，法国的精锐部队为防止苏联在非洲得手，进行过十几次干涉。

北约任务扩大后，应把恐怖主义作为另一个目标。对一个国家的公民进行恐怖主义袭击，就是对所有文明国家的袭击。恐怖主义是对国际秩序的国际性挑战，需要对它作出国际反应。北约盟国应制定出一个对付恐怖主义袭击的合作计划和联合行动。

我们的合作应扩大到经济援助计划。我们应共同以那些具有战略重要性、又最需要我们援助的国家为对象。在选择提供援助的手段时，美国应乐于听取欧洲人的建议。他们在同自己原先的殖民地打交道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往往比美国能更好地起牵头作用。例如，由于同法国的关系，科特迪瓦成为非洲为数不多的繁荣国家之一。英国对同它的前殖民地打交道有很多经验，这是西方的宝贵财富。

我们如能联合行动就会比单干更有成效。因此，我们应扩大北约的任务。美国和西欧携手合作，能够成功地挫败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缘政治进攻，并制定出鼓励繁荣而不是鼓励中饱私囊的经济援助计划。

我们在新“欧洲年”中还必须就北约各国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取得协商一致意见。政治上我们应向克里姆林宫显

示我们是一条统一战线。我们不能允许苏联人挑动大西洋两岸的一方反对另一方，利用我们联盟之间的嫌隙扩大他们的影响。

对美国人来说，建立统一战线要求我们在言论上降低调子。好战的反苏演讲也许能给美国的保守派听众鼓气，但会使欧洲的各盟国心寒。在欧洲人看来，冷战的激烈言辞不能使人怀疑苏联的意图，反而使人担心美国人的鲁莽。我们以坚定和以理服人的口气也能向西欧人发出同样的信息，同时又不致于无端地损害联盟。

对于欧洲人来说，建立统一战线就要求把对苏政策同苏联在世界各地的行为联系起来。苏联的意图应以行动而不是气氛来衡量。欧洲人对现实世界的状况往往比美国人持更现实的态度。他们应该比我们更先认识到只改善东西方关系的气氛、而不解决东西方之间的实质问题是虚幻的成就。我们都应记住，苏联需要与西方改善关系更甚于西方需要与苏联改善关系。

此外，在采取协调行动阻止向苏联人非法出口战略技术方面，西欧人应大大加强与我们的合作。他们在这些方面的一些做法不负责任到令人吃惊的地步。80年代中期，苏联人通过日本和北约成员国挪威取得了减少他们潜艇噪声所需要的机器。结果，美国将需要花费500多亿美元才能恢复它过去在反潜作战能力方面的优势。西欧人应认识到由于向苏联泄露高级技术给西方带来的危险。美国毕竟只是在北大西洋驾驶潜艇，而西欧人却生活在北大西洋沿岸。

最重要的是，要建立有效的西方统一战线就要求北约动员其经济力量。这既是我们最大的本钱——北约的经济就产

量而言同苏联相比高于三比一——也是我们使用得最少的本钱。既然莫斯科在反对西方的斗争中不择手段，我们在用王牌来遏制克里姆林宫方面也应不失任何良机。

鉴于戈尔巴乔夫谋求振兴苏联经济，我们的经济力量将使我们具有空前的牵制力。苏联的经济增长部分依靠与西方贸易和获得西方技术。我们可以肯定，随着美苏军控协议的签署，接踵而来的将是苏联的贸易代表团到各西方金融中心寻求投资者。1987年12月首脑会晤时，戈尔巴乔夫曾明确要求有机会会见美国商人，这绝非偶然。

无论是里根政府还是西欧人都没有对增加东西方贸易提出足够的政治条件。美国不仅结束了卡特时期的谷物禁运，而且还谈判了一笔新的谷物交易来安抚美国农场主。西欧各国政府则为了达成苏联市场可以接受的交易而不惜代价。两者都采取了一种只追求经济交易、而不把经济交易同苏联的国际行为相联系的目光短浅的政策。如果贸易的增长不与苏联在世界各地应有所收敛扎扎实实地联系起来，到头来只会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毁灭。宣称经济制裁无损于苏联经济是一个神话。那无异于说一艘救生艇因为有漏孔而浮不起来，堵上漏孔、制裁就有效了。

我们应有同莫斯科作经济交易的意愿——但对方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而要由我们开价，唯一的办法是西方国家携手合作，制定出一个充分利用其经济力量的战略。

在新的“欧洲年”，北约必须决心采取大规模的行动。它通常采取的不痛不痒的解决办法是无法防止一场根本性危机的。在对联盟进行重新评价时，我们不应相互指责，不应

各方都考虑对另一方采取一套惩罚措施，最终导致联盟的解体。相反，重新评价应是携手合作，制定出共同的方针迎接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在实现40年前创建时的目标方面，这个联盟已出色地发挥了作用。但当时要求它对付的威胁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而联盟本身也必须加以改变才能对付这种威胁。1999年的世界将与1949年的世界大不相同。如果这个已有40年历史的联盟现在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1999年它就会报废。

有人认为欧洲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已彻底完蛋了，我们不应理睬这些人的意见。事实将证明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欧洲即将复苏的迹象。人们很难相信,仅仅六年前英国还被认为是欧洲的病人，不会再有所作为。而今天的英国却在经济生产率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方面居工业化民主国家之首。英国的进展预告了欧洲的进展。

西欧有潜力在90年代实现第二次复兴。不愿为其防务作出必要牺牲的大国失去了一种自尊感。这是一种难以描述、但在有亲身经历的国家看来是个十分明显而且颇为痛心的现象。任何欧洲国家都无法成为超级大国，但团结的欧洲却可以构成一个超级大国。西欧不应该作为东西方之间的诚实的经纪人，或更糟糕地作为这一斗争中的一个小卒。西欧能够也应该成为当之无愧的平等伙伴。在防务上依赖美国的欧洲最多只会在作出有关欧洲安全的决定之前事先被征求一下意见。而更可能是在事后才进行通报。这对大国来说是一种无法忍受的现象。

欧洲各国人民的力量、教育水平、工业能力和技术专长都足以使他们跨入各国的前列。大幅度然而又是量力而行地

加强常规军事力量将使他们有充分的资格在决定自己和世界未来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是，除非欧洲人振作精神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否则他们就难以发挥自己的潜力。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应为自己的军事安全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则应努力帮助他们发挥潜力。在新的“欧洲年”里，我们需要重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不仅是为了使这个联盟能够迎接它所面临的新挑战，也是为了使我们的盟国能在政治上发挥无愧于它们传统的作用。

第七章

勉强的巨人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上只出现了一个新的经济超级大国。历史上只有一个亚洲国家跨入了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前列。也是这个国家享有亚洲最稳定的民主。它就是日本。这个充满远古传说的国度在过去40年里所取得的经济和政治成就，只能用令人愕然这个词来形容。

托克维尔曾预见美国和苏联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和最强劲的对手。但在他那时候，日本在西方还不为人知，它还是一个笼罩着神秘色彩、由其统治者所造成的封闭社会。1854年，海军准将佩里[1]打开了日本的大门；大约就在那时，日本的领导人认识到，日本前途的关键在于明智地利用西方的影响。

日本的发展是稳步向前的，但西方却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1924年，温斯顿·丘吉尔在预测未来时少有地犯了一个错误。他说："日本远在天涯海角，它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威胁我们的重大利益。"17年后，在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大的一场战争中，大英帝国及其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被日本帝国杀得溃不成军。而正象丘吉尔无法预言对日战争的情况一样，

[1] Mathew Perry (1794—1858)。——译者

他也不可能预见到，战争结束40年后，日本会成为西方民主国家大家庭中可靠的一员，而且几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

直到1929年，日本还只占世界经济生产的4%，美国则占34%，英国、德国和苏联各占10%，法国5%。今天日本已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仅次于美国。1945年，美国的原子弹打败了日本，也炸毁了日本的工厂。1987年，日本成为仅次于加拿大的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其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苏联。

人们常说日本的经济奇迹是战后时代最重要的发展。但即使没有这场战争，日本仍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之一。战争如果起了作用，也只是加快了这一进程。50年代初期，日本的传奇人物吉田茂首相曾半开玩笑地说道："很幸运，日本被炸成一片废墟。如果日本现在引进新的机器设备，它应该能够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国家，生产率会比那些战胜国要高。销毁机器费用很高，但是敌人替我们代劳了。"吉田茂是正确的，因此他提出的保守政策和原则当今的日本领导人大部分还遵照执行。

撰写或谈论日本的经济奇迹已成为时髦。但更令人赞叹的日本奇迹是，在一个几百年来一直为军阀和天皇所统治的社会里，民主竟诞生了。美军占领时期，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富有远见的领导和吉田茂及其精心培养的接班人的照料下，民主站住了脚跟，并已根深叶茂。日本在20世纪的伟大成就是建立了一个经济上强大的日本。美国的伟大成就则是建立了一个民主的日本。历史上没有任何国家象美国那样如此一片好心地进行军事占领，并取得如此持久和良好的效

果。也没有任何国家象日本那样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之一是，一个战败国公民的年均收入现在是 16 000 美元，仅比战胜国公民低2 000美元。仅仅20多年前，日本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25％。

日本变成亲西方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是战后时期最偶然的事态发展之一。日本虽然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不是欧洲国家，但它对西方联盟的重要性不亚于北约的任何成员国。战略上，它是东方的堡垒。经济上，日本的力量对制定统一的西方经济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同西方结盟对它大有好处，苏联进一步向前推进对日本的不利不亚于对美国和欧洲各国。

日本已成为西方联盟不可缺少的一员。如果日本为苏联所囊括，太平洋将成为赤色的海洋。1983年，中曾根首相曾保证说，他的国家对于遏制苏联在远东的侵略将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他的生动的比喻说得还不够，因为其对日本所起的作用的含意是太被动了。美国、日本和西欧的生产总值占世界的2／3 以上。这些经济力量全部纳入一个单一的地缘政治战略——加上与此相匹配的官方和私人发展援助，军事开支和贸易——之日，就是西方在冷战中取胜之时。自由的力量联合一致，极权主义就绝不可能横行。

西方联盟有了日本比没有日本强大得多。美国和日本都应该为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感到自豪，这种伙伴关系使日本从战争的痛苦和破坏中成长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战争和其后的美国军事占领——以及占领结束后直至今日的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其后果既有消极面，也有其积极面。

目前对日本的治理是依据一部由美国人制定的宪法，并由美国人译成略为别扭的日文。当时，在日本这样一个被战

争折磨得精疲力竭的国家，这部宪法中的反战规定没有引起多少争议。而今天，随着一种健康的民族自豪感日益增长，有些日本人觉得这一规定是侮辱性的。同时，日本和西德一样，其国防的关键因素仍然依赖美国。

建立在依赖基础上的关系会造成双方相互蔑视。有关战争的惨痛记忆也会如此。珍珠港事件只不过是47年前的事情，巴丹岛血战46年前，广岛和长崎43年前。一个现年35岁的日本人，当他出生时，他的国家仍处于军事占领下，受华盛顿的统治。美国人和日本人对这些事件的记忆和判断其正确与否是各不相同的。表面上看来，美国人和日本人也许是现代历史上曾互为对手而现在却相处得最好的国家。它们已克服了彼此间的分歧并学会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携手合作。但不幸的事实是，许多没有经受过外国军事占领的美国人仍然记恨日本人发动了战争，而许多没有遭受外国军事入侵的日本人，则对被占领感到愤恨。此外，每一个日本人都意识到日本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经历过核战争恐怖的国家——这一点已烙刻在每个日本人心中。

这些愤怒情绪只有受到其它因素的激化时才会变得非同小可而且具有危险性。近年来象一片乌云笼罩在美日关系上的尖锐的经济分歧便是一例。除非日本和美国的领导人都以勇气和远见采取行动，否则今天的暂时经济压力会给世界上一个最重要、最富有成果的双边关系造成永久性的破坏。

尽管贸易不平衡绝不是美日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却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1986年，日本销往美国比美国销往日本的货物多600亿美元，这是造成美国在世界贸易中高达1700

亿美元赤字的主要因素。批评日本的人说这一贸易逆差使美国人失业，他们还抱怨日本人对美国商品关闭市场。

日本的政策制定者们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来增加日本人用来购买进口产品和劳务的钱。他们本来可以购买美国的180美元一吨的大米，但他们却禁止进口大米以保护日本农民，而日本农民的大米售价为每吨2000美元。对财产税和城市规划政策进行修改可以降低土地极其昂贵的售价，从而使消费者有更多的钱用于其它开支。例如，在东京市中心的一块地皮的价格要比在曼哈顿繁华区同样大小的地皮高900倍。70年代中期坐落在郊区的一座中等大小的房屋售价是7万美元，现在则高达100万美元。虽然日本人已经取消了很多阻碍进口的关税，现在他们的税则比欧洲经济共同体少，但他们还可以进而降低使美国公司无法大力参与诸如大阪港的关西大型新机场之类项目的政府性非关税壁垒。

但是，尽管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者时不时地发出在政治上很得人心的抱怨，但日本人却不能对贸易赤字负全部或主要责任。美元和日元比价的变化也有巨大的影响。从1955到1975年期间，日本进口大于出口、出现贸易赤字的情况共有14年。但后来美元的比价和美国人对节油的日本汽车的需求都上升了，日本的产品便开始流入美国。1987年，美元对日元的比价猛跌时，贸易赤字开始下降，日本开始受到日元升值的不利影响，正象美国出口商一两年前受到日元贬值的不利影响一样。最后，在我们对日本人吹毛求疵之前，我们应该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行为。我们不能把美国巨额的联邦预算赤字归咎于日本人，也不能因为他们在诸如家用电子仪器等

工业部门的竞争中超过了美国而对他们有所指责。

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日本没有采取我们认为它应该采取的行动来改善我们的贸易地位的话，美国是否应该以保护主义的立法来惩罚日本。回答是否定的。自从40年前当选为国会议员以来，我一直主张自由贸易。但我的论据并不在于保护主义的罪恶，而在于世界力量对比的现实状况。日本同其它所有国家一样，执行它认为符合本国利益的政策。在盟国和友邦之间，对这些政策总会有不同意见。但除非短期的意见分歧比长期的关系更重要，否则就必须避免采取惩罚措施。这个道理很简单，奉行保护主义的美国政客们应懂得并牢牢记住。

可是，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却摇摆不定。光景好的时候彼此友善，光景坏的时候几乎公开敌对，有时甚至是剑拔弩张。去年有个参议员称日本人为“水蛭”；一个众议员对日本人向美国市场倾销廉价半导体怒气未消，说道：“上帝保佑哈里·杜鲁门。他扔了两颗（原子弹），应该扔四颗。”这种言谈应受谴责，但在贸易保护主义情绪正高涨的时候，出自那些急于保住自己位子的美国政客之口，是不奇怪的。然而，日本是西方战略联盟中的一个平等伙伴，不能每逢贸易问题闹起来时便把它当作一个方便的政治出气筒。日本人已注意到国会就贸易问题进行辩论时的恶意的语调，自然会怀疑在其它领域能否信赖我们的友谊。值得注意的是，一本题为《日本不坏，美国坏》的书去年被列为日本的畅销书。另外一本颇受欢迎的书——《处在危险中的日本》提出，美国正把日本作为其经济问题的替罪羊。

美日关系中的最重要因素是信任和尊重，任何两个友好

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莫不如此。双方都必须承认，虽然我们一直是、今后仍将是经济上的强硬竞争对手，但在维持和平方面我们又是伙伴，因此所作所为就应该象伙伴。在我过去40年中所见过的数百位政府领导人中，我最珍惜我有幸会面的几位日本首相与我之间的个人友谊。他们是：吉田茂、池田勇人、岸信介、福田纠夫和佐藤荣作。

不能允许贸易逆差或币价波动等次要危机从根本上影响自由世界中这两个经济上最强大国家之间的关系。同我们之间关系严重破裂可能导致的动乱相比，这些偶尔的磨擦是无足轻重的。

美国和日本都是成熟的国家，能够经受得起它们关系中的狂风暴雨。但由于我们在战后建立的这种关系的特殊性质以及我们两国文化传统的差异，双方都必须谨言慎行。去年一家日本公司的子公司显然是背着政府和母公司向苏联人出售关键性的防务技术，一些美国议员便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砸碎了东芝收音机。这种作法不是一个联盟的成员在同另一个成员发生争议时所应有的行为。

和在贸易问题上一样，一些对日本持批评态度的美国人动辄指责日本遵照40年前美国的规定禁止军事活动。的确，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我们不应期望日本人在处理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时能象处理力量对比那样容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可以随着某人的一次握手或大笔一挥或爆炸一颗炸弹而改变，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1953年，当我以副总统的身份访问东京时，日本报纸以

八栏的大标题报道了我的讲话：美国在二战后以宪法的规定限制日本的防务开支是“犯了一个错误”。我当时就认为，日本应该为自己的防务多做些事情。由于日本的财富大量增加，和苏联正向太平洋“伸手”，我在35年前提出的论点今天有了更充实的理由。但是，日本之所以迟迟不采纳这类建议，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

50年代期间，在美国完全默许的情况下，日本所采取的政策使它几乎可以将其全部人力物力都用于国内经济建设。军事开支被控制在最低水平，这既是因为日本有一部美国制的严格限制其军事开支的宪法，也因为它有我们的核保护伞。但随着我们的经济增长在70年代放慢，以及越战以后我们的防务预算的增长幅度下降，日本的低水平防务开支在美国成了一个问题。人们在辩论这一问题时的主要口号是：“别再沾光了。”

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日本人对大规模扩军在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其理由美国人是应能理解的。近年来，尤其是在中曾根首相任职期间，日本人开始摆脱1945年的毁灭性失败给他们蒙上的阴影。但要理解为什么在过去的30多年里日本人一直不愿在军事上加强自己，为什么时至今日日本人对防务开支仍充满极为矛盾的心情，我们只要看一看美国在越战之后的情况就行了。

在印度支那遭到失败后的五年里，美国的孤立主义愈演愈烈：军事预算被削减；每逢在国外动用美国部队时，都需经过极其吹毛求疵的审查，使美国实际上成为一个无所作为的世界大国。今天，越战结束已有13年之久，新闻媒介和国会中的孤立主义者仍愤怒地批评为保护我们在中美洲或波斯

湾的利益而动用哪怕是美国的一兵一卒。在战争中被打败就能造成这么深远的影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120万人战死沙场。我们在向他们宣讲应把更多的钱用于防务时，不应忘记美国在越南只牺牲了55000人，但却在一段时间里丧失了民族自豪感，并因患上优柔寡断、孤立主义的毛病而一度陷于瘫痪状态。

日本不愿重建军备是由于战败的创伤所致，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同情他们。但这种不情愿又是一种借口，使他们能在享有经济超级大国地位的同时，又无需承担军事超级大国的责任。这是不能接受的。日本人不愿重建军备的心情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靠美国为其提供安全保障的确使日本能舒舒服服地将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经济建设，现在同我们进行经济竞争，而且在某些领域的竞争中超过了我们。

在战争中被打败和战胜国制定的政策迫使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实质上是被动的角色，但日本最终必须放弃这种角色，这有三点实际的原因。这三点都不仅涉及我们的安全利益，而且也涉及日本的安全利益。

首先，当初美国承担起日本的防务责任时，几乎控制着50%的世界经济。而今天仍然维持着这一承诺的美国却只控制着世界经济的27%。因此，日本在防务上沾光极容易成为喜欢抨击日本的美国人的目标。如果这种不满的情绪扩散的话，我们同日本之间的极为重要的互利关系终将受到破坏。

其次，日本必须意识到，对一个大国来说，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作用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责任。把本来可以用于解决国内问题的财力花在防务开支和外援上并不是件愉快的事情。我们这样做是不得已的而并非自己的意愿。这个世界

总的来说对自由是不友好的。任何兴旺发达的自由社会要想在这个世界中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承受这种负担。二战以前美国是个孤立主义国家。尽管它的自然倾向如此，战争还是使它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日本也必须奋起履行一个世界大国的义务。

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除非日本切实履行它作为大国的义务，否则它便无望得到真正的国家安全。

从地理上来看，日本是一个岛国。但如果日本仍试图在地缘政治上只充当一个岛国的话，它是无法生存的。有个评论员曾说过，日本不想“与任何人为敌”，只想“向所有人推销商品”。这个目标值得称道，但却根本不可行。原因简单而无情：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苏联的一个事实上的目标。不管是在苏联的太平洋战争计划中还是西方联盟的遏制或必要时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的计划中，日本的作用都被估算在内。

苏联过去十年里在远东地区扩充常规军备一直是一个不祥的朕兆。苏联军力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现在正以太平洋战区为目标。1976年，苏联部署在亚洲的兵力是31个坦克师、2000架作战飞机和755艘舰艇的海军。今天，苏联则有41个师，85架新型、载有核导弹的逆火式轰炸机，2400架作战飞机和840艘舰艇。即使根据拟议中的中程核武器条约的规定，撤除了苏联在亚洲的中程核导弹之后，日本的所有关键目标仍在苏联战略核武器的射程之内。

更令人不安的是，尽管戈尔巴乔夫在亚洲发动“和平攻势”，俄国人却仍在炫耀其巨大的实力。1986年，苏联飞机侵入日本领空达350次，据估计1987年次数更多。1986年，苏联

韩国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们都应认真考虑它们更害怕什么：是日本的18万人的自卫队，还是苏联在亚洲的78.5万人军队？是日本只有270架飞机的空军，还是苏联在远东的2700架飞机？

战后出现的新世界要求重新估价亚洲的力量对比。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愈强大，亚洲就愈安全。在任何争取亚洲和平的战略中，日本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如果苏联突然发动一场常规入侵，目前的日本自卫队只能抵抗两天。一些反对日本进行大规模扩军的评论家说，美国的安全保证足以阻止苏联采取这类行动。遗憾的是，情况并非如此。由于美国在现场没有足够的地面部队与苏联人抗衡，要阻止这样一场入侵起码是困难的。美国不久就不得不考虑使用海基核武器或美国本土上的核武器。

虽然这些武器都是严阵以待，但危险在于苏联人会把使用这些武器的威胁当做虚声恫吓。美国于1979年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武器的主要原因，就是人们担心如果苏联部队向西欧进军，美国不会使用其本土上的战略核武器，以免有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远东也是如此，而且更有甚之。如果美国总统使用核武器阻止苏联对日本的常规袭击，他可能使美国遭到大规模的核攻击——一个总统不大可能甘冒这种风险。苏联人知道这一点。因此，日本今天很容易受到这种袭击，处境是危险的。日本最终必须具有以自己的力量进行自卫，防止苏联常规入侵的能力。它不需要一对一地赶上苏联，只需要做足够的努力使苏联的入侵因代价太高而根本无法考虑。

目前日本不能进行全面的扩军。日本各邻国对第二次世

界大战记忆犹新。但这种情况会改变的——尤其是如果日本在向亚洲和其它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和进行投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话。当日本向世界表明它愿意为建立一个和平、繁荣和自由的亚洲而投资时，各邻国对它的军事态势的疑虑肯定会慢慢地消退。如果日本在21世纪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它将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捍卫自己及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友邦和盟国利益的超级大国。

过去，日本人一直由于没有把更多的钱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而受到批评，因为与美国相比，他们的防务开支要少得多，只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而美国则占7％。但值得赞扬的是，日本人近年来增加了对外援助，尽管许多有困难的工业国已减少了这种援助。1987年，除了每年80亿美元的例行援助外，日本还宣布了总值达300亿美元的新的援助计划，大部分用于援助与日本有大量贸易往来的亚洲国家。这是个值得欢迎的步骤，但步子还不够大。

基本的问题在于联盟中的每一个国家在国家安全方面花了多少钱，而不是在国家安全预算中军事开支占多大比重。美国的国家安全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其中6％用于军事开支，2％用于经济援助。日本用于国家安全的开支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其中军事开支占1％，另外1％为基本经济援助计划。日本国家安全开支的总数应向美国看齐，即在经济援助方面拨出足够的资金，以弥补军事开支方面的不足。

由于国内劳动力费用上升，日本也开始象美国的多国公司那样，打入发展中国家寻求廉价的劳力市场。这些投资可

以有助于也可以有害于发展中国家，这取决于如何进行和管理这些投资。二战之后，随着美国的经济力量扩展到世界各地，出现了“丑陋的美国人”这一无稽之谈。日本必须尽力避免“丑陋的日本人”综合症。1985年，一位来自同日本有良好关系的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官员告诉我：“日本人的毛病在于他们和半导体一样——只进不出。”这种夸张的说法有失公允，但却指出了日本的一个潜在危险。我们的拉丁美洲邻国对美国的跨国公司也常常有同样的抱怨。任何一个富裕的外国，不管它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对这些国家多么有益，都是左翼政客和革命分子喜欢攻击的目标。不能期望日本商人在国外成为慈善家，但他们应讲究经营方式，以免给二战期间曾经遭受日本侵略之害的各国人民心中尚未熄灭的反日情绪火上加油。如果日本人打好他们的亚洲牌，他们将再一次证明，一个拥有跨国工厂的经济超级大国能够为它自己和这些工厂的所在国带来不可估量的好处。

说日本商人不是慈善家并无侮辱之意。日本商人和各国商人一样，也想尽量多赚钱。他们也未必愿意通过发展援助、投资和技术转让，使其它国家发展到成为日本未来的竞争对手的地步。

但是，长远来说，这些国家肯定要与日本竞争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正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的经济已被摧毁。但现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的帮助，日本的经济在同我们的经济竞争。美国商人过去常抱怨很难竞争得过日本的廉价劳动力。而现在，日本人则担心竞争不过韩国的廉价劳动力。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将成为对日本和美国的巨大挑战。

单从贸易和利润这一范围狭小的问题来看，日本成为美国的对手出现在一些人看来似乎是一个不幸的事态发展。但从东西方之间斗争这一更广阔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有着深刻的积极意义，因为在自由国家的大家庭中，日本的实力和西欧的强大经济一样，补充了我们的实力。

日本对自己与穷国的关系也必须有这种宽阔的胸怀。日本不希望这些国家滑入苏联的轨道。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日本在战略上将受到危害，经济上也将遭到削弱。极其贫穷的共产党国家是日本或任何其它工业国产品的不景气的市场。由于这个原因，日本同尼加拉瓜、古巴和越南等共产党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虽然短期内有利可图，但从长远看对日本和西方的作用是适得其反的。苏联人利用他们在边远地区的前哨对这些地区广泛传播专制独裁和经济崩溃。日本最好还是少强调同这些国家的贸易，而多重视同那些需要帮助以抵制共产主义诱惑的国家之间的贸易。

最近，日本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贷款进行了再筹资，在缓解这些国家的债务问题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些行动及其增加援助的计划，说明日本认识到为发展中国家的未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为日本的未来投资。

日本开始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是可取的，也是必然的。日本与其背着过去流血战争回忆的包袱，不如为建立一个新的和平的太平洋分担责任、共享荣誉。今天的美国仍然有数千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与日本人作战，其中一些是国会和其它机构的领导人物。对于他们和其他不计其数的人来说，想到日本东山再起是不舒服的。对于许多亚洲人也是一样。但再过50年，活着的人中没有人会记得第二次

世界大战。100年后，这场大战将象美国内战或美墨战争对今天的美国人那样，成为一个非常遥远的事件。到那时，日本人会早已认识到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日本的命运不听命也不依赖任何其它国家。

如果日本要成为西方联盟中真正的一员，除了经济和军事力量以外，它还需要具备其它两个条件。它需要有更加国际主义的心态和愿意在世界舞台上坚持日本利益的领导人。

关于领导人的条件已正在形成。

在多年前举行的一次西方首脑会晤中，戴高乐曾这样说起战后的一位日本首相："这个半导体推销员是谁？"这句话不留情面但却一针见血。1967年，新加坡的李光耀也曾同我谈到同样的话题。他说："日本人必定会再次在世界上发挥重大的作用。他们是个伟大的民族。他们不能也不应该满足于把自己在世界上的作用局限于生产更好的半导体收音机和缝纫机，以及教授其它亚洲人如何种水稻。"

戴高乐和李光耀这两位世界领袖中的巨人，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除了吉田茂之外(他的专横作风曾招致左翼反对派的嘲笑，但却使对战争深感厌倦的日本人民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得到精神力量)，大多数的日本首相无疑地都是谦和的。日本当时在世界上的"低姿态"要求领导人也具有低姿态的风格。在过去的30年里，日本有过许多杰出的领导人，他们都忠实地执行吉田茂所制定的政策：自由企业，经济增长，政府稳定，与美国保持紧密的安全关系。这些正是日本为在战乱后复兴而迈出的第一步所需要的政策和领导人。

中曾根康弘是日本战后出任首相的第一个外务相。在他任职的五年中，日本迈出了第二步。它开始为防务承担更多的责任。日本领导人第一次想成为一个完全由各主要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组成的联谊会中积极而直言不讳的一员。自从传奇式人物佐藤荣作和吉田茂以来中曾根是任首相时间最长的。他同这两位首相一样，果断地引导着日本前进。他为日本的首相树立了新标准。希望竹下登这位手腕高超的接班人能继承中曾根的新传统。

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首相一直在政府正式掌权，而过去大权在握的天皇只是严格地充当礼仪性的角色。尽管如此，切不可低估日本君主作为一种团结各方的力量所起的作用。麦克阿瑟将军在为日本缔造新的民主政体时所作的最英明决定之一就是允许保留天皇。当天皇裕仁最终告别历史舞台时，日本将失去一位为日本的进步立过大功的精神领袖。

日本国外的许多人视天皇为慈眉善目的庸人，成天不是种树养花，就是沉浸在他所嗜好的海洋学中。但了解他的人都不会同意这种看法。我见过天皇两次，一次在1953年，当时我是副总统；另一次在1971年，当时我是总统。他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虽然他为人谦和，但对国际问题却有浓厚兴趣和了解。

轰炸了广岛和长崎之后，裕仁呼吁国民放下武器，这使战争得以尽早结束，从而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进行抵抗的游击战。裕仁的坚定与镇静的态度有助于日本人民把日本从战败国建设成和平时期的经济巨人。他对日本所面临的挑战了若指掌，并深知自己有责任鼓舞国民去迎接这些挑战。

长远来说，任何一个联盟的状况不仅取决于其领导人的

素质，而且还取决于能否培养出一种联盟心态。就西方联盟而言，所需要的是在这个联盟中的两大成员日本和美国之间建立一种更公平的关系。

日本和美国还没有找到所谓政治上的平面赛场，双方在这种场地上能够作为对它们之间的平等地位有充分信心的平等伙伴打交道。现在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文化障碍和不愉快的回忆。日本至今仍存在着对西方影响的恐惧心理的残余，这种心理使日本在海军准将佩里用武力打开日本大门之前的几百年里一直是闭关锁国。甚至当他们在夏季提高棒球的球艺、冬季用铃声奏起《欢乐颂》的合唱曲、每年消费几十万个汉堡包的时候，日本人仍在抵制任何穿过最表层向深处渗透的西方影响。事实上，正是因为日本人始终意识到西方娱乐和时尚是外来品，他们对这些东西才更感津津有味。

美国人对日本人也有自己的疑虑。即使不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人们心中留下的记忆，东西方之间仍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时髦的美国青年对寿司了如指掌，却无法去领悟神道这个至今仍为数百万日本人所信仰的古代宗教。美国农场主的怨气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日本政府限制进口他们售价为每吨180美元的大米。但却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日本执政党的官方理论是要限制进口大米，其原因至少一部分在于在日本土地上生长的大米是“我们精神文明的核心”。大多数西方人对日本的民风不甚了了，许多将要前往东京的商人觉得有必要去上课，复习一下谈什么话题保险，什么话题危险，以及到日本人家里作客时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常常批评日本人的文化传统过于内向，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过于执着，而不顾及其它国家。但在许多方面，美

国人也大同小异。在美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大多数美国人都不愿与欧洲所发生的冲突有任何瓜葛，尽管大多数美国人的祖辈都来自欧洲。直到二战结束，美国人与日本人的共同点要比与欧洲人的共同点少得多。但是，自从1945年以来，美国和日本有了民主和自由企业这些共同点。以此为基础，可以进一步有所作为。这些应是我们两国之间友谊的基础。

我们的欧洲军事和经济伙伴也是我们的文化伙伴。我们与英国人有着共同的语言，与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在祖先、哲学、文学和音乐方面都有共同点。但我们的欧洲遗产中的精华是政治自由。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只是继承了它。现在我们又与日本分享着这种自由。未来对美国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要认识到，由于我们都致力于自由，因此，我们与日本人的文化关系同我们与欧洲人的文化关系一样牢固。

但这不是单方面的。日本人民也必须向我们开放，不仅是开放市场，而且还要开放他们自己。他们必须学会不怕"西方毒害"；他们必须认识到，曾经是他们主要长处之一的文化和种族单一性也许会妨碍他们努力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争取自由与繁荣的多民族联盟的一分子。

的确，我们在文化上有所不同，这些不同不会消失，也不应该消失。均脂牛奶的面上是不会有奶油浮起的。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如果各个伙伴在追求和平与繁荣的共同事业中贡献其特有的长处，那么双方的力量都会大大地增强。

日本对美国存有戒心，其部分原因也许是由于战争的余毒和许多美国政客令人遗憾地认为教导日本人太容易了。作

为我们这个联盟中最强大的一员，我们往往会错误地认定我们也是最英明的一员。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我们想在世界上投放这种力量的意愿有时会使我们受到弱小国家的猜疑，而且我们还常常表现出智力方面的狂妄自大。我们的评论员、众议员和参议员急不可耐、怒气冲冲地劝日本人："增加防务开支。放松银根、刺激对美国产品的需求。增加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援助。向我们在波斯湾的努力提供资金和道义支持。"

如果这些日本人都能做到那当然很好。但他们不会因为我们要他们这么做，或采取某种行动符合我们的利益就遵命去做。相反，他们倒很有可能向我们提出一个议事日程："如果你们解决预算赤字，我们就会更多地购买你们的产品。我们会增加防务开支和对第三世界的援助，但你们必须证明你们的外交政策是前后一贯的，既非越战中的'全力以赴'，也不是患了越南综合症后的'埋头于沙中'，而是介乎两者之间。"

日本外交官精明强干，彬彬有礼，绝不会以这种粗陋、针锋相对的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同样，当我们以政府官员的声明，国会中的讲话和报刊社论等同样粗陋的方式下令日本人起步走时，他们也不会做出积极反应予以接受。在同日本人打交道时，我们常常忘了国际事务是一门微妙的艺术，产生误解的可能性极大。我们绝不会这样满不在乎地对待我们的欧洲盟国，除非我们甘愿面对严重的后果，这方面的一个事例是当年约翰逊总统公开批评戴高乐之后，法美关系冷淡长达一年之久。可是我们却很想教训、哄骗甚至威胁日本人。他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认为我们把他们的友谊不当回

事？还是认为我们以战胜国自居仗势欺人？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已证明自己对日本是热情友好的，尤其是在美日友谊对我们有利的时候。我们还需要证明自己是一个长期可信赖的朋友，因为在亚洲人看来40年只是一个瞬间。要当之无愧地取得不仅日本人、而且我们在全世界所有友邦和盟国的信任，我们就必须停止纯粹为了在国内捞取政治好处而对他们横加批评的作法。对于那些我们不允许它们教训我们的人，我们也不应存教训之心。

归根结底，在美日之间培养一种健康的联盟心理的最大障碍在于这两国现在不是联盟中的平等伙伴。

日本的一个观察家说过："日本要具有平等地位，就必须单门独户。如果日本不是单门独户，它只能是低人一等，并很快变成西方的殖民地。"这句话的嘲弄人之处在于，由于日本在安全方面依赖另一个国家，事实上它在一定程度上已是西方的殖民地；它只是作为经济大国才是平等的一员。因此，日本人的困境正好与苏联人相反，苏联仅因为其军事实力才取得超级大国地位。正如日本人自愧于他们在安全上依赖美国，苏联人也自愧于自己在经济上的落后。苏联经济的问题在于共产主义。日本国家安全的问题在于政治和心理上的约束使日本无力保护自己。

能够帮助日本消除其对于失去个性的恐惧的办法，就是由日本在外交、发展、最终在军事方面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日本人民完全有理由一想到战争就感到厌恶，许多日本人不愿日本重新武装。美国人民也厌恶战争。不同之处在于，美国人支持保持足够水平的国家安全开支，以保卫祖国、对付任何侵略者。日本人的态度必定也会改变，尤

其是如果其邻国对日本的再次崛起不再那么担心的话。随着这种变化，日本人民由于认定日本已再次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而产生一种新的自信心。一个更加活跃、更加自信的日本将意味着下一个世纪太平洋地区的自由与和平的前景肯定将大有好转。

第 八 章

苏醒的巨人

20世纪的中国受尽了劫难：它经历了革命和困苦、贫穷与希望、政治和思想动荡、乱后得治、治后又强行乱。在60年的时间里，中国猛然从一个古老的王国成为稚弱的共和国，然后又变成了共产主义专政的国家。它时而怒气冲冲地把西方的点滴影响都拒之门外，时而又谨慎地接受同西方改善关系的好处。它是世界上最具有同一性的国家之一，但在这个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它的内部却一直同室操戈。

1949年革命后，中国充满敌意、处境孤立。在那个年代里，许多西方人对它既怀疑又恐惧。它是东方的愤怒而神秘的赤色巨人；在西方各国人民尽情享受战后经济大繁荣之时，它却刻意要把一种惩治性的、狂热的、纯而又纯的意识形态信条强加给本国人民。西方领导人中，研究过中国及其曲折的历史者寥寥无几，夏尔·戴高乐是其中之一。他在1962年[1]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使支持他的某些反共人士颇感意外。当有人问及缘由时，戴高乐回答道，“因为中国是个大国、古国，又一直备受欺凌。”

60年代我在野时，由于中苏分裂和戴高乐、阿登纳等政

---

1 原文如此。——译者

治家的启发，我对中国的想法已开始有了变化。戴高乐和阿登纳都告诉我，美国同中国发展某种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1963年赫伯特·胡佛[1]89岁寿辰我去纽约看望他时同他的一次谈话。他给我出的主意恰恰相反。他说，我们不应同中国人来往，因为他们“嗜血成性”。当他描述1900年他作为一个年青的工程师在中国的经历时，看得出来他还惊魂未定。那是义和团起义之时，一小撮狂热分子举行暴动反对西方剥削。团民和镇压暴乱的官兵都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暴行。胡佛夫妇回忆起他们曾目睹数以千计的尸体在他们租界沿边的河流上飘浮而过。

他们是一个野蛮的世纪揭开帷幕时的目击者。20年后内战爆发，孙中山的军队推翻了秉政已有2000年的帝国。在30年代，中国饱受日本强暴的侵占之苦，据中国政府称有2200万人死于非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另一场内战中和1949年毛泽东的部队击败蒋介石后巩固共产主义新政权时，又有500万人丧生。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工业化运动和强制实行的集体化运动中，2700万人饿死。中国领导人当时却称之为“大跃进”，岂非怪事！几年后毛泽东发动了文化革命，对全国进行严格的思想审查。这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民不聊生，在知识分子中造成的创伤直至今日还没有消除。受害者之一是邓小平之子邓朴方。狂热的红卫兵把他从窗口推下，使他从三层楼摔到地面。现在他只能与轮椅为伴。

但是我们时代的奇迹之一是中国在惨遭20世纪各种最可怕的天灾人祸之后，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头等大国。160年前，拿破仑这样描绘中国：“一个巨人在沉睡着。

① Herbert Hoover（1874—1964）：第31任美国总统。——译者

让他睡吧！一旦醒来，他会震动全世界。”这个巨人现在苏醒了。他的时候到了，他准备震动世界。

在和外来与内部的势力苦斗了半个世纪之后，中国统一了。仅在50年中人口从4亿增至10亿。在20世纪的一位最杰出的政治家邓小平的领导下，它摆脱了教条型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消除了一切由政府机构进行计划所造成的不堪承受的压力，从而把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巨大潜力发挥出来。如果中国继续走邓小平的道路，我们孙辈的世界将有三个超级大国，而不是两个——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2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它还算不上个大国。那时它是个发展中国家，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仍是如此。有些专家当时认为中国积极响应我们的倡议只是因为它们想取得西方的市场和西方的投资。一位专家预言毛泽东问我的第一句话将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准备怎么帮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错了。1972年我和毛泽东、周恩来会晤长达20小时以上，中方没有提起经济问题。当时对中国领导人说来，重要的不是美国的金钱而是美国的实力。使中美两国走到一起的是国家安全这个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

两国的和解也许是战后年代中最富有戏剧性的地缘政治事件。但是意义最深远的事件则是60年代的中苏分裂，其后中国原先在意识形态上的师表、在经济上的恩人莫斯科便成了虎视眈眈的对手。中国对苏联在其北部边界大军压境、苏联导弹以其城市为目标、苏联援助与其敌对的印度以及苏联对亚洲其它地区的领土野心都深感不安，使它除了求助于苏联的最强大对手美国之外，别无其它选择。中苏都是共产党

国家，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同两国是天然的冤家对头。但是，中国人知道苏联威胁着他们，而美国则不。正如1976年我在北京对当时党的领袖华国锋所说，有时一个泱泱大国也必须在意识形态和生死存亡之间作出抉择。华国锋表示同意。1972年，中国选择了生存。

北京的若干强硬路线分子顽固反对同资本主义美国发展关系；无独有偶，我们寻求同中国建立新关系的决定也使一些美国人有切肤之痛。他们认为我们同共产主义分子来往会背叛民主原则。但是我们和中国人一样，别无其它切实可行的选择。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这一主动行动、中国被迫向苏联就范，那么西方今天所面临的苏联共产主义侵略的威胁将大得多。共同的理想使我们同西欧和世界各地的盟国结合在一起；但是不以这种共同理想为基础，而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在中美两国间建立一种联系，是符合两国利益的。双方都认识到，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哲理性分歧，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互为敌人，而有一个充分的理由结为朋友——我们在遏制苏联威胁方面有共同的利益。

这一威胁至今仍使我们感到关切。事实上，这一威胁今天比16年前更大了。包围的魔影使中国人坐卧不安。1972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北越关系友好，美国人在南越和柬埔寨，阿富汗中立。今天，越南、柬埔寨、老挝和阿富汗都是亲苏、反华的。1979年，中国同苏联支持的越南人发生冲突，伤亡两万人。

但是，即使当时不存在苏联威胁，我们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和世界人口最众多的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关系也是当务之急。一个原因是友好关系显然会带来更多经济和文化上的

好处。另一个原因是原子时代的严峻现实。1967年我会见戴高乐时，他说他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但是美国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陷于孤立”。我的回答是，“10年后中国的核能力取得重大进展时，我们将没有选择的余地。目前我们之间的交往不够，应该增多，这是至关重要的。”强国之间虽有分歧仍应交往，否则就可能产生误解和错误的判断，这种风险是现代世界担当不起的。我们同中国之间的隔阂，从纯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不无道理，但它是一件我们双方都已负担不起的意识形态奢侈品。核武器对于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含意。对于负责的国家领导人，它意味着我们无论如何应寻求共同点。

从长远看，中美关系能持久存在，其原因不是恐惧而是希望。只要双方都不对对方或对方的友邦和盟国怀有领土野心，我们之间就不会产生芥蒂。双方友好不会使我们有丝毫损失，而只会使我们大有所得。1949年至1972年之间，美中贸易几乎是零，16年后美国已一跃而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但发展的速度非凡。从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始时至1983年，中国八亿农民（改革的最先受益者）的个人收入增加了70%。一些专家预言，下世纪初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西德。

然而，为了正确理解这一点，应补充说明在2000年时，西德6000万人的人均收入将是每年2万美元，而中国的10亿人则只有人均875美元。中国新任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不久前泰然自若地说过，邓小平开始的现代化运动要使中国达到象美国这样先进国家的水平，可能需要100年之久。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担任过赵紫阳的职务的某些人（特别是中国的毛

泽东和苏联的斯大林）曾认为可以在几年而不是几十年中强行达到这个水平。因而发生的动乱使几千万中国人和俄国人死于非命。在一些分析家看来，赵紫阳的较为现实的预言似乎是降低了要求。在我看来，这话很有中国味。赵紫阳同许多东、西方的领导人不一样，他知道快速解决等于一点没有解决。但是他又极其自信地认为，优秀的人民的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一旦迸发出来，必定会结出累累硕果。

1969年我们再次谈起中国时，戴高乐说，“你最好趁早承认中国，而不要等中国强大了使你不得不承认它。”他是对的。世界上最能干的十亿人所具有的潜力必然会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和军事巨人。现在以及在20世纪结束前的几年里，我们的目标应是：确保21世纪的中国是个独立的巨人——不一定亲西方，但肯定不亲苏。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关系冻结了20年，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隔阂不合乎情理，因为1972年以来的事态已经表明，两国人民之间大可互通有无。只要中国同苏联结盟，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是对手。这一障碍排除了之后，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结为朋友。

今天，美中两国人民在中国的发展事业中已结为伙伴。假如双方坚持走这条道路，21世纪的中美关系将是世界上最重要、最互利的双边关系之一。

中国的经济革命是其领导人在两方面的看法急剧改变的结果：他们对西方采取新态度和邓小平1978年的经济改革。中美1972年和解使中国能取得西方市场和技术；邓小平1978年的改革使中国能把新得到的东西付诸使用。第一项变化是

由于中国认识到它应想个办法平衡苏联军事力量的威胁。第二项变化是由于中国认识到苏联的经济模式可能使中国人民永远陷于贫困，它应另谋出路。

这两项摆脱苏联统治和影响的独立宣言出自三位迥然不同的领导人之手。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指挥1949年革命的两位元老。他们密切配合，永远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他们也发生了几次矛盾，几乎把中国搞得不可收拾。1972年我见到他们时，他们在世人面前有意以这样的形象出现：毛泽东是个哲人，而周恩来则是执行者。我们第一次会晤时，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拒不讨论具体的外交政策和国内问题。他说这些问题应向周总理提出。“我谈哲学问题，”他说道。毛泽东在他那凌乱、摆满各种书籍的书房里，稳坐在一张安乐椅中，向客人们赠送他的诗词手稿的复印本。他摆出国父的架势，一位同日常事务若即若离、既备受爱戴又令人茫然的人物。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直至1976年去世之前，毛泽东一直是中国的擎天柱。

他们两人都是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1949年共产党掌权后，毛泽东仍是个革命者，周恩来则致力于建设国家，巩固而不是破坏中央的国家权力。他曾靠冷漠无情和老谋深算把代表旧中国的蒋介石军队驱逐出大陆，后来他又凭借这一本领建设新中国。

周恩来已从致力于革命政治转向对付革命后如何治理中国的挑战。但是毛泽东不愿让治理国家阻碍他心目中的不断革命。他为人诡诈而变幻莫测——我在 1972年 访 华 前安德烈·马尔罗向我所作的描述是：“他心中的一个梦幻搞得他神魂颠倒。”中国的群众视他为诗人、先知、学究，而且认

为他常常整人。60年代时，他感到中国的革命热情日益衰退，便发动文化革命清除一切西方影响。周恩来和他所实行的渐进式经济现代化政策被毛泽东红卫兵的狂飙所席卷。最后，周恩来本人以及他同毛泽东的伙伴关系终于幸存。其影响最深远的后果，除了这场革命本身之外，便是中苏分裂和中美和解。

中国在第二场革命中断然摒弃了马列主义的经济教条。筹划这场革命的是一位曾在第一场革命前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进行过长征的领导人。邓小平过去是、现在仍是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他在1949年参加创建新中国并对巩固这一政权作出了贡献，这使他成为毛、周手下受信用的人。但是他对毛泽东大跃进的失败感到极其苦恼，使他对信仰教条式的马列主义进行了反思。但他在60年代提出的第一个试验性的改革方案却使毛派激进分子对邓小平进行反思。1967年他被流放到外地，但到了1973年他东山再起，并可能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而这时周本人为经济现代化而小心翼翼地采取的几项初步措施也已被毛所否定。1975年，邓小平和这时已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开始着手制订那些今天指导着中国的原则——“四个现代化”。这时激进派又跳了出来，邓小平再次被流放，而周恩来在他一生的最后几个月里也大权旁落。但此后不久，建设派击败了狂热分子，粉碎了“四人帮”，曾两次被打倒的邓小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袖”。

我会见过邓小平四次——1979年在华盛顿、1979、1982和1985年在北京。他那急切的决心和绝对的自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次离开北京时印象都比上次更深刻。而每一次，他所领导的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变化又加强了我对这位

领导人的印象。人民群众充满信心，对西方和美国的事物也充满了好奇心。1972年我会见毛、周时，我们年青的女翻译们身穿灰色而宽松的毛式服装、剪了一本正经的短发。亨利·希金斯说过，“为什么女人不能象男人一样？”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太认真对待这句话了。1985年我访问广州时，中方女招待员穿的是高跟鞋和款式新颖、五颜六色的旗袍。我的东道主说，“你会注意到现在我们的衣着更多姿多彩了。我们的意识形态也是这样。”

如果过分夸大这两方面的变化，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中国领导人仍是共产党人而不是资本家。尽管他们对我热情款待，对同西方接触似乎永不满足，但是，他们广泛的经济改革的目标并不是要改变中国的实质，而是在不改变中国实质的情况下，通过引进那些适用于中国的外来影响使中国强大起来。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的。几百年来中国从未被外国入侵者或外来思想所永远征服过。它同化了它们。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1967年评论毛泽东的革命时对我说，“毛泽东正在瓷砖上作画。下雨时他的画会被冲刷一空，但中国会存在下去。”

直至邓小平在1978年掌权之前，中国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是使中国人人都一样穷。今天，一些人有机会赚钱摆脱贫困。邓小平懂得，他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是平等的贫穷，要么是不平等的进步。他把赤贫的中国同在新加坡和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所做出的成绩进行比较之后，他选择了有些不平等的进步，舍弃了不求进步的僵化的平等。

1972年我第一次看到中国。那是文化革命之后凄凉的年月。自从那时以来所发生的有目共睹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

中国仍是个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已能看到电视。大城市的街道上熙来攘往的人们穿着西式的风雨衣和运动衫。十几岁的年青人看美国电影，听西方摇滚乐队的音乐会，吃肯德基炸鸡。妇女们过去把短头发压在毛式帽子下面，现在却到北京的伊丽莎白·阿登美容院预约时间进行美容。边远省份的人纷纷到首都旅游，他们手持日本照相机前往长城和故宫参观。1972年北京大部分人彳亍而行，如今他们骑自行车，有些人还有汽车。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蒸蒸日上。1986年的增长率为11%，是工业化西方国家平均增长率的3倍。最引人瞩目的成功是在农业方面。邓小平实行改革的头两年，农民收入的增长比毛泽东时代的20年还多。由于实行了新的物质刺激体制，允许农民在上缴了政府规定的定额之后保留或出售他们所生产的任何产品，现在中国的粮食产量已足以供养其十亿人口并有余粮可供出口。中国驻美国大使韩叙最近向我指出，中国的可耕地只占世界的6%，现在养活着世界22%的人口。与之对比，在斯大林式集体农庄操劳的俄国农民却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供养苏联的二亿五千万人

西方一直屏息以待地观察戈尔巴乔夫的每一个举动。西方观众历来望眼欲穿地期望每一个苏联新领导人干出一番大事业。他们对于人权方面的每一个小让步、一丁半点的改革或开放，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的确，由于苏联是个军事超级大国，其国内的事态发展具有重大的特殊意义。但是，迄今为止，戈尔巴乔夫的表现只是他愿意给斯大林制造的破机器加加油。而邓小平通过有条不紊地对中国的农业、工业和科学现代化作出规划，已开始彻底改建中国的机器。因此，至

少在目前，年轻力壮的戈尔巴乔夫虽然衣冠楚楚、辩才无碍，但比起那位84岁高龄、身穿毛式服装、不断抽着香烟、时而放声大笑、脚边放着痰盂的中国领导人来，他则相形见绌。戈尔巴乔夫到目前为止只敢想象的事情，邓小平却做了。

邓小平敢做敢为，但他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削减中央政府的经济权力威胁着共产党官僚机构中那些靠行使这种权力掌权的人。改组中国军队威胁着军方的权势。摆弄经济自由的西方观念有鼓动中国人性格中严历的排外倾向的风险，正是这种倾向造成了义和团起义、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短期执政。

世俗之见认为中国的改革家们无法继续允许经济自由，否则便要大大改变其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许多专家说，如果农民和厂长能在市场自由行事，他们也会要求在政治领域自由行事。如果党控制经济的权力受到限制，它控制人民的权力也会被削弱。

但是，邓小平——伟大的领导人往往这样——比这些专家们高瞻远瞩，他看到的未来是他们所无法想象的。的确，他做的事情共产党国家从来没有做过。但是，绝对不能断言这些事是办不到的。如果对于邓小平改革的世俗之见最终证明是错的，其原因仅在于：这些改革行得通。邓小平所下的赌注是：撇开权力和意识形态不说，中国是不会反对办好事的。

1987年邓小平不得不撤销他选定的接班人胡耀邦的共产党负责人职务，西方有些人有疑虑，认为这正是反对办好事。中国大城市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有与新的经济自由相

称的更多的政治与学术自由，强硬路线分子把这归咎于胡耀邦。还指责胡没有维持严格的思想纪律，邓小平本人对示威游行的反应是保证对那些今后鼓动这类事件的人决不手软。

邓小平的做法引起了西方各报纸社论撰写人的尖锐批评，他们认为看来邓小平已使他们心目中的为建立民主新中国的大有希望的进军逆转了，对此他们表示失望。这些批评家对邓小平追求的目标和进退维谷的处境一无所知。他的权威来自共产党。他需要这一权威治理中国。邓小平知道改革不应使党的权威受到严重损害，否则结果将是党再次进行回击，而且也会给他致命的一击——或者更糟的是，党丧失了维持秩序的能力。某些西方超级鹰派人物梦寐以求的就是看到革命再次席卷中国，然而那会造成大批人死亡，并使中国和亚洲陷入混乱之中。

1987年底，改革派再次牢牢地掌握了大权，这时已能清楚地看出，许多人原来低估了邓小平。他的改革可能不受政府中年老的持强硬路线的保守派的欢迎，但在群众中颇得人心，因为自从革命以来群众中有许多人现在才第一次有足够的收入买得起诸如电视机和电冰箱之类的奢侈品，而这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货币流通量的增加造成了一些腐败和通货膨胀现象。工业企业未能提供足够的产品满足消费需求的增长可能造成城乡关系的紧张。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而不必改变改革的总方向。但是，中国人民对未来的新期望是绝对无法逆转的。历史的一条不愉快的教训就是，没有尝过繁荣和自由的甜头的人可以在两者皆无的情况下度过一生。但是，一旦他们有了繁荣与自由，就不会拱手交让，而会以斗争进行捍卫。邓小平的改革所引起的政治

动乱同改革如果被北京的强硬派搞垮后所可能出现的局面相比，是不足挂齿的。

邓小平在上次党代会上放弃了对中国政府的管理权，把它移交给赵紫阳。许多西方观察家以训诲的口吻评论道，一个共产党领导人能自愿、大大方方地让位，由比较年轻、经过精心培养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实属罕见。他们没有看到，这在任何形式的政府，包括民主国家中，都是罕见的。戴高乐把他公认的接班人乔治·蓬比杜甩了；丘吉尔甩了艾登；阿登纳甩了他的能干的财政部长路德维希·艾尔哈德，而且做法十分冷酷无情，有一次艾尔哈德声泪俱下地向我谈起阿登纳对他的多次轻慢中的某一次。日本的吉田茂是个少有的例外。他精心培养了池田、福田和佐藤等人在他下野后任职。因此，在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以吉田的亲西方保守原则治国。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仅是制度，领导人也是重要的。西方以有条不紊、郑重其事地移交权力见称，但这种做法仍能使政策陷于一片混乱。在独裁和极权主义的政府中，可能发生强行废黜领导人但基本国策不变的情况。例如去年哈比卜·布尔吉巴被免去突尼斯总统职务便是一例。邓小平下野时留下了他所要留下的人马和政策，他高明地创造了一个政治奇迹。

邓小平和日本的吉田一样，不认为在政府中任职的他手下的能人对他是个威胁，而认为一个领导人的政策在他身后能由精心培养的接班人继续执行，这才是最后胜利。今天邓小平的身体仍然健康。但随着他日益自感岁月无多，他得出了一个似乎自相矛盾的认识：一个领导人永垂不朽的关键在

于能谦逊地认识到别人能够也必须接替他。邓小平一生中有许多杰出的成就将为后人所铭记。但是，能主动正视自己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不是在别人的强制下完成这一认识——这样坚强的领导人在历史上是不多的。他说过："我趁脑子还没有糊涂的时候就退下来。"寥寥数语，却生动地反映了他人品的伟大。

邓小平的终身好友胡耀邦被黜一定使邓深感难过。赵紫阳是他挑中的第二个人选，这是个极其得当的人选。他是个既有魄力又有才干的经济学家和懂技术的领导人．但他也是个妙趣横生甚至是个有魅力的人。去年党代会时，他在一次酒会上向西方记者强调他和他的同僚们穿的笔挺的西服并不是进口货。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把站在身边一位高级官员的衣襟翻过来，让大家看看"中国制造"的商标。

赵紫阳积极赞同邓小平的改革方案，他甚至还迈开了一些很有希望的新步子，使小厂有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农民买卖政府发给他们的土地租约。而最重要的可能是制订新方针使共产党不要插手政府日常事务。许多反对改革的强硬路线分子被罢了官。但另一些认为邓小平改革步子走得太快的人却留了下来。在赵紫阳完全巩固其权力之前，他将继续求助于邓小平调停他同保守分子的争端。至于邓小平百年之后，在这许多人中谁实力雄厚、又有高瞻远瞩的气魄足以取代他——这尚属未定之天。在共产党国家里，只能由一个人当领袖。这个领袖是否赵紫阳，这取决于他作为政治策略家的手腕是否能和他作为经济策略家已成功地显示出的手腕相比美。

但是，中国沿着邓小平的新的希望之路已走了这么远，走回头路的可能性极小。国家如同个人一样，会从自己的错

误中受到教益。中国是在眼睁睁地看到全面计划经济试验破产或是停摆了之后才开始进行部分自由经济试验的。在邓小平作为周恩来、毛泽东门徒的岁月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筹莫展，只低声下气地依靠苏联的赏赐。大跃进失败后，邓小平认识到了中国人民在国内未能充分发挥潜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未能充分发挥潜力。毛、周留下的最大一笔遗产是他们使中国转向西方，从而终于使它进入了20世纪。而他们的接班人的遗产将是把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的清规戒律中解放出来，并为中国将来肩负国际领导重任作好准备。

邓小平上台执政时年事虽高，但颇有新思想。他的主要对手不是手下的年青人，而是周围耄耋之年的老人。他们担心他们所熟悉的中国就要结束了，而他则欢迎和鼓励它结束。他们怀念着他们和他曾一起为之战斗过的革命理想；而他则明白中国的体制如果不作根本性变革，这些理想会在十亿饥民的口中化为灰烬。16世纪时，一位法国学者在垂暮之年绝望地写道，“但愿年青人都能深明事理，老年人都能笃行不倦。”84岁高龄的邓小平既深明事理，又笃行不倦。这两种素质的结合产生了无比的威力——它已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朝着繁荣和领导世界的新时代奋勇前进。

西方许许多多天真的人在观察邓小平时，把他视为中国的托马斯·潘恩[1]——以结束共产主义统治为长远目标的民主革命者。邓小平所采取的行动的确颇有戏剧性，甚至鼓舞人心。但邓小平是个改革家而不是革命者。作为共产党人，他不想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中国或民主的中国，但他并不受

---

[1] Thomas Paine（1737—1809）：美国政治家、哲学家。——译者

制于意识形态。他首先是个民族主义者，想使中国强盛，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来推行能使它在21世纪成为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

虽然邓小平的明确目标不是更多的政治自由，但是如果经济改革奏效，政治变革可能接踵而至。变化应是逐步而稳妥的——快得能跟上群众的期望，但又不至于使现有的政治结构无法招架。邓小平自己说得好："如果我能使群众的生活逐步有所提高，那么我想这一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最好保证。"成功的关键是时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今天在中国人看来是很新鲜的事，都会成为家常便饭。见识过改革、从改革中得到了好处的年青领导人会主张继续和扩大改革。邓小平理想的实现会给自由正名。中国会认识到自由没有什么可怕，而只会带来种种好处。

为使邓小平的改革不至于夭折，美国和西方应起一种核心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有赖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有赖于中国同其工业化国家的贸易伙伴之间不断保持友好关系。如果西方放慢在中国的投资速度、以保护主义打击中国或在太平洋地区不执行开明的外交政策，从而辜负了中国的期望，那就会损害中国的经济，而帮了中国国内反改革派的忙。

1972年我们由于对苏联威胁的担心而走到一起；这在1999年可能已不足以维系我们的关系了。如果我们建立友好关系的动机仅限于此，那么我们就把自己的命运置于苏联人的掌握之中。共同的安全利益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如果威胁消退了，共同的经济利益仍可以使我们站在一起。如果我们要中国保持面向西方的态势，就必须使中国人通过同西方保持

良好关系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北京的改革派应能向有疑虑的同事们显示，执行邓小平的新政策比回到苏联模式和苏联的怀抱中去对中国更有利。

如果美国能证明自己是个可信赖的朋友，中美关系就会持续到21世纪并逐年有所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健康和牢固的，但我们必须努力使这种状况保持下去。对它疏忽大意或认为不成问题都是不行的。但在回顾了头16年来的所有成就之后，我们有理由对有待今后进行的工作充满希望。

1972年前，美中之间没有贸易、旅游、学术交流、技术和文化交流，没有军事关系。今天，双边贸易每年已达约100亿美元。250多家美国公司在中国开设了办事机构，美国人在华投资达15亿美元。在国外学习的30000名中国留学生中，15000名在美国。每年有25万美国人到中国旅游。一项小型的军事关系计划，包括向中国出售某些防御性武器已在执行之中。现在美国青年外交官渴望被派驻北京、上海和广州，中国青年外交官则热望到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任职。

通过这些和其它的事态发展，中国正在了解美国，美国也正在了解中国。在这两个一度曾经是如此不同、如此具有威胁性和如此难以沟通、格格不入的社会之间，现在正在编结一种了解和相互依存的网络，所有友好国家关系中都难免时而会发生颠簸，这种网络有助于减轻颠簸。

中美之间持久关系的基础已经奠定。现在我们必须在这基础上有所建树。

我们首要的任务应是加倍努力增进双边贸易。目前的贸易额是我们最初向中国打开大门时所梦想不到的，但仍然远远不够。我们同台湾1500万人的贸易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十

亿人贸易的10倍。

中国的出口以纺织品为大宗，因此极容易受到美国保护主义情绪的冲击。尽管我们在同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贸易伙伴之间存在着贸易赤字，但里根总统顶住了提高贸易壁垒的要求，这很值得称道。他和下一任总统都应继续这么做。保护主义是一种快速解决法。它能带来官能上的满足，但从长远而言效果总是适得其反的。日本是保护主义分子打击的主要目标，但它的经济之强大可能足以安然承受美国各种新的贸易限制措施。但这些措施会使中国发展中的经济——而且不难想象，会使亚洲和世界的战略平衡——受到严重打击。如果中国关上了向西方敞开的大门，它只好再次被迫去敲克里姆林宫的大门。

西方还应使中国得到更多的工业发展技术，我们不应向任何潜在的敌对国家出售可在军事上用来对付我们的高度敏感的技术。但是我们对于没有军用价值、而在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却是必不可少的技术也不应掌握过严。中国也能从其它工业化的西方贸易伙伴那里取得许多这种技术。不如让中国人从我们这里得到这些技术，这样我们就有利可图。

中美关系的前途既掌握在美国政治家手中，也掌握在美国企业界人士手中。赫鲁晓夫曾对一批西方企业界领导人物说过，“你们长期掌权，而政治家们却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但是，为了能胜任这一长期任务，美国企业界人士应学会放眼未来这一东方艺术。中国人思考问题时以几十年、几百年为单位，而气急败坏的西方人想到的往往只限于本财政年度结束时的收支状况。许多从中国回来的商人都发牢骚，说中国外贸官僚机构办事之慢叫人急得发疯。美国人的习惯做法

是，上午开始谈一笔买卖，吃午饭时喝上三杯马提尼酒就把有关问题解决了，下午再打几个电话和电传就办好了扫尾工作。但是这种快刀斩乱麻的买卖在中国行不通。中国人还记得西方列强无情地剥削过中国，想起这一点他们就激烈地讨价还价。

然而，在中国经济现在刚刚开始发展时坚持下来了的美国人，以后会对自己的坚持性感到满意的。已批准的中国和西方公司合资企业有8300多家，150多家外国公司还获准设立独资经营的子公司。这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大不相同，例如墨西哥，它对外来投资极为恐惧，严格限制外国人拥有所有权。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繁荣，那些在1988年已着手投资并坚持下去的人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厚利。在中国经商，有耐心，就会赚大钱。

我们的对华政策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热中于采取美国特有的做法，苦口婆心地训导别国如何处理其政治事务。中国人是个独立性极强的民族，对于外人企图影响或主宰他们事务历来很有反感。由美国政府官员或新闻界人士发表谈话，对中国反改革或反民主思潮的反映表示关切是无济于事的，只会得罪或疏远中国领导人，效果可能同这些天真的批评家的原意恰恰相反。美国的左翼和右翼人士都必须克制住自己古道热肠的冲动，不要在人权问题上教训中国人。里根政府中的某些人还要求把我们对人工流产的观点强加给中国，这是可笑的。中国是个人口过多的国家，它面临的抉择是要么控制人口要么挨饿。

最重要的是，我们应避免在台湾这一棘手的问题上走错步子。1972年我们在上海公报中采取的立场（这一立场在其

后的历次中美谅解中得到了加强)应是我国今后政策的指南。在台湾和大陆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唯一关心的是，中国人在他们之间决定这一问题时应采取和平的方式。我们不能也不应在一笔交易中充当掮客。最敏感的问题是武器问题。我们应严格信守我们的承诺，只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只是随着台湾和北京之间紧张关系的缓和而放慢我国军援的步伐。

但是我们应明确表明，在和大陆的中国人建立友谊时，我们不会牺牲台湾的中国朋友。朱利安·艾默里[1]雄辩地阐明了这一点："放弃支持已久的事业、解除信誓旦旦的联盟关系，常常是必要和合法的。但是，对于一直是朋友的人听其任由命运摆布总是错误的。我们也许不得不甩掉他们的利益，但应千方百计地至少救他们一条活命。"美国外交史上最黑暗的两页是参与暗杀吴庭艳和在促使了伊朗国王垮台之后又对他的命运漠不关心，从而帮助了霍梅尼上台。我们对台湾人不应再犯类似的暴行。

许多念念不忘台湾问题的美国人没有看到，邓小平也受到中国政府中保守派的压力，要他在台湾问题上采取行动。压力之大不亚于历届美国总统受到的美国亲台院外集团的压力，也许更大。挑起同北京的对抗既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我们台湾朋友的利益。邓小平同英国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规定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在1997年这块英国殖民地将交还中国管辖。他希望这个协议会成为一个起点，再就台湾搞个类似的安排。不管怎样，对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关切心情，我们反应越灵敏对邓小平和台湾就越好。这个问

---

[1] Julian Amery (1919—)：英国政治家。——译者

题极其复杂，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中国人很精明 我确信他们终将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

对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行动，中国人会象对美国在中国的所作所为那样，密切注意。最近的事态发展使他们有理由对我们的一贯性和可靠性感到担心。我们在越南的失败，以及其后苏联在整个印度支那扩张势力，在战略上对中国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中国在1979年同苏联支持的越南进行的战争中，伤亡两万人。如果南越没有被共产党北越打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70年代末期我们在地缘政治上处于冬眠状态，这使中国人深感烦恼。当我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6个月见到他时，他懊丧地问我："美国的唯一目标就是和平吗？"我回答说我们要的和平不只是不打仗，而是"公正的和平。"遗憾的是，那时我说的话只是清谈而已。美国正在越南综合症的苦痛中呻吟，没有心思履行其国际责任。12年后，由于我们在越南的经历所造成的怨恨日渐淡漠，我们的决心又大大加强了。但这种决心还没经受过真正的考验，这一点中国人是知道的。然而，使我们携起手来的国家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始终是我们关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人将继续指望我们对苏联人施加压力，促使其撤出阿富汗；在太平洋保持军事存在以平衡苏联的力量；争取同苏联人达成讲求实际的军控协议，以免他们具有战略优势，对我们和友邦进行讹诈；继续抵制苏联在发展中国家扩大其影响。上述各点我们都应做到，这是符合我们自身利益的，也符合他们的利益。

在这些和其它一些领域，美中利益是相近的。以进取的

姿态追求我国的对外政策利益会自然而然地加强美中关系：应采取行动时却无所作为会伤害美中关系。在中国的国防力量壮大之前，它的军事威慑力量实质上是我国的威慑力量。但是我们决不要忘记，我们是为自己干，而不是为中国干。对中国人曲意逢迎只会招来他们的蔑视。我们可以预期，尽管双方关系融洽，但北京会继续喋喋不休地发表其传统的反对资本主义、偶而还反美的公开言论。对此我们不应反对，正如中国不应反对我们公开发表反其言论一样。

但是如果中国超出了言谈的范围而在外交政策上开始一个扩张主义侵略的新阶段的话，那么我们之间趋于一致的利益就会突然明显地分道扬镳。例如，中国人在1986年出售价值十亿美元的武器给伊朗，其原因一部分是为了赚钱，一部分是为了抵消苏联对霍梅尼所作的姿态。这种政策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但后果则是无可回避的。里根政府处理得当，它采取措施不向中国提供它想要和需要的高级技术装备。

正如中国人在经济政策方面已更加练达，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也更精明了。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独立自主、颇有分寸的主动行动：为同南朝鲜搞关系采取了一些尝试性的步骤，但并不危及他们同共产党北方的长期关系；同原先的敌对国家日本逐步改善关系，但不允许日本货物和影响不受控制地大量进入；在向伊朗出售武器的同时和伊拉克保持联系；而最重要的是，为使北京同莫斯科之间的冷淡关系热乎起来而进行谈判和交流。

中苏关系解冻的迹象在美国使不少人心慌意乱，甚至使一些人惊惶不安。某些超级鹰派分子曾希望这两个共产党大国会打起来——尽管中苏之间哪怕是常规冲突也很可能升级

为使用核武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另一些人则指出中苏双边贸易在1982年至1986年之间增加了近7倍。由于诸如此类的因素，他们担心中苏和解会使共产主义国家重新成为铁板一块威胁我们。

这两种可怕的结局都不大可能出现。邓小平希望同苏联改善关系，因为这样他们就会让他把更多的人力物力集中用于经济发展，在国防上少花力量。而且他希望缓和紧张关系以免升级发生战争。对中国来说，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世纪的和平。但是邓小平不想使双方关系回到1961年前的状况，那时中国在经济上依赖苏联。他知道中国最需要的是经济发展。这一方面西方和苏联之间不存在什么竞争。西方什么都可提供；苏联可提供的东西很少。只有中国对西方不再抱有希望时，它才会重新求助于那个居心叵测的北方邻国。

中国不愿同苏联恢复旧有关系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在共产主义集团中决不愿再当一个小伙伴。中国依附于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个世界上，它是个雄踞一方的大国；而世界上又有许许多多国家看到它必将成为一支强劲的力量，乐于帮助它把潜力发挥出来。近年来西方和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络绎不绝地乘坐一位记者称之为"运牛奶的火车顺访了中国"，并同中国领导人一起登上万里长城。他们认为这符合他们个人和他们国家的利益。中国领导人十分明智，对要求来访者一一予以接待。邓小平1985年对我说过："我们不会拴在一架马车上。"这精辟地概括了中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由于同样的原因，至少在目前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发展有一个不能超越的限度。我们不是盟国。仅仅35年

前我们还是敌国。数以千计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在朝鲜交战过。伤亡者之一是毛泽东的一个儿子。如今我们是新结交的朋友，是在多年的相互敌视甚至仇恨和交战之后，冷冰冰的共同利害关系的计较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这种利害关系可能起变化，友谊也会随之而变。在变幻不定的国际现实面前，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共同的经历、斗争或理想可以使我们永不分离；除非中国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改革运动，否则我们对于如何治理国家的基本观点仍将是针锋相对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一颇有发展前途的关系仍受制于双方都无法完全控制的各种事件。

我们应避免使这种关系产生浪漫主义化或过分重视双方对对方的浅薄的好奇心理。如果中国或美国的所作所为被对方认为难以接受的话，互派留学生、旅游、蓝色牛仔裤、美国摇滚乐、景泰兰饰器都无法使我们永不分离。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是茶话会或办喜事，而是件复杂的精制品，必须时刻予以关注和照料。我们若不谨慎从事，会出毛病的地方很可能都要出毛病。

然而，为了生活在下个世纪的儿孙们，我们必须确保两国关系继续存在并得到发展。我们今天与之交往的那个国家还刚刚开始在这个现代世界里摸索前进；而明天，同他们打交道则可能是世界上的头号大国。在从现在到那时的这段时间里，新的朋友可能成为新的盟国，今天还不存在的共同经历和价值观念可能出现——这是由于在这个变化不定、冲突迭起、难以揣度的世界里可能发生当前无法想象的事件。

1972年周恩来和我在杭州的会晤中，完成了就上海公报的谈判。这个公报标志着美中两国新的和平关系的开始。为

纪念这件事，我们种植了一棵我从加利福尼亚带去的三英尺高的红杉树。那是加州国立公园中一棵全世界最老和最高的树的树苗。当时我们二人都不能肯定这棵树能在中国土壤上长大。

事实证明，土壤和气候都是友好的。1987年10月新泽西州的托马斯·基恩州长访问杭州。东道主请他参观了这棵树，它已有90英尺高。更有意义的是，他们说这棵树的40000棵树苗正在中国的7个省份茁壮成长。

中美两国人民都在世界上最能干的人民之列，天赋的潜力都极大。展望21世纪，我们看到的是，土壤和气候都适于培育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大有可为，它能把这个世界的和平与自由推至空前未有的高度。

第 九 章

第三世界战场

人们常把工业化的西方和苏联集团以外的国家统称为"第三世界"。这个词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但用来描述分布在赤道南北、横跨四大洲、包括各个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的150个国家时，却是个方便的套语。他们最大的共同点是都处于水深火热的极度贫困之中。第三世界30多亿人民的人均收入每年不到800美元，而美国则为18000美元。它们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他们尚未找到卓有成效地开发其巨大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办法。

我们无法解决它们的全部问题。但是在未来的岁月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帮助它们解决问题。不帮助它们就无异于放弃了我们在道义上的责任，也就是允许贫困、绝望和冲突无限地反复循环，而这必然会妨碍我们在世界上建造现实和平的大厦。

"第三世界"这个词最恶毒的方面是它暗示我们需要有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第三世界政策"。以这种简单化方式思考、言谈和行事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以变奏方式弹出同一主题。他们齐声唱道，我们富，第三世界穷。这点是对的。但是他们接着又说，解决的办法是"由北方把资源转给南

方”——换句话说，发达国家应给不发达国家更多的钱。他们把这个极其多样化而复杂的世界归纳为狄更斯小说中的简单化的内容：自私的富豪对于饥肠辘辘、伸手求乞的叫化子不屑一顾。

西方自由派人士对于第三世界的态度是过多爱莫能助的内疚，而提供发展中国家能实际使用的具体援助却过少。最近，为美国某家大报撰写文章的书刊评论员谴责基普林所著《贡噶·丁》有种族主义色彩。然而，在英国人来到印度200多年之后、欧洲大国放弃其殖民地20年之后，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对穷国仍然怀有是“白种人包袱”的优越感。

分享财富的计划过去行不通，将来也永远行不通。原因只有一个，而且很简单。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并不是由发达国家一手造成的，发达国家也不可能独自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就是狂妄至极，甚至是种族主义。我们可以为这些正在奋斗中的国家指引道路，因为我们自己曾经走过由贫穷到繁荣的道路。但是，如果由我们背着他们往前走，对它们并没有好处。我们只会造就一批永远低三下四地乞求施舍的乞丐国家。我们每替它们前进一步实际上是后退两步，因为它们对我们的依赖越来越大，而当我们已无力帮助或不愿帮助时，它们却又更无法自食其力。

但是，在摆脱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所怀有的无补于事的内疚感的同时，我们并不推卸责任。这些国家的贫穷、营养不良、疾病和战争并非我们的过错，但是这些却肯定是我们的问题，也是它们的问题。如果我们置身事外，在这场为发展中国家的前途而进行的竞争中，西方是输定了。

第三世界的重要性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第三世界拥有庞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它生产世界上大部分的石油和其他原料。没有这些工业经济就会崩溃。到1999年，地球上五分之四的人将是第三世界的居民。在1899年，世界十个最大城市分布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到1999年，十大城市中将有八个在第三世界。

第二，第三世界正是现实的第三世界战争[1]正在进行的地方。苏联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进行非常规性战争，企图控制拥有石油等资源的国家，而这些资源对西方的存亡利害攸关。贫困、营养不良和疾病是政治动乱理想的孳生地。绝望、专制独裁和苏联刻薄的机会主义一起，在第三世界造成了日益恶化的经济停滞和政治动荡的气候。

第三，第三世界是全世界战争和革命的震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有1800万人在第三世界的战争中丧生。这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战场上牺牲的人数还多。当前有40多场战争正在第三世界激烈进行。这些战争大多同苏联无关，但却同美苏争夺密切相关。超级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最大危险是当它们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场小型战争便可能升级。小型战争总是具有引发世界大战的潜力。

第四，扪心自问，我们无法容忍这样的现状：西方是个富足的小岛，而周围却是贫困的汪洋大海。我们不应容忍这一现状，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几十亿人也不会容忍这一现状。我到过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人均收入很低的冷酷数字不能反映人们在摆脱了礼宾和陪同参观的限制之后所亲眼目睹的一贫如洗的状况。第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绝对贫困线

---

1 英文中第三世界战争（Third World war）和第三次世界大战（Third World War）的差别仅在W这个字母的大小写。——译者

之下。45%的城市居民和85%的农村居民缺乏足够的卫生设备。每天有30000人因饮用污水和不良卫生条件而死亡。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平均寿命不到50岁，而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0多岁。到本世纪末，第三世界的婴儿死亡率将是美国的四倍。由于第三世界的平均人口增长率是西方的三倍，1999年第三世界的人均收入可能下降。

如果下一世纪要成为和平的世纪，就必须解决第三世界困苦和战争的原因。如果要在21世纪根除20世纪世界上许多地方遭受的苦难，那么就必须满足第三世界的安全需要、充分发掘其经济潜力并实现其政治愿望。

第三世界动乱和贫困的原因在不同的地区各不相同。

在远东，我们看到经济自由所唤起的活力和极权共产主义的沉闷和呆滞，两相对比有天壤之别。共产主义是灰色的，不是红色的。在拉丁美洲，许多很有前途但有时却不稳定的新兴民主国家受到咄咄逼人的苏联卫星国的威胁时，我们也看到类似的反差。在印巴的仇怨中，我们看到了不可饶恕的资源浪费，本来这两个国家都应将这些资源用来为本国人民谋福利，现在却被用于在宗教和政治上比试高低。在贫穷的非洲，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事例和奄奄待毙的人，足以证明把好端端的钱白送给坏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这些国家现在比西方投入几千亿美元援助之前反而更穷了。在中东，我们看到传统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抗争演变为一场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为一方、以色列和温和的阿拉伯国家为另一方的冲突。除非这些国家克服分歧并认识到它们面临来自德黑兰的危险得多的威胁，否则中东仍将是世界上最有潜在爆炸力

的地区——文明的摇篮可能会成为文明的坟墓。

在亚洲，我们看到了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在哪一种社会、经济和政治政策之下国家和人民能够生存和发展，哪一种政策使它们衰败和沦亡。世界上从未在同一地区内有过如此鲜明的对照：共产主义造成民不聊生，而准许享有广泛自由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则带来了富足和幸福。

人们通常认为，没有自然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注定贫困、难以翻身。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否定了这种看法。在过去的25年中，新加坡的经济一直以每年7.5%的惊人速度增长着。如能保持这一势头，到1999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将高于美国。英国的保护地香港面积为404平方英里，其人均寿命为76岁，人均收入几近7000美元，经济上没有外债。在40年代末期，台湾人均收入为50美元，大抵同大陆中国持平。现在其人均收入为3500美元，是距离只有120英里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均收入的十倍。

南朝鲜已取代了日本，成为西方、苏联人和中国人谈论得最多的亚洲经济奇迹。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里，南朝鲜6.5%的平均年增长率使这个饱经战祸、1953年人均收入为50美元的国家发展为人均收入2200美元、识字率高于美国的潜在经济巨人。

有些人辩解说，亚洲的经济成就是“不可捉摸的东方”的某些神秘特征的产物。众所周知，东方人埋头苦干、生产效率高，但这些国家的成就是由于实行了深思熟虑、切实可行的经济战略的结果，而这种战略未必只适用于亚洲。它们都奉行旨在促进生产、使人民致富的自由市场政策。它们抓

住世界经济提供的机遇，相互作用并从中牟利，而不是象马列主义者那样顽固地否认其存在。

这些国家的政治自由够不上美国或欧洲的标准。但是这些国家确有基本的经济、社会和宗教权利，同它们死气沉沉的共产党邻国相比，它们看上去简直就象迪斯尼乐园。在南朝鲜，学生因示威游行要求早日举行自由选举而被捕。在北朝鲜，没有示威游行、没有自由选举，没有任何自由。在李光耀的新加坡，年青人有时因蓄发过长而受到严厉的总理的训斥；在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年青人因携手而遭到机关枪扫射。

全世界的民主进程也许永远不会象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快。鉴于20世纪各种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成绩不佳，只要民主有所进展，我们就应该感到高兴。事实上，目前在所有的非共产党亚洲国家，我们都看到它们在走向代议制民主。20世纪最重大的政治成就之一就是在1987年12月，南朝鲜90％的合格选民投票结束了专制独裁统治的时代、开始了民主的时代。台湾也采取了不可逆转的步骤举行自由的多党选举。香港不久可能产生代议制的自治政府。泰国加强了民主。到1999年，所有这些国家的物质进步很可能都伴有相应的政治进展。

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如何培育了稳固的代议制政府的种子，这方面南朝鲜是个很好的例子。有些人批评说实现民主花的时间太长。但是有历史观点的人，尤其是同第三世界各国相比时，必定会认为在保障政治稳定、取得经济进步和走向民主方面，南朝鲜是成绩斐然的。

从南朝鲜越过三八线，那边囚禁在共产党独裁者金日成

的封闭社会中的人民既不知道民主的挑战和好处，也从未尝过经济发达的痛快。这并不是因为北朝鲜人不如南朝鲜人肯干。这是由于他们生活在一个严格要求顺从而不鼓励发挥主动精神的制度之下。北朝鲜这类的极权共产主义是亚洲最惨痛的失败和最巨大的苦难的根源。

有些人因认为共产主义会使亚洲繁荣而反对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现在他们不能不看到今天几千万人正在印度支那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个铁的事实。正如列宁所说，“事实是顽强的。”

越南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少于160美元。1975年西贡陷落前，南越人均收入为500美元。60万南越人为了逃脱由苏联支持的北方征服者的魔掌而葬身南中国海。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的和平就是坟墓中的死寂。在越战结束13年之后，美国人理所当然地已急望忘却其在越南的经历，而这时每个月却仍有1500人乘船逃离越南。

共产主义也葬送了曾是独立、繁荣的国家柬埔寨。根据红色高棉领导人多年前在巴黎居住时制订的一项狠毒的总计划，残暴的红色高棉采取行动，在几天之内把金边全城的人驱赶一空，以便使他们能建立一个农业共产主义社会。许多家庭的全体成员、受过教育的人、僧侣和教士、少数民族以及所有可疑或臆想的反抗分子，都惨遭杀戮。鼓励子女把父母送交刽子手。在其后三年中，700万人中有200多万人挨饿或被清洗。今天，14万越军占领下的柬埔寨是世界上营养最差的国家之一。21％的柬埔寨儿童在五岁前夭折。人均寿命为46岁，人均年收入为80美元。实际上，柬埔寨这个国家已不复存在。

今天的柬埔寨将成为明天的菲律宾，如果残忍、野蛮的共产党新人民军所公开宣布的推翻民选政府的目标得以实现的话。同所有共产党人一样，新人民军利用它同马尼拉的谈判来巩固军事战果和削弱对方取胜的斗志。除非阿基诺夫人承认必须从军事上击败新人民军，否则她和民主的菲律宾都无法生存。

美国政府和国会对这一危急的局势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菲律宾成为第三世界的又一战场，美国的利益、日本和我们西方盟国的利益以及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菲律宾在整个南太平洋的各个邻国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阿基诺夫人当选总统使菲律宾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大多数人仍然支持她。但是没有经济增长和军事安全的政治合法性是脆弱的。而在菲律宾，政府官员中的个人合法性是罕见的。没有任何人怀疑阿基诺总统本人的廉洁。但是由于她出身于菲律宾两个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对她来说尤其重要的是要确保其政府不要染上“菲律宾病”，即裙带关系加上贪污腐化这一致命的弊端。

我们不应错把菲律宾人当作我们的棕色皮肤的小兄弟。我们明知一些政策行不通，却给予资助，这对他们并无好处。我们应当大量增加我们的经济援助，但条件是应将援助用于实行健康的经济政策。否则我们只是白花钱制造虚假的希望。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移居美国之后表明他们是有才干和勤劳的民族。他们所需的只是能发挥其巨大潜力的政府。如果阿基诺总统大力实施市场化的经济政策，她使能驾驭其人民的能力和热情，以及吸引为了促进更大的发展所需要的外国投资。

菲律宾南边的邻国印尼是世界上最默默无闻、最不受重视的国家之一。1953年我作为副总统首先访问的亚洲国家就是印尼。我是通过苏加诺总统来观察印尼的。苏加诺总统是我所见过的最有魅力的领导人之一。他对他的新独立国家的未来梦想联翩。但是他的不负责任的政策和个人腐化对印尼成了一场恶梦。他的继任者苏哈托总统慢慢地使印尼摆脱了苏加诺晚年时的混乱局面。印尼很可能在21世纪成为一个巨人。它自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它的人口占世界第五位。印尼人和菲律宾人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他们很有才干，潜力很大。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继续给予有力的领导以保持政治稳定和奖励主动精神、能吸引外资的新的经济政策。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是印尼的两个邻国。它们属于亚洲非共产国家中最重要、最有前途的国家之列，同时也是最经常被忽视的国家。对新西兰的工党政府外交政策的看法见仁见智，但可以认为该政府以活生生的榜样证明，依靠私营企业的经济政策在推动进步方面比过分相信政府计划的政策有效得多。如果澳大利亚的工党政府（我们对它的外交政策比较满意）效仿新西兰的榜样，那么这个地理上的巨人在下个世纪毫无疑问会成为经济上的巨人。

如果能防止越南这个恶性肿瘤扩散，东南亚非共产党国家的前景就是光明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对其邻国的态度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953年我在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所见到的领导人都害怕北方的共产党巨人对它们国内革命者的支持。今天，中国同除了台湾之外的所有邻居都有良好的关系。人们仍然害怕它，但却由于不同的原因。随着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它能淹没小国的经济，尤其是诸如纺织业这

种劳动密集型、大规模生产的工业。正因为如此，马来西亚和泰国有远见的领导人正计划转入发展高技术工业。

暴力变革会拖垮一个国家，而和平变革能使它无比昌盛。这两种做法的遗产在远东都能看到。自由同暴政之间的鲜明对照应有助于面临这一选择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作出正确抉择。

在亚洲次大陆，印度同巴基斯坦之间的斗争是第三世界冲突的一个悲惨事例，这种冲突即使没有苏联也仍然会存在。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同苏联关系密切。巴基斯坦是美国的盟国，正在逐步演变为民主国家。自从1947年它们脱离英国获得独立以来，已经有500多万人在分治后的屠杀以及这两个新生国家之间的两次战争中丧生。25万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队仍在边境上对峙着。这一冲突作为第三世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几乎不亚于中东。

印度这个国家既大有希望，也十分凄惨。1999年，印度人口将超过十亿。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穷人居住在印度。在一个领域，印度取得了显著的经济进步。60年代，印度巧妙地把技术和财经援助同自由市场的刺激相结合，农业因此取得了爆炸性的丰硕成果。印度现在生产的粮食足够养活其八亿人民，而且还有一些余粮可供出口。这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一个事例，说明政府的英明政策能把一个有才干的民族的精力解放出来，并解决许多人认为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第三世界各国应从印度60年代的成就中得到启示，也应从印度70年代和80年代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在60年代，一个颇有希望的工业基地发展起来了，但是政府的官僚机构（它

是使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失去活力的毒剂）发展得更快。象中国人和菲律宾人一样，移居国外的印度人在诸如美国这样不挫伤主动性和苦干作风的国家里都能发财致富。移居美国的普通印度人的收入高于普通的美国人。然而在印度，印度人个人杰出的勤奋精神却因其经济被政府过多的管理和保护主义所窒息而付之东流。

尽管面临难以置信的困难，印度仍然有着第三世界中为数不多的行之有效的民主政体，这是很难能可贵的。1947年，印度赢得独立时有四亿多人口，其中印度教徒25000万、穆斯林9000万、锡克教徒600万、佛教徒和基督教徒数百万；500个独立的小君主和土邦王；23种主要语言和200种方言；3000个不同种性，最底层的是6000万“不可接触的人”。不论我们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及其继任者有什么分歧，以民主方式治理这样一个国家(除了甘地夫人实行过短期军法管制以外)是20世纪最了不起的政治成就之一。它使人想起约翰逊博士在评论一个女传教士时说过的一段名言：“这象是一只狗用两条后腿走路一样。走得并不好，但是能这样走本身就令你惊叹不已了。”认为印度治理不当的人应记住，能治理印度就是一大奇迹。

巴基斯坦在独立后的30年里，一直备受政治和经济纷争之苦。从1977年起，巴基斯坦由开明的军方领导人齐亚·哈克总统领导。他实现了发展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政治稳定。但他认识到人民的民主愿望，实行了逐步民主化的进程。如果没有政治暴乱或苏联从阿富汗对它施加的压力破坏这一进程，那么到1990年将会举行另一次自由选举。

巴基斯坦是美国的传统盟友，而印度的外交政策则已倾

向苏联。今天，巴基斯坦处于反对苏联向南亚扩张的前线。它支持阿富汗自由战士，并收容了300多万难民。这些勇敢的政策极为危险。为了报复，仅在1986年苏联飞机袭击巴基斯坦共达600余次，1987年袭击的次数就更多了。苏联代理人企图通过恐怖分子投掷炸弹、煽动种族纠纷使巴基斯坦局势动荡。

印度这样的民主国家竟然奉行亲共产党的对外政策，这是本世纪地缘政治中的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在非共产党大国中，唯有它没有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同喀布尔保持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寥寥无几，它是其中之一。在非共产党国家中，只有它在金边设有大使馆。它同苏联保持广泛的军事和经济的联系。苏联几乎同印度所有各级的公营和私营经济部门直接打交道，甚至还向印度政治家捐款。1985年，印度在联合国支持美国的次数为8.9%——比共产党国家蒙古还不如。

印度为什么担心巴基斯坦侵略它，这是令人费解的。印度有八亿人口，巴基斯坦只略多于一亿。印度拥有的战斗机是巴基斯坦的两倍，它的常规部队占世界第4位，巴基斯坦占第13位。印度担心美国向其敌人提供军事援助，然而在过去三年中，苏联向印度提供的武器是巴基斯坦从我们手中得到的两倍。1974年，印度引爆了一个核装置，现在正大声疾呼反对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哈克总统一再建议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印度拒绝了。

苏联扩张主义是南亚面临的最大外来威胁。巴基斯坦人了解这一点，有些印度官员、商人和记者也开始表示担心印度向西方求助但却依靠北方的政策可能是致命性的。印度人

同北极熊睡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被它抓伤。

对这两个国家最大的内部威胁是会危及其政治稳定的经济停滞。贫困助长了种族不和，削弱了印度的国力。贫穷会使巴基斯坦无法实现向民主过渡。这两个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每年将80亿美元用于对付对方的军备，这简直荒唐。两国强有力的政治家早就应同对方讲和，并向使两国受害的贫穷宣战。

阿拉伯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是又一场历时40年、浪费了经济发展所急需的大量资源的战争。即使苏联在中东销声匿迹，这一冲突也仍会存在。但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利用它来损害我们在该地区的利益。同时，在中东这个第三世界地区，为了促进稳定与和平的事业，美国的积极介入是必不可少的。

在直接卷入阿以冲突的国家中，没有一个能使其人民的生活达到高水平，其中许多国家还同时面临债台高筑和人口剧增这两大危机。然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勒斯坦分治，此后以色列人同阿拉伯人打了五次全面战争（1948年、1956年、1967年、1973年和1982年），同时还有许多无休止的小冲突和军事事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以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计算其军事开支；阿以战争中有关国家的军事开支则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倍数计算。

美国能够，也应该起建设性作用帮助解决中东冲突。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说，苏联能帮助中东国家打仗，而唯有美国能帮助它们讲和。过去40年中我们在该地区取得了很大成就。1948年以来，我们保证了以色列国的存在。我们也是一贯要求公正解决阿以冲突的唯一力量。战后美国最大的外交成就

之一便是卡特总统谈判的1978年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建立了和平的戴维营协定。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如果我们不能促进和平的事业，我们就会鼓励那些企图通过战争以售其奸的人。

1973年战争中，我下令大规模空运装备和物资，使以色列得以阻止叙利亚和埃及在两条战线上推进。在赎罪日战争期间担任以色列总理的果尔达·梅厄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空运是极其可贵的。它不仅使我们精神振奋，也向苏联表明了美国的立场。毫无疑问，它使我们有可能取胜。"我们为以色列的生存所承担的义务是深根固蒂的。我们不是正式的盟国，但是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却比任何条约都更强有力，这就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过去没有任何一个美国总统背弃过这种义务，今后美国的每一个总统也都会忠实地信守这种义务。美国决不允许以色列的死敌实现其消灭以色列的目标。

除了道义上的原因之外，美国支持以色列还有其它重大的原因。以色列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以色列国民的教育水平全世界最高，唯有日本能与其媲美。以色列几乎没有自然资源，但却建立了能同世界经济成功地竞争的工业经济。它拥有世界上最精锐的武装部队。以色列在40年战争期间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已使世人对它刮目相看。在40年和平期间它所能取得的成就将使全世界为之咋舌。

但是，我们的利益和以色列的利益都要求我们不仅是毫不迟疑地给予政治支持。美国必须象卡特政府那样重新在外交上扮演活跃的角色。有些观察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声称只要美国继续向以色列提供外援并坚定支持以色列拒绝就

西岸和戈兰高地问题进行谈判，以色列的安全便能永远得到保障。

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理由有两方面。第一，目前我国外援预算分配失当，这是我们所承受不起的。第三世界有30亿人都有资格得到美国的外援。以色列一国以其仅有的200万人口却得到预算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我们向以色列和埃及提供的援助超过了我们外援的一半。这样的政策不能继续下去。美国在许多国家都有重大的战略利害关系，这些国家都亟需我国援助。如果我们由于过度资助中东战争而无力他顾，我们就无法帮助菲律宾和斗争中的中美洲民主国家缔造和平。

第二，高枕无忧的政策会使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濒于危殆。许多以色列人满足于外交上的僵局。这在短期也许对他们有利，但在长期则会导致灾难。以色列已经在过去的五次战争中取胜，下一次还会取胜。但是在每一回合的暴力行动中，它都损兵折将，稳定和平的前景也更加遥 遥 无 期。此外，正如朝鲜人和越南人已学会了打仗那样，阿拉伯人也将学会打仗。以色列现在比它的对手强大，应立即进行和平谈判，这才符合它的利益，而不要等到对方力量增强迫使它进行谈判。尽管美以关系友好，但以色列不能永远作为仇恨的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存在下去。

双方继续僵持也会损害那些愿同以色列谈判的各阿拉伯温和派政府。以色列的许多支持者认为，埃及既已决定退出冲突，和平进程就应停止。在它们看来美国应同以色列结成战略同盟，并避免同一切阿拉伯国家接近。这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

我们应该向自己提出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和平进程没有进展、面临激进主义和教原旨主义双重威胁的约旦和埃及的温和政府（拿破仑曾称之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能维持多久？如果亲以色列集团的压力不让美国运用其影响力推进和平进程，甚至不让美国将武器出售给应该得到武器的约旦等国家，那么这些政府还会愿意奉行目前的亲西方政策多久？以色列必须承认其本身的利益要求美国同阿拉伯温和派国家建立密切关系，而且只有外交进程促进更广泛和平的实现而不是陷入僵局时，这些国家才会仍是和平时期的稳定的伙伴。

时间对中东和平从来并不有利。战后时期每十年爆发一次阿以战争，因为在和平时期听任政治僵局形成。因此美国应在中东采取更现实的政策。美国应寻求同阿拉伯温和国家，尤其是约旦、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建立良好的关系。它也应积极推进和平进程。每半年派国务卿到该地区同其领导人磋商决无可能促进卓有成效的谈判。正如基辛格在1973—1974年穿梭外交中以及卡特总统在1978年戴维营所做的那样，美国必须运用其影响力把有关各方撮合在一起并使他们通过解决问题能得到好处。

和平进程的下一步必须以西岸和兵荒马乱的加沙地带的未来为重点。戴维·本·古里安的一句话可以指导我们的政策。他说主张吞并阿拉伯领土的"极端分子"将会剥夺以色列的使命。"如果他们得逞，以色列将既不是犹太人的国家，也无民主可言。阿拉伯人在人数上将超过我们，必须以不民主的、镇压性的措施使他们就范。"以色列的利益要求和平解决1967年占领的领土。如果以色列吞并这些领土，它将成为由两个民族组成的兵营国家，其人口约有一半是被剥夺了

公民权的阿拉伯人。而且，由于巴勒斯坦人出生率高，在这个犹太国家里犹太人不久就会沦为少数。如果它继续其军事占领和逐渐使这些领土殖民化，它最终会使敌视以色列的阿拉伯世界团结一致，而莫斯科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有可能进入该地区。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6年和1958年不让苏联进入中东。我在1973年也是这样做的。但是现在美国已不再拥有核优势，如果发生另一场中东战争，要使苏联人不进入这一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和平进程的前景进行诚实、公开的辩论，现在是时候了。所有各方都必须把宣传词藻冷却下来。那些偏离了某些支持以色列的极端分子所持的强硬路线的人不应立即被扣上反以色列的帽子。1981年我和另一些对以色列友好的人支持里根政府向沙特阿拉伯出售预警飞机，1986年我们又支持里根政府向约旦提供战斗机的计划，那时我们都曾被扣上反以色列的帽子。大家都必须明白，对以色列的邻国友好并不是与以色列为敌。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要求美国同温和的阿拉伯国家有友好关系。如果美国不能运用其牵制和影响的力量推进和平进程，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将是不可能的。

宣布独立总是作为在第三世界建立更健康和更有保障的社会的第一步。然而，令人痛心的历史事实是，独立并不能保证繁荣。绝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150年前独立后都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大多数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后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都过着负增长的暗无天日的日子。

西方国家对非洲满怀同情之心。西方的金钱也源源不断

流往非洲。1985年和1986年，数以万计的美国人和欧洲人慷慨解囊对埃塞俄比亚的饥荒给予捐助。他们把粮食倒入了政治污水坑，而不是送入饥民口中。几十年来，西方各国政府都是如此。1965年至1984年期间，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向非洲提供了两千亿美元以上的援助和投资，但是人民仍然挨饿，1983年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3年前下降了4%。严峻的事实是、尽管给予援助，尽管世界各国对它们关怀备至、意图善良，但一般的非洲人现在仍比1960年时更为贫穷。

原因在于那些政府太不象话。这些政府绝大多数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绝大多数都很腐败。绝大多数都是独裁政权。在共产主义的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人民的苦难是由蓄意采取的冷酷无情的国家政策所造成的。但是，除了北非的埃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等国以及诸如博茨瓦纳、塞内加尔、喀麦隆、马拉维、毛里求斯、象牙海岸和肯尼亚等几个撒哈拉以南国家之外，非洲的领导人一塌糊涂。就21世纪而言，非洲的教训是，如果使用外援的政府奉行糟糕的政策、世界上所有的外援也无法改善第三世界人民的生活。

有关的事例令人气馁、也几乎举不胜举。

埃塞俄比亚对救灾援助征收进口税，在税额最高时期这个由苏联支持的斯大林式政府从中筹集的款项超过了其最大宗出口品咖啡的收入。当数以千吨计的粮食在港口腐烂、沙漠上数以十万计的人民忍受饥饿之时，埃塞俄比亚为其共产主义革命十周年举行了奢糜的庆典，耗资一亿美元。在1984年至1985年饥荒时死亡的100万人中，四分之三是由于门格斯图总统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政策而丧命的。

扎伊尔的蒙博托总统是个大富豪。他用50亿美元的家财

为扎伊尔清偿累累国债之后仍有五亿美元余额供他生活之用。与此同时，1960年以来实际工资下降了。在扎伊尔出生的婴儿有一半在五岁之前夭折。非洲最长的蒙博托吊桥在1984年启用。该桥一层为汽车道，另一层为火车道。但附近并无铁路，启用后的头六个月，每天平均驶过该桥的汽车为53辆。

苏丹一座耗资数百万美元的糖厂因建造在沼泽地上而下沉。一座有20年历史的瓶装牛奶厂从未用来制造瓶装牛奶，因为没有冷冻牛奶的设备和将牛奶运往市场的交通工具。

赞比亚由于实行了价格控制，农民每生产价值一美元的粮食必须付出一美元购买肥料，因而不生产粮食更有利可图。

多哥一座耗资4200万美元的钢铁厂从1979年投产后至1984年期间有效使用率为22%，其部分原因是多哥没有生产钢铁所需的足够原料。

美国负有特殊责任的利比利亚是个经济和政治灾区。

1957年我访问加纳，目睹英国人把这个殖民地移交给受过美国教育的新任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那时我第一次有幸见到马丁·路德·金博士。我们叙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我们希冀这个首先取得独立的黑非殖民地将成为殖民时代结束后的非洲各国的楷模。我们两人都很乐观，因为加纳是第三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之一，其人均收入为朝鲜的两倍。去年加纳庆祝独立30周年时，它的情况一团糟。为满足恩克鲁玛的妄自尊大而修建的工程半途而废，工厂开工率只有五分之一，到处是一片凄凉的景象。

非洲的情况证明了未必只有共产党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才会妨碍外国投资、惩罚个人的主动性和储蓄、建立掌管经

济计划的臃肿不堪和寄生性的官僚机构。非洲各国政府的不稳定是尽人皆知的。从1957年加纳成为第一个获得独立的欧洲殖民地至1985年期间，非洲发生了72次政变，13位国家元首遇刺，以及几十场战争。尼日利亚、卢旺达、布隆迪和乌干达发生的内战和灭族罪行使300余万人丧生。

情况也并非一团漆黑。象牙海岸的费力克斯·乌弗埃－博瓦尼总统1960年在这个前法国殖民地上台执政时，他没有象许多其他非洲领导人那样把欧洲人赶走。他准许法国留下投资和技术人员并将利润汇回法国。目前在象牙海岸有35000名法国人，这是独立前的三倍。这些做法和整个黑非洲所奉行的政策大相径庭，黑非洲认为欧洲的影响阻碍进步，有损它们的民族自尊心。整个黑非洲的人均收入只有216美元，象牙海岸却高达1000美元。

四年前，多哥把一家难以维持的钢铁厂出租给一位美国企业家。1984年以前，这家工厂的380名工人每年的钢铁产量从未超过4000吨。去年150名工人生产了9000吨。其他国家政府也正为搞私有化而断断续续地采取了一些步骤。这是一个微小但却鼓舞人心的迹象，表明非洲各国正在接受乌弗埃—博瓦尼的教训：一个民族可以既保持其自尊又求得发展。

然而没有一点政治自由的人是无法有自尊心的，而政治上非洲仍然处于黑暗时代。44个撒哈拉以南的国家中，占黑非洲人口85％的40个国家的政府是未经选举产生的，也不以任何方式向人民负责。这些国家是：安哥拉、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吉布提、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象牙海岸、肯尼亚、莱索托、利

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斯威士兰、坦桑尼亚、多哥、乌干达、扎伊尔和赞比亚。津巴布韦在1979年白人少数人统治结束时建立起来的民主已风雨飘摇。罗伯特·穆加贝总理已要求建立一党制国家，并正对两大反对党采取镇压措施。

另一个不给黑人公民民主的国家是南非。这些受压迫的黑人占非洲41200万受压迫的黑人的5.5%。但他们受到西方官员和新闻记者的极大注意。南非黑人要求政治平等，我们希望他们得到政治平等。但是赞成是一回事，采取有效措施又是另一回事。蛊惑人心的言论无助于实现民主。

许多对共产党世界和非洲其他各国的苦难漠不关心的美国人对南非的种族不公正状况极为激动。理由之一是，这种矛盾的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正如两位西方分析家最近所指出的，“西方人士把南非当作他们自己在道德和政治问题上不满情绪的出气筒。他们的国内问题十分复杂、难以解决，便把南非当作一个方便的替身或类比的对象。”他们的愤懑情绪对许多西方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虽能带来一种满足，但并不能取代政策。不应为了使美国大学生、教授和报纸编辑感到他们在道义上是正确的而让南非发生流血事件。

我们的政策应是大力鼓励向分享权力过渡，但这一过程不应破坏南非的经济。南非黑人比非洲一般黑人生活水平高得多正是得益于南非的经济。非洲最大的黑人中产阶级在南非。南非的黑人妇女专业人员超过了非洲各国的总数。拥有汽车的南非黑人多于在苏联拥有汽车的俄国人。如果我们鼓励在南非采取暴力解决的办法，在南非造成流血、经济混乱

和崩溃，那么黑人和白人都会受害，只有苏联会从中得利。

苏联人已对非洲人国民大会下了不少本钱。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他们对民主的偏爱。去年一名年青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告诉一位著名的美国电视记者，他曾被送往苏联受训，学习游击战、破坏活动、窃取情报、恐怖行动等技术，这些都是准备用来对付南非白人的。有人问他如果他和他的革命战友一旦取得政权应如何报答苏联人时，他笑着回答说，"感激之情"，"仅仅是感激之情"。然而苏联人盘算要得到的并不是感激。他们觊觎的是南非。南非在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方面是非洲大陆最富庶的国家，战略地位也最重要。它是第三世界最令人垂涎的目标。莫斯科觊觎南非丰富的矿藏（其中有许多矿产是美国国防工业所仰赖的）以及运载90％西欧石油的绕过好望角的海上航线。

如果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革命者们获胜，非洲黑人将只是把非洲白人统治者换成俄国白人而已。如果美国能有助于使南非演变为多元化的、经济上繁荣的国家，它对其它斗争中的非洲国家将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榜样。如果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后台苏联在南非得逞，它只会成为极权主义独裁者的又一个榜样。

发动一场反对南非的种族战争并不是结束南非种族主义的办法，却是结束数百万人生命、结束黑人和白人的富裕生活和结束南非同西方亲近的办法。如果西方不断通过效果适得其反的经济制裁向南非经济进攻，如果非洲人国民大会所发动的在南非国内扩大影响、在国外争取合法性的运动继续得手的话，那么准会发生一场种族战争。

美国实行贸易制裁和美国公司被迫变卖资产一年半之

后，这些做法的失败已是有目共睹。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南非黑人并不比以前享有更多的政治自由。唯一的变化是，他们的经济地位更加虚弱。现在我们既已采取了惩罚性的措施，我们在外交上左右比勒陀利亚的能力就大大削弱了。南非政府还对不同政见严加镇压。被迫撤出南非的80家美国公司已无法继续实行使黑人生活大有改善的公平就业的做法。数以千计的人面临失业的威胁，一些温和派的黑人领导人也认识到实行制裁使黑人工人受害不浅，而对种族隔离政策却打击不大，因而已对他们一度鼓吹过的政策产生怀疑。

非洲人国民大会鼓励经济制裁以及其他他们希望会造成大批黑人失业从而提高他们“革命觉悟”的政策。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国会的制裁迄今尚未带来这一后果。当国会重新研究这些措施时，它可以决定要么强化这些措施，从而使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成为美国的政策；要么放弃这些措施，改而采取一项新战略，即以无情的外交压力和积极的经济刺激相结合促使比勒陀利亚在改革的道路上前进。由于这一做法不会给黑人立即带来民主，这项渐进的政策也许难以取悦美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但它符合南非黑人和白人的利益。

有人提出，非洲政府糟糕的原因在于非洲的人民绝大多数是黑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以外，黑非洲的42个政府没有一个成立于31年前。在拉丁美洲的20个国家中，15个在成为民主国家之前已独立了120多年之久。

1815年，当西蒙·玻利维亚还正在帮助实现这个拉丁美洲独立的新时代时，他问道，“你能想象一个不久前刚从锁

链下解放出来的人民腾空而起、自由翱翔而不跌入深渊吗？”

如果他今天还健在的话，当他读到有关海地的混乱情况、古巴和尼加拉瓜的共产主义专政、智利和巴拉圭的独裁政权以及墨西哥的经济危机时，他会感到颓丧。但是作为西半球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玻利维亚的目光会越过这些眼前的问题并指出拉丁美洲所处的历史地位仍然是大有希望的。拉丁美洲面临许多重大问题，但它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有人力和物力资源，足以解决这些问题并在21世纪进入一个自由而空前进步的时代。

1958年当我的南美之行由于暴乱而中断回国时，我说过只有在爆发革命或因足球赛引起骚乱时，拉丁美洲才会在美国报纸上成为头版新闻。我的话是寓庄于谐的。我们十分注意地球另一边所发生的事情，而对南北美洲的近邻却不甚关注。现在我们的注意力已集中在防止共产主义在中美洲扩散，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也应研究制订鼓励整个拉丁美洲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政策，以免其他国家再遭共产主义颠覆。如果南美洲巨大的政治森林一旦着火，我们扑灭中美洲后院灌木林火所取得的任何成就看来都将是徒劳的。

拉丁美洲最大的希望所在，也是其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人口众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拉丁美洲有一亿三千万人，同美国相近。今天，拉丁美洲有三亿人，美国只有二亿三千万。到下世纪中叶，拉丁美洲的人口将是北美的三倍。到1999年，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将是墨西哥城和巴西的圣保罗。在本世纪，拉丁美洲人惯于把美国称为北面的巨人。下个世纪，我们将会把拉丁美洲，尤其是两个大国，称为南面的巨人。

巴西和墨西哥说明了拉丁美洲所面临的挑战及其几乎是无穷的潜力。

人们把今天的巴西比作上个世纪末的美国。巴西幅员辽阔、大部分地区未经开发，是个多种族和多民族的国家，有13500万人口。它是世界上第五大国，人口居第六位、经济占第八位。不幸的是，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政治和社会发展的速度。巴西拥有一些第三世界最壮观的城市，而这些城市周围却是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一位友人曾对我把里约热内卢描绘为身穿肮脏内衣的美女。巴西还因是第三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而声名狼藉。

如果巴西当前的经济危机能够解决，巴西的民主就会得到加强，它的光辉前景就会有所保障。解决办法是自由贸易、更多的私营企业和在债务问题上取得合理的妥协。

巴西已是世界经济中的有力竞争者。巴西的经济计划官员应该开放其市场并使巴西同世界经济进一步结合。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对从巴西进口货物施加限制的话，我们就不能期望巴西采取上述做法。北面的巨人同南面的这个巨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军事上的盟国，现在它们必须通过对两国都有利的互惠贸易政策成为经济上的盟国。

为使巴西能在世界经济中进行更有力的竞争，控制全国工业约三分之二的巴西政府应开展私有化运动以降低其在国内经济中的作用。巴西人有经营企业的天赋。1986年100万人辞去有薪金的工作，开设了20万家新企业。政府应放手让人民去发展经济，自己集中力量改善社会状况。巴西人有一半年龄在20岁以下，这些人之中一半没有受过教育，几百万人仍

然生活贫困。

巴西的债务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政府不应因民粹意识的冲动而拒付债款或制订新的反对自由市场政策。另一方面，债权国政府和银行家不应向巴西和其它债务国提出无理条件，逼得这些政府不得不考虑拒付的问题。这种悲剧性的事态发展对债权国和第三世界的稳定都会起破坏作用。

今天巴西正经历着近代历史上一场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前途坎坷不平，但也会大有所得。巴西的领导和人民正在领略自由的一条最严厉的教训：一个对成功不封顶的制度有时对失败也不保底。

我坚信巴西会度过难关，因为我十分敬重巴西领导人的政治才能。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弗农·沃尔特斯将军也许是最了解巴西的美国人。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30年前一群暴徒由共产党率领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袭击了我们的车队之后，他告诉我说巴西人具有和葡萄牙有关的经历，这使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和那些以西班牙传统为主的邻国不同。他说，“你去参观斗牛时就会看出这种差别。西班牙人把牛杀死。葡萄牙人只逗逗牛。”巴西的领导人也有同样临机应变、明察秋毫的能力，他们避免使用暴力、确保安全而又不破坏自由。巴西在21世纪必将成为经济超级大国。

当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冲突象中美洲的火山一样爆发之前很久，夏尔·戴高乐说过，“中美洲只是通往墨西哥途中的一个小事件。”这个和我们接壤的南方邻国，人口8000万，是第三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由于它拥有巨大的人力和

自然资源，它的潜力极大。它的各方面问题也一样大。

1000多万美国公民是墨西哥后裔，在美国非法居留的墨西哥人可能也有这么多。两国在历史上也有过纠葛，有时是令人痛心的。许多了解这段历史的墨西哥人至今没有宽恕我们。19世纪的美墨战争和20世纪初一些美国公司对墨西哥资源的剥削都是美国帝国主义行径的突出而难以宽恕的事例。但是两国负责任的领导人现在应看到，我们不能继续因为过去在拉丁美洲的罪过而惩罚未来。

墨西哥和美国之间建立有利于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两国都是利害攸关的。美国人特别应学会给墨西哥人应有的尊重。1955年我参观墨西哥大学时，我向该校的教务主任纳布尔·加里略·弗洛尔斯打听他的学历。他说他在墨西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而为了取得博士学位他不得不进入一个历史较短的学校——哈佛大学！他以此不动声色但却铿锵有力地提醒我，在墨西哥人看来，美国还乳臭未干。我们可以不赞成墨西哥的中立外交政策和它的一党政治，但我们应尊重它走自己的独立道路的权利，如果这条道路并不敌视我们的利益。

墨西哥目前的严重经济危机使人们忽视了这一事实：它从1945年至1970年之间的年增长率为6％，这在第三世界是名列前茅的。70年代发现的石油既是福又是祸。墨西哥领导人看到石油财源茂盛，便乘机大手大脚地举债和挥霍；它坐失良机，没有把石油利润明智地用于使经济多样化和开发私营经济。相反，墨西哥变得过份依赖石油。它根据预估的石油收入向外借贷，10年中外债从400亿美元增至1000亿美元。油价暴跌后，墨西哥成了第三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之一，官僚

机构也使经济陷于瘫痪状态。政府目前控制全部经济的三分之二。由于受常见的通货膨胀、效率不高、贪污腐化的影响，政府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3%。墨西哥为不进一步减少对进口的严格控制和进一步刺激私营经济，它将继续每况日下。

墨西哥的下一任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能在危难之秋提供墨西哥所需要的领导。他是个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务实的第一流经济学家。如果他出面领导这个国家，而不是象他的许多前任那样只维持门面同时却窃取国家财富的话，他就必须作出决策：墨西哥应有国家控制的经济还是多样化的自由企业经济。

领导人只能因解决了重大的问题而成为伟大的领导人。如果萨利纳斯能打破墨西哥过去的枷锁，奔向美好的未来，他就能作为墨西哥最伟大的总统而名垂史册。

在1958年我的南美洲之行以后，我同波多黎各才能卓著的总督路易·蒙诺兹·马林作了一次颇为引人入胜的谈话。他对于在我的几个停留地点发生暴力示威深表遗憾。他说，“我对于我的拉丁文化传统深感自豪。我们拉丁系民族对自己的家庭一往情深。我们在音乐、文学和艺术方面显示了巨大的才能。我们是虔诚的教徒。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们的治国才能历来不佳。”他接着说拉美各国处理政务不是太严便是太宽——不是专政便是混乱。他最后说，“遵守秩序和享有自由应二者兼顾，这极为重要，而我们往往就是做不到。”

虽然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都在150年前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取得了独立，但民主政府的广泛建立却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仅十年前还只有以下几个国家建立了民主政府：

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牙买加、苏里南和委内瑞拉。其后又有十个国家加入了它们的行列：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秘鲁和乌拉圭。

上述情况给人以值得高兴的新启示，也使人们有理由满怀希望，但我们却不能无视这些事件的阴暗历史背景。除了个别国家外，拉丁美洲的独裁统治和动乱已有400年的历史。仅本世纪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就发生过 190 次政变和军事干涉事件。生活贫困者超过一亿四千万人，他们只有勉强糊口之粮和栖身之地。

拉美新兴的民主国家感到难以创造更大的繁荣或制定负责任的经济政策。这一地区的外债总额为4000亿美元。巴西、阿根廷和秘鲁的通货膨胀超过100%。虽然拉丁美洲有许多人对他们选举出的领导人已不抱幻想，但他们并不拒绝民主这个新生事物。但是如果选举产生的温和领导人拿不出摆脱贫困的办法，选民们可能选择那些保证有办法摆脱贫困的激进、反对民主的领导人。

把拉美的贫困归咎于美国已成为一种时髦，在知识界尤其如此。有些人声称美国进口廉价的拉美原料、高价出口工业品的做法使拉美无法摆脱贫困。这些“依赖派理论家”把拉丁美洲的困境归咎于外部因素而忽视了问题的内部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天主教的解放派神学家们还给这一自命优越的理论加上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的阶级所做的典型错误的分析。这两种神话相辅而行，能使这个预言自我实现。它们说拉丁美洲人太软弱，无力掌握自身的命运；他们太被动、无法解决自身的问题。这会使致命的共产主义毒菌赖以滋生的

漫无目标和停滞的状态永远延续下去。

把拉丁美洲的问题归咎于美国的人不妨想一想一个国家转而投靠共产主义时所发生的情景。多年来，人们对卡斯特罗的古巴发展模式交口称赞，认为它对拉丁美洲来说是个别开生面、有生命力的典型。现在这一闹剧已彻底戳穿。在卡斯特罗独裁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古巴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下降了。如果这一趋势继续下去，古巴式的发展模式会使古巴在1999年成为拉丁美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拉丁美洲的贫困并不是由于依赖美国，也不会因共产主义革命而得到解决。它只有放弃过去遗留下来的政府控制经济的做法才能使经济持续增长，造福全社会。中央集权统治下的经济及其恶果——管理不善、官僚主义和腐败——白白浪费了人民的精力。国有化工业、国家补贴、对物价和进口的控制造成了通货膨胀、赤字，使企业没有竞争能力、办事缺乏效率，并浪费了这一地区的资源，断送了其前途。

有迹象表明，拉丁美洲终于对经济集权所带来的不可容忍的情况有了反响。要求经济自主和改革的最响亮的呼声来自秘鲁。秘鲁是一个极其贫穷的国家，它力图在对付麻木不仁的政府官僚机构、同本半球最惨无人道的共产主义恐怖分子“光辉的道路”进行斗争的同时保持民主这一新生事物。从这个波谲云诡的环境中，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苏托发出了响亮的呼声。他的力作《另一条道路》研究了秘鲁地下经济所具有的非凡的企业活力。书中说明政府不是调动人民的干劲而是挫伤，而政府本来是能够以保护合法的产权和消除官僚机构的独断专行来做到这点的。德·苏托提醒我们注意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只要可能，

我们就必须以拉丁美洲的办法来解决拉丁美洲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另一条道路》应该成为同该地区以及第三世界打交道的所有美国决策者的必读书。

拉丁美洲需要扩大贸易以求繁荣。苏联人已经看到拉美的贸易潜力，这已成为他们最近派遣外交人员进入本地区时的一个主要议题。由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原因，拉美会认为同我们比同苏联人贸易更为可取。如果我们抓住这一时机，向拉美商品开放我国市场，同时鼓励它们向我国开放市场，我们有可能使西半球发展为历史上最繁荣的自由贸易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一届美国政府（包括我的任内）对拉美的政策是十分得当的。下一任总统务必结束这种忽视的倾向。为此他应避免继续用口号来窒息拉美。我们的“争取进步联盟”和“睦邻政策”收效甚微，使许多邻国境遇不佳。我们对拉美的最好援助是实行基辛格委员会关于向中美洲提供经济援助的建议，并将其推广至南美。我们的目标应是鼓励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

美国必须继续显示我们希望整个拉美实现民主和经济繁荣。如果该地区能调动人民的干劲和资源，它无疑会在下个世纪成为自由世界的一个经济巨人。

第三世界的唯一不变因素就是变化。我们毋需接受恩格斯的哲学也能看到他所说的“必须改变这个世界”具有深刻的号召力。第三世界问题成堆，将会也应该发生变化。唯一的问题是通过和平方式还是暴力方式；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留下的是专政还是自由。

当前有两种革命变革正威胁着第三世界。第一种是共产

主义革命。尽管20世纪已使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残暴和败绩无所怀疑，然而仍然有人不能忘情于暴力革命。他们长途跋涉到尼加拉瓜为桑地诺采摘咖啡、支持共产党人控制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恐怖行动，并把菲律宾残酷无情的新人民军称为“身边的好人”——以此助长共产主义的毁灭之火。他们舒舒服服地呆在远处，很少会亲身吃到苦头、失去家园或看到自己的亲人在深夜被带走。他们对历史一无所知、对时局自欺欺人。在革命眼看即将成为一堆焦土时，他们奇怪地保持缄默。

30年代他们是斯大林迷，直到斯大林在苏联大开杀戒。在50年代和60年代，他们把毛泽东当作英雄。这个“农村改革家”祭起了一场意识形态的狂飙，使几千万中国人死于非命。共产主义在1975年席卷印度支那以前，他们兴高采烈地为越共和红色高棉歌功颂德。当越南和柬埔寨新政权使这两个国家山河破碎、哀鸣遍野时，他们一时张口结舌——后来却又谈论起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的新共产主义革命者来了。儿童不应玩火，而这些主张共产主义革命的人是把第三世界当成游戏场所的意识形态上的儿童。

共产主义的具体实践已使仅仅15年前在第三世界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共产主义思想信誉扫地。凡实行共产主义的第三世界国家，无一能实现繁荣与和平。在亚洲，监狱式的共产党国家的经济死气沉沉、停滞不前，而其周边国家的经济却生机勃勃。在债务和发展完全牵扯在一起的拉丁美洲，古巴和尼加拉瓜人均债务最高、总增长率最低。在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已成常规的非洲，共产党国家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是最贫穷、最匮乏的。

在穆斯林世界，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成为暴力革命的主要手段。在讨论这一新近的现象时，至为重要的是我们切不可因为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极端行径而无视穆斯林传统的伟大之处。产生卡扎菲和霍梅尼的同一宗教也产生了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哲学家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但是，在穆斯林世界持偏激观点的激进分子所展示的革命前景同共产主义具有同样的诱惑力，破坏性也一样大。共产主义革命迎合人们的物质需要。穆斯林革命则迎合其精神需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许诺迅速实现现代化。伊斯兰的革命意识形态则是对现代化的反动。共产主义许诺把历史的时钟向前拨。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则要把它往后拨。

伊斯兰革命分子谴责共产主义东方的无神论和资本主义西方的物质世俗主义。1987年8月伊朗示威者在麦加狼奔豕突踩死了400名朝觐者。他们高呼“打倒苏联”，也高呼“打倒美国。”他们威胁西方在波斯湾等地的利益，也威胁苏联的稳定，因为苏联人口中有5500万桀骜不驯、在精神上受压迫的穆斯林。

共产主义革命分子和伊斯兰革命分子在意识形态上敌对，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以其偏狭的理想为基础，不择手段地取得政权，建立独裁统治。这两种革命都不会使第三世界人民生活得更好，而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但是这两种革命，总有一种会取胜，除非西方推行一种统一的政策来对付当前第三世界斗争中的经济和精神方面的问题。

第三世界中的变革之风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我们无法予以阻止，但却能设法改变其方向。当人们需要和要求变革时，

仅仅反对只会把局面搞得更糟的革命性变革是不够的。对于出坏主意的唯一回答是出好主意。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是一种信念。共产主义也是一种信念。正如惠特克·钱伯斯30年前作证时所说，“共产主义的成功决不会大于所有其他各种信念的失败。”

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区，特别是在穆斯林世界，仅有繁荣是不够的。伊朗便是一例。关于伊朗革命的神话是它是由伊朗国王的腐败、警察弹压和群众的贫困所造成的。这是错误的。在国王执政期间，伊朗的情况比该地区的任何其他国家（以色列除外）都好。伊朗人民的教育水平遥遥领先。1979年伊朗国王去埃及并死在那里之前不久，我在墨西哥见到了他。我记得他曾对我说，他把数以万计的学生派往美国留学，其结果却是这些人回国参加革命反对他。他解放了妇女，许多妇女却参加了使她们重新戴上面纱的革命。

霍梅尼的革命行反对镇压之名，实际上它是反对现代西方的价值观念。就镇压而言，它使妇女事业倒退1000年。它既恨资本主义，也恨共产主义，把它们看作是唯物主义的孪生兄弟。年青人支持他的革命，不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更多的自由和更好的工作、住房和衣着，而是因为他们要求得到一种超过唯物主义的信仰。伊朗人民在革命后得到的正是霍梅尼曾保证给予他们的待遇。至于这是否正是他们原先认为他们会得到的待遇则无法知晓，因为霍梅尼从不举行自由选举。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推行的是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而他们则满怀激情和信念予以接受。

西方的经济理想带来了增长和繁荣。西方的政治理想带来了自由。第三世界渴望两者都能兼得，但是由于西方善于慷

概解囊而却不善于传播其价值观念，共产党人和现在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便捷足先登填补了这一空白。有些人保证给各发展中国家带来繁荣和实现其理想，而实际给予的却是贫苦的生活和灵魂的锁链。从现在起至1999年这段时间里，美国必须一马当先开展一场运动从这些人手中夺回道义上的优势。

如果第三世界的人民认为我们只对在同苏联的冷战中取胜感兴趣，那么我们就会在争取人心的斗争中失败。第三世界的人民面临很多问题。共产党人至少还议论这些问题，而我们却往往只议论共产党人。

我们应发动一场争取进步的和平革命。为此我们就需要有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安全、经济和政治需要的有章法的和前后一贯的政策。我们应知道除非这三方面的需要都得到满足，否则，第三世界在下个世纪就不会成为和平发展的地区。没有增长的安全是空洞的许诺；没有安全的增长是靠不住的许诺；而没有政治发展的增长和安全则是没有实现许诺。

安全援助。向第三世界的友邦和盟国提供军援并非解决它们问题的唯一办法，然而如果它们要取得实现进步所必不可少的安全，在某些情况下军援却是不可或缺的。这类援助应伴以培训援助，其内容不仅限于如何使用这些武器，而且包括使受援国部队有良好的品行。

经济援助。1986年我们在外援方面耗资略低于130亿美元，约占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鉴于我们把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6%用于国防，我们为了准备一场可能永远不会打的战争所花的钱比准备一场我们有失败风险的战争——为第

三世界的繁荣而进行的和平革命——多花30倍以上的钱。国会现正在削减政府提出的外援要求。这是鼠目寸光、令人痛心的。但我们确有必要对我们的外援计划作一些重大改革。我们有大量援助分配不当。大量的援助养肥了第三世界的各国政府，维持了现状，助长了腐败，支持了镇压。过多的援助用于北方向南方转移财富，过少的援助用于创造财富。

我们分配援助应根据以下三原则：

1.援助不应没有附带条件。所有援助都应有明确规定、便于检查的目标。

2.凡有可能，援助均应为双边而不应为多边的。这一做法有极为必要的政治理由。援助应符合我国利益，否则国会不会批准。世界银行愿向共产党政府提供贴现贷款，这不符合我国利益。目前向多边机构所承担的义务应重新研究并检查其成本效益以及是否符合美国外交政策利益。

3.我们应坚持监测所有受援国政府的经济状况。我们应确保它们朝进一步私有化的方向前进并能吸引资金而不是吓跑资金。援助应用作创始资本，为建立以增长为目标的自由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条件。援助应鼓励成功而不是保证失败。它应有助于进步而不是维持现状。

贸易。第三世界需要贸易更甚于需要援助。如果我们向它们开放我们的市场，这些国家消除经济停滞状态就更有希望。而我们为了一己的私利，继续对农业给予补贴，就使第三世界糟糕的局面更加不可收拾。

食糖是个极好的例子。美国政府定价食糖每磅22美分，以此对我国效率低下但政治上却很有势力的食糖厂商进行补贴。国际市场价格便宜10美分。这不但使美国普通家庭在食

品方面的开支每年增加100美元，而且严重打击了第三世界的食糖厂商。生产和提炼食糖是许多穷国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且往往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演变的第一步。危地马拉、牙买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哥伦比亚、泰国、菲律宾等国的食糖出口占其收入的一大部分。仅在1985年，由于我国对食糖进口的限制使加勒比地区各国损失了二亿五千万美元的收入。

作为一个世界军事大国，我们在国际经济事务中不能采取偏狭的做法。这不是鼓吹利他主义。这是鼓吹为了自身的利益采取高瞻远瞩的做法才属明智，同时也是宣传这样一种思想：所有国家长期增长比个别国家短期采取权宜之计好。

债务危机。第三世界负欠的8500亿美元债务是西方70年代末期恣意贷款遗留下来的问题。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对美国的负债一样，它严重地拖了世界经济的后腿。有些人说这些债务国不该借这笔钱。另一些人说债权国不该贷给这笔钱。这些话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面对着的是一种状况，而不是一项理论。除非债务国能吸引投资，并通过盈利有足够的钱向发达国家购买各种进口商品，否则世界经济的局面就不会有大的改观。如果债权国坚持要求对方采取紧缩措施以全数偿还债务，那么第三世界各国负责任的领导就会被赶下台，取而代之的将是激进的、不负责任的、立誓要赖掉这笔债务的领导人。

美国和墨西哥1987年12月签署的协议只涉及墨西哥债务的一部分，更没有涉及整个第三世界的债务问题。但它为处理这一整个问题指明了道路。西方各国政府和银行应以第三世界各国政府的支付能力为基础，共同承担为这些债务筹集

资金。减轻负担对债权国和债务国都有利。双方达成协议、保证偿还一部分债款,比坚持全数偿还、最后完全落空要好。

政治成长。在整个第三世界,我们都看到这样一些国家,它们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基本需要一旦得到满足,便向民主推进。我们不应被动地等待发生这一演变。大力支持第三世界的民主事业,现在已是时候。为此我们必须否定两种无稽之谈。

第一是我们同第三世界的关系应死板地以人权问题为条件。这种态度,不管动机多好,是目光短浅和危险的。墨西哥诗人、评论家奥克塔维欧·帕斯说过,“道德不能取代以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向完全政治自由演变总是缓慢而艰巨的。美国直至70年前才允许占成人人口一半的妇女有选举权。黑人不享有充分的选举权,1957年通过了选举权法案之后才改变了这一状况。但是,我们如果因为某国政府在政治方面的人权不能和我国相比而拒绝同它来往,我们就不能帮助它实现民主。如果某个独裁政府不能把经济搞上去,该国人民就可能受共产党妖言的欺惑。如果该国成为共产党国家,人权问题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第二种无稽之谈是,第三世界在政治上应向联合国求教。虽然300年来的情况已证明了创造财富的经济规律,但是联合国却始终顽固而盲目地把重新分配财富作为其中心任务。这个世纪的情况已证明国家社会主义犯有血腥暴行,败绩累累,然而联合国却一直充当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喉舌,同时经常谴责民主的资本主义。

我们不应把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强加于任何人,但我们也应该毫不犹豫地公开宣布自己的政治价值观念。这意味着

阐明文职人员政府的原则、个人的权利和责任、在民主社会中国家所不可逾越的界限、法制以及警察作为非政治性专业人员所应起的作用。

这一任务不但应由政府、而且也应由私人组织来完成。劳联—产联设有一个致力于在世界各地发展工会的自由工会研究所。自由工会研究所阐明工会在自由社会中的作用，并与共产主义统治下工会成为国家以铁拳进行压迫的帮凶相比较，以此在第三世界工人中酝酿成立民主政府。美国商会下设国际私营企业研究中心。目的是促进私营企业这个民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另一重要部门。大学和商业学院应向第三世界各国有培养前途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金以使他们对自由企业有所了解。

1982年里根总统设立了国立民主奖金，目的在于推动全世界民主阵地的扩大。它监测选举的情况，向民主和非民主国家中的亲西方的思想库、民间组织、商业性会议、报社、妇女组织、工会提供资金。它光明正大地为鼓吹西方和美国的理想以取代国外那些行不通的制度而开展工作。它在许多对越战还耿耿于怀的政治家中不受欢迎，因为他们以宣传我们的理想为耻。因此，国立民主奖金每年为得到可怜的1500万美元都要国会斗争一番。如果我们真心实意要使第三世界繁荣、稳定、民主，我们就应在从现在到1999年这段时间里逐年增加这笔经费。

民主治国是一种需要有远见的艺术，而不是以许多高楼大厦、航空公司和水坝来满足浅薄的民族自豪感。我们应通过促进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民主治国精神、法治和人人都享有自由成为缔造民主的典范，而不应成为兴建标榜民主的建

筑物的典范。我们应使第三世界获得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但是最终我们还必须以各种办法强调那些使我们自己获得了安全与繁荣的政治生活中实质性的精神价值观念。

对于我们在第三世界的真正作用持怀疑态度的人，应考虑一下第三世界最雄辩的领导人新加坡的李光耀的话。1985年他问美国国会："美国是否想对以民主和自由市场为一方、以共产主义和受控制的经济为另一方的斗争撒手不管，而且是在它为争取第三世界民心的斗争即将获胜的时候？"

第 十 章

一个新的美国

夏尔·戴高乐有预知未来的天赋，绝大多数伟大的历史人物也莫不如此。他先于别人早早地预见到了希特勒的崛起所带来的危险，摩托化部队的惊人潜力以及法国在1940年战败和蒙受耻辱之后有可能恢复元气并在战争结束时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1959年他到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时，以如炬的目光观察了美国政治。这时，几个月后便要开始1960年的总统竞选。他对我说，“我不想干预美国政治，但我对总统候选人的建议是以‘为新美国而奋斗’的口号进行竞选。”他是对的。作为副总统，我无法采用这个建议，否则人们就会认为我不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账。但是约翰·肯尼迪的确以那个口号为主题竞选，并获得胜利。

我想向1988年的总统候选人提出同样的建议。罗纳德·里根和艾森豪威尔一样，是位深孚众望的总统。美国人民支持他的领导。他们很高兴美国现在在国外形象高大，在国内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增长和繁荣。他们钦佩他以高明的手法恢复了美国的威望，恢复了爱国主义在美国的崇高地位。但是美国人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总统候选人如果只是依样葫芦全套照搬里根总统的做法，只保证继续执行他的政策，

人们对这个候选人就会不予理会。

为新美国而奋斗的号召会深深地扣动美国人的心弦。安于现状不是美国人的特点。在美国历史上，宁静期和蓬勃变化期交替出现。但这种宁静历来只是表象，而不是实质。一种力的躁动在表壳下翻腾着。现状充其量只是进一步大显身手之前的小憩——稍事停顿、充满电池以便接受新的挑战。而美国历史周期中的另一个阶段破土而出，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对于伟大民族和伟大人物来说，真正的满足不在于玩味过去的成就，而只能来自从事新的冒险。

值此12年后21世纪便要来临之时，号召为新美国而奋斗更能鼓动人心。人们会日益感到，我们必须抖擞精神，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为美国在下个世纪的领导地位做好准备。我们的所作所为，对未来世界的面貌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如何领导、挑选谁领导我们，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成败所系确实是人类文明的前途。我们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下个世纪究竟是人类最美好的世纪还是人类最后的一个世纪。

我们应反躬自问：美国在下个世纪应扮演什么角色？1999年之后，领导世界的指挥棒是否将传给另一个国家？美国这个有史以来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在立国200年之后，是否已是夕阳西下了？套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我们现在目睹的是伟大的美国试验已经开始完蛋了，还是刚刚揭开了序幕？所有的人都经过同样的历程——呱呱坠地、求生图存、一命归天。绝大多数人是在他们已没有理由生存时死去的。国家也经历过诞生和死亡。但是，就国家而言，只有在它没有理由生存

时死亡才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有充分的理由生存下去——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为了别人。

要懂得美国的特点，我们就应研究我国的历史。如果我们对过去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对将来就不会有实事求是的看法。在我们庆祝美国宪法二百周年时，有些肤浅的人宣扬这种神话：美国的治国观点是从在费城聚会的那些杰出人物的头脑中象变魔术一般产生出来的。连一些开国元勋也说过要为“千秋万代”建立“新秩序”。然而，宪法虽然为未来开创了新秩序，但它却是牢固地建立在过去流传下来的一些古老原则基础之上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思想在独立宣言和宪法中都有所反映。然而，正如保罗·爱德华·戈特弗里德所说，“虽然洛克的教导影响了美国和法国革命，但是，其它诸如犹太基督教、古典甚至中世纪的原则对美国政府的建立和成长都有所贡献。”

开国元勋们的有利条件是可以在一张崭新的帆布上作画。但是，他们虽然不受过去僵化做法的约束，却对过去的伟大思想家们作了大量的借鉴。他们通过综合这些古代的伟大思想，创造了一种高于任何思想或其总和的新思想。

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但也是非常实际的人。他们对于建立一个人会不以人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新乌托邦不存幻想。他们知道人应朝着尽善尽美而努力，但他们决不可能希望达到这一境界——他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人所居住的并不完美的世界之中。他们知道没有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是无所作为的，而没有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却又是毫无意义的。他们想建造一种在他们谢世之后仍能存在下去的牢固结构。亘古以来没有人建造得如此巧妙。

虽然他们是革命者，但他们知道暴力革命将使他们功业毁于一旦。因此，他们提供了一个能够通过和平变革实现革命目标的进程。

推动他们的首先是一条原则。他们也许没有读过巴鲁克·斯宾诺莎的著作，但是他们首创的业绩却是斯宾诺莎言论的具体实践："国家的最终目的不是主宰个人，也不是以恐惧约束他们；而是使人人摆脱恐惧，这样他就能在有充分保障和不伤害他自己或他的邻居的情况下生活和行动。……国家的目的实际上是自由。"他们虽然赞美平等观，但反对以窒息个人自由为代价强制实行平等的任何制度——个人自由是人类创造力大发扬的必要条件。

在经历了施行邦联协定、政府过于软弱无力的那些混乱年头之后，他们想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强得足以保护人民的权利，但又不足以威胁这些权利。他们天才地建立了一种使政府的三大部门行政、立法、司法相互制约的体制。当时他们万万不会料到今天的各大公司、各大工会和新闻垄断集团的无边威力。但是，他们对于任何可能威胁人民权利的集权是会存有戒心的，因为他们认为自由、强大的人民是取得进步的必要前提。

一种只能称之为对他们首创的体制所怀有的神秘的信念推动了这些讲究实际的人。这无法在文件的字句中找到，但他们认为他们的创造不只是为自己，也为他人；不只是为他们的国家，也为别国；不只是为他们那个时代，也为千秋万代。他们不会妄自尊大地视美国为世界强国，但他们认为他们正在参与一项比他们本人伟大得多的事业。

他们不是糊里糊涂的空想改革家，但他们有自己的道德

与精神的价值观念。他们对于今天在资本主义世界似乎已占相当主导地位的人生哲学也许会感到骇然——许许多多人的行为都只是受自私的、世俗的和物质价值的驱使，都只崇拜金钱这个唯一的上帝。他们是保守分子，但他们的保守之中含有恻隐之心。

他们希望美国不但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且成为一个好国家。他们满怀爱国主义的激情，但他们知道爱国主义这个词的本意是热爱国家。他们希望自己的祖国无愧于这种爱。

为了了解美国在未来扮演的角色，我们应首先了解美国过去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世界舞台上不是个一般性的国家。我们在人类物质条件所取得的革命性进展中始终是一股中坚力量，在近代的伟大政治与军事斗争中也一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但是我们的作用还不限于此。我们还是一座意识形态的灯塔——具体体现了有关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独树一帜的哲学思想。

20世纪初美国还不是个世界性大国。经济上我们相对地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军事上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当各个帝国的庞大舰队已在海上称雄时，我们还刚刚有支小船队绕地球航行了一周——而我们的地面部队甚至比海军更弱。政治上我们奉行有意避免卷入旧世界的惶乱与纷争的政策。

与此同时，使美国的制度生机勃勃的理想产生了一种深刻的效应。它使我们对于我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的美好前景无限乐观。自从我国独立以来，美国人一直认为我们代表了比我们自身更高大的理想。托马斯·杰斐逊说，“我们的所作

所为不仅是为我们自己，而且是为了全人类。”亚伯拉罕·林肯称美国为“地球的最后的和最美好的希望”。阿尔伯特·贝弗里奇充满诗意地谈到美国的“天命”。伍德罗·威尔逊说，“一个爱国的美国人对国旗最感自豪的时刻是美国的国旗对别人、对自己都已成为自由的一种象征时。”

这些话都说在美国成为一个有名有实的世界性强国之前。我们对于我们所倡导的原则笃信不疑。我们的影响力不在于我们的军事、经济实力，而在于我们的理想及其所取得的成功在世界各国深入人心。我们不是以武力而是依靠我国的理想所具有的威力登上世界舞台的，这样的大国在历史上仅此一个。

我们在这个世纪中始终无愧于我们的理想。我们始终是世界上一股支持正义的力量。我们设法冲淡带来和平的凡尔赛条约的复仇性。希特勒曾保证帝国将存在1000年之久，我们是一个决定因素使他的保证落了空。我们努力在欧、亚两洲顶住苏联的扩张。我们在维护我们的理想时肯定犯过错误。但是，美国的理想主义——它有时很天真、有时误入歧途、有时热心过分——一直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作为世界性大国，我们的一个最大长处和最大弱点是我们从来没有效法旧世界的现实政治，以冷酷和玩世不恭的态度行事。

赫鲁晓夫1959年在莫斯科同我进行了厨房辩论后，想显示一下他的灵活性，以使自己有别于那些教条主义的同事们。他指着他的副总理轻蔑地说道，“科兹洛夫同志是个不可救药的共产主义分子。”赫鲁晓夫是在嘲弄科兹洛夫坚定的理想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美国人历来都象科兹洛夫。他们在对待世界的态度上一直是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们又和科

兹洛夫不同，并不一心只想把自己的理想强加于全世界。这是我们的值得称道之处。对于美国人来说，不能仅以对我们有利为理由来说明某一项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它还应和我们的理想合拍。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说，只有我们对自己行动的正确性深信不疑时，才符合我们的利益。

在这一世纪，尽管各种变化风起云涌，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但我们坚持走我们的道路。1899年时没有人会预言这一世纪在物质方面的空前发展，使各国的生活条件都有改善，现在连穷人也比以前吃得好、住得好、有更好的医疗条件、寿命也更长了。没有人会预言人类将分裂原子、探索太空、发明电脑。没有人会预言在两次世界大战和100多次小战争中将有100余万人丧生。没有人会预言美、苏将取代英、法、德成为主要世界大国；欧洲各帝国将瓦解；极权共产主义将统治世界人口的35%。

这些变化虽大，但和将在21世纪发生的变化相比，将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在目前就确定美国应在将来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的潜力似乎是无限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强、最富的国家。我们能在世界各地投放我们的军事力量，能对当代一切重大政治问题施加影响。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经济、政治制度在国际上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有吸引力。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如果准许的话，世界各地有几亿人将向美国移民。

但奇怪的是，一种新的否定主义今天正使美国身受其苦。越来越多的学者、教授、政客众口一词地谈论美国经济力量

和政治领导地位的衰落。他们声称我们已目睹了美国世纪的结束。他们振振有词地说美国文明已登峰造极，现在面临江河日下的颓势已难以挽回。他们指出了我们周围的种种衰败的征象——年青人吸毒成瘾的问题、教育危机、鼓吹保护主义以及孤立主义颇有吸引力，等等。巴西甚至在篮球赛中打败了我们！

新否定主义者是否正确？上述种种是否证明美国最伟大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只有我们听任新否定主义宣扬者的悲观情绪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才能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我们和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不同意先决论的历史观。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有所选择。我们有继续扮演一个世界领导者的资源、实力和能量。我们能在21世纪成为一股主持正义的力量。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尚未得到回答：我们是否具有扮演这种角色的国民意志？

新否定主义者声称美国的国民意志已一蹶不振。卡特总统在戴维营同顾问们举行了那次广为人知的会议之后宣称美国已沉疴不起。他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是对的。但他宣称美国人民染上了这种病症则是错的。事实上是美国的领导阶层感染了这种足以致命的病毒。新否定主义者也受了感染。美国人民不是失败主义者。他们会对强有力、负责任的领导作出响应。问题在于我们的领导阶层缺乏这种领导素质。

如果莫斯科在美苏角逐中获胜，原因将是美国领导阶层的失职。正如罗伯特·尼斯比特笔下所见，“我们似乎又生活在一个患有明显‘神经衰竭症’的时代；患者不是大多数美国人，而是意识形态卫士和知识分子。”在过去40年里，在教育、财产和权势方面身居上层的美国人在世界事务中迷

失了方向。他们每看到一种时髦的思想便对之一见倾心。当前颇为风靡的是裁军与和平主义，而这对西方的命运可能是个祸殃。如果美国社会的决策者们以及那些能影响他们的人丧失了领导的意志，那么美国的大多数人可能也无法挽回失败的狂澜，这是一大危险。

里根总统已经证明了坚强的领导会有多大的魄力。尽管那些自称为出类拔萃之辈者几乎一致地反对，他在1980年和1984年都以压倒多数获胜。获胜的原因在于他号召美国人屏弃70年代的否定主义和孤立主义，朝着在国内创造各种机会、在国外起领导作用的新时代迈进。里根政府的内外政策的功过尽可商榷，但没有人能否认里根总统的达观而自信的风格使美国人恢复了有所作为的精神。虽然伊朗和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事件影响了里根总统政府的形象，但他留下的一项重要遗产将是当他离任时美国人民会比他就任时情绪高昂得多。

然而，右翼和左翼人士都问，美国国内已有许多燃眉之急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在世界舞台上粉墨登场？许多人因为我们在越南的失败而感到幻灭。使另一些人灰心绝望的是，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贪污腐化，把美国援助的几十亿美元浪费在中饱私囊和政府办理的无价值事情上。这些领导人又在联合国辱骂我们，更使他们气愤至极。右翼批评者认为美国十分高尚，不应被肮脏的世界政治所玷污；左翼批评者则认为美国不够善良，难以对世界作出任何贡献。这些新老孤立主义者认为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虽受破坏，但早已得到恢复，他们都想把领导世界的主要负担转嫁给欧洲和日本。

我们应历史地看待美国今后在世界上的作用。本世纪初，美国是否起世界性作用无关紧要。这个任务可由和我们有相同价值观念的其它国家承担。当我们临近下一世纪初时，情况已不复如此。由美国扮演主角是极为重要的。如果美国退回到新孤立主义立场上去，那么没有一个和我们持有相同价值观念的国家拥有可以取代我们的必要力量和意志。而与此同时，苏联这个敌视我们的价值观念和利益的国家必将取代我国。

如果我们退缩，我们就会把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拱手让给苏联；我们就使苏联能安然在这个世界上进行统治和扩张；我们就会看到和平与自由迅速地寿终正寝，而当21世纪晨曦微露时，全世界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野蛮时代。如果我们退缩，我们最终将发现自己成为赤色海洋中的一个孤岛。我们会取得和平，但那将是退让与失败的和平。

因此，我们必须驳斥新孤立主义的一套做法：撤出欧洲、减少对盟国的核保证、设立保护主义的关税壁垒、停止援助自由战士、退出意识形态斗争。在超级大国的角逐中，如果美国占上风，世界各自由国家便能安居乐业；如果苏联占上风，自由国家便岌岌可危。苏联式的暴政以扩张求生存，而自由则是在生存中得到扩展。但是，为了扩展，首先必须生存。

我们应继续肩负领导的重担，这不但是为了别人，也为我们自己。戴高乐写道，“法国只有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时才显出其英雄本色。”各国无不如此。个人也是如此。但美国尤其如此。只有我们矢志不移地要成为世界上一股活跃的主持正义的力量，美国才能忠于它的立国原则。只有我们

矢志不移地参与缔造人类文明未来的伟大事业，我们才能问心无愧。

在21世纪人类将改造世界。我们应在这项伟大事业中起核心作用。我们将通过一场惊天动地的技术革新在物质上改造世界。我们应通过一项实现现实和平的战略努力在政治上改造世界。同时，我们对于人类的精神世界也不能有所忽视。

科学的进步将在21世纪改变物质世界的面貌。据估计，90％的科学知识是在过去30年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知识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将翻一番。在其后的年月里，科学将以幂级数的速度发展。一个大规模的知识爆炸即将到来，然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会变了个样。

在1999年之后的年月里，我们将看到一整个、一整个新的工业部门发展起来使我们的生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将能以化学燃料电池制造行驶1000英里以上无需充电的电气汽车。超导材料将改变电力的传送和生产。合成燃料技术将使石油永远供过于求。我们将解决聚变核反应堆的问题，从而生产出一种用之不竭的洁净能源。我们的儿孙在21世纪回顾历史时对过去的能源危机将感到茫然不解。

我们将会看到医学技术的巨大进展。在生物技术方面，我们将制成可靠的人工脏器供移植之用。我们将发明新办法使受损的大脑和神经组织恢复功能。我们将研究出药物给关节炎患者舒经活络。我们将制造能在人体内扫瞄以诊断各种疾病的机器。通过对脱氧核醣核酸酶的研究，我们将根除几十种疾病，甚至根除癌症和艾滋病。在我们的子孙中，享年100岁将已不足为奇。

我们将终于能够解决世界的饥饿和贫困问题。我们将看到脱氧核醣核酸酶的研究人员培育出产量更高、更有效利用阳光、能抵抗疾病和虫害、能在贫瘠的土壤中生长的新品种作物。饥荒将成为历史。未来学家赫尔曼·卡恩预言，美国建国时为200美元、今天约2000美元的世界人均收入，在21世纪将增至20000美元。

我们将看到电脑继续发生革命。我们将使声控文字处理机更臻完善。我们将使电脑的运算速度有整个数量级的增加。我们将制成人造智力——不仅能执行复杂计算、而且能进行创造性思考的电脑。我们将看到机器人技术取代传统制造业。只要20年以后，一台雪茄盒大小的电脑的储存量将相当于10个美国国会图书馆。而这和将在21世纪晚些时候开发的技术相比又只是雕虫小技了。

这些只是我们能够预见到的几项变化——它们和无法预见的变化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美国应永远是技术革命的急先锋。为此，我们应提高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我国商界巨子应开始筹划下个世纪，而不要一心只想着下个季度的利润。我国的教育家应严肃对待如何在各级建立第一流的教育体制。我国的政界领导人应顶住保护主义的冲动，因为高筑关税壁垒只是虚弱和衰败的国家逃世的办法。

我们还应克服60年代的反技术综合症。在核电力领域尤应如此。反核院外集团分子使兴建核发电厂成为不可能。他们声称关心对环境造成的危险。但事实上核电力是最洁净的能源。而且，西方核电厂和苏联切尔诺贝利电厂不同，有多层次的安全系统。此外，我们将看到随着技术的进步，核电厂有内在的安全保障。在这样核电厂中，如果反应堆温度过

高，核连锁反应将自动关机。在核电力身上我们看到了未来——而且它是可行的。

如果美国要从大有希望的下个世纪得到好处，我们就必须驳斥反技术主义者的喧嚣。如果听从这些当代卢德派分子[1]的主意，随心所欲地反对科学进步，我们就会使美国的技术陷入死气沉沉状态。

我们必须再接再励，献身于探索太空的事业。我们将为实用目的而探索太空，如发射通讯卫星和设有实验室的空间站，以在完全失重状态下生产医用疫苗和无疵工业晶体。但是我们的作为不能仅限于此。我们必须重振探索精神。俄国人1957年发射人造卫星后不久，一位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探索太空可能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他指着一张列有气候、通讯、医药研究等十个项目的图表，然后转身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说，“总统先生，也许我们会取得的最重要发现没有列在这张表上。”这才是探索太空的最好说明。发现美洲大陆的人也曾以为他们发现的是东印度群岛。

20世纪人类登上了月球。21世纪人类将在火星上行走，然后越出太阳系，奔向其它星球。我们必须参加，哪怕只是为了投身于这场激动人心的冒险和这项具有挑战性的事业。在这些伟大的努力中，我们能使美国精神变得更高尚，我们能为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一致，我们会为群策群力地做到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单枪匹马做到的事情而感到自豪。

在我们使物质世界改变面貌的同时，我们必须努力在政

① 指19世纪初用捣毁机器等办法反对技术革新的自发工人运动。——译者

治上改造世界。20世纪我国在技术上的进步超过了政治上的进展。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在下个世纪重演，因为我们的物质水平已高度发达，如果不伴之以政治上的进展，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彻底毁灭。在21世纪，如果我们不仅要使我们自己而且使全人类取得最大的物质进步，我们就必须想办法在减少战争可能性和分享和平好处方面取得更大的政治进展，以与我们的科学进步相匹配。

我们的政治任务同更高级的新发明相比，将艰巨得多。我们可以预期政治与经济力量平衡在21世纪将大起变化。美苏在下世纪初仍将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但往后情况如何就难以预料了。照目前的增长速度看，日本将在国民经济总产值方面超过美国，而且随着其政治力量的上升，军事力量也将相应地强大起来。中国将成为经济、军事超级大国。如果西欧除了经济实力之外又能在政治上团结，它也将跻身于超级大国之列。我们将不能够再凭藉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优势进行领导；我们应以高超的政治远见进行领导。

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和下世纪初，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将是美国和苏联。我们将看到托克维尔早已深刻地预见的这场大规模角逐达到高潮。我们将面临两大问题：我们能否避免核战争？我们能否避免不战而败？我们必须努力设法避免能带来无穷无尽进步的科学能力被用来制造无边无际的毁灭。同时我们还必须保卫我们的制度和价值观念，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一件最有希望的事态发展是戈尔巴乔夫认识到有必要处理濒于绝境的苏联国内问题。他承认苏联的制度在若干重要方面失败了。他知道不能把以巨大代价换来的军事力量优势

用来对付他的主要对手，否则便会招惹一场大灾难。他知道他的国内经济问题牵制了他在世界各地争夺影响的能力。他知道莫斯科向与其毗邻的领土不断扩张已在各条战线上都遇到了强劲的反对者。他知道他面临的问题至少需要一代人才能解决。他需要一代人的和平——或更确切地说，一代人不打仗。

我们的任务是利用这20年时间为自由与现实和平的事业制定议程。首先我们必需驳斥在我国各名牌大学、新闻界、大企业和政界中的新否定主义分子的意见。他们的做法中最令人不安的一个方面是新孤立主义。这些受了这种新型致命性病毒感染的人和老孤立主义者不同，他们不仅反对美国卷入国外事务，而且反对国内的防务计划。他们害怕发生另一个越南或爆发核战争，这种双重恐惧的心理使他们惴惴不安，不敢大胆地面对苏联构成的威胁。每当西方利益出现险情时，他们只能告诉你如何回避苏联的威胁。他们对危机的反应总是不出人们之所料：把它提交给联合国——那实际上意味着不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仅在20年之后苏联就会恢复活力，把目光转向新的扩张，那么我们就刻不容缓。我们应该敢想敢做。我们应努力为这个世界勾划出轮廓，但我们不应按照自己的面目来改造这个世界。我们应认识到，对我们行得通的制度对于经历不同的其他人未必行得通。我们应批驳道德相对主义这一时髦但内容贫乏的理论。我们笃信我们的价值观念。但是这些价值观念中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不把它强加于人。我们的价值观念只能以示范的方式向其他人传播，而不能强制他们接受。

我们应使美国战略威慑力量不易受到苏联的第一次打击，以恢复其可信性。我们应加强在诸如欧洲、朝鲜和波斯湾等主要战区的常规力量，使苏联领导人打消能够只靠常规力量赢得一场战争的念头。

我们应利用莫斯科经济力量的衰落改善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竞争地位，加强我们的友邦，同希望成为我们友邦的国家改善关系。我们应继续同世界上其它几个主要力量中心——西欧、日本和中国——建立合作关系。我们应帮助那些正为防止共产主义取胜而战斗和正在努力把已获胜的共产党赶下台的人。我们还应致力于改善其它国家的生活条件，以削弱共产主义口号的政治吸引力。我们应说明，即使没有共产主义威胁我们也会致力于减轻使世界上大多数人备受折磨的贫困、痛苦、疾病和不公正的现象。我们为国外的进步投资，就是确保了国内的进步。

我们应利用同莫斯科的谈判显示：在矛盾无法调和的领域我们坚定不移；在可能达成协议的领域努力达成互利的协议；增加苏联社会同西方的接触；并视苏联人在国际上的表现，相应地同他们建立一种建设性的关系。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自欺欺人地认为美苏紧张关系的缓和意味着矛盾的结束。如果戈尔巴乔夫强调必须解决苏联国内问题，我们不应随之臆想苏联的制度已经改变或认为对西方的威胁已不存在。西方有些人认为他已经放弃了苏联要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这些人应看一看他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七十周年时讲话的最后部分：“1917年10月我们同旧世界分道扬镳、一刀两断。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的世界——共产主义世界。我们决不会背离这条道路。”即使戈尔巴乔

夫在推行改革时，他仍会要求满足苏联的利益并向我们的利益挑战——而20年后他则会大刀阔斧地卷土重来。如果我们在1999年前采取必要的行动，我们对他就能严阵以待。

我们必须防止高枕无忧的危险。正如保罗·约翰逊笔下所见，“历史的一个教训是对任何文明都不能掉以轻心。无法保证任何文明能够万古长存。如果你的牌打得蹩脚、一再出错，一直在等着你的黑暗时代很快就会到来。”我们不能听任西方文明落个这种下场。我们拥有必要的物质和道德储备力量，但我们还必须显示出我们有取胜的手腕和意志力。

当我们注意物质需要和政治问题时，我们不应忽视处理人类精神范畴的必要性。

美国倡导某些哲学思想，新否定主义分子侈谈美国的死亡时，他们的论点不仅是美国已丧失了出面领导的意志，而且已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他们指出这个问题是对的。过去许多文明的衰落不仅是因为它们已懒得为进行领导而作出必要的牺牲，而且也因为它们已丧失了目的性和方向性。一个对自己的理想丧失了信心的国家不能期望其理想对他人有吸引力。

为了恢复信心，我们必须寻根。两个世纪前，美国军力弱小、经济贫困。但是在美国革命中诞生的这个国家对全世界是个鼓舞。我们的吸引力并非来自我们的财富或实力，而是来自我们的思想。目前我们经常强调我们的军事和经济力量。虽然我们在某些特定的日子歌颂我们立国的原则，然而我们日常谈话则是以有关物质享受的信息为主。

但是这个世界的意义不仅在于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人均统

计数字。几百年后当历史学家编写我们这个时代时，他们将记述对于人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之间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斗争。美苏之间的竞争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人间经历之间的斗争，它们分别以利剑和精神、恐惧和希望为代表。苏联的制度靠利剑统治；我们的制度以精神治理。他们靠征服扩大影响，我们则藉助于榜样。我们所熟悉的是自由、不受束缚、希望和自我实现；他们熟悉的是暴政、屠杀、饥饿、战争和弹压。这些品格使得苏联取胜的前景令人不寒而栗，但也正是这些品格使苏联可能取胜。

我们认为个人是第一位的；苏联人认为国家是第一位的。我们主张政府的权力应是有限的；他们则信奉由党和国家掌管一切权力的极权主义制度。我们的制度旨在使个人在不违反公共秩序和不侵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有最大的活动余地。我们解放了个人的创造力，而苏联人则囚禁了他们之中最有创造力的人。我们创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制度——其最令人艳羡之处不是它的产品而是它的自由——而苏联人则建立了一个被官僚机构窒息的停滞的社会。

莫斯科利剑的魔力无法击败西方精神的威力。斯大林曾有一次挖苦地问起罗马教皇指挥多少个师，以此嘲笑教会影响世界上各种事变的能力。这样的评论说明他不懂得是什么推动这个世界前进。归根到底，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决定历史。当深知世界如何运转的政治家们以强大的思想为武装时，更是如此。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便是个极好的例子。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宗教领袖。他对各国、各种族、信奉各种宗教的男男女女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其中奥秘何在？这不仅是因为他

身居高位、衣著华贵、仪从煊赫。也不是因为他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语言天才，为人热情，善于借助电视的影响。群众倾听教皇讲话是因为他们想听听他说些什么——不仅关于宗教，还有神秘的生活和精深的治国之术。他使富豪和穷人摆脱生活的苦闷、单调和乏味。他使他们看到，如果人能听从林肯称之为人性中善良的安琪儿的忠告，人能达到一个多么崇高的境界。这种信念是反对宗教的共产主义所无法战胜的。

当这位新上台的苏联领导人今后去美国各地旅行时，除了让他参观游泳池、购物中心和我们的几百万辆汽车之外，更重要得多的是，使他看到和感受到创造了这些东西的精神和思想。如果我们同苏联在物质上竞争，我们将取胜，这是因为我们制度行得通，他们的制度行不通。但是我们最大的长处——从我国独立以来便是如此——在于我们的思想。在这一方面莫斯科根本无法竞争。马列主义已经技穷，对这个世界拿不出什么新的招数了。我们享有的自由却使我们能够在时代的变化中探索其新的涵意。

美国的立国者们要求享有宗教自由，享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权利和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解追求生活的真谛。对于我国这一生气勃勃的原则，我们不应视而不见。我们不应听任我们同莫斯科的竞争蜕化为比赛谁能生产更多的炸弹、建设更多的摩天楼和创造更高的人均国民经济总产值。如果我们的目标仅在于物质财富，我们和共产党人就没有区别了。我们应听从马克斯·韦伯的告诫，谨防具有破坏性的、自私的唯物主义——人类精神的官僚化是囚禁西方的“铁笼子”。我们应把美苏竞争引导为辩论谁家的思想不仅能造就

最强大或最富足的经济，而且还能造就最公正的社会。

共产主义者否认有上帝，但是，无可否认，共产主义是一种信念。我们认为它是一种错误的信念，但是对于错误信念的回答决不能是没有信念。200年前美国孱弱而贫穷，那时支持我们的是我们的信念。当我们进入第三个世纪和下一个千年期时，我们对自己的信念应重新有所领悟、重新注入活力。

我们在这一方面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使所有美国公民都能充分地分享美国的成就。我国的开国元勋们创立了一个以平等和自由为基础的制度，这就为后来者留下了未竟之业。他们知道他们的社会和他们的理想之间还有差距，特别是由于还存在奴隶制。但是他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制度会逐渐演变并终有一天会符合他们的理想。我们必须继续为此努力。我们必须解决城市下层人民、无家可归者、穷人和生活条件极差者的问题。我们必须纠正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美国大多数黑人的目前状况比24年前民权法案通过时没有改善，这是我们过去的污点和对我们未来的挑战。几个月前一个一岁半的女孩跌进枯井时，我们都为之难过。我们应重新发扬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和世界各地人们当时情真词切地表现出的恻隐之心。

我们不应重新采用过去已告失败的政府计划。但是我们也不能以这些失败为借口不再进行尝试。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采取新的做法。穷人的态度以及社会对待穷人的态度都应大大改变。我们已懂得解决贫困的问题不仅是给穷人发钱，而是更为复杂。我们在对贫困采取建设性行动之前，必需对这个问题先进行一番独具创见的思考。

如果我们年青人的创造力都消耗在单纯为自己追求金钱利禄和社会地位上，我们就不会取得进步。尼采写道，他预见有一天这种世俗的唯理的价值观念会取胜，并从而使文明沦亡。他告诫说应防止出现他所谓的“最后的人”，即一心只想过安逸和舒适的生活、无法振作精神从事崇高事业的人。尼采正确地认为最后的人是个讨厌的家伙。我们可以同意尼采的看法而无需接受他的否定主义。指导西方的哲学思想如果蜕化为拉塞尔·柯克所谓的漫无边际的自私自利，西方就会毫无作为。

20世纪60年代我们接受了一种错误的看法，即我们只要确保人民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关心，我们就能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上述各项都很重要，但是，局限于物质占有范畴的生活是空虚而痛苦的。我们应牢记圣经的教诲：“人不只靠面包过活。”

自从有文明开始，对生活真谛的探索便一直不断。它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最后的答案总是扑朔迷离。但是，我们应作这种探索，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通过这一探索我们可以为自己开创一种更丰富、更美好的生活。一些人认为会在经典中找到答案，另一些人则求助于宗教。我们认为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真谛不存在于唯物质主义之中，不论它是共产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根据最高法院的裁决，我国宪法要求我们不在学校里讲授宗教。但是，使宗教脱离教学并不意味着拒绝生活中的宗教。世界的几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鼓舞着人们，这是因为这些宗教注重精神方面的价值观念和实现人的抱负。

我们有必要恢复对我们的理想、命运和我们自身的信念。我们活在世上不只是为了享乐和自我满足。我们负有创造历史的使命——不漠视过去、不毁弃过去、不向过去倒退，而是奋发向前、积极向上，为未来开辟新的前景。

除了现已面临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大问题之外，我们还应注意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希望美国以哪些成就载入史册？难道我们希望后人在缅怀美国人民时只想到他们曾建造最高大的楼房、驾驶最高速的汽车、身穿最华丽的衣服、培养出最优秀的运动员？难道我们希望后人铭记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摇滚音乐歌星比优秀教师更受人钦佩？相貌俊美比远见卓识更令人倾倒？适于拍电视的素质比真才实学重要、粗野的举止比端庄的品格重要、耸人听闻的渲染比事实真相重要、丑闻比好事重要？或者我们还是希望后人记得美国人民曾创造过伟大的音乐、艺术、文学和哲学，在世界上曾以一支为正义而斗争的力量显示过身手，并曾致力于探求生活的真谛和更崇高的目的？

我们应校正我们的哲学思想方位——重新奉行我国那些生气勃勃的原则，并再次下定决心为根据这些思想使我国社会更臻完美而贡献自己的一切。我国最伟大的天才都在战争中脱颖而出，这已成为一种传统，也是个悲剧。战争使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团结一致，竭尽全力。这在和平时期较难做到——但我们应以此为目标。应动员打一场战争的全部力量来缔造更美好的和平。我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回答是：为新美国而奋斗。

圣托马斯·阿奎那说过，“如果船长的最高目标是保住

他的船，这艘船永远出不了港。”海面可能有狂风暴雨，但矛盾是创造之母。不冒风险就不会失败。但不冒风险也不会有成功。我们决不应因成功而满足，也决不应因失败而气馁。归根到底，关键在于一项伟大事业的召唤、承担和威力。它是我们梦寐以求、推动我们前进的理想；它比我们都高大，象整个世界那么大。

在战争时期，荣誉勋章颁发给在本职工作之外有突出表现的人。在和平时期我们不应只满足于完成本职工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完成本职工作的道德观对于一个伟大国家的人民来说，要求偏低。我们应有更高的要求，即朗·富勒所谓的壮志凌云的道德观——献身于把我们的潜力最充分地转化为现实，以无愧于正在作出优异成绩的人民。

希望后世在缅怀我们的时候不仅认为我们是爱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的好人。希望他们记得我们是一个伟大的人民，记得我们在接受本世纪至高无上的挑战——为自由不战而胜——时，我们的表现不仅限于履行自己的应尽之责。

我们是否正目睹美国革命的苍茫暮色？我们是否正眼看着西方文明开始退入一个新的黑暗时代——苏联极权主义？或是焕然一新的美国将为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领路，走向一个新的黎明？

1946年丘吉尔在威斯敏斯特学院作铁幕问题讲演时说过，“此时此刻，美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已是登峰造极。对于美国民主来说，这是个庄严的时刻。因为实力最强者对未来也负有令人望而生畏的责任。”这些话说于42年前，但今天仍然一样真切。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１９９９年不战而胜
作者＝
页数＝３３８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